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之五

梦

萦

秦

望

山

蒋遂 著

任行 上

杭大人出版社

图书编目数据

梦萦秦望山/蒋遂。--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杭大人出版社，
2020.3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 5）

ISBN 978-1-970152-14-2

I. 梦萦秦望山 II. 蒋遂 III.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 IV. 杭州大学一回忆录；蒋礼鸿一回忆录；盛静霞一回忆录；蒋遂一回忆录

梦萦秦望山

蒋遂 著

责任编辑：温时幸

封面图片：倪建勇

封三题诗：施建基

印章设计：任 平

出版发行：杭大人出版社（Hangdaren Press）

地 址：2376 Timbercrest Court, Ann Arbor, MI 48105, USA

网 址：<http://www.white-clouds.com/hdrp/>

电子信箱：shixingwen@yahoo.com

开 本：小 32K

定 价：免费阅读

出版日期：2020年3月22日

国际书号：ISBN 978-1-970152-14-2

夢繁春望山

倉松敬署

2016年10月

谨将此书献给爱妻郭敏俐（1956-2019）。



自序

秦望是一座山
秦望在之江边上
之江就是浙江
浙江就是钱塘江
之江边上有一座秦望山
秦望山面向之江
秦望山上原有一所大学
叫之江大学
之江大学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有一天他们生下一个小孩
那小孩就是我：
“秦望之子”。

之江大学所在的葱郁山麓，人称秦望山，这是有据可查的。尤其是在钟钟山先生、夏瞿禅先生、任心叔先生和我父亲蒋云从的诗文中，我不止一次见到。可是这到底是不是秦望山所在，却是大可以商榷的。近年有人在《浙江学刊》撰文说此山非彼山，言之确确。就我而言，倒是非常喜欢“秦望山”这个称谓，“秦望”据说是秦始皇南巡系舟之处。多么的有历史内涵和富有诗意啊！之江大学所在地，一般之江人还称作之江山，也是非常贴切的。

1934年，父亲由浙江嘉兴秀州中学保送考入之江大学。秀州和之江都是教会学校，父亲中学没毕业就到之江实习，这是在他自己写的文章中，我所看见的。1938年毕业，他留校任

教半年后追随恩师钟先生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后因婚姻问题去重庆中央大学，并与母亲盛弢青结婚。1945年抗战胜利，随学校返回南京。1947年被南京中央大学解聘，携母亲重回之江大学。再后来，他们经历了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

1952年3月8日，我出生在之江山上的头龙头十间头宿舍。这个时候十间头宿舍究竟属于之江大学还是浙江师范学院，大概需要考证一番。那时新政府接管这所美国教会的之江大学，并进行高校的院系调整，随之而有了浙江师范学院。

我母亲怀有我的时候，在之江山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山道上摔过三跤，而我出生时脐带正好绕脖子三圈。所幸接生的医生是一位日本战俘，医术高明，他倒提着我的小脚，在屁股上拍打。约半个小时，我终于哭出声来。不知这算不算幸运？

我在之江山上度过了短短三年时间，按常理还未记事。最真切的是，我有一张坐在之江山情人桥边的照片，还算文静。1955年，我家从之江山搬到体育场路的浙师院宿舍。1957年又搬到浙师院（以后的杭州大学）道古桥宿舍。

经历半个多世纪，当我有条件坐下来回顾往事时，我经常想，我的源头在哪里？……那自然是郁郁葱葱的秦望山！

怀念秦望山，然而又没有什么值得记忆的东西！之江大学那逝去的人文精神，是我魂牵梦萦之所在。古桥遗梦，短短40年历史的杭州大学，又是个曾经的梦。

从之江山上匆匆下来，有过童年时“道古桥边的幸福生活”；少年时的“山雨欲来风满楼”；青年时的“冰雪覆盖的三江平原”。虽然不出彩，但点点滴滴也可资回味。七八年前动笔在网络博客《秦望之子》上“耕耘”，现整理结集。率性挥洒、不重考据、真情流露、任人评说，是为自序。

前言

本书 2016 年中秋完成第一次印刷，原来我定的数量是 100 册，内人郭敏琍说：“印 150 册吧。”

2020 年 2 月 29 日，杭大人出版社温时幸社长微信于我：

蒋兄，美国国会图书馆已经收藏【烟雨西溪——杭大新村记忆】，将来会向大众提供免费阅读。另外，你可以收集有关你父母的文章吗？作品多的话，可以分两本出版。

我答曰：

我有自己写的《梦萦秦望山》，如要可以提供，不过我要再校对一遍。

得到这样一个机会，我很开心，谁不想自己的文字能有所问世呢？只是，2019 年 12 月 15 日 0 点 49 分，敏琍不幸因病逝世，享年 63 岁，悲痛袭来不能自己。敏琍逝世后，秉承我父母捐献遗体的行为，也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浙江大学医学院，凤凰涅槃，她在奉献中永生。在 2020 年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新冠肺炎大劫难中，医务工作人员从遗体捐献者的解剖中，获取了大量的病理资料，对抗疫有重大意义。遗体捐献的举动应该使全社会达成共识。

敏琍从 2009 年至 2019 年逝世前，登秦望山不下十几次，这源于她对秦望山的喜爱，源于对在秦望山工作过的公公婆婆朴素的敬爱。秦望山，也是她的“梦”，所以此书的出版，是对她捐献遗体大爱的最好纪念。

目录

自序	i
前言	iii
第一章：秦望山，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十二年风雨忆父亲	1
粉蝶飞迷千里路，落花飘下一声钟——盛静霞的诗意人生	15
重返秦望山	61
陪钟鼎阿姨登顶秦望山	65
那飘洒的蝶影，闪烁在青山白水间	68
第二章：道古桥边的幸福生活	
童年	74
怀念夏季	78
矿石收音机	82
治印	85
可怜的小“麻雀”	88
少年读书郎	90
杭大幼儿园的故事	92
往事朦胧——忆我的小学生活	96
古桥遗梦	100

第三章：山雨欲来风满楼

反动标语来无踪去无影	104
屈辱的年代	106
家书抵万金	110
狗崽子与看门狗	112
文革中的“瞎折腾”	114
十年文革两茫茫	117

第四章：冰雪覆盖着三江平原

八千里路风和雪	127
我们新的家园	132
贫下老中农	135
黑土地上的春耕、夏种和秋收	139
守护丰收果实	142
高高的兴安岭	144
“吃啦？”“吃了！”	147
搭车	149
感恩知青岁月	152

第五章：随笔

闲话杭大路	155
闲话西溪路	159
闲话杭大子女	166
闲话杭大情结	170
岳母如娘	176
老有所乐	179

内人的幸福生活	183
人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	188
之江才子朱生豪	192
风萧萧兮宜水寒，将军一去兮不复返	195
魂来怒捲江潮白	200
沉默的丰碑	207
世谊陆维钊先生	209
文章不著一字空	212
想起了“啊呀呀”	214
杭大“教授楼”的那些年，那些事	219
道古桥宿舍的那些年，那些事	224
最近的距离在远方	237
往事琐忆——与陈纲教授一家的情缘	244
夜访纯真年代书吧 与朱锦绣老师拉家常	248
义子	252
我的兄弟凤苟	254
怀念蒋祖怡先生	258
搭伙记	262
五十八年的感动	267
《杭大附中回忆录》前言	271
《风云岁月》电子文刊第四期卷首语	275
《风云岁月》电子文刊第六期卷首语	278
《烟雨西溪——杭大新村记忆》后记	282
《枉凝眉》开卷	284

第六章：游记

温州寻故之旅	285
探访“老杭大民宿”	296
西塘游记	299
烟花三月下扬州	302
南通，叫我如何不恋你	307
西出阳关有故人	314

第七章：小说

尔乙的故事	323
-------	-----

后记	346
----	-----

第一章：秦望山，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十二年风雨忆父亲

1983 春天的一个阴雨天气，我正在上班，忽然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爸爸身体不好，我急忙骑车赶回家。回到家里爸爸躺在床上。才知道爸爸刚才突然头晕，时间不长就好转了，妈妈叫我尽管放心，爸爸没有事。看着爸爸，我鼻子一酸，再也忍不住落下泪来。爸爸躺着轻轻地对我说：“不要紧，不要紧。儿子女儿都孝顺。”

晚饭后，爸爸又和平时一样，坐在饭桌边玩起了骨牌（一种民间的游戏）。忽然间，只见爸爸双目失神，人定坐在桌旁，十几秒钟后他又恢复了原状。这时前来看望爸爸的盛斯猷老师、曹天麟医师都坚持要送爸爸到医院。爸爸在极不情愿的状况下，坐上吉普车在夜幕下踏上了第一次住院的路途。从此，爸爸开始了漫长的和疾病斗争的路程……

“文革”后，爸爸曾经度过一段好时光。1978 年，爸爸当了 34 年讲师后，终于评上了教授，加上了工资，还破天荒被评为杭州大学先进工作者。我们国家“文革”后恢复高考，爸爸担任了阅卷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记得那年夏天，爸爸胸前挂着“巡视”的红牌，意气风发奔波在烈日下。平时爸爸忙于著书立说，他还被批准为硕士研究生导师，招收了第一批硕士研

研究生袁泽仁、祝鸿杰，一年后又招收了俞忠鑫。以后还招收了黄武松。然而，好景不长，爸爸不知在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脾气越来越急躁，不愿看书，整天躺在躺椅上，连老朋友远道前来看他，也声称不再看书了。

我将爸爸送到医院，医生初步检查后，决定要爸爸住院。那天夜里，我是在走廊的沙发上度过的，此时我并未意识到，这样的日子仅仅只是开始，爸爸躺在病床上也全然没有想到，病魔已经开始缠身，他注定要和病魔作一次无望的决斗。几天后，医生的诊断出来了，爸爸被确定为脑动脉硬化。其实，这个论断是错误的，但是谁也没有怀疑诊断的结论。直到最后第二次住院，浙医二院的岳岚医师告诉我们，爸爸当时是典型的嗜铬细胞瘤症状。由于受到那次错误诊断的影响，原本可以及早手术根除的肿瘤，没有切除，以至于到1987年手术后，仍然没有阻止癌细胞的扩散。

由于受那次错误诊断的影响，爸爸认为再搞研究已经力不从心了。他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五版后记》中自述：

这本书的新一版（即第四版）修订本印行后，我仍旧陆续进行增订工作，增加的部分有若干资料和二十三个条目。现在我因患脑动脉硬化，增订工作不能不带着不少问题结束了。

在这种情况下，爸爸仍于1987年起，担任了汉语史博士生导师的工作。第一届招收任继昉，以后相续招收的博士生有：方一新、蒋骥骋、梁晓虹、颜洽茂、黄征、褚良才、何丹、李立成、殷寄明、罗维明、陈增岳、曾良以及访问学者马国强。

1987年5月，爸爸再次病重，我妻子小郭和俞忠鑫将爸爸送进医院。经检查，腹部有一直径达七厘米的肿瘤，医生又

要我们将爸爸送到浙医二院做 CT 检查。那天小郭到二院取报告结果，回来时忍不住放声哭了出来，原来，报告上的结果竟然是“肝癌”！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我们两夫妻和妈妈欲哭无泪，医生告诉我们。爸爸最多活到那年的国庆节。姐姐从千里迢迢的哈尔滨赶回家，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

学校沈善洪校长、薛艳庄书记赶来了。楼上楼下，沈校长跑得满头大汗。沈校长向来对爸爸十分尊重，1972 年沈校长和爸爸都在舟山小分队。记得那年我陪爸爸去普陀游玩，沈校长也在其中，他和爸爸一路上谈古论今，事后他说：“这位老先生是有学问的。”他担任校长伊始，就和当时的校办主任盛斯猷叔叔到我家探望爸爸。薛艳庄书记立即和浙江医科大学的郑树校长联系，郑树校长组织了浙江医学界最高水平的专家阵容，对爸爸的病情进行会诊。专家组除郑校长外，还有浙医一院的王怀德院长、浙二医院的吴金民院长（当时为肿瘤科主任）、浙医大党委书记陈昭典、浙医一院党委书记张赵盾，二院放射科章士正医师等。郑校长语出惊人，请张赵盾医师为爸爸做 B 超检查。在 CT 开始流行的时候，居然采用相对落后的 B 超，其原因何在？原来，除了张医师的高超技艺外，B 超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检测，而 CT 只能对人体作九十度的断层扫描，当然不如 B 超灵活。张医师的检查报告出来了，报告认为是腹腔肿瘤，排除了肝癌的可能。

从那以后，郑校长几乎成了爸爸的私人医生。爸爸几次住院，遇到疑难问题，总要找郑校长。她工作再忙，也不会忘记爸爸的病情，自始至终对爸爸的治疗进行指导。1995 年的春节，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她竟然在薛书记的陪同下，来到我

家探望爸爸了！

那天去浙一做检查，车队竟然不肯派车，理由是癌症要传染！我们只能向浙江省九三学社要车。在回来的路上，爸爸看着车窗外，六月骄阳，荷花盛开，我问爸爸：“你看什么？”，爸爸轻声说“看看”，淡淡地流露出一种渴望。看到爸爸痴情地望着车窗外的荷花，我不由想起往事：1960年，爸爸在上海编《辞海》。家里只有我和妈妈、姐姐。有一次我们去西湖游玩，同样也是夏天。湖上荷花盛开。回家后我给爸爸写了平生第一封信。信中用了许多“快快乐乐”，爸爸回信风趣地说“小狗快乐有灾难”。

由于张医师的报告排除了肝癌，二院章士正医师进一步诊断为良性嗜铬细胞瘤，郑树校长安排转二院手术，这样，我们一家才放下悬挂的心。但是，爸爸住在医院里却高烧不退，我们紧张的心情丝毫没有放松。爸爸每晚高烧到39度至40度，药用得越来越贵，烧发得越来越高。而浙医二院的消息却说，要等爸爸的烧退下来才能转院做手术。我急得实在不行，和小郭赶到二院，对吴金民主任说，再这样下去人就要不行了，他看到我着急的样子，打电话到医教科说：“他儿子急煞了！”医教科终于同意爸爸立即转院。那天我在路上足足跑了三个半来回，才把手续办妥。第二天我和姐姐、小郭把爸爸送到二院。二院真不愧是爸爸的福地，当天体温降到37.50度，第二天体温完全正常。八月底，吴金民院长、外科花主任、王彬医师为爸爸做了手术。

爸爸从手术的麻醉状态中醒来，兴奋得地对护士说：“你们真是白衣天使。”还打听王彬医师的府上是在哪里？他滔滔

不绝地告诉我爷爷的名字、奶奶的名字。还说：“现在不告诉你，以后你就知道了。”他说回到家里就要看书，我问他：

“你以前为什么不看书了？”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说：“就是不想看。”手术后的几天里，我和小郭、姐姐、黄金贵、祝鸿杰、俞忠鑫、颜洽茂、方一新等日夜轮流护理，爸爸的身体一天好似一天，拆线后的第一天，医生再三挽留，爸爸执意要出院。爸爸回到了阔别三个多月的家，消瘦的脸上挂满笑容，一步一步，踉踉跄跄走进他的书房（其实是他的卧室兼全家吃饭的场所）。他抚摸着布满尘埃的书，流露出喜悦的心情。此情此景，令我终生难忘！

从这以后，我们都认为爸爸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郑树校长也说“蒋先生可以活到一百岁”。妈妈兴奋地写下了：

无力回天泪雨零，荧屏显示忒分明；
虺蛇踞腹全无望，游刃飞针竟再生。
百日沉疴一旦解，重阴消散霎时晴；
秀才纵有生花笔，难表良医割股情。

爸爸好像换了一个人。他早早的就坐在书桌边，摊开书一看就是几小时，手里不停地作着笔记。有一天我看到他在看《说文解字义证》，这是一本大十六开的书。几乎有两寸厚，我问他：“你看得完吗？”他笑着说：“看得完。”过了几个月，他就对我说：“我已经看完了。”在爸爸遗留的笔记本上，我看到爸爸1987年出院后的读书目录，密密麻麻数百种。

1989年，爸爸在体检中发现肺部出现节结状阴影，杭大

医院的报告认为是肿瘤转移。我们家人瞒着他四处请名医诊断，大部分意见认为报告的结论是正确的，我们又一次将他送到浙医二院住院检查。爸爸对住院极不情愿，但是在我们的坚持下，还是去了医院。由于原来的嗜铬细胞瘤标本经重新检查后，仍然是良性，医院的检查还是没有结论，只倾向于不像转移。出院时，出院报告单上的结论是“肿瘤转移？”。那个时候，从内心上讲我极不愿意承认肿瘤转移的事实，故而总是认为爸爸不是肿瘤转移，还找了不少资料，但是从那以后，这个阴影就时时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暗暗祈祷，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让爸爸活到八十岁！

苍天有眼，1995年的春节我终于为爸爸举办了八十大寿，我和小郭、蒋凝买来了鲜花、蛋糕，但是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为爸爸举行的庆典……

从1987年到1990年，爸爸又度过了“文革”后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他似乎变得和小孩一样，天天哼着自己编的小调，什么“媳钗俏兮翁颌首，歌罐开焉嫂棒伤”等等。他丝毫没有受肺部阴影影响，天天读书著说，学术生涯又达了一个新的高度，《怀任斋文集》等一大批重要著作和论文陆续发表。他担任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敦煌俗语词研究”即杭州大学学术丛书《敦煌文献语言词典》的课题负责人和主编。1990年，词典进入了定稿阶段，爸爸一条一条地审阅条目，事必躬亲，将最后文稿确定下来。

8月间，爸爸突然呕吐，我们以为他不过是一般的小毛病。那天小郭和方一新送爸爸到医院检查。一停车，爸爸就晕倒了，护士、医生将爸爸用担架抬进急诊室。住院后，经检查爸爸是

胃出血。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爸爸的出血趋于稳定。那天我已经三天没有回家了，原来和妈妈说好是要回家的。下午爸爸突然吐血了，大口大口的鲜血从嘴里喷出足足半脸盆，我当即倒了下去。小郭和我商量，如果我不回家，妈妈要担心。这时又少不了人，最后我们决定打电话叫俞忠鑫和颜洽茂来。我回到家，躺在床上怎么也合不上眼。第二天一早赶到医院，小郭告诉我爸爸吐血便血一夜不止，脸白得和墙壁一样。一早医生就拿了手术单要我签名。我糊里糊涂地签了字。这时候祝鸿杰、褚良才、方一新、黄武松赶来了，何明春陪着妈妈赶来了。爸爸被推进手术室，看着爸爸苍白的脸，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看到爸爸！在焦急的等待中，医生出来了，他告诉我们手术很顺利。我的心才放了下来，我想爸爸是胃出血，没有大问题的，过不了很久，他又可以恢复健康了。十天以后，爸爸又开始便血，紧接着发烧，又开始吐血。这时医生才告诉我们，爸爸开刀时胃里并没有出血点。显然，这是一次技术事故！接下来的几天中，爸爸吐血一直不止。有一天，爸爸已经没有力气将血吐出来，是我用手把血块从他的口里拉出来的。爸爸一次又一次地吐血，每吐一次血，人就明显地消瘦一次，浑身的汗湿透了衣服、床单。医院终于吃不住劲了，他们要求我们将爸爸转到浙医二院。

那天转院时，是祝鸿杰、张涌泉、我和小郭将爸爸送去的。浙二医院的医生对爸爸进行了检查，从静脉血管造影的片子上，看到肝门右下方有一个血团，至于明确的原因还是不能确定。本来院长吴金民要组织会诊，但是医生中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爸爸是肿瘤转移，一派认为爸爸已经好几年了，不像转移，

最终没能组织会诊。好在经过一个月的打针输液后，爸爸没有吐血，此时爸爸身体虚弱，体重只剩下八十八斤。由于爸爸的血止住了，而医生也无法确定病因，我们只好将爸爸接回家。在回家的时候，吴院长也摊着手说：“没有办法，实在弄不灵清。”

爸爸出院后，身体虽然受到极大打击，但是恢复得还是比较快的。由于出血太多（总共输血七千多毫升），总之体质已经大大不如原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爸爸开始阅读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写作《史记校读》，并完成了四万八千字的初稿。他还计划校订《康熙字典》，因工程浩大，也只完成部分稿子。

1992年10月，一个惊人的消息从北京传来，爸爸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被评上代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高荣誉的第二届吴玉章一等奖。爸爸一辈子辛勤劳动的成果终于被社会承认了！33年来，爸爸前后四次修订《通释》，化费了巨大的精力，也奠定了《通释》在汉语史研究上不可磨灭的地位。蒋绍愚先生在《近代汉语研究概况》中述说：

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当推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和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解释的是敦煌变文中的词语，但所引材料并不限于敦煌变文，而是广泛涉及唐宋诗词、史书、笔记等，所以是近代汉语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从研究方法看，也比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更为科学。此书对词语的解释，突破了我国传统训诂学仅以同义词相训的框框，而是以现代语言学的眼光从众多用例中概括词义，说明一些词语的通假、音

转以及虚词的语法作用，并进而阐述一些词语的构成和得命之由，描写一些词语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探求一些词和词义的发展规律。此书从1959年初版以后，迄今已四次修订，每次修订都补充许多新的内容。更显作者在科学研究方面精益求精的态度……

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称《通释》为“研究中国戏曲小说之津梁”。

爸爸内心的高兴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北京方面来函邀请他赴北京人民大学领奖，他也没有答应。爸爸自从1978年到青岛去开《汉语大词典》工作会议、1988年由祝鸿熹陪同到四川主持张永言先生的博士生朱庆之答辩后没有出过远门。这时小郭提议，由她陪伴七十七岁的爸爸到北京去领奖，没有想到爸爸居然答应了。

领奖在10月31日举行。那天晚上我们全家都早早地坐在电视前面，等待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连远在哈尔滨的姐姐一家也不例外。终于，报道人民大学成立六十周年暨颁发吴玉章奖的时刻到来了。只见爸爸满头白发，迎风屹立，电视把爸爸的风貌送到了天涯海角。妈妈激动地写下了：

雪霜盖顶不知愁，忽作凌云汗漫游；
矍铄银屏现风貌，先生微笑立鳌头；
忘餐废寝乐无涯，淬砺沉潜发异葩；
谁见敦煌光照窟，名传海外耀中华。

1994年春天，百花盛开，谁也不会想到，爸爸的病已经到

了无可救治的地步。5月份，爸爸参加了学校召开的博士生导师会议，爸爸在会上还发了言。会议中，爸爸咳嗽不止，沈校长请校办吴寒同志将爸爸提前送回家。

6月10日，爸爸平生第五次住院。到1995年5月止，其间回家两次。但从那以后，我最最崇敬的爸爸终于踏上了人生的不归路！爸爸三次住院两次回家，每一次都只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邻居童亚菲老师等都说，这简直是奇迹。医院的医生护士、亲友学生都不理解，爸爸病成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还要让他回家？其实，爸爸是放不下他时时记挂在心头的两部宏论巨著。尤其是最后一次回家，爸爸已经没有什么体力可以支持他的写作，但是他还是坚持每天在书桌边写上一到两个小时。一天夜里，妈妈睡梦中醒来，竟看到爸爸艰难地伏在书桌上写字！今天，爸爸的遗著字迹依然娟秀，却再也无法完成了！

爸爸年轻时曾对我妈妈说过：“为无益之事，遣有涯之生，读书不过玩玩而已。”爸爸住进医院，每天还手不释卷，二院刘进医师说：“蒋老是奇人，只要有一点能量，他的大脑就活动起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要看书。那是怎样一种情景？我们用手帮爸爸拿着书，翻到他要看的那一页，他看一眼书，就闭上眼睛。他心里明白，他再也不能继续看他的书了。这哪里是在“玩玩而已”，简直是“玩命”了！是要将生命和书溶化在一起。记得小时候，爸爸总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那时候爸爸还有一间8平方的书房），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出书房，就连大年初一也是如此。以后条件改变了，爸爸再也没有一间可供他读书的书房，他的房间变成他的书房兼卧室兼全家吃饭的场所。他的书桌是一张原来我结婚时用过的打字桌（所

谓打字桌，是用来放打字机的小桌子），放在饭桌的对面。常常是我们饭还没有吃完，爸爸就转椅一转，转过身去伏在书桌上写字了。爸爸在医院里看书看出了名。一天护士小宗对我说，她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要看书的人。她告诉我，有一次她的一个护士同学在急诊室工作，告诉她，几天前那里曾有一个非常要看书的病人。小宗说：“你等等，我们这里也有一个，你那里的叫什么名字？”她同学讲出名字，小宗惊呼道：“就是我讲的那位。”同病房有一位病人，是浙江省肿瘤医院的前副院长赵恩生教授。赵教授也是一位老知识界人士，人品高尚。赵院长对爸爸的读书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头一次看到真正的读书人。蒋教授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人了！”爸爸去世的第二天，我和小郭到医院办手续，病房里的医生护士还在议论爸爸，林小莉医师说：“你爸爸真是了不起。我有一个同学是杭大中文系毕业的，她告诉，你爸爸两个字就可以讲上两节课。”宋震亚医师说他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一本书，几颗葡萄干伴随他走过了整个生命最后的旅程。

在最后的日子里，爸爸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根本不能起床，连翻身也做不到。但是爸爸从来没有哼过一声，医生护士都说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病人。自从爸爸1987年手术到临去世，我们没有听到他叫过一声痛，连两次开刀也是如此，问他痛不痛，他总是说“不痛”。1990年手术后，他曾对我说：“哼哼好过一点。”我含着泪水说：“那你就哼吧。”每天护士长李军上班巡视病房，问他：“蒋老，好不好？”他总是说“好”。最后爸爸已经瘦得连血管也瘪了，每天护士给他输液，往往要打好

几针，连护士也不忍心下手，遇到这种时候，我实在不忍看下去了。对于疾病，爸爸从没有表现出急躁，总是静静地躺在床上看他的书。二院的冯维琴医生赞叹地说：“个人修养非常之高！”。

爸爸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是手不释卷。不记得爸爸对我有多少爱抚，只记得爸爸在读书之余喊我一声“小猪猡”。只记得仅有一次爸爸将我背在他宽宽的背上。成年后，我上山下乡、进厂工作，爸爸又只是读书不止，父子间没有多少在一起的时候。只有在爸爸病中，我才能坐在爸爸身边，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感到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坐在爸爸身边，静静地看着爸爸，我觉得灵魂是那样的纯净。看着爸爸，我仿佛觉得是在读一本书，一本我从未读懂，从未读透，从来也读不完的书。

爸爸晚年，往往显得很冷漠，对前来看他的人也不多说一句话，有人说爸爸很难接近。其实最后的几年中，爸爸是一位身患绝症的重病人，性情当然受到很大的影响。他满脑子想的是把那两部著作写出来，以至于连带研究生这样的事都没有多少兴趣了。他长年沉浸在学术研究中，对人事、世事从不谙练，不会客套，也不会奉承。其实爸爸也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杭大古籍所方建新，爸爸原来与他素不相识，1987年在病榻上看到他的论文，对他的学问非常欣赏。方先生几次三番到医院护理爸爸，一再说要报答爸爸的知遇之恩。他将室名命名为“怀任斋”以怀念任铭善伯伯，并要我替他刻一方石章，沿用至去世。陆维钊先生去世后，爸爸要我陪他去看望陆师母。他还曾要我陪他到华宇清老师家送书。爸爸去世前几天，祝鸿熹王素仙夫妇到医院，爸爸对他们说：“怀新结婚，没有来得及

道喜。”（注：怀新，祝鸿熹之子）在爸爸的交往中，除了他的同事、学生还有许多普普通通的人。爸爸住院时，原先在我家帮助过家务的郑阿莲阿姨、刘云仙师母都三番五次去看望他，她们都没有将他当成一个高深莫测的学者。1982年，爸爸的老友吴中匡先生携女儿来杭探望，吴先生去后，爸爸挥泪写下了：

一枝借了更奚求？请看闲庭瓜蔓幽。
绝域风尘君竟至，卅年琐碎话无头。
从兹一去七千里，能得方来几许秋？
挥手不须潸别泪，中郎有女此何忧。

爸爸除了书，在生活上没有其他任何要求。他一辈子不嗜烟酒，不讲究衣着。他唯一喜好的是一杯清茶，而且每天只此一杯，从不再泡。他的书斋除了书，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对于时下越来越兴起的物质享受，他在墙上贴上“穷窠”二字，以明其心态。对于外面的花花世界，爸爸从来也没有享受过。他没有进入过豪华的餐厅卡拉OK，没有坐过高级的“奥迪”和“奔驰”。晚年他只是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院子写下：

小庭未有半分畲，几植蕉葵妇乞花；
我享其成望窗外，牵牛吐蔓上丝瓜。

爸爸在病中，我为了找两件他替换用的绒布衬衣，才发现，一件已经掉了领子，一件断了袖子！爸爸去世后，我和姐姐、

小郭为他整理衣物，看到的尽是一些穿过十几年的旧衣服、旧鞋子。我们一边整理，一边再也忍不住落泪。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五年五月九日，北京时间清晨七点零五分，爸爸驾鹤仙去。爸爸再也没能回到他的书斋，爸爸再也不能完成他的著作，爸爸再也不会听到我们对他的呼唤。爸爸去了，他对我们没有一句遗言，没有一声嘱咐。然而，他走时头脑是那么的清醒，这就是他，一位纯粹的学者，一位不同凡响的父亲！

九天之上敦煌飞天漫舞。1980年，陆维钊先生病故。爸爸写下了：

数朋辈鱼贯同归非久论资有在；
剩文字蟬蚋未到尚容掩泪相看。

现在爸爸终于可以和前贤哲人、恩师好友许慎、段玉裁、王念孙、张相、钟泰、夏承焘、王重民、任铭善、陆维钊、郭在贻等，相聚一堂，神驰天外。

（写于1995年10月）

粉蝶飞迷千里路，落花飘下一声钟 ——盛静霞的诗意人生

大运河边的扬州，地虽处长江北岸，因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历代被称作“江南”之地。长江上的金山、焦山、北固山将扬州与江南串联起来，那瘦西湖的垂柳、平山堂的钟声，处处浸透着扬州文脉的妩媚与厚重。更有那“扬州八怪”的文墨韵事，“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绝句，使得人们对扬州遐想不断。

一、书斋曾共君吟啸，寂寂荒苔映砚田

1917年农历初春的二十三日，扬州湾子街降临了一个小生命。这小女孩长得清秀可人，母亲极喜爱，取名“静霞”。

湾子街弯弯曲曲，飘荡着老扬州的气味，那盛家的宅子深在巷尾，却也气度不凡，盛静霞从小就居住在名为“客座”两居室内。“客座”在宅子的东面，居室前的空地上有假山盆景和花草，前厅放着红木桌椅，通过一道圆形的拱门可以进入内室。盛静霞大学同学季廉方抗战胜利后游扬州，曾访盛静霞故居，有诗《三游维扬怀弢青》记曰：

违别乡关已七年，三游湾子访庭轩。

书斋曾共君吟啸，寂寂荒苔映砚田。

盛静霞年幼时，在爱好古典文学的母亲影响下，对《聊斋》

《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就如痴如狂。她小学进入扬州中学实验小学就学，每次比赛作文，总是得第一名，于是得了一个“小冰心”的称谓。她有一位黄懿娴朋友很仰慕她，将自己的字改作“企冰”。黄企冰名懿娴，字璧如，又字企冰，后来就读扬州国专，师从著名女词人丁宁，著有《无是轩诗词草》，风格清新婉约。她俩自幼至老一生交好，直至双双离世，也是奇事一桩。

1930年小学毕业后，盛静霞很自然地升入扬州中学。扬州中学是一所有着悠远历史的名校，肇始于1902年创立的仪董学堂。仪董学堂监督李慎儒著有《禹贡易知录》《瀛环新志》《鸿轩诗稿》等，因此扬中的国学源远流长，学生们受其熏陶就不足为奇了。盛静霞扬中同学汪仪璋就作得一手好词，如《虞美人》：

金风飒飒秋容换，深夜凉初转。
小楼独醒自心惊，四壁细听，鼠啮应虫鸣。

满床明月浑难寐，欹枕低垂泪。
小园渺渺几时回？还向五更，梦里觅归期！

这首抗战时期写就的《虞美人》，以细腻手法，写一位流落他乡的少女对故园的深沉怀念。汪仪璋的家也在湾子街的小巷里，与盛静霞朝夕相处。令人称奇的是，汪仪璋日后却成为一名数学教授。

二、白羽鸟随丹壑迥，黄衫人拥赤云回

1936年盛静霞中学毕业，其时她极向往北平的清华大学，她母亲却坚决不同意她北上。于是她同时报考了南京中央大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结果被两所大学同时录取。“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最终答应她就读离扬州更近的中央大学。

谁会知道，盛静霞当时遵循母亲的安排，没有去之江文理学院就读，十年后的1947年却随夫婿蒋礼鸿来到之江大学的秦望山上，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盛静霞就读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诗词才华在一群名师的赏识和提携下，真正得到了提高。汪辟疆（名国垣，号辟疆，晚号方湖，江西彭泽人）、吴梅（字瞿安，号霜厓，江苏苏州人）、汪东（原名东宝，后改名东，字旭初，号寄庵，别号寄生、梦秋。江苏吴县人）、唐圭璋（字季特，满族人，江苏南京人）、卢前（原名正绅，字冀野，自号饮虹、小疏，江苏南京人）等，均对盛静霞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1936年初秋，重阳节那天，汪辟疆先生雇了两辆马车，偕“雍社”成员到南京栖霞山赏景，其时栖霞山多红枫，经霜弥艳。汪师偕诸生登临高阁，酒过数巡后，命每人赋诗一首，当场交卷，由汪先生修改后发还。回到宿舍一看，盛静霞的八句诗中竟有五句是汪先生改写的，只留下原来三句。当时有同学身穿黄色汗衫，采一把红叶，盛静霞据《霍小玉传》中有黄衫客的故事，于是就写了“黄衫客拥赤云归”一句，又因山名栖霞，她的名字中也有“霞”字，所以末两句有“最怜小字偏相似，疑是三生栖止来”。盛静霞看到汪先生的修改之辞，以为

写得不妙，大哭起来。同室汪仪璋问她怎么了，盛静霞说：“诗做坏了，大部分被先生删了，八句只剩下三句！”汪告诉她：

“我听说先生还表扬你哩！说你那句‘黄衫客拥赤云归’很形象，末两句虽然轻飘了些，也还可以。他还说：‘盛静霞是一只未成形的小老虎，将来会有大作为的。’”盛静霞这才破涕为笑。这首记录当时师生笔墨往来情景的作品，即《重阳登栖霞山分韵得开字》。其序云：“彭泽汪辟疆师创雍社，重九偕诸子游栖霞山，山多红叶，经霜弥艳。”

明灭山容巧剪裁，寻村出郭得追陪。
芳塘野荻含愁舞，绝洞寒花带泪开。
白羽鸟随丹壑迥，黄衫人拥赤云回。
最怜小字偏相似，疑是三生栖止来。

其时汪辟疆先生创办了“雍社”，吴梅先生却创办了“潜社”。一天，在秦淮河边的“老万家”，潜社聚会，凡听吴先生上课的都要去，吃一餐，交一元钱，盛静霞也遵命前去。吴先生告诉大家，饭后要填一首词。盛静霞其时从未填过词，只能苦苦思索，勉强凑成。等大家都交了卷，吴先生随即挥毫，一一为之批改、修润。盛静霞觉得这个场面颇似《红楼梦》中宝黛诸人的吟诗斗韵，仿佛自己也成了“红楼”人物。

中大中文系教授汪东先生，给学生讲周邦彦的《六丑》，逐字分析，极为精辟。他对学生沈祖棻非常赞赏，在黑板上亲自抄下沈的几首小令，并说：“五百年来，无此作手，我自愧弗如！”沈祖棻后来成为著名词人，当时一句“有斜阳处有春

愁”被称之为“沈斜阳”。汪东曾在上课时说：“中央大学出了两位女才子，前有沈祖棻，后有盛静霞。”博士黄征对此曾考证过盛，盛说：“这话确实有。当时汪东（旭初）老师在课堂上对着全班同学说的这两句话。可是我哪能和沈祖棻比呀！”

尚未待盛静霞阅尽六朝古都的风貌，卢沟桥事变就发生了。日寇铁蹄即将踏遍华夏大地，政府仓促撤离。在南京大屠杀腥风血雨来临前，中央大学随政府迁往陪都四川重庆。盛静霞告别慈母，只身前往重庆。一路上坐木船，108号人住一间大房间，吃的是糙米粗食，穿的是破衣缕衫。重庆遭受日寇飞机数以万计的狂轰滥炸，民不聊生，尸横遍野。盛静霞与同学们一起参加赈灾活动，翘首盼望抗战早日胜利。与此同时，她拿起笔作武器，写下了大量揭露日寇暴行的长诗，表达了一位爱国女性的激愤。她晚年结集出版的《频伽室语业》中，仅仅收录其中13篇。约举之：

哀渝州

五月四日岁己卯，夕照昏昏飞铁鸟。空岩蛰伏愤难伸，弹落如珠闻了了。冲宵烈火山头起，遥指渝州三十里。焰舌赭星正吐舌，江水无声天地死。黉宫少年眦尽裂，攘臂连踵来城阙。途中渐听哭声高，道上惟看残与缺。火云烟阵哪见城，雷轰电掣惊风逆。崩倒之下人鬼奔，焦烂之内号啼急。无头之人芒芒行，披发之魅当道立。横拉枯朽落焦梁，忽迸血浆飞断臂。瓦砾如山下有人，头腰已出股胫塞。翻砖拨瓦群力尽，挣扎牵拉终不得。泣请诸君断余骨，宁愿残生半身失！闻此呜咽皆泪流，一拽再拽肝肠出。彻宵灰烬化孤城，阴风惨惨天不明。十日掩

埋那得尽，百里哀鸿相扶行。烬中往往残骸出，峡底时时冤鬼鸣。中有百人藏一穴，穴口弹落相蒸烹。开山忽见互抱拥，逼视始知皆焦腥。城中从此华繁歇，早闭晏开行踪绝。僵尸夜起忽扑人，月光如水面如铁。呜乎！百年兴废事可推，昨日天府今劫灰！

薄薄粥

渝州被炸后，哀鸿遍野，校中乃设施粥处，余亦参与。

薄薄粥，胜茶汤；些些药，堪疗创。持盂歇担立道旁。道旁不为市与贩，饷吾同胞来城坊。城坊远来为何事？五月四日灾殃起：家业成灰骨肉尽，一身出自劫灰底。梦里但随行者行，行来更无止处止。龙钟白发扶杖来，伶仃稚儿走沿地。衣裳褴褛面青黄，遍山遍野相迤迤。日长岁久怎为生？地北天南何处去？问之无语亦无泪，强之不食但唏嘘。披创带血不知痛，抱袂携筐芒芒视。感此浩劫意如麻。我亦流浪无家儿，珍重前途斜阳斜！

壮丁行

东乡抽壮丁，西乡抽壮丁；南乡追逃遁，北乡仗刀兵。东南西北多如鲫，二十三十壮且英。壮丁壮丁何处去，保家卫国争光荣。城中山中搜罗尽，五千壮丁初抽成。空中敌机忽蔽天，山底洞壑可容身。居人尽作龙蛇蛰，壮丁尤如鹿豕屯。抽来不易不能放，放之惟恐逃戎征。长绳大索缚将死，铁锁横扉何狰狞！狂风飒飒弹如雨，釜中鱼鳖遭烹蒸。号呼辗转无人问，一息未断犹望生。千挣万扎骨现千匝万匝仍缠绳！四方自此多寡

独，军书涂却五千名。

警钟行

长空杲杲白日静，钟声呜呜惊传警。狂飚蔽日走石沙，壮呼老啼汤沸鼎。穴中尽作蛙鼃蛰，六街飒飒阴风冷。天崩地裂起奔雷，当头岩石訇然陨！父母妻子颤相抱，生离死别在俄顷。震荡昏眩不得死，耳聋睛突犹为幸。一弹中穴门，百口同灰殒，十里之外肢体飞，须发粘壁血肉紧；一弹中居室，四邻火光炯，焦梁灼栋落纷纷，滚地抱头无处遁。一弹复一弹，百弹千弹意未逞。毒雾下堕随风狂轧轧机枪急雨猛。雕栏画栋焰冲天，红尘顷刻群鬼骋。鲜血模糊不忍观，游丝一息声悲哽。唤儿唤女如痴狂，遍街奔走双睛迸！龙钟老妪抱头颈，头颈半缺连儿颈。树头挂骸血淋漓，破腹流肠枝穿挺。衰翁拾得锦衾归，衾中热血包双胫。百里楼台化劫灰，万家骨肉忽异境。怒焰齐随弹火高，警钟震处痴聋醒。为谢东夷运无多，人寰惨绝天安忍？黄昏山色照群骸，野犬无声细舐吮。

张总司令歌

司令名自忠，号荻忱（1892~1940），山东临清县人，赋性忠诚，夙怀志节。抗战后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皆建殊功。而临沂之役，率所部疾趋战地，一日夜达数百里。与敌板垣司令号称铁军者，鏖战七昼夜，卒歼敌师。后豫鄂会战，在南瓜店附近激战，中弹牺牲。

浩气荡荡充天地，气不可夺生可弃。将军百战弃虎躯，大汉於今有正义！喜峰口外初扬威，淝水滔滔倭魂飞。大洪山上

骨如雪，云梦泽中奇布围。豫南鄂北名雷起，转斗苦争更不已。鏖战临沂七昼夜，夜走羌营二百里。无何会战襄阳道，横拉残敌如朽草。轻骑追风不顾身，困兽临危反相咬。杀气连云不见天，黄沙漫漫白日昏。三军大呼如疯狂，怒将铁甲裹金创。贼援如山杀不尽，征袍血透刀无芒。飞弹忽中将军臂，振臂一呼臂如铁。纷纷人马尽辟易，创痛复起战更烈。飞弹忽中将军胸，挺胸三跃转从容。手刃百贼贼愈众，天昏地暗围重重。拔剑自裁左右夺，慨然成语气磅礴。于国于家心无惭，杀敌致果待奋发。一声大呼皆血流，金创迸裂忠魂歿。天愁地惨生阴霾，残军舍死争忠骸，忠骸入都万人拜，万人意气更慷慨！

盛静霞字“弢青”，此“弢”乃弓衣之意。可见盛不但有扬州女子的柔弱，也兼有男子的豪迈气概。也许正是日寇的残暴，激发起了盛静霞的豪气，写下了如此激奋的诗句。有近时文友点评：“就诗艺而言，盛先生此新乐府远非白居易可比，自是直追杜工部。”能否追得上权且勿论，但是这些诗作与杜甫写于安史之乱中诗作思想感情与艺术风格的近似，却是很明显的。

转眼间，盛静霞就要毕业了，她一向怕写论文，于是向汪辟疆先生征求意见，说：“可否以四十首《新乐府》代替论文？”汪先生说：“别人不可以，你可以。”于是盛写下了四十首揭露日寇暴行的长诗，并顺利毕业。这确是汪先生不拘一格选人才的独到之处，也可作为现代教育的一个借鉴。

三、欲寄一双红豆子，换取相思万字

1940年盛静霞中大毕业后，1940年至1942年任白沙女子中学国文教师，1942年至1943年任中大国文系助教，1943年至1945年任国立大学先修班国文教师。

白沙女子中学正规名称叫做“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中”，坐落在白沙镇一庄园内。庄园的名称叫“衡庐”，是重庆有名的川监银行总经理别墅。高高的别墅拱门上书写着“衡庐”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庄园内有池塘，池塘上有一小巧的“湖心亭”，周边种植了玉兰、白兰、珠兰、茉莉、夹竹桃等花草，飘着淡淡的花香，后院有一片高大的楠木林。在楠木林的尽头长着两株挺拔的红豆树，不由得使人想到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诗句。因此，白沙女中也被称为红豆树中学。

然而毕竟是在抗战时期，红豆树下的生活是艰苦的。搭建在楠木林中的教室，是木竹“捆绑”、夹心糊泥的墙壁，稻草铺的顶，纸糊的窗子，黄泥土的地面。同桌的两人共用一盏桐油灯，一个星期只发三根灯草。吃的是发霉的米，菜肴是蚕豆、空心菜或者元白菜，一个月也难见到几片猪肉。在这样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学生们努力学习、教师认真执教，大家都期盼着抗日战争早日胜利。

盛静霞中大毕业后，应吴子我校长的聘请，来到白沙女子中学这所神秘而充满活力的学校执教。多年后，她的学生吴崇兰在回忆她的时候，深情地记述：

盛老师是当年国立中央大学名教授卢冀野的得意门生，也

是吴子我校长的学妹，她长于诗词，一笔小楷，清丽秀逸，有才女之称。她到红豆树来教书的时候，是老师中最年轻的。她文静雅致，十足的古典美人，单身男老师对她有遐想的，不乏其人。

吴子我校长一向自豪有纳网拦截好老师的本领。盛老师也是她网拢来的王牌国文教师。初来校时，我们正好是刚升入高一的学生，她就从那时一直带领我们到高三毕业。她发讲义教我们白居易的《长恨歌》，不但要我们背诵，也教我们摇头晃脑地哼，一时文风大盛。所以我们这一班毕业时，数理好的没几个，国文作文，则从来不强，这都是那时打下基础。

盛静霞在这个时期，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当时在重庆沙坪坝地区，有从沦陷区迁移来的学校不下数十所，由于女生稀少，格外引人注目。盛是典型的江南女子，旋即被誉为沙坪坝十大美女之一，追逐者甚众。但盛静霞幼年时受父亲娶妾刺激，对用情不专的男人最为反感，青年时又受卢冀野先生、唐圭璋先生忠贞爱情的熏陶，对情感极为慎重，一时间竟没有遇到一个使她动情的人。

此时她的一位老师钱子厚先生到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执教，给她写来一封信，说替她找到一个人，比她大一岁，并寄了一张二寸半身照，一张集体照，说“末座少年即蒋云从也”。集体照上，许多老先生中，果有一位少年，着白色长衫，坐在最右面，将两只长袖交叠在膝上，颇有些气度；半身照，五官也端正。这样盛静霞便与这位蒋云从通起信来。盛看蒋云从的信字迹娟秀，还附了诗词，感到很满意，钱先生又请她在中大为蒋云从找一份工作。

蒋云从（名礼鸿），浙江嘉兴人氏。少年就读嘉兴秀州中学，毕业后保送入杭州之江文理学院，深得钟钟山（泰）先生、徐益修（昂）先生、夏瞿禅（承焘）先生治学三昧。抗战时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钟钟山先生助教，颇得钟先生喜爱，于国学深钻精研，为诸师看好。

蒋云从接获中央大学聘书，从好友吴中匡（时吴中匡任钱基博教授助教）处借300元路资，千里迢迢从沦陷区来到重庆，不想盛静霞对他并不满意。蒋云从木讷，盛热情，谈不到一起去。钱先生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来信责问盛静霞：“为何两人相处数月，仍未订婚？”并说云从在篮田有“小圣人”之称，品质极好！还有人说他是热水瓶，外似冷漠，内心却极热烈。钱钟书先生是蒋云从篮田师院的同事，很少赞扬别人的，对他的评价却很高，并说：“云从小字如簪花好女，人品亦如之。”

盛静霞一位同乡的先生——章涛先生，和她很熟，说：“这个人品学兼优，相貌也不错，你老大不小了，就定下来吧！”盛仍表示不能勉强。他就给她出主意，说：“你俩虽然经常来往，但感情建立不起来，你也很苦，不如调个地方，拉开距离，大家都冷静下来，也会想到对方的好处，过一段时间，反而好起来，我看到有这样的例子。”于是盛静霞就约蒋云从两人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说：“一定要学会讲话，只要改掉不言不语的脾气，我们的关系还会继续的。”

隔了数日，收到蒋云从一封长信，内附《鹧鸪天·和遗山薄命妾词》三首：

【鹧鸪天·和遗山薄命妾词】三首

(一)

海水摇空绿漾楼，为谁幽怨赋西洲？
不知江北江南路，已忍天寒日暮秋。

书欲寄，泪先流，不成一字只成愁。
冰霜过了春应在，忍把天桃斫断休！

(二)

肠断金堂目已成，十年芳约可怜生。
床头锦瑟量长短，梦里香车记送迎。

云自合，月难盈，人间何地着深情？
潇潇一夕惊秋到，恼乱高楼又雨声。

(三)

心尽方知蜡泪深，颤秋残地淡无阴。
若容款曲心甘奉，直为相思病亦禁！

鸡塞远，凤箫沉，行云几费梦相寻。
写情赋怨浑闲事，宽了年时约腕金。

盛静霞细细看来，那竟然是用鲜血写成的蝇头小楷，原来蒋云从将手臂割开一条约半寸长的口子，和着鲜血写就。如此

执着的情感深深打动了盛静霞！

多年后，盛回忆起这段往事，还深感“酸鼻”。数月后蒋云从来到白沙，宛然换了一个人，头发养长了，剪了分头，穿着一件青灰色绸夹衫（是早年任铭善先生送他的，他一直舍不得穿），脚下皮鞋铮亮。尤其喜慰过望的是，他竟娓娓不绝谈起这几个月来的情况来。

从此嘉陵江边，白沙附近的山村野寺，多了一对才貌两全的情侣。一时间沙坪坝传说：“这下子盛静霞可满意了，换了个朋友，这位谈吐儒雅，风度翩翩，不是那个蒋礼鸿！”引得俩人都笑了起来。

蒋礼鸿曾与夏承焘先生学习诗词，小令写得不同寻常。两人相爱后，便不断诗词唱和，盛静霞艳羨李清照“归来堂斗诗”的乐趣有增无减，约举之。

【浣溪沙·叠纪梦】

蒋礼鸿

卧后清宵细细风，徘徊明月静房栊。
梦魂飞袅一声钟。

何处许加离别字？只今犹是未相逢。
春蚕秋蝶思无穷。

又

【浣溪沙·叠纪梦】

盛静霞

款款清宵款款风，山楼沉入月明中。
星河浪静接天东。

粉蝶飞迷千里路，落花飘下一声钟。
眼波犹漾小帘栊。

【调笑令】

盛静霞

风劲，风劲，窗外鸟啼虫应。
空帷罗袂生寒，针线琴书坐闲。
闲坐，闲坐，自拍自歌自和！

【前调】

蒋礼鸿

花信，花信，风雨几翻过尽。
又还倦出重帷，和泪严妆整齐。
齐整，齐整，自把玉颜问镜。

【戏作】

盛静霞

丽句清词不可加，霜毫飞散九天花。
近来赢得新诗债，不及清偿一味賒。

【和韵】

蒋礼鸿

清狂似子亦何加？别样襟怀爱墨华。
若使长无米煮，可能折贴向人賒？

【清平乐】

蒋礼鸿

柳姨桃妹，何似寻连理？
欲寄一双红豆子，换取相思万字。

近来多少缠绵，低徊怎诉人前。
从道拗莲作寸，千丝只要相连。

【浣溪沙·谢赠红豆再用纪梦韵】

盛静霞

远水遥岑云雾封，瑶台有路转难通。
千辛万苦一相逢。

共说相思镌肺腑，还将宝玉嵌玲珑。
一双心字可怜红！

【南泉别馆】二首

蒋礼鸿

(一)

花溪黛色到帘腰，一角疏棂望不遥。
多谢岸边灯错落，送人双影过溪桥。

(二)

灯边款语爱清真，信有天花着此身。
乞得三生游一度，不辞沦谪百千春。

【花溪】二首

盛静霞

媚客溪山觉有情，秋漪相映脸霞明。

一枝柔橹咿唔说，结得鸳鸯更鹭盟。

轻舫款款镜中过，亚水幽篁弄影多。
比似青溪何处好？晓风吹度榜人歌。

和云南泉别馆花溪四绝句

盛静霞

【南泉别馆】二首

(一)

一楼灯漾可怜红，山影溪声弦管中。
移过云屏遮锦幄，怕因密语妒金风。

(二)

借将山馆定深盟，灯底喁喁语未清。
底事泥人不教去？今宵倍觉不胜情。

【花溪】二首

(一)

一点晨曦破雾扃，危舷并倚过前汀。
入花双桨须轻缓，为有鸳鸯尚未醒。

(二)

无边温婉一轻舸，欲说深情转觉多。
稳渡清溪山一角，尘寰何处有风波？

蒋、盛在热恋期间，也不只卿卿我我，花前月下。盛静霞在先修班讲课，每学期要讲好多篇古文，经常有语文教师因讲课不受欢迎，被轰出去。她平时只爱好诗词，对古文不求甚解，就请蒋礼鸿帮忙，他极其认真地将那些深奥的古文一一加以疏解，盛在讲台上赢得好评，心里对他又多了一层好感。

其时，蒋礼鸿正在撰写《商君书锥指》，这部书日后被教育部评为“著作发明及艺术品”三等奖。时值盛夏，蒋礼鸿与盛静霞各占书桌一角，蒋礼鸿撰写，盛静霞就帮他抄写。一个半小时下来，桌下留下四条汗迹，也许这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吧，盛静霞在帮助蒋礼鸿抄写的过程中，细细品味到蒋礼鸿扎实的学术功底，也深深地为他的钻研精神所折服。

1943年蒋、盛订婚了，一时师友贺诗如云。

【闻云从静霞订婚喜赋二绝即寄云从以贺之】

钟泰

(一)

捣尽云英不作难，何言蜀道上青天？
一情会使人奔走，未待红丝两足缠。

(二)

文字相知有夙因，相投事不比文君。
订情何用辞人赋？但谱巫山一片云！

【水龙吟·率和博，云从先生、弢青女士一笑】

唐长儒

窥帘蟾月通欢，瑶台偃蹇吹琼管。
吴头楚尾，千山万水，等闲寻遍。
弱羽凌波，凝香款梦，良宵微暖。
有琴心暗逗，连环倩解，凭阑看，流云缓。

赋得黄花人瘦，倚新声，小屏山畔。
胜因漫记，华鬢一笑，三生燕婉。
碧海青天，红朝翠暮，霜娥偷怨。
待定巢燕子，翩跹俪影，照奁花满。

民国三十二年十月二九日，重获弢青惠书，敬悉已与云从先生缔白首之约，悲喜曷极，因赋诗二章寄之：

【黄企冰】

(一)

频年苦制心头泪，兹夕为君一尽倾。
空谷足音惊老魅，春风鬢影画丰神。

尘寰犹有忘形友，荒服应馀未死身。
从此海鸥休避客，忘机同是过来人。

(二)

怪底东南山气佳，曾闻玉树着琪花。
词清楚尾传龙女，语妙吴侬唱馆娃。
枝上珍禽来翡翠，弦间金羽诉琵琶。
一从结得相思子，占尽风流是白沙。

唐圭璋先生还有“青鸟不传云外信，白沙今日是蓬莱”一句，用了李后主的成句，巧妙地镶嵌着“弢青”和“云从”的名字。战火中的恋情，使许多人深深地牵挂。

1945年7月24日，盛静霞与蒋礼鸿在重庆结婚。盛静霞做了一件暗花的绸长衫，洞房安置在蒋礼鸿的单身宿舍里，买了一张三尺半宽的新板床，有人说要油漆一下，盛说抗战胜利在望，回家的日子不远了，何必破费呢！家具也是向学校借的，同事们实在看不过去了，送了两只热水瓶，蒋的表兄送了一对玻璃花瓶和一些塑料花。在沙坪坝和白沙各请了两桌，大家知道他俩穷，说：“总要热闹热闹，大家凑份子，蜻蜓尾巴，自吃自，一切由我们操办，你们只做现成新郎新娘好了。”

主婚人是柳翼谋先生，大家用一方红绸签名，蒋、盛各写一首《瑶台第一层》：

【瑶台第一层】

蒋礼鸿

民国纪元三十四年六月十六日，与弢青结婚渝州。嘉宾不弃，惠然肯来，爰乞题名，以留永念，并制慢词为引。

连理枝头侬与汝，人天总是双。
瑶华小滴，回头蓦见，只是迷藏。
分明相见惯，怯此度烛底轻狂。
难回避，催人密誓，长命鸳鸯。

风光，联翩裙屐，筵前共看杜兰香。
华镫滟绮，羞霞酡玉，幽意无量。
更房栊窈窕，笑语里送入仙乡。
记情芳、向浅红罗帕，翠墨行行。

【前调·和云从婚筵韵】

盛静霞

明镜台前肩并处，笑看恰一双。
罗衾雪粲，宝奁月满，密幄云藏。
相携还试问，问者番可许轻狂？
低回煞，怕仙云梦邃，迷了鸳鸯。

春光，筵开图画，氤氲都是酒红香。
无端凝坐，怎禁羞涩，不许思量。
又纷纷催说，说早早、好入花乡！
郁芬芳、有流苏一地，烛影千行。

只隔 23 天，1945 年 8 月 15 日抗战胜利了！那天忽然鞭炮大作，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时间山城重庆人声鼎沸，如痴如狂，盛静霞大笑不止，竟发了两天两夜的高烧，蒋礼鸿说：“你这个人真是太容易激动了！”八年抗战离乡背井，终于可以返回家乡见到久别的亲人，怎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

四、秦山好，面面江窗

抗战胜利后，中大回迁南京。蒋礼鸿在此时间写下了许多诗篇，表达了极度兴奋的心情，盛静霞在写作时，除对抗战胜利表示欣喜之外，也多了一层对时局的忧患：

【次山中韵】

蒋礼鸿

闻道秋风不入滇，山中生意尚欣然。
大堪白堕醉千日，未少青蚨数百钱。
矮纸有人抄险韵，邮筒许我溷新编。
可怜送得飞光去，也是人间好少年。

又

北走燕幽南走滇，蟠胸意气自轩然。
要将淮海金三品，来供何曾食万钱！
北海酒尊排日满，《东山乐府》一时编。
诗人莫作非辰叹，为报中兴又此年！

【送劬堂先生出峡】

辽东皂帽未云贤，忧患乾坤有转旋。
天为斯文留一老，我来问字记三年。
沧江漫作怒蛟吼，白首能歌出峡篇。
亦欲东穿平善坝，安澜凭仗德星先。

（劬堂：柳诒徽。（1880-1966），字翼谋，号劬堂，江苏镇江人。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历任北京、南京等高等学校教授，长期担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蒋、盛的主婚人）

【用刀字韵】二首

（一）

千种玲珑百种娇，心灵剔透擅谐嘲。
侬今但唱《无愁解》，汝是并州快剪刀！

(二)

十二巫峰翠黛娇，江妃、水伯恐相嘲。
十年浪走成何事？但载蛾眉唱大刀！

【读劬堂先生泊夔府诗有感·用云从奉怀韵】

盛静霞

白帝城高记溯舟，仓皇已遣八年愁。
中原才见三分定，故国依然一梦游。
天意不教蝼蚁尽，人心直令鬼神忧。
升平更有无穷愤，极目寒江浩荡流！

中大回迁南京途中，舟抵宜昌，盛因服食鱼羹，竟腹泻不止而休克。幸在江边曾邂逅蒋礼鸿秀州中学同学朱有圻，蒋立即雇人力车，将盛连衣被抱置于车上，送至朱寓。朱有圻内人吴爱群不顾瘟疫，央保姆为盛洗涤，并邀宜昌唯一私人医师出诊，注射针剂，始得痊愈。盛不禁叹曰：“抗战胜利，余与云从随前中央大学包轮出峡。至宜昌，余大病几死。同舟重病者尚有三人已死。其中有胡小石师第四子，年仅十余岁，极健壮，师呼为‘老虎’者，呕血数升，竟死于途中。”

中央大学回迁南京后，盛静霞携蒋礼鸿回乡省亲，不想盛的母亲对蒋礼鸿侧目而视，私下里说：“家里一些田产没有，见了人一点言谈世务不懂，‘堂堂二小姐’不乘飞机回来，让他在房里叠被，带回一个‘小当差’。”盛静霞自然不为所动。

她对蒋礼鸿感情日深，虽然不善女红，见蒋礼鸿身上母亲为制的棉衣破败不堪，便亲为其“翻里作表”，“感而成诗”：

云从有旧衣，制自君姑，破败不可着，余为翻里作表，既伤穷困，复感慈恩。惻然同赋此

君有一袭衣，出自慈母手。十年风雨在襟袖，色泽剥落非故有。随君既万里，母逝亦已久。穷愁无新制，积笥生尘垢。我来见之心惻悯，为君翻陈出其新。颜色虽改针线在，拆来费尽金刀力。还想当年缝衣人，寒灯照首首如银。慈颜我已不及见，但从手泽知艰辛。我亦有母在天角，摩挲此衣空伤神。衣成亲为披君身，转侧看衣颌首频。虽有好颜色，不复针线密，针线虽粗，亦愿君永存。存之传之于后昆，中有羈人浪子之泪痕！

蒋礼鸿看在眼里，则答曰：

母氏所制衣，弢青为重新之，感而成诗。读竟，纵笔书其后：

春雨露濡秋霜气，十年携之走万里。霜露惊心长已矣，沾袖空余泪如水。君从吾篋见泪痕，欲将针线回阳春。忽看颜色一朝新，坎泉何处寻慈魂？君今留滞在天涯，翘首白云苦忆家。呜乎！君乎我乎真细草，春晖无际那能报！

蒋礼鸿因撰写《商君书锥指》获教育部三等奖，评委萧公权先生说：“本著作参采订正今昔诸家之说，并下己意整理古籍，颇称该备。议论亦每有独到之处。而允当朴实一洗穿凿之弊，尤为难能可贵。《商君书》殆当推此为善本矣。”此次评奖没有一等奖评出，闻一多先生也只二等奖。中大为此曾拟升蒋礼鸿为副教授，蒋却认为年资尚浅加以拒绝了。岂知，回到南

京后不久，蒋礼鸿却被莫名解聘。此事曾被闹得沸沸扬扬，据蒋礼鸿猜测，由于盛静霞是汪辟疆先生的得意门生，新上任的系主任和汪教授是对立的派系，所以叫他卷铺盖了。盛静霞更作了这样的推断：“他的被解聘，是否既是汪、胡派系之争，也与当时政治有关？”因为蒋礼鸿秉性耿直，不时会对时局有所议论，此亦盛静霞之猜测也。

1947年夏，蒋礼鸿携盛静霞回到复元后的之江大学。离开南京，蒋礼鸿作了《去白下口号》：

【去白下口号】

飘如一叶出宫渠，进退吾生尚有余。
野鹤自安三尺胫，乱书犹累两头驴。
偶然桑下曾留宿，何用修门更曳裾。
颇觉嵇康无远度，至今人诵绝交书。

此诗表达了蒋礼鸿极度豁达的心态。多年后，香港中文大学黄坤尧先生这样评论此诗：“当时蒋礼鸿被中央大学解聘。前句从容屈伸，表现出毫不在乎。颈联留宿桑下难免有情，但也不必苟延于贵游之门了。末联不学嵇康狂放和愤懑，显出包容，更显出气度。”

盛静霞未曾想到，十年前与之江大学失之交臂，今得再续前缘。

来到之江后，他俩搬到秦望山上“十间头”宿舍最西面的楼上，虽只两间小屋，足以读书煮饭。推开窗户，果然如夏承

焘先生所云：

秦山好，面面江窗。千万里帆过矮枕，十三层塔管夕阳，诗思比江长。

盛静霞早就慕名夏先生是词学大家，又是蒋礼鸿的恩师，迫不及待地拜谒了夏师。蒋礼鸿将盛静霞所作诗词精华手录一册，取名为《碧蓀词》呈夏先生审阅。夏对盛的诗词才华亦颇为赞赏，阅毕在词作最后书：“以作家相期，故多刻核之评，谅之勉之。”并在日记中记载：“早阅盛静霞词卷，为评泊一过。最爱其《鹧鸪天》云：‘近来处处成酣睡，何必佳人锦瑟旁？’

《蝶恋花》云：‘的的心膏煎复煮，信他一刹能明（明，双关语。光明，使你明白）汝。’望其能躬行实践，乃是真词人。”

于是盛静霞与蒋礼鸿受夏先生之命，豪情大发作《虞美人》奉答。

【虞美人·瞿师湖楼命制】

蒋礼鸿

绿苔依约年时迹，再见幽寻屐。
湖山原属不羁人，常献漾漾鸥外一帆春。

楼中玉貌知尤好，未是中年了。
但翻绡帙近清尊，那为封侯龌龊向风尘。

【前调】

盛静霞

瞿禅夫子湖楼，命云从及予作词。忆十年前尝一度流连湖上，尚不识夫子也。不图乃有今日之遇，敢不勉为一章乎！

韶华换尽芳堤迹，长记流连夕。
苍茫曾指翠烟丛，定有幽人栖止水云中。

识荆还向名湖畔，自是平生愿。
待看待坐小楼时，常把一池新墨乞新词。

同年冬，盛静霞女儿出生。盛颇有些前卫思想，于是与蒋礼鸿商量：“我不知道将来有几个孩子，但是孩子都姓‘蒋’，我不高兴。不如这样，第一个孩子姓‘盛’，以后都姓‘蒋’。”蒋礼鸿满口答应：“可以，可以。”自此蒋、盛的女儿取名为“盛逊”。蒋礼鸿虽然读的都是“之、乎、哉、也”的老古董，却对盛静霞的主张亦步亦趋，引得一些人大为不满，并要他“好自为之”，意思即不要放弃封建卫道士的做派。更有些人直呼蒋、盛的女儿为“蒋逊”，甚至在“文革”时竟然传出盛逊是盛静霞私生女的说法。

1949年，解放战争的炮火轰轰作响，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杭州解放日下午，蒋礼鸿正在读书，之江山上枪声大作，历一个半小时有余，盖因解放军进入杭州是通过之江山而来的。蒋、盛虽然对共产党了解不多，但对国民党时期物价飞涨、民

不聊生的状况也极为不满，盛曾作《抢米谣》表达不满。

抢米谣

战后，各地物价奇昂，尤以沪上之米为最，购买困难。奸商更居奇屯积，于是抢米之事常发生。军警亦置不问焉。

东海狂风作，申江恶浪起。江头矗米市，铁锁双扉闭。大道直如发，道上人如蚁。携筐抱筐久鹄立，立满通衢无隙地。四更摸索来，午日相蒸晒。白头老妪僵欲死，黄儿郎裂眶眦。已交辰过扉不启，怒焰愤火冲天起。一人呼抢万人和，万拳一举双扉破。云囤困积接栋高，潮奔蜂涌呼且号。市中主人肥如豕，血渍双睛空咆哮。银珠白玉遍地流，饿骸千万齐腾蹕。大筐小筐满复溢，衣袋襟袖无遗窍。携之不得步难移，街头抱米坐嘻笑。道傍有警士，顾视亦莞尔。主人咆哮风雷声，负手倘佯如充耳。日斜人散米已无，珠玉一地犹疏疏。黄口小儿扶地走，百结衣衫面浮垢。还伸双手瘦如鹑，细捡泥沙入破帽。

1951年中国政府颁布了接管外资开办的教育与医疗机构条例。之江大学由浙江省教育厅接收。校长黎照寰交出校政后离校。此时盛静霞被新的校政解聘，理由竟然是怀疑她是美帝特务。盛静霞离开之江后，在原白沙女子中学训导主任饶师岚的帮助下，去杭州弘道女中任教。好在这段时间不长，盛静霞又回到院系调整后的浙江师范学院（即之江大学的前身）中文系。

1950年代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曾招收一届研究生班，由夏承焘先生、任铭善先生等为导师，教授古典文学课程。因为是第一次招收研究生班，学院特别重视，指派盛静霞为班主任，

不但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还兼给学生辅导古典文学课程。学生庄严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况：

由于校领导对院系调整后第一批研究生格外重视，特聘请盛先生负责我们的行政事务和辅导工作。这样她就兼老师和班主任于一身。她功底扎实，学有专长，在宋词辅导中，使同学得益非浅。她工作细致、热情、善良而有同情心。所以，不论男女同学，事无巨细，都愿意和她谈心。

盛静霞在辅导学生时，曾对一些民间曲子词不太明白，她自然就想到蒋礼鸿。蒋礼鸿对内人的问题也不敢怠慢，于是认真研究起来。他这一研究竟然发现一些敦煌藏经洞卷子在阅读时非常费解，并且很少有人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这样蒋礼鸿在1959年出版了名为《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专著。此后蒋礼鸿对《通释》不断进行增补和修订，从最初第一版到他去世后，学生据他的手稿增补的第六版，前后逾36年，字数从最初五万余字，最终达四十多万字。《通释》曾获得首届教育部人文科学一等奖、第二届吴玉章一等奖等。蒋礼鸿的学术成果大都离不开《通释》，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部被日本学者誉为“研究中国通俗小说的指路明灯”的专著，与盛静霞竟有这样的联系。

五、吾犹壮，待从头做起，学习雷锋

1958年，杭州市政府决定，以浙江师范学院和省委党校为班底成立“杭州大学”。盛静霞与蒋礼鸿自然都成为杭大中文系的教师，盛静霞在古典文学教研室、蒋礼鸿在语言教研室。

1957年反右运动兴起时，对知识界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蒋礼鸿的好友任铭善被错划为右派，到系资料室扫地，好友吴天五被发配到东北，著名教授钱南扬也带上右派帽子被扫地出校。1958年4月，夏承焘先生在日记中记到：“见云从交心文字，谓肃反中以被静霞监视过严，思在体育场路碰死汽车上，阅之汗毛为起。”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连蒋礼鸿这样意志坚定的人，也难免产生绝望的想法于是蒋礼鸿未免对西湖边无主孤坟动起伤感之情。

【鹊踏枝】

萧瑟西风催梦促，惊起云屏，摇曳灯痕绿。
水远山长闻怨曲，白莲花上魂难续。

悴叶蜗涎萦蹙缩，雨晕灯昏，鬼隐颓坟哭。
万古荒荒愁一握，微茫篆迹谁能读？

1959年盛静霞与夏承焘合作，完成了《唐宋词选》的选注。夏先生为此书撰写《前言》，盛静霞作注，最后两人审定。这本读物，力图予各流派及近两百首词以公允的评价，细致的分析，是解放后第一部普及性的《词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为难以解读的唐宋词走向青年，促进唐宋词鉴赏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这在解放后不久的学术界，是开风气之先的。

1962年，杭州大学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迎来一个学术气氛高潮的时期。这段时间，学校组织了一系列专题学术报

告，有胡士莹《变文的体裁与特点》、姜亮夫《先秦语言文字初探》、夏承焘《词调的声音》、王驾吾《王安石政论文》、任铭善《建国以来语言文字几个问题》、刘操南《楚国疆域形势及屈原放逐图说》、徐步奎《庄子在文学史上的评价》。盛静霞与蒋礼鸿则分别作了《辛弃疾词的艺术特色》《训诂方法与古典文学教学》的学术报告。

盛静霞在这期间还陆续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如《辛弃疾的〈摸鱼儿〉》《朱淑贞介绍》《论李清照》《对〈唐诗选〉注释的意见》《怎样欣赏古典诗词》《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等。相对来说，这时期是盛静霞能够比较专心做学问的阶段。除潜心教学与学术研究外，盛静霞自杭州大学成立起，担任校工会主席多年，她关心教职员的生活，杭州大学幼儿园就是在她的倡议下创办的。

这时期，蒋盛两人都进入了中年，蒋礼鸿更是把学术研究看作是生命的第一要素。盛静霞不免有些想法。一次，她对一位同事说：“蒋礼鸿和我的感情，毕竟和年轻时不同了，他自顾自看他的书，和年轻时对我的热情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否是我们爱情衰退的表现？”那位同事说：“盛先生，这是你错了，男人年纪大了，总是以事业为主，这是正常的。”以后，她向蒋礼鸿说起这事，蒋说：“是嘛！现在如果我们还像谈恋爱时卿卿我我，那像个什么人呢？”

他们之间，从浓烈的感情，更多的是转到平实的生活。蒋礼鸿会用纸折一手“小蛤蟆”，一天他问盛静霞：“你会不会折‘小蛤蟆’？”盛说：“我不会，我只会折‘大猪头’。”蒋说：“我折给你看，但要一张好纸。”找了半天找到一张香烟壳里

包香烟的纸，这纸又薄又韧。蒋礼鸿把纸量了又量，裁成四面见方，没有一点长短，然后折了起来，费了好半天折成一只有四条腿的蛤蟆，把蛤蟆嘴剪开一点，用一小块红纸粘进去，和真的蛤蟆一模一样，用手在屁股上一敲，还会跳起来。盛静霞折了好几次，都不合格，蒋说：“这是我们蒋家家传的，是我姐姐教我的，看来以后是要失传了。”

这期间，蒋、盛之间虽然相互唱和的少了，但两人写了不少描写新社会的诗词：

【采桑子·咏新安江夜景赠工地同志】

蒋礼鸿

吴刚辟碎千轮月，洒遍层崖。
化出繁华，天帝难将夜幕遮。

非关月姊能呈艳，劳动堪夸。
干劲争霞，开作人间智慧花。

【浣溪沙·赠工地同志】

盛静霞

铁缆穿云走若龙，飞轮夭矫划长空。
九渊凿出水晶宫。倒海移山惊创造，
坚冰积雪锻英雄。喜听捷报趁东风。

【沁园春·读雷锋日记】

蒋礼鸿

不朽其谁，手迹犹留，翘仰英雄。
正万千来者，叮咛策勉；浪翻潮长，矢志追踪。
不锈螺钉，为人舍己，剜切分明见肺腑。
回环读，爰行行字字，火热鲜红。

自私要付飘风，似落叶纷纷一扫空。
恰一针见血，砭顽立懦，片言居要，发聩惊聋。
美好青春，谦虚劳动，万古千秋日正中。
吾犹壮，待从头做起，学习雷锋。

然而随着“左倾”路线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间，以夏承焘先生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杭州大学“文革”早期即展开所谓的“林、夏战役”（林指杭大副校长林淡秋，夏指夏承焘先生），并一共召开了五次全校性批斗大会。

1966年初夏，一帮学生冲到蒋家，因蒋礼鸿曾经指出国家某位领导人语言文字不规范，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盛静霞与女儿躲在里屋，儿子则颤抖着站在门口，只见学生向蒋礼鸿怒吼：“向毛主席请罪！”既而又大叫：“向毛主席下跪！”一向兀傲的蒋礼鸿也不得不跪下双膝……

这段时间，家中接连遭受蒋礼鸿被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儿子在附中遭到毒打以及两次抄家，盛静霞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知。更有甚者，盛静霞因审查所谓“之江大学经济问题”，也被关了起来，她因有肠梗阻的毛病，一次从嘴里吐出粪便，造反派居然要她将粪便吃下去！

1969年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两个孩子远走黑龙江。盛静霞一个人在苦苦等待黑夜的结束，好在有邻居郑阿莲的母亲陪伴她度过这一段难熬的日子。

1976年，随着“四人帮”倒台，人们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时刻。蒋礼鸿与大多数知识界人士一样，对四人帮的倒台充满喜悦，他激奋地书下：

断句

题剪报 1981年“四人帮”被揪出公审时之狼狈相。

恶鬼必须钢铐锁。（指江青）

死猪要用开水烫。（指张春桥）

蒋礼鸿得以继续搞他喜爱的语言文字，儿子也从黑龙江回到杭州，盛静霞的日子才归于平静。

1978年蒋礼鸿破格升为教授，继而又担任研究生、博士生导师，盛静霞却因身体原因提早退休（当时可以延退）。离开工作岗位后，盛静霞自然感到缺乏生活的意义，恰好蒋礼鸿担任了《汉语大词典》副主编，负责浙江省编写组工作，她便要求参加编写组工作。蒋礼鸿却不同意，说：“你从来没有搞过词典工作，怎么可以参加？”盛说：“也不是每个人都参加过编写工作。”杭大的盛斯猷老师也从中做工作，最后蒋礼鸿

说：“你要参加也可以，但不拿一分钱的报酬。”盛静霞欣然同意。

此后，校党委书记薛艳庄不知怎的知道了这件事，就问盛斯猷，怎么会有这样的事？盛说确有其事，是蒋先生定下的规矩。书记立即说：“从现在起，立即按规定，发津贴给她。”

六、独舞孤飞也不妨，穿花弄影自成双

“文革”后，蒋礼鸿被评为教授，与他当年《商君书锥指》得奖，中大欲升他为副教授竟然整整隔了33年。这时间蒋礼鸿将精力都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中，不想1983年春天，蒋礼鸿居然莫名晕厥过去，多方查证不得结果。1987年蒋礼鸿再次病重，经浙江医科大学郑树校长多次组织勘查，始知得了一种叫做“嗜铬细胞瘤”的疾病。很快，蒋礼鸿做了手术，术后，盛静霞激动异常，写下了：

【回天】

无力回天泪雨零，荧屏显示忒分明。
虺蛇踞腹全无望，游刃飞针竟再生。
百日沉疴一旦解，重阴消散霎时晴。
秀才纵有生花笔，难表良医割股情。

【贺云从】

(一)

玉李天桃竞放妍，与君同庆古稀年。
居然劫后人犹健，纵目余霞正满天！

(二)

终老西湖亦是仙，珠玑拾掇尚成篇。
人间乐事何须羨，学海相携卅二年！

蒋礼鸿坐享书斋，则有：

【小庭】

小庭未有半分賒，儿植蕉葵妇乞花。
我享其成望窗外，牵牛吐蔓上丝瓜。

【风雨】

夜来风雨声势粗，早起开门风雨无。
何处好寻风雨迹？打断芭蕉三两株。

1991年，盛静霞与陈晓琳出版了《宋词精华》一书，是继《唐宋词选》后对宋词的又一研究成果。为了有助于青年读者，她们除注释外，又用现代文对宋词作了“译诗”之举，这种方

便读者的手法，自然不能完全表现原词的韵味，有待于世人的评价了。

1992年，蒋礼鸿以一生心血铸就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被北京人民大学评为吴玉章一等奖，这是当时国内文科奖项的最高奖。蒋礼鸿由儿媳郭敏珺陪同前往北京领奖，盛静霞在银屏上看到蒋礼鸿满头白发矗立在领奖台上，也是热泪盈眶，百感交集！她又深情地做诗庆贺蒋礼鸿。

七绝 二首

云从所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四次增订本）获吴玉章奖金一等奖，于1992年10月30日飞京。11月1日领奖，中央电视台放映。（1995年12月复获国家教委一等奖）

（一）

雪霜盖顶不知愁，忽作凌云汗漫游。
瞿铄银屏现风貌，先生含笑立鳌头。

（二）

忘餐废寝乐无涯，淬砺沉潜发异葩。
谁见敦煌光照窟？名传海外耀中华！

蒋礼鸿经过手术后，身体虽然有一定起色，但终因病情沉重，经多方救治，仍不得复元，1995年5月9日清晨，他撒手钟爱的语言文字学而去，享年八十岁。

在蒋礼鸿去世的病房内，盛静霞颤抖地取出与蒋礼鸿生前共同拟定的遗嘱，向在场的学校领导、子女、学生宣读：“去世后遗体捐献给浙江医科大学作科学研究之用。”病房里一片唏嘘，儿女号啕大哭！

蒋礼鸿捐献遗体之事，在社会上引起一片震动。人们对一位著名学者的举动不免有些不解，但是盛静霞非常清楚，蒋礼鸿此举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年轻时，蒋就与盛静霞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把神和怪、力与乱放在一起，又说‘祭神如神在’可见孔子是不相信有神的。”蒋年幼时祖父去世，他守夜和祖父并头而眠，毫无感觉。所以捐献遗体，泽惠社会是蒋礼鸿深思熟虑的结果。

蒋礼鸿逝世后，盛静霞看似平静，内心的思念却与日俱增。她在《忆云续录》中记述说：“读《谁怜落日》，至谊和她丈夫说：最美丽，最感人的故事情节，必须是最直接的，最简单的，最不需要诸多解释的。那就如一男一女忽然地发现他们原来非常匹配与相爱，那才踏实、那才漂亮。是不是？”

由此得启发，我与云从正是如此，“一见钟情”最能吸引年轻人，然而，那完全靠不住，不过是“以貌取人”而已；“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大了，遂成连理，也靠不住。幼小的孩子懂得什么？只有真正相互了解了，踏实了，那才靠得住！我和云从是经过这一阶段的。而且，至今我认为任何人，包括和我有过爱情关系的，都比不上云从！他是我的“唯一”！

2000年，在盛静霞辅导下，出版了《蒋礼鸿集》，全书约400万字，包括了蒋礼鸿一生著作的绝大部分，此书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关注。自蒋礼鸿逝世五年后，蒋礼鸿学术成果得以全

面总结发表，自然是盛静霞最最希望看到的，也可以说了却了她的一个心愿。

同年，盛静霞住进杭州市老年福利中心。有关盛静霞进入老年中心，也有许多猜测，一时间有关盛静霞与子女不和的消息也时有传闻。其实盛静霞一直是个思想开放的女性，尤其在旧社会追求婚姻幸福之举，就曾引起一些老先生的不满。当年蒋礼鸿携盛静霞回到之江大学，有人说：“此来气象非昔，望好自为之。”盛静霞回忆起来说：“如果我们的恋爱地点，是在扬州或者杭州，我们都未必能成功。扬州，我母亲、姐姐一定会反对的，杭州，也会反对，恰恰我们两人都在四川，不受他人干扰，自订终身，这可是真正的自由。”

盛静霞晚年一直关心社会老年问题，对20世纪我国兴起的老年事业尤感赞同，所以立志要亲自实践。杭州市老年福利中心当时正建院，在报纸上打出广告，盛静霞将报纸广告剪下来细细阅读，以后就下了决心要去老年福利中心。

盛到了老年福利中心，深切感受到中心领导、保育员和同住老人的爱护。中心领导还以有盛静霞这样的高级知识界人士入住感到兴奋和自豪。

盛静霞本来是个乐观开朗的人，尤其与同室朱惠清老人情投意合。朱奶奶也是个和蔼的老人，盛静霞稍显急性，她也不在意。媳妇、儿子每个星期不管刮风下雨都带孙儿前去看她，并烧一些可口饭菜一起进食。女儿每年春节前后从哈尔滨回杭去老年中心陪伴她。盛静霞在老年中心安顿下来，渐又起诗意赞许政府此举：

【采桑子·颂社会福利中心】

余自上月 26 日住进福利中心，甚为满意。盖年轻人工作紧张，老人倍感孤寂，单身者尤甚，此为时代步伐前进中之现象。市府有见于此，不惜拨巨款，建成福利中心。现已有二百余人来此休养。相互亲密融洽，余亦乐不思家。感喟之余，发为短章。盛静霞撰于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 1107 室，2001 年 3 月 22 日。

（一）

回廊曲槛朝还暮，缓步芳洲。
小径寻幽，春水粼粼别样柔！

琪花瑶树知多少？掩映红楼。
人在层楼，哪识人间更有愁！

（二）

绿茵场上晨曦露，鹤发童心。
抖擞精神，高杠低栏稳称身。

相逢何必曾相识？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处处温馨处处春！

盛静霞入住老年福利中心后，还有最后一个心愿未了，她要结集出版蒋礼鸿与她的诗作，这也是她对蒋礼鸿感情的最后

依恋。

蒋礼鸿生前，曾由学生帮他出过一部名为《怀任斋诗词》的集子，后又由儿子打印成文本。蒋曾经对张宪文先生云：“余少年为韵语，垂老摧烧之。独录数篇，奉少作好事者，其谓如何？”这部诗作也是秉承了蒋礼鸿一贯的作风，非自认为是精品的，不录。这部集子由《蒋礼鸿集》收录，但蒋与盛的大量唱和之作却不见其中。

盛静霞早年得名师指点，诗词之道非同凡响，且其中与丈夫的唱和之作，是她最在意和留念的。故而她倾生命的最后精力，也要将此诗集出版。在蒋礼鸿弟子黄征博士的倾力相助，弟子蒋骥骋博士的资助下，名为《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合集》的蒋、盛诗词合集终于得以刊布。

该书总收怀任斋诗词 137 首（附他作 4 首），频伽室诗词 386 首（包括了蒋礼鸿与盛静霞的唱和之作）。虽然作品不算宏富，但却是他俩作品之中的精品。

盛静霞在《前言》中说：

面前这本小书，是我与蒋礼鸿的诗词合集。

蒋礼鸿（1916—1995），字云从，浙江嘉兴人，毕业于之江文理学院。室名“怀任斋”，是怀念好友任铭善先生的；又名“双瓶室”，是借用古代故事，比喻夫妇同在一室读书的；后改名“频伽室”，“频伽”是佛经中的两只妙音鸟，比喻夫妇诗词唱和。抗战期间，他随钟泰师到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助教，钱子厚先生介绍他和我通信。1943 年我介绍他到中央大学国文系任讲师，1945 年我俩结婚。这几年两人有大量唱和之作。

他在学术方面的主攻方向，是语言文字的校勘、考证，代

表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国内外学术界给予了高度评价，曾两次获国家级一等奖。1977年开始任《汉语大词典》副主编。1978年12月，《辞海》编委会恢复，他担任语词部分的分科主编。他于1978年在杭州大学超升为教授，并担任博士生导师。他的诗词很少发表，但写得绵密真挚，不同凡响。真挚笃诚，是他品质上最大的特色，在诗词方面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我生于1917年，字弢青，江苏扬州人，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我自幼喜爱古典诗词，对历史上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归来堂”斗茶的故事很向往，认为得一“文章知己”作为终身伴侣是人生最理想的志趣。我和蒋云从从未见面到通信、恋爱，也经过一些曲折，但被云从真情流露的诗词所打动，最后结为连理。两人同在杭州大学（前称之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执教三十余年，他教古代汉语，我教古典文学（重点是唐诗宋词）。相处五十余年，学术切磋，诗词唱和，只有心领神会之乐，从无龃龉勃谿之苦，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自此，盛静霞完成了她从思念丈夫到坦然面对余生的转变，她的诗作《孤蝶》道出了她的心声：

【孤蝶】

独舞孤飞也不妨，穿花弄影自成双。
无情有意来相伴，似慰幽人莫断肠。

盛静霞在梦中见到的蒋礼鸿已与此前不同。一次盛又梦到

蒋礼鸿，在梦中蒋居然替盛介绍起对象来，说此人如何如何，竟是以兄长的身份出现，反映了次前蒋礼鸿常像兄长一样关心盛的情景。这梦少了些许凄惨，更多的是平淡，当是盛静霞思想的转变。

盛静霞在老年中心安然度日，蒋礼鸿学生黄金贵送她轮椅一辆，她写道：

【轮椅小咏·谢黄金贵赠轮椅】

（一）

脚软筋酥已数载，忽蒙赠我四轮椅。
无限风光椅上坐，一日看遍院中花。

（二）

辘辘大道上，顾盼敞胸怀。
何人为推挽，喜有凝儿来。

（凝儿，盛静霞孙儿，深得盛喜爱。）

2006年4月16日清晨，盛静霞溘然长逝，享年九十岁。此番她终于可到九天之上，与蒋礼鸿再续“之江大学神仙伴侣”的情缘了。

盛静霞去世前，不忘与蒋礼鸿的旧约，嘱咐儿女，将她的遗体捐献给浙江大学医学院（此前蒋礼鸿捐献给浙江医科大学，此浙大医学院乃四校合并前的浙江医科大学），此时距他俩共

同商定捐献遗体已 11 年矣。

4 月 20 日，盛静霞遗体捐献仪式庄重举行，灵堂正中摆放着以浙江大学名义捐献的花圈，百多个花圈一字排开，空气中回荡着《化蝶》的音乐。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学生赶来参加，他们面对盛静霞遗体肃然起敬，一些当年的女学生，潸然泪下。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省解剖学会、浙江省作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仪式。原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省九三学社组委冯培恩教授致词说：

盛静霞先生见证了一个世纪的潮起潮落，从前中央大学的一位才女，进入美满婚姻殿堂，从刻苦钻研诗词文学到潜心教书育人，留下桃李万千，词赋惠人泽世。她那善良、恭俭、谦让、坦荡的品格，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贯穿了她淡泊名利而又充满意义的人生。

会场上两副挽联，道出了盛静霞一生的轨迹：

先师品行静若秋水；
才女人生诗意留霞。

诗美、词美、文美、人美，金陵美才女，痛也九秩摧玉；
贤妻、贤母、贤长、贤德，西溪名贤师，慨乎一朝捐躯。

盛静霞以一首“粉蝶飞迷千里路，落花飘下一声钟”开启了她的诗意人生，又以“独舞孤飞也不妨，穿花弄影自成双”走向她的生命尽头。“蝶”始终是她生命的一个象征，美丽动人而又令人心醉！

隔年，《钱江晚报》组织清明网络祭奠征文，其子蒋遂以一篇《那飘洒的蝶影，闪烁在西湖的青山白水间……》获奖，结尾处有：

南山陵园建有我父母的衣冠塚，那青青墓草今年更加葱翠了吧？静霞云从，就像天际边的彩云和彩霞，父亲永远追随着我的母亲。

我的至情至爱的父母，我站在高高的山冈，看到你们双双化蝶的身影，在西湖的青山绿水间飘洒！



重返秦望山

只记得之江山上有许多野狗，有一次晚上，我家和住在楼下的何思臣一家孩子在楼梯里放了一些食物，等野狗进来吃食，野狗钻进来的时候把系在门把手上的绳子一拉，野狗被夹住了脖子，嗷嗷乱叫，最终挣脱了出去。

我有一张3岁时坐在之江“情人桥”边的照片，岁月流失，照片上是一个腼腆的小孩坐在石条几上。之江山的情人桥在网络上有照片，但是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情人桥了。母亲说我在之江山上进过幼儿园，第一天很老实，第二天也很老实，老师说这个孩子很听话，但是到了第三天不知何故就和别的孩子吵起来了，居然还一口咬住了对方的嘴巴。

我在之江山上住的是教工宿舍头龙头的“十间头”，我家住在最西面的二楼。今年（2010年）春节与之江大学教务长陈世振先生的大女儿马莉一起吃饭，是原之江大学张明樑教授所请的。席间马莉问我你们在之江住在什么地方，我说是十间头最西面，她说：“最西面不是何思臣家吗？”我说何家住一楼，我家住二楼（据何思臣女儿说，我家搬到体育场路后，她家搬去楼上），她才明白了。除陈世振外还有原之江大学体育教授张强邻先生，别的就记不清楚了。张先生的儿子张程鹏现在还和我住杭大新村27幢，是先后邻居了。程鹏说那时候看到我母亲怀孕，那应该就是怀我了。

1949年春，解放的炮声已经隆隆在杭州上空响起，钱江大桥作为国共争夺的重要阵地，进入了战斗白日化的地步。之江大学上空枪弹飞舞，据张程鹏先生考证，中国人民解放军有

一路就是从之江山边的小路上进入杭州市区的。此时之江大学的教职员都躲进防空洞里，我姐姐盛逊只有两岁，饿得嗷嗷大哭，父亲不顾头上枪林弹雨，冲出防空洞为姐姐寻找食物，书生之气荡然无存。

父母都是纯粹的读书人，姐姐出生后他们因为不会带孩子，闹过不少笑话，甚至把姐姐送给母亲的好友饶师岚作为女儿，后因姐姐在饶家不习惯，又被抱了回来。

自打这以后，父母就决定不再要孩子，并且采取了避孕的方法。但是避孕也不是万能的，用母亲的话说“一不小心就有了蒋遂！”之江山起起伏伏，父母在上课时都要经过不少的山路。母亲在山路上曾经摔过三跤，所以在分娩时，脐带在我脖子上缠了三圈（那时的医疗水平不像现在，没有B超等先进的设备），幸好医生的医术高明（一个日本战俘医生）把我倒吊起来，在屁股上拍了半个多小时，我终于啼哭出来到人生的第一声哭声，此时是1952年3月8日。我想父母将我的名字取为“遂”，是希望我一生平安顺遂吧。有个网友看到我博客上这段记述，笑说：“幸好大难不死，否则这世上又少了一个才子呢。”当然我不是什么才子，那是对我的夸奖了。

现在回想起来，人生真的是十分的玄妙，如果不是那位外国医生，也许不会有我的今生今世。

2009年的劳动节，儿子在外地出差，我与内人郭敏琍在家无事，就想出去走走。内人说：“我们去之江山吧！”我极为兴奋的说：“好啊！”确实自从1955年下山以后，我还没有再回到过我那魂牵梦萦的之江山！

来到陌生而又熟悉的头龙头脚下，保安问我们：“你们是

干吗的？”我说之江是我的出生地，我来寻访它了，他就笑笑不再阻止我们上去。一路走上山路，那已经不是原先那种石板台阶的小路，用水泥铺就的山路不算太陡峭，在树影里弯弯曲曲通向山上，耳边是不知名的鸟鸣，间忽有小松鼠从眼前的树杈一闪而过，路上只遇见一对老夫妻，几乎看不到人，空气是那么的清爽，令人心驰神旷。豁然间看到一排白色长长的二层楼房，那是记忆中的“十间头”吗？我恍恍惚惚不敢肯定，见门牌上写着“头龙头一号”、“头龙头二号”……“头龙头十号”，无疑那是“十间头”了！今天的“十间头”已经非常破旧，而且进行过改造，又在北面接了出来，加大了居住的面积。“十间头”悄无人声，有些住房竟然大开着门，显然到这里来的人少而又少。我绕到西头终于看到那昔日的处所，这才是梦中经常出现的景象！昔日的家面向钱塘江，在树影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大江东流，百舸竞流，一桥（钱江大桥，茅以升所建）飞跨，天堑变通途！

期间，有位住在“十间头”的先生走过来，因为大家都是浙大的同事，自然就攀谈起来，他说我的“家”已经不是浙大人所住，卖给一位别处的先生，他现在不在家，否则你可以到自己的“家”去看看。他自己已经把房子买了下来，是当初买的房改房，价钱不贵，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房子已旧了，住在里面有种提心吊胆的感觉，是啊“十间头”毕竟不是什么有特色的建筑，说不定那天就会消失殆尽。我默默的望着“家”，努力的把它深深的刻在脑海深处，说不定那天我就只能在记忆的深处寻访到它了，想到这里心里不禁涌上一阵无限的悲伤。

走上情人桥，风光依旧，但总觉不是原来那座“情人桥”

的感觉，铁质的桥身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时代在变迁，旧的建筑有许多不适应了，就象观念的改变。人们往往试图找回以往的感觉，情人桥被媒体一再炒作，但炒不回以往的情调。就象各地炒作的“新文物”虽然能适用于旅游的需要，但怎么看都是一种假像，令人厌恶。当然我对现时的情人桥还不至于如此吧。

陪钟鼎阿姨登顶秦望山

2014年夏季的一天，燕子来微信说，90岁的钟鼎阿姨来杭州了。燕子何许人，钟鼎阿姨何许人？听我慢慢道来。

父亲蒋礼鸿在自传中说：“我在之江念书的时候，老师钟山（泰）先生的反复涵泳，细究文章脉理的读书方法，夏瞿禅先生谦虚乐受的读书态度，徐益修（昂）先生的诚挚不已的治学精神都对我有所熏陶、启发，惭愧的是践履不及三师的百一。”这钟鼎阿姨，就是钟山先生的小女。其中的关系如下：

钟山→女儿钟鼎→女儿谭芳→儿子吴非；燕子（暴春燕），吴非妻子。

2001年吴非在浙江大学毕业，正好杭州有一个人才新政，凡大学本科毕业均可户口留杭。于是谭芳和我商量是否把吴非户口落在我家，我说“没问题”，就这样，吴非成了我的家庭成员，以后燕子，孩子旦旦也相继落户在我家。吴非成家后，在杭州富阳之间的紫云山庄安了家。之后富阳成为了杭州的一个区。

去年钟阿姨老伴谭叔常先生谢世，钟阿姨得以自由身来杭看望从未谋面的曾外孙吴澍丰（旦旦）。

接获燕子微信，我与内人敏琍立即赶往紫云山庄拜会钟阿姨，钟阿姨年事虽高，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我向她打听父亲和钟先生往事，她娓娓道来，打听她去东北的原因，时间、地点、人物交待得一清二楚。不由得使我由衷赞叹，不亏是名门之后、知识女性！

钟阿姨和我说，她此来杭州还有一个心愿，去之江山看看

当年的所在，寻寻旧时的回忆。我们当即约好下星期去之江大学、登秦望山！

这天，我和内人敏琮早早驱车来到之江山。我们的车有浙大出入卡，随意进入。然后与门卫说有位 90 岁的老人要来此寻梦，门卫倒也非常通情达理，连连点头答应，须臾，钟阿姨等人驾两辆车到来。

下了车，钟阿姨坚持用一辆轮椅手推前行。原来钟阿姨为照顾老伴，落下一个腰椎疾病，长时间依靠轮椅。以后女儿谭芳寻来膏方，坚持使用，竟然可以推着轮椅可走个把小时。她推着轮椅且行且讲，使我们又回到那个年代。

钟阿姨在 1938 年因日寇入侵离开之江，在那里度过了她的 18 岁少女年华。她指着一幢赤色楼寓说，那是西斋，当时的女生宿舍。来到情人桥，这座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桥梁，她说变了变了！当年桥下并未筑坝，也没有那一泓碧水。

迈过情人桥，来到头龙头。那稀稀落落的老房子，是当年中方教师的宿舍。钟阿姨兴奋地指着一幢二层小楼说，那就是她家！我曾多次来过头龙头，这座小楼已然破败，屋顶漏水。所幸现在作了修复，那楼得以恢复外貌。当年钟先生任之江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凡十四年，故有资格入住这栋独立小楼。钟阿姨说，那些年钟先生的俸禄是二百大洋。他拿出一百元用于生活支出和贫困亲戚接济；一百元用于购书。由此可见，民国时的学者生活还是颇为优越的。机会难得，我与敏琮拉着钟阿姨在小楼前用相机定格，她愉快的笑了！

夏季的炎热，声声蝉鸣，都阻挡不往钟阿姨脚步，她执意要登上最高的图书馆。通往图书馆的山道实在太陡峭，我坚持

要推着轮椅送钟阿姨上去，她拗不过我。我推着钟阿姨缓步前行，心中充满着敬意，终于来到图书馆门前。钟阿姨默默地围着图书馆转圈，拍拍我手臂告诉我，之江大学附属中学曾经借用图书馆几个房间办学，她曾经就学于此。我不仅感慨地想起，大半年前冬季，我也曾陪文史专家王季思的公子、王则柯教授来之江寻访之江附小未果。后经年轻朋友潘胜春告之，旧时之江附小在王先生上山前数月被拆除了。

从图书馆下来，钟阿姨又执意自己推车行走。科学馆、经济大楼、都克堂……甚至一草一木的历史，在钟阿姨口述中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中午，钟阿姨兴致未泯，还要再走走看看。怕她太累，大家一再劝她就此罢休，她相约我今后再来看看。来到西湖双峰村九通茶庄用餐，总经理田蕾女士早早把空调打足，一行人酒足饭饱。

自打上网后，我网名取“秦望之子”，是对这座美丽森林大学深深的敬意。这虽然是国外教会办的学校，但也为我国培养了很多人才。她没有排斥传统文化，钟钟山、徐益修、夏瞿禅、任心叔、郁达夫、朱生豪、胡山源、陈从周、马叙伦……包括我父亲蒋礼鸿或任教或就学于斯。建校 170 年的之江，她的人文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我。

望着慈祥善良的钟鼎阿姨，心里想，她才是真正的“秦望之子”！

那飘洒的蝶影，闪烁在青山白水间

这篇文章是2007年参加钱江晚报网络大奖赛时所写，并获得大奖赛第二名，时间是2007年3月13日。

清明时节雨纷纷，清明之际山青、水白。

日月如梭，转眼又到清明时节。2006年清明节后（2006年4月16日），母亲盛静霞以90高龄驾鹤仙去，追随父亲蒋礼鸿，在九天之上共续神仙眷侣的前缘。思绪如那洋洋洒洒的细雨，弥漫在沉沉的夜……

2006年4月20日举行母亲盛静霞的遗体捐献仪式。到会的原浙江大学副校长、九三学社浙江省主委冯培恩教授对母亲盛静霞捐献遗体及11年前（1995年5月9日）父亲蒋礼鸿捐献遗体的行为高度评价为“以一介书生，升华为生命的强者”。

《钱江晚报》作了《国学大师蒋礼鸿夫妇成浙首对共同捐赠遗体的夫妇》，《都市快报》作了《二十年前有个约定昨天实现》的报道。

父亲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学者，父亲蒋礼鸿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母亲盛静霞毕业于南京（前）中央大学。父亲致力于近代汉语的研究，母亲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

父亲以著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屹立于敦煌学研究的高峰，此书荣获国家教育部首届社会科学一等奖、第二届吴玉章奖金一等奖。生前为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的原杭州大学终身教授。

母亲擅长古典诗词的研究，与“一代词宗”夏承焘合著过

《唐宋词选》。

但是他们的思想并不守旧，20年前，母亲看到有关捐献遗体的消息，就和父亲相约生后将遗体捐献给社会。1995年5月9日父亲先行过世，遗体捐献给当时的浙江医科大学。

母亲去世前一个月，她还书面嘱咐我们表达捐献遗体的心愿。

晚间，明珠电视台《我和你说》栏目主持人徐筱安在报道“盛静霞先生遗体捐献仪式”时说，仪式上弥漫着浓浓的浪漫情怀。

“浪漫情怀”是对父母感情生活的一个描述。

父亲蒋礼鸿虽然是搞考据、搞训诂研究的，骨子里也洋溢着诗人的气质。夏承焘先生曾说：“考据词章不妨兼治，锲而不舍，可到陈兰甫，凌氏《梅边吹笛谱》不足拟也。”

母亲盛静霞在（前）中央大学有“中央大学出了两个女才子：‘前有沈祖棻、后有盛静霞。’”的说法。

父亲抗战时在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有“小圣人”的称呼，母亲在（前）中央大学有“女才子”的称呼。

诗词使父母亲走到一起。

母亲在（前）中央大学是“十大美女”之一，追求她的人很多，有教授名流、达官贵人等。但母亲一向以精神生活为追求的理想，向往着赵明诚、李清照“斗茶”的志趣。她最痛恨那些旧社会的做官人。

得知母亲对爱情的理想，她的老师钱子厚教授大发感慨，

说：“就是到天涯海角也要替你找一位！”以后钱教授果然将“白衣少年”蒋礼鸿介绍给我母亲。

当年（前）中央大学撤退到重庆，父亲千里迢迢从沦陷区穿越日寇的封锁线到重庆，来找我母亲。

母亲热情奔放，父亲严谨内敛，看似性格不同的人走到一起，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初恋并未如花季般的开放，父亲的木讷让母亲无所适从。重庆白沙的校友们都说段姻缘看来是没法继续下去了。

但是母亲却是一个粗中带细的人。她理智的反省这一段情感后，与父亲商量两人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双方冷静思考思考。父亲欣然同意。

他们分开后，却带来了转机，父亲将诗词发挥到极至。隔了数日，母亲收到父亲的一封长信，内附《鹧鸪天·次遗山薄命妾词韵》八首，其中有：

.....

书欲寄，泪先流，不成一字只成愁。
冰霜过了春应在，忍把夭桃斫断休！

.....

若容款曲心甘奉，直为相思病亦禁。

.....

母亲为父亲的才学所折服，也为他的真情所感动。随着鸿雁传书，两人的感情越发融洽。期间父亲运用自己的学术功底，为母亲解决了大量疑难问题，进一步获取了母亲的芳心。

再度见面时，父亲也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形象，理了小分头，穿上铮亮的皮鞋，“白衣少年”翩然而至。从此重庆白沙红豆

树中学的红豆树下多了一对谈诗论词，卿卿我我的情侣。

母亲是爱情至上者，外婆却嫌我父亲“没有一些田产”。但是母亲坚信自己的选择是不会错的。果然在五十年生活中，母亲越加体会到父亲的真情。

相爱容易相守难，感情并不能代替油盐柴米。那么他们在五十年的漫长生涯中，是如何处理情感与物质的矛盾呢？

首先，母亲是一位将金钱看得很淡的人，虽然出自大家闺秀，身上却有着不同于女流之辈的豪气，为人行事奉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原则。父亲则更是将书看得比金钱更贵重的东西。所以他们一生接济他人，即便在文革中间，父亲因坐牛棚只拿 35 块生活费，母亲也拿出钱来帮助父亲那边的穷亲戚。

在他们看来，任何的物质都不能取代科学研究的乐趣。生活上的低标准，学术上的高质量是终身追求的理想。少了一分物质上的烦恼，就少了一分感情上的矛盾，自然就多了一分生活上的乐趣。

有人问我：“蒋先生和盛先生的性格差异挺大的，他们是如何处理感情与性格的矛盾呢？”

是的，我母亲的性格外向，父亲内敛。然而父亲在内敛的表象下却有着一颗炽热的心，当年父亲在和母亲唱和的诗词中有：

作茧缫丝甘九煮，织成锦绶长围汝！

甘愿象蚕茧那样在滚水中沸煮，抽出的丝织成锦绶围在心爱的人脖子上，是何等的付出、何等的情怀啊！

当抗战胜利的钟声响起，父母就象久别巢穴的小鸟飞回故

乡。在溯江而下的轮船上，母亲不幸身患重疾，父亲拼死服侍使母亲转危为安。

父亲的内敛表现在他对学术研究的态度上，在情感生活中更多的是一份激情，不是长期生活在他们身边的人不大看到而已。

当然，个性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不同性格的人之间如何相处？父母留给我的印象是：真诚、信任和宽容。

父母年轻时，有一天晚上母亲外出，父亲在床头看书。母亲的一位女朋友冲到我家，倒头睡在父亲对面的小床上。父亲自顾自看书直到母亲回来。两天后谈起此事，父亲说：“她这个人也是随便了一些，她来时，我已睡下了，她老实不客气，叫孩子让床给她，我要是有些歪心，或是换了一个男人，只怕就‘不妙’了。”母亲说：“我是绝对信任你的，难道，我还不知道你？就在我们热恋时，你也是‘发乎情，止于礼’的，什么‘坐怀不乱’，‘同床不乱’在你是不在话下的。”这是何等的信任！

年迈以后，父亲话语更少了，母亲还是和以往一样，爱说爱笑。父亲就在一边悄悄的说：“啰哩啰哩，呜哩呜哩。”

他们五十年的春秋是在杭州度过的，西子湖的山山水水、钱塘江的滚滚潮水见证了他们的情感生活。黄龙洞的老道士认识他们，西泠印社的营业员尊重他们，直到晚年，他们相互搀扶着漫步在杭大路上，夕阳在他们的身后留下了长长的倩影……

父亲去世后，母亲在梦中呼唤着他：

独舞孤飞也不妨，穿花弄影自成双。

无情有意来相伴，似慰幽人莫断肠。

最终我的父母为一个共同的理想，先后踏上了人生的归途，将遗体捐献给社会。

茫茫遗体早无踪，犹有衣冠向晚风。

何日碑头朱变墨，云阶月地会相逢。

母亲盛静霞注：“云从（我父亲的字）墓碑上，有我俩姓名。伊墨书，我朱书。俾他日墨涂也。首句云云，盖遗体已捐献国家。”

南山陵园建有我父母的衣冠塚，那青青墓草今年更加葱翠了吧？

静霞云从，就像天际边的彩云和彩霞，父亲永远追随着我的母亲。

我的至情至爱的父母，我站在高高的山冈，看到你们双双化蝶的身影，在西湖的青山绿水间飘洒！

第二章：道古桥边的幸福生活

童年

前些年由于浙江大学要进行旧房改造，杭大新村许多人家搬了出去，但是也有不少人因为条件没有谈妥，抵制改造方案而没有搬出去。最后由于仲向平教授等一些呼吁保护杭州老房子的人的努力，作为杭州市有价值的老房子保留了下来。

1957 年春天，我家从体育场路的浙江师范学院宿舍搬到杭大新村。

杭大新村已经是这批老房子的第三任名称了。最早由于旁边有一座桥叫作“道古桥”被称为杭州大学道古桥宿舍。以后杭州大学的教职员人员扩大，现在的文三新村居住了很多老师，遂将道古桥宿舍称为河南宿舍，文三新村称为河东宿舍。因为杭州大学南面有沿山河、东面有西溪河得名。

1958 年杭州大学创建在杭州市西郊，现在的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地址上。应该看到是当时城市西进的一部分了。道古桥是一座架在一条从宝石山流下来，通向沿山河的未知名小河上的小桥，名称古色古香，当年还可以看到河里的小船。

当年杭州大学边上是著名的松木场，河道交叉，云水相连。

当时从体育场路浙江师范学院宿舍，搬到道古桥宿舍，可谓是从城里来到了乡下，足以使孩子感到新鲜。

道古桥宿舍是在原来的坟场上建造的，蒋绍心家的院子里还留有一块“福望公墓”的石碑。记得刚搬来时，路上还可以看到尸骨和骷髅。我们这些男孩子是可以拿着尸骨打架和把骷髅当足球踢的。当然坟场也不是一无是处，参加松沪抗战的国民党 88 师将士的尸骨也掩埋在那里，一排一排十分整齐，可惜在文革时被毁，只留下一座纪念碑坊。

我家住在五幢四号。和我家相邻的四幢和六幢都有许多知名的学者，他们是：

四幢夏承焘先生、姜亮夫先生、蒋祖怡先生、胡伦清先生、胡士莹先生、钱南扬先生、吕漠野先生、陆维钊先生。

五幢王承绪先生、王驾吾先生、董聿茂先生、吴向先生、陈桥驿先生、张文昌先生。

六幢陈书先生、严德一先生、陈学洵先生、周洵钧先生、任铭善先生、王璘先生、陈士怡先生和焦梦晓书记。

道古桥宿舍还有其它的名人如林淡秋、孙席珍、朱福炘、郑晓沧、陈企霞等。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仲向平教授的著作《杭州老房子 续编》。书中称“这片绿色小区，曾是传承中国文化的中心，是浙江学术的圣地，也是新西溪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文化名人的群落”。

当年的那些老先生大多已经作古，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还常常留在我的记忆里。

记得那年，我父母蒋礼鸿、盛静霞到农村参加四清，我就住到了蒋祖怡先生家，我姐姐盛逊住到陆维钊先生家。蒋祖怡先生家极朴素，吃饭时是极小的鱼做菜。

有一次，我妈妈逼着我扫门前的马路，那时的路是小石子

铺的，很难扫。姜亮夫先生的内人陶秋英女士看到后说：“好同志！”

夏承焘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师，父亲要我称呼他为“太老师”。还有一位太老师钟泰先生，一次他到我家，父母当然是毕恭毕敬。太老师对我说：“站如松、坐如钟、”

一次在周洵钧先生家，他得知我在杭州砂轮厂工作，就和我谈起硅酸盐等化学问题。

我在道古桥宿舍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记得我和焦梦晓书记的儿子焦星星在用竹子做的剑斗打。那时我们没有多少玩具，剑是用建筑上的竹排上拆下来的竹子自己用刀削的，焦书记在一边说：“好利害的剑！”

几个男孩在晚上打仗，黑夜里我拔起一丛小草，根部带了一大把泥土，扔了过去。第二天胡伦清的孙子胡潮生说：“介（杭州话，意思为“非常”）大一块泥扔在我脸上！”我心中暗自好笑。

我还和周洵钧先生的儿子周立在沿山河钓鱼，钓鱼的渔竿是在边上农民家的竹林里偷来的竹子做的。

夏天是最美好的季节，男孩子都去捉蟋蟀、抓知了。我家院子里种了两棵杨柳，长势很快，不久就成为大树了，我在竹竿上绑上一个网，用来抓知了。

夏天来了，有许多小鸟刚刚会飞，我们就捉来自己养，笼子也是自己用竹子做的。父亲不相信我会做鸟笼，我硬是做了一只鸟笼，父亲大为惊奇。

那时候家里没有空调，一台电风扇成为我家最大的骄傲。夜里大家都到院子里乘凉。大跃进的年代，孩子们都充满好奇，

一次瞿墨新(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女儿翟小园说：“到了共产主义，我想树都会在天上走路了。”

当然道古桥宿舍也不是世外桃源，文革前王璠先生被人杀害，后来查到是一位农大的学生，是看中了他家的钱。王璠先生的内人叫德梦铁，是欧洲人。我们小孩不知道她是哪国人，就叫她“苏联妈妈”，后来知道她是奥地利人。德内人长得高大丰满，她家的两只波斯猫也长得肥肥胖胖。文革后就不知道德内人的下落了，据说是回奥地利去了（以后才知道德内人是拉脱维亚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怀念夏季

杭州 2011 年的夏天悄然来临，这夏天来临的标准是连续五天气温超过 30 摄氏度。

杭州的夏天已经越来越使人感觉烦恼了，从每年的气象预报上几乎都能看出来，杭州是全国少有的几个特高温的城市。进入夏天的人们，尽可能待在空调房里，只有那些辛勤的农民工兄弟、环卫工人和其它一些户外工作的人员不得不顶着烈日挥汗工作。

但是，夏季原来并不是那么可怕，至少在我记忆中的童年，夏天甚至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

记得小时候，刚进入夏季时，正是鸟儿哺育幼鸟的时候。杭州大学道古桥宿舍是在西溪湿地旁建立起来的，周边有大片的竹林、树林、河流和小溪，那些地方是鸟儿理想的栖息地，各种各样的鸟儿在林子里做窝，哺育幼鸟。我们几个小伙伴会到那些地方捕捉幼鸟，因为那些嗷嗷待哺的小鸟抓住以后，可以用小棍子挑着食物喂它进食，不必担心像大鸟一样抵死不吃而饿死。

抓住的幼鸟以麻雀居多，也有象“白头翁”和其它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鸟。这些幼鸟不像成年的大鸟那样，抱定的是“活命哲学”只要肚子饿了就伸出脖子，张大嘴巴，“叽叽咋咋”地叫着要进食，于是我们就用小木棍挑着食物对它喂食。这些食物主要有米饭、小虫子，用米饭喂食的好处是食物来得方便，但是坏处是缺少营养，时间长了小鸟会得一种脚气病，严重的会死掉。小虫子需要到户外去捉，最多的虫子是一种叫皮虫的。

长在一只纺织起来的皮囊里，把它们挑出来喂食是最好的食品。

幼鸟从小鸟喂到成鸟，时间很快。先是它们自己会进食了，不必我们再去喂它。起先长成的小鸟进食时还有些困难，多半是歪着脖子吃食，以后吃得越来越像样，最终可以非常熟练的进食。再后来，幼鸟的羽毛也丰满了，慢慢的会学习飞翔。这个时候再把小鸟放在纸板盒子里养就不适合了，它会飞走。于是我找来工地上搭脚手架的竹排，抽出一根，用菜刀、剪刀做成鸟笼的架子，用剪刀在上面钻孔，再把竹子削成细圆条子插到孔里，做成一只像模像样的鸟笼子，那可是一个读小学的孩子做的啊。

这些小鸟大都是养不活多长时间的，原因有多种多样。有一年我好不容易养活的一只小麻雀不久也死去了，伤心之余，请父亲在一条小竹排上写上“小麻雀之墓”葬在芭蕉树下。

炎炎夏日最好的活动就是亲水，我在小学二年级时就学会了游泳。那时我是跟杭州大学中文系蒋祖怡先生的儿子蒋绍忠去学游泳的。蒋绍忠后来可是个大人物，曾经担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总经济师，这个总经济师直到他退休几年后，还没有继承的人选。

最早是跟蒋绍忠到弥陀山游泳池学游泳，以后杭州大学建立了游泳池，就到自己学校的游泳池去。杭州大学游泳池是一座标准的比赛用游泳池，25MX50M。那时没有瓷砖，游泳池的四壁是水泥的，一不小心脚碰在水池边，就会划出血丝。每场时间一个半小时，3分钱一张票。有一次，妈妈盛静霞到游泳池来看我游泳，因为游泳池就在中文系大楼后面，很方便的。妈妈穿着浅蓝色小花的短袖衫，下面是黑色的长裙，打着一把

西湖绸伞，那时她才40几岁，又年轻又漂亮。我穿一条绿色的游泳裤，在水里尽情的向妈妈展示自己的水上本事，妈妈说，我就象一只小青蛙在水中翱翔，我听了非常开心。

以后进了初中，学校的体育课也有游泳这个项目。我已经是游泳“老手”了，就担任“救生员”一职，那些同学没有几个会游泳的，都挤在浅水池，我自然也无事可做，坐在岸边晒太阳，打打水。有一年杭州市举行横渡钱塘江比赛，我们学校也参加了。由于我游泳水平娴熟，最终上岸时，我是全校第二名。文革后，我从黑龙江回来，还和任平、王小贤他们去横渡钱塘江，那次不但游到对岸，还从对岸游了回来。

那时由于物质生活比较贫乏，都还没有空调。我家有一台电风扇，算是高级享受了。那电风扇是华生牌的，没有档位，开起来“哐挡挡”的，像火车一样。夏天父母参加高考阅卷，会带回来一些冰块，放在家里降温。父母的单位也会发一些西瓜，我记得那西瓜放在竹床下面，好多呀！那时最好的西瓜是平湖西瓜，长长的个子，剖开来是黄色的囊，真好吃。父母是学者，吃西瓜也不同别人，我家的西瓜是对剖开来，用瓢羹挖着吃，以免弄脏衣服。那时的冰棍只3分钱一支，叫作“白糖棒冰”，也有更高级的“赤豆棒冰”，但是我们吃得最多的还是白糖棒冰。

每天到了夜晚，家家户户都到室外乘凉。这时候也是我们小朋友交流的最好时间。一人一把扇子，扑打着蚊子，坐在小凳子上天南海北侃大山。由于道古桥宿舍建立在原来的墓地上，所以一到夏天晚上，会有许多萤火虫在天空中飞翔。有时候，我们会捉一只萤火虫放在瓶子里面，于是父母就对我们讲起

“车胤囊萤夜读”、“悬梁刺骨”等奋发向上的故事。

天色越来越暗，四周黑咕隆咚的。坐在原来的墓地上，不免会想起孤魂野鬼来，于是胆子大的孩子开始讲鬼故事。“俄顷，只见一片漆黑！那厢飘来一个身影，仔细看却是没有脚的，突然那厮吐出红红的舌头，两眼放出绿光，大喝一声：‘快拿命来！’……”听得人毛骨悚然。于是，一个个偷偷溜回家中，躺在地板上直冒冷汗，心里拔凉拔凉的。那一天的炎热在此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每个人都有对童年的美好回忆。不知今天的孩子，明天会讲出什么动人心魄的故事？

矿石收音机

五六十年代，物质生活非常贫乏，主要原因是经历了大跃进等非常时期。那时我们这些学者的家庭还算是比较富裕的，我父亲蒋礼鸿工资 140 元，母亲盛静霞工资 120 元。父亲的工资在解放前比那时还要高，解放后降了下来。

虽然如此，父母亲还是很大方的经常接济一些亲戚朋友，长年接济的有我的堂姐蒋淑琴。淑琴因为其夫婿李茂盛封建思想严重，虽然是革命干部，还是非要生儿子传宗接代，生了 4 个女儿 1 个儿子。另外有一个远房的姨妈，是我母亲的表姐。文革后期母亲还接济过郑阿莲阿姨的母亲，因为阿莲阿姨的母亲在我们姐弟去黑龙江后照顾过我母亲。

另外还有一些人，有我母亲住院时的农民病友。瞿墨新（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女儿瞿小园因为从小患内风湿性关节炎，到处求医，我母亲也资助过她。

母亲的中学同学张香兰女士，因为丈夫的历史问题，解放后吃尽了苦，不得已把自己的儿子金蜀过继给别人。金蜀也就随别人姓了“金”，原本是姓“李”的。妈妈说有一年金蜀因为交不起学费，他妈妈张香兰女士让他到我家借钱，我妈妈借了他二十元钱。我想当时借钱的窘迫一定使人难忘。

金蜀日后成为著名的建筑师，他设计的交通银行曾获杭州市十大建筑奖。银泰大厦、中信实业银行、杭州海关、罗马公寓等都是他设计的。

在那个时代根本没有电视、音响、电脑等现代化娱乐工具，但已经有收音机可以接收新闻。那个时候喜欢收音机的人称为

“无线电爱好者”。蒋祖怡先生的二儿子蒋绍忠就是无线电爱好者，在他的影响下小儿子蒋绍心也喜欢上无线电，并日后成为电子学方面的专家。

我那时简直就是蒋绍心的“跟屁虫”，他喜欢什么，我也喜欢上什么，自然而然也就喜欢上了无线电。

最早的时候是动手安装矿石收音机。现在的人几乎不知道什么叫矿石收音机了。由于电子管收音机属于高档收音机，一般的人没有经济条件安装，晶体管还没有出现，所以无线电爱好者一般是从矿石机的安装开始。

现在看起来矿石机实在是太简单了，一只“矿石”、一副线圈、一只可变电容器、一副耳机再加4个接线柱就可以收听新闻了。

“矿石”是一种检波用的元件，外面是一个塑料管，里面有一颗“黄铁矿”和一根黄铜的小弹簧，通过塑料管上的小洞，可以用细铁丝等拨动小弹簧，使小弹簧对准黄铁矿上的晶体，形成检波。具体的原理就不说了，也许大部分的人看了也不懂。

有了元器件以后，我就把它们安装在肥皂盒里，既漂亮又实用。收音机需要外接天线和地线。我把竹杆绑在屋外的法国梧桐上，接上天线，又挖地埋上地线。天线和地线通到屋里，我接上收音机后，就可以躺在床上收听新闻了。

收听的惬意就不用说了！躺在暖暖的被窝里，伸手不见五指，听着解说篮球赛的实况转播，激动的心情远比观看“足球之夜”兴奋。矿石机伴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

那时每到春节，父母会在我的枕头下放上一块钱，当作我的“压岁钱”。一块钱可以买许多无线电的元件。我从家里出

发，走到湖滨路上的“红波无线电商店”挑选自己喜欢的元件，然后还要从宝石山东麓爬上去，再从黄龙洞下来回家里。

有一年我和周新农同学代表杭师附小参加市的无线电比赛，拿回了一个第五名，奖到一副耳机。

以后晶体管出现了，矿石机被晶体管收音机代替。买半导体的钱远比“矿石”元件高。我的父母不太乐意了，我很知趣的停止了无线电的爱好。虽然我没有在无线电的道路上走下去，也许这也是一条成才的道路，就像蒋绍心一样。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埋怨我的父母，因为我知道虽然我没有成才，但是父母给予我精神上的支持，是我今生今世也用不完的。我很清楚的知道，我现在不因金钱而烦恼，是因为我出生在一个既不富裕也不贫穷的家庭，诸事都想得开。当年有一个越南语言代表团访问杭州大学，一位越南人问我父亲：“你的孩子是干什么的？”父亲说：“我的孩子是一位工人。”

治 印

童年是幸福的，我生长在学者家庭，父亲蒋礼鸿是研究古代汉语的，母亲盛静霞是研究古典文学的。我多多少少也受到一些影响。

父母作为老一辈的学者，他们的根基远比现在有些教授学者深厚。我父亲不但学问好，而且传统文化都有所涉及。记得小时候家里就有清郎次宁的绘画，父母不但书法出众，而且父亲还画得一手好画。他画的骏马体态丰盈，兰花清秀，松竹傲霜，母亲会画工笔的仕女。

父亲在任铭善先生的传略中说任先生能写折枝梅花，其实父亲的画也绝不在任先生之下，只是他纯粹是给我画着玩的，在旧信纸背面，随画随扔根本不打算留下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对治印感起兴趣来。其实当时是受到蒋祖怡先生的小儿子蒋绍心的影响。祖怡先生也是国学大师（不知道这么说是否又有人评头论足了，最近媒体对国学大师的争论实在是太多了，但我认为这些老先生确实非现在的专家教授可比）。

我和蒋绍心是自幼的朋友，用他母亲的话说，他家的抽屉我比自家的还要熟悉。每到中午父亲就要到他家窗口喊：“蒋遂，吃饭了！”（我家住五幢，他家住四幢）。

那时候我们这些人家，家里都有许多印章，足以用来学习治印。后来自己的兴趣来了，就到西泠印社等处去买石料，一块石料也只一两毛钱。制印用的刻刀在杭州湖滨路上的书画社可以买到，也只一两元钱。

开始刻章时并没有用上正规的刻刀，记得是用半把剪刀。也没有专门的印台，至今我刻章也不用印台。记得看到任平（任铭善先生的儿子）的印台我还很羡慕的。

第一次刻的章是“小牛之印”，有段时间父亲喊我叫小牛，我姐姐盛逊叫大牛。大概是取牛的憨厚和诚实吧。

第一次刻的还算不错。是阳文的，由我父亲在石料上先写上字，由于印章上的字要反写上去，我年纪小写不来，父亲很高兴的帮我写了。以后任铭善先生的儿子任平也在差不多的时候开始制印，我们自然就成为一党了。

任铭善先生也为我写过印章上的字，现在想起来如果把这些印章保存下来，应该是价连联城了。

开始治印的时候，手法不好，常常会把手刻破，时间长了就游刃有余了。以后刻得多了，水平也提高不少，印台根本是不需要的。那时候搞到一本《西泠四家印谱》，对我的帮助很大。我父亲还在这本书上找到许多文字的错误，寄给出版社他们没有反映。以后又看了一本有关制印的书，书上有“宽可走马，密不插针”等论述对我影响很大。

任平由于也是出自名门，治印的水平也很好，我在到黑龙江农村插队时，他给我制了一方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制印时间长了，自己也学会在石料上写字，慢慢的连写字也不需要了，就在石头上直接刻下去。阴文、阳文挥洒自如。回忆在春日的阳光下，慢慢的一刀一刀刻下去，刻一刀吹去石粉，再印在纸上，慢慢修改，心绪是那么的平静。

我还和父亲联合制过一方印，是我的私章，父亲在边款上刻了“蒋遂二十初度，云遂合作”的字样，可惜这方印章被丢

了。

以后名气慢慢大了，有许多人请我刻章。其中我为父亲刻的“怀任斋”印章大概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怀任斋”是父亲用于纪念任铭善先生的。

我家现在还存有不少印章，有父母在西泠印社刻的印章，有任铭善先生为我父亲刻的印章，有我父亲自己刻的印章。有两枚是祝遂之先生、陈振濂先生为我父亲刻的印章。当时祝、陈还未出名，是中国美院的章祖安先生命他为我父亲刻的。陈有说参加了西泠印社就是社会名流云云。

现在我和蒋绍心已经不再治印了，这是因为我们都不再继承父亲的学业，而任平还在制印，他现在也成为了书法界的名人。

可怜的小“麻雀”

1957年我随父母蒋礼鸿、盛静霞从体育场路浙江师范学院的教师宿舍搬到道古桥新建的宿舍。

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和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组建杭州大学。当时杭州大学正处于初创时期，一切都非常简陋，甚至学校连大门也没有。那时的大门是单身教师宿舍二幢前面围墙的一个缺口。从道古桥宿舍到学校去，要走过一座搭建在沿山河上的一条竹排小桥，走在上面晃晃悠悠的。以后有部队的解放军战士对沿山河进行改道，修建了天目山路，杭州大学的大门才改建到现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大门的这个位置上，也有了正式的校门。

那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原中文系教学楼（中文系教学楼随着学校改建，早已经拆除不见踪影）的西面墙上画了一幅宣传画。我记得很清楚，这幅画足足有三层楼高，画的手法也不错，比现在杭州市的一些墙绘更有水平。画面上有炼钢用的小高炉、有沉甸甸的麦穗、有在天空翱翔的飞机等等，那宣传语说的是三年赶超英美。为了大炼钢铁，家里把一些锅碗瓢盆都送到学校去熔化。

那时候国家还兴起除四害，四害是指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这其中最惨的是麻雀，以后对麻雀进行了平反，不属四害之列。那年的一个冬天早上，我随父亲蒋礼鸿去学校消灭麻雀。我们到学校时天色才蒙蒙亮，父亲把他的棉帽子带在我头上，我手里拿着铜火熄的盖子，随大人一起敲打，据说这样做能把天上的麻雀震下来。可怜那时杭州大学地处西溪湿地，麻

雀们可以到各处觅藏起来，哪有那么好事，能把麻雀震下来？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终于在健身房（现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幼儿园）前把一只惊恐的“麻雀”震了下来。然而仔细一看分明不是“麻雀”，是一只与麻雀长得极其相似的小鸟！

大跃进以后，紧接着是三年大饥荒，一下子变得吃不饱饭了。当时由于父母都是学者，国家每月有发肉票和其它补贴，所以我们家的日子也还算好过。为了填饱肚子，我家的小园子里种了胡萝卜和其它蔬菜，那时挺奇怪的，种什么都长不好，胡萝卜才手指大小就不长了，于是就拔出来生吃。家里还养了小兔子，也是长不大就死了，也是拿来吃。杭州比起其它城市还算好的，到饭店里吃饭不要粮票。一次父母带我们到杭州饭店（现在的香格里拉酒店）吃饭，饭店里人满为患，等了几个小时才上餐桌。平时家里的保姆会做高粱窝头，蘸了糖吃，味道还不错的。

那时实在吃不饱，我就偷偷的拿了家里几张饭票放在鞋子里，没想到走路时掉出来了。母亲盛静霞大怒，用修袜子的袜底板打我手心，手心里每条纹路都充满了血丝。跑到蒋绍心家里，他奶奶给了我一些吃的，才收起泪水。

蒋绍心生来聪明，看到食堂的饭票是油印的，于是就找来父亲的钢板蜡纸照饭票的样子刻起来，再用鞋油一刷，便可以假乱真。凭着这几张饭票，我们在食堂买到几只麸皮馒头，大嚼一顿。

少年读书郎

我年轻那会儿，娱乐生活比较少，物质生活也比较贫乏，所以有些事情也不是想要怎样就能怎样的。于是喜欢音乐、喜欢画画、喜欢读书的称为有“爱好”的人。现在想想挺好笑的。我从小生长在学者家庭，自然对“书”比较熟悉，于是有了读书的“爱好”。

能够第一次把大部头的书读下来的，记得是在小学时读《青春之歌》。读那书时，已经能比较顺利的把整本书读下来，这是个成功阅读的开始，所以我记得比较清楚。那书先是我姐姐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我也只是借了姐姐的光。至于书中那美丽的林道静到底提高了我多少的革命意识，则不敢得意，革命青年卢嘉川也不是我崇拜的对象。倒是很记得另一位革命青年江华，他爱花，还说“美好的东西人人喜欢”。

无聊的时候，我会在父亲的书架上翻翻，希望找到可以看的书。但我从来对那些深奥的古书是敬而远之的，到现在我也看不懂。翻到《聊斋》，也不太看得明白，总算是硬啃下来了，对书中“俄倾”两字分外感兴趣，知道是非常迅速的意思，感叹古人的文字怎么会这样简捷！看了《水浒》就学会了喊：“这厮无理！”

当然比之于《水浒》的不正统，《三国演义》更值得欣赏。直到现在我还认为，现在可以搞出多少“戏说”、“别传”等娱乐的电视剧，古代为什么不可以有“演义”呢？虽然《三国演义》与《三国志》有许多差别，人物的描述也不一定比历史上真实。但这演义也树立了正邪的标准，演义上的曹操被描述

为奸诈小人，是对这种品行之人的一种鄙视。我最喜欢的人物不是关羽，不是刘备，而是常山赵子龙。子龙截江夺阿斗真是浑身是胆！张飞在长板坡一声怒吼吓退曹操百万大军，也实在过瘾。诸葛亮的借东风、空城计也令我喜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多少对我也有些影响。成年后更知道“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是出自诸葛亮的《诫子书》。

父亲的书架上也不尽是古书，上面有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朱是我父亲秀州中学和之江大学的同学，两人相交甚欢。也有父亲喜欢的《一千零一夜》《基度山伯爵》《茶花女》等等。

我看《基度山伯爵》看得如痴如醉，幻想有一天也能像基度山那样宰了仇人而不必受法律的制裁。一次和朋友郊游，有王小贤说贵族的区分是怎样的？我顺口报出“公、侯、伯、子、男”，惹得一片称奇！

年岁渐长以后，有了少年的性懵懂。看中国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特别记得一句话，那是国民党军官关敬陶在看电影时，有性感女郎穿着稀少在台上跳舞，就说：“再进化怎么办？真格光屁股？”现在三点式已经登电视之大雅之堂，好在“光屁股”还不曾见。看来60多年前的关敬陶是多虑了。

那个时代晚上没有娱乐，躺在被窝里看书就是最好的享受，一看看到半夜两三点钟。

昏灯一盏，
思绪飞扬！

杭大幼儿园的故事

半夜醒来看了一篇微友江燕写的《小镇往事(五):后高山的故事》，记述她上幼儿园的往事，不觉兴致上来，也想写一篇。

我上过三个幼儿园：浙江师范学院幼儿园、天水幼儿园和杭州大学幼儿园。

之江山上的浙师院幼儿园全然没有印象，只记得妈妈说我是三岁进幼儿园，大概不久就下山搬到浙师院体育场路 262 号教师宿舍了。妈妈说我进园第一天很乖，第二天也很乖，但是第三天一口咬住一位小朋友的下巴了。

1955 年搬到体育场路，浙师院搬来的只是部分院系，所以没有幼儿园。父母把我送进天水幼儿园。天水幼儿园是老牌子，现在还在体育场路和中山北路交叉口的西南角。那时候中山北路还没开凿到环城北路，园址在现在体育场路和中山北路交叉口的中山北路北面的位置上。那是一个老底子的“墙门房子”，即有围墙的院落。院内有天井，房子很高大，以前定是富贵人家所建。我在这个幼儿园待了两年，是不是有人接送已记不得了，从教师宿舍到幼儿园也就 100 米左右的路程。这 100 米的间隔，北面是大片的油菜花地，南面有稀疏的民房。记得中文系吕漠野先生的儿子忆波，有次在油菜花田里捉一种会飞的，像蜜蜂那样的小昆虫（没刺的）他把油菜花整倒了一大片，于是有农民前来宿舍交涉。印象中农民很文明，不知为什么现在的人竟然如此戾气？只能说那时的社会风气好，否则又怎么解释呢？北面还有一个棺材铺，里面整整齐齐叠满棺材。

有一天晚上棺材铺起火了，我们在二楼窗口上看到熊熊大火照亮了半个天边。

有一天，班上一位小朋友与我说他哥哥在武林路上，要我和他找哥得去。于是两人溜出幼儿园，一路向西去。那时体育场路还是石子路，车辆极少，人也极少。走了半天向南拐到武林路，武林路那时叫西大街，已是柏油马路，两边的店铺不少。也许那位“哥哥”子虚乌有，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中途那小子还掏几分钱买了里面装着彩糖的玻璃棒，把棒子砸开找里面的糖吃。现在想想似乎不可能，把玻璃碴子吃进去岂非要出人命？但确实印象很深。逛了半天，太阳也升到头顶，人也乏了，肚子也饿了。两人焉巴焉巴往回走，走到家门口，妈妈正站在那里，见到我，妈妈也没打我，说是已报告派出所了。这是我的第一次都市猎险记。多年后与内人郭敏珣随便说起，她竟也读过天水幼儿园。你看，这缘份！

1957年，浙师院在城西松木场地段建起新校舍，我家从体育场路搬过来了，这时在之江山上的浙师院本部也搬过来。于是人声鼎沸，大小孩子到处跑。时任学院工会主席的妈妈倡议建一所幼儿园，于是幼儿园诞生了（一年后，浙师院与杭州大学合并成立新的杭州大学）。

幼儿园初设在铜佛寺，地址在杭大（现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东门外。铜佛寺古木参天，庙堂幽暗，我又开始第三段幼儿园的生活。幼儿园到道古桥宿舍的家尚有一段距离，小伙伴结伴同行。那时不像现在车水马龙，也没有什么人贩子，大人们很放心让我们自己走去上学。有一天刚雨过天晴，地上有些水塘，同行的陈干（教育系陈学洵先生公子）任平（中文系任铭善先生公子）个子比我大，别出心裁要抬我过水塘。后果可想而知，

我掉下来了，好在衣服没怎么湿透，照样上幼儿园。幼儿园搞什么活动，记不得了。唯一记得的次活动是抓阄。就像《红楼梦》中一样，用一块布盖着许多小物件，然后把手伸进去抓，据说抓到什么就爱好什么。具体抓到什么早忘了，只是过程还记得。应该不会像贾宝玉样只抓胭脂水粉吧？

铜佛寺破败不堪、阴冷潮湿，自然不是办幼儿园的好地方，没多久就搬家了。现在铜佛寺早就拆了，只留下几棵硕大的香樟树。我曾很有心的在网上查铜佛寺资料，一无所获。估计杭州文献资料也许会有，只是我纯粹兴趣，也懒得去查。

幼儿园搬到道古桥宿舍，是在西溪路(原来叫杭徽路)和四幢之间。那是一条三角形狭长地带，建起一座平房，以后又建一座二层楼房。现在房子还在，只是幼儿园搬到了浙大西溪校区，原杭大健身房里。

新园的教室很宽敞，铺着木地板，阳光从窗户里直射进来。比起铜佛寺的阴冷潮湿，不知舒畅多少，户外活动场地也很大。最兴奋的是有很多玩具。印象最深的是一种木质积木，一块基本型状的积木比砖块还大，空心的搬起来毫不费劲，上面漆了清漆，木质纹路清晰可见，拿在手里暖暖的。用这些积木随心所欲搭房子，想怎么搭就怎么搭，惬意！我家住在四幢后一幢：五幢，上学方便许多，不用再穿过半个杭大了。第一天早上自己背着小棉被上学，兴奋！中午都是回家吃饭的，吃完再进幼儿园睡午觉。有时候中午回家前溜到四幢蒋绍心家玩(他比我大三岁，已上小学)大人也知道我的伎俩，到了时间，爸爸跑到绍心家后门喊：“蒋遂，吃饭了！”中饭后的午睡，似乎从来没睡着过，拖着拖着，就从窗户里看到绍心、忆波等略大的孩子，小学放学回家了。

在这里，我又有两次逃学的经历。中午吃完饭去幼儿园，都是自己去，所以干脆跑到杭大校园里玩。时间差不多了，装作放学的样子回家。大人不知道，幼儿园好像也没在意，不告状。有一次在杭大玩，看到一队解放军的马车经过。那个时候马车很普遍，体育场路上经常看到过，路呢，干脆叫“马路”。解放军很友好，我们就爬到马车上回家，嘴里还喊着“得尔，得尔驾！”引得解放军哈哈大笑。到了大班，不知道因为“威武”，还是有“组织能力”，竟然做起幼儿园的“大王”来了。这时候已是“男女有别”了，跟着屁股后的都是男孩子。那时幼儿园教育没那么严厉，也许老师根本不知道有“大王”一说。男孩子喜好打架摔跤，我这“大王”的地位一半也是靠打架打出来的。就像“猴王”的地位，只不过没有妻妾成群。当然也有不服气的。一位小男孩(名字就不透露了)某天在他哥哥带领下，到我家来，他哥嘴里喊：“蒋遂，出来！”想是让我和他弟弟打一架。我站在阳台上不动，他们大概也有些气馁，又怕家里有大人，僵持了一会儿，怏怏地走了。

离开幼儿园已经 57 年了，还能记得一些往事，还真不容易。某天陪内人参加退休科活动，在黄龙洞遇见幼儿园卢老师，她虽然认不得我，却记得我！与卢老师愉快地合影，还互留了电话。

现在我孙子也上了浙大西溪幼儿园(原杭大幼儿园)。我儿子也是这个幼儿园出来的。祖孙三代同为幼儿园前后同学，你说奇不奇？院方知道我家四辈和幼儿园的情缘，推荐我儿子为“家委会”成员。

这缘，不知还会不会续下去？

往事朦胧 ——忆我的小学生活

最近王瑜邀我加入“杭师附小 59 级”微信群。遥忆 56 年前往事，恍若昨梦！1957 年随父母从体育场路浙师院宿舍搬入道古桥宿舍，59 年夏，进入杭师附小。

入学那天，我随附小五年级的姐姐去上学。穿过杭大的大操场时，有一头黑色的恶犬向我扑过来，那狗身型高大、面目狰狞，追着我嚎叫。姐姐追上来，用书包不断砸在恶犬的头上，那狗才不得已跑了。以后听大人说，遇到狗不能跑，你越跑它越追。

穿过西溪河（那时好像没这名字）上的小桥，前面是杭师附小。小桥是用竹排搭建的，连桥梁也是竹子，走在上面“咯吱、咯吱”地响，道古桥宿舍通杭大的桥也是一样。学校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记忆可能有误），中间是楼梯，有教室和教师办公室。有一位姓张的校工住在学校，他的子女也是附小的学生，以后升入杭大附中。教学楼后面是大大的操场，厕所在操场东北角，课间去上厕所，人满为患，印象非常深刻。我进的一甲班班主任是陈登德老师，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教我们语文。不记得是否还有数学老师，亦或数学也是陈老师教的？焦又新同学提示，二年级时学过俄语，俄语老师是一位姓方的男老师。我记得那位方老师肢体语言非常丰富，嘴里喊“啊、呀、噢、唷”，手上板书，身体还不断左右摇晃。图画课，不知哪位老师教。记得有次写生，是画路边的树，我挑了

一棵树杆倾斜的法国梧桐，得了五分，心里非常高兴。

据张俐拉同学回忆，到四年级后，甲、乙两班重组，分为五年制和六年制两个班，学校在下宁桥建起新校舍——本部。当时我父母认为我应该读六年制，我不甘心争辩说如果五年制进不了中学，还可以再读六年制。他们默许了我，这样我调整进了四乙班，并且搬到本部。当时本部没有围墙，周边和农田连在一起。学校在周边种上带荆棘的小树做围墙，我们班也参加了劳动。我据此写了一篇作文，用倒叙的手法描写20年后与叔培、叔洪重访母校，那排小树已长成大树。班主任邱碧君老师对这篇作文大加赞赏，在班里当场宣读。邱老师的鼓励使我对写作兴趣大增，不久后又写了一篇刻苦学习的作文。此文说我父亲出生贫家，靠努力和勤工俭学完成大学的学历，还特别提到父亲把获得的金质奖状卖掉以维持学习和生活。此文也得了高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升入中学后，有次杭大附中举行阶级教育展览会，其中有同学们父辈的军功章，我想到爸爸的金质奖状，照小学那篇作文又写了同样的一篇。这下捅了马蜂窝，资产阶级的奖状怎能和军功章相提并论？学校要开除我，在一些好心老师斡旋下，撤了我班长职务，没把我开除掉。这一节情况是我看到母亲遗作才知道的，这是我终身的痛。四乙班数学老师是一位姓陈的男教师，早几年遇到邱碧君老师，她说陈老师出任了西湖小学校长，现在应该也退休了。我小学时数学常常不及格，作业本也不敢给父母看。到晚年究其原因，主要是不肯花功夫，不愿多思考，期望蒙混过关，语文也有这种情况。

搬到本部后，上学的路远了，记得冬天的时候，早上出门

天还黑漆漆的。路也不好走，沿西溪河边的小路是泥路，下雨天不小心会滑倒，甚至有滚到河里的危险。因为路远，父母联系住在河东宿舍的老朋友任铭善先生，让我到他家蹭中饭。任先生公子任平是我好朋友，吃饭时他会告诉我“螺蛳是穷人的荤菜”，由于政治运动、大饥荒后不久，专家学者的生活都不容易。以后由于杭大河南宿舍在本部上学的不止我一个，几家联合起来请校工吕承德先生妻子王大妈给我们送饭。大概有十几个孩子吧，王大妈用一根扁担，两头挑着箩筐给我们送饭。冬天母亲在铝制饭盒上套了棉套子，吃到嘴里时还是热呼呼的。有一次王大妈忘了到我家取饭，我自己赶回去吃饭，一路走去，觉得路也不是那么长。

附小注重文体活动，我还参加了足球队，市里召开小学生五人制足球赛，附小队输给了保俶塔小学，因为保小有位队员是“留级胚”，体格强壮，我们冲撞不过他，最后得了第四名。我参加过无线电比赛，和同学周新农获得过西湖区小学生矿石收音机比赛第五名。参加歌咏队，到杭州电视台录过节目，那时寻常百姓家是看不到电视的……

1960年代兴起“学雷锋”，我班出了个“好事大王”王洛夫。他做的好事总比我们多，放学搞卫生不声不响，第二天就得到老师的表扬。他还经常会捡到一分钱交给老师，令我羡慕不已。我也梦想能捡到一分钱交给老师，于是总把眼睛盯着地面，不想发现了一个秘密：地面上总会看到钮扣！我满怀兴奋把一捧扣子交给老师，却既未得到表扬，也未得到批评，心头一丝失落。有次埋头地面，居然发现一支钢笔。那钢笔外壳的颜色很特别，黑色和绿色相间，如玳瑁一般。我一看那支钢笔

是我母亲的。母亲看到后也认为是她丢的，于是“奖励”给我。那支笔伴随我很长时间后，又丢失了。人生也许就是这样，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于是又有什么不能放弃呢？

到了五年级，开始小升初考试复习，记得又回到文三街的分部。我属于不认真读书的学生，只能临阵磨刀枪，也不知道考不上中学的后果。幸好凭着小聪明，考试结果还不错，考上了心仪的杭大附中，得以和大部分朋友又在一个学校厮混。发榜那天，附中的橱窗上列出名单，初一甲班排在第一位，我排在初一甲班第一名。多年后问起附中一位老学长尹俊骅，他说这意味着我的成绩最好。不知此话可真？

古桥遗梦

前些年，浙大教授蔡天新提议恢复西溪路上的古桥名——“道古桥”，此举打开了我思绪的闸门。

1957年，我随父母搬到道古桥边的杭大宿舍。那时的道古桥是一座水泥石桥，桥栏很矮，桥身不高，坡度也不大。道古桥架在杭徽路（今西溪路）上，一条黄沙铺成的“马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一片泥泞。路边是大片稻田，有零星的土地上长满了瓜果蔬菜，别有一番田野风趣。这座毫不起眼的道古桥，一直伴随着我成长。

道古桥下流淌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在北面不到20米的地方与沿山河交汇。小河发源于宝石山西麓的白沙泉，涓涓细流汇成小河，童年的我还在小河上看到过摇橹的船娘。小河弯弯流经农田，河两岸垂柳轻拂，还长着一些茭藕。1960年代困难时期，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蒋祖怡夫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表姐沈月秋还将挖来的块茎磨成粉，供我们小孩充饥，对我们来说实乃人间美食也。

和这条小河交汇的沿山河直通松木场的大水系，当年的松木场河道交叉，众多船只在那里进行木材、蔬菜交易，煞是壮观。每次上学路过松木场，可以看到渔船上的鸬鹚，水底的甲鱼和下水道出口处密集白条鱼。

1980年代，这一带土地被大量征用，原先的稻田和牛奶场，逐步建起了高楼。建筑的兴起给环境造成很大破坏，小河变得越来越肮脏，水流越来越少，终于有一天，小河被预制板覆盖，道古桥被拆除。现在，当你走过西溪路和杭大路交叉

口的西侧，或许并没有意识到，那里曾经是一座“桥”。

然而“道古桥”这个地名，在老杭大人心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每每遇到老杭大人，都会习惯地提到“道古桥”三个字，只要是知道“道古桥”的，就自然而然拉近了距离，往事就像源源不断的河水流淌……

1950年代建校的杭州大学，在今天目山路北，南有沿山河，东有西溪河。学校南面建起了教工宿舍，最初就叫“道古桥宿舍”，也就是今天的“杭大新村”。我就是道古桥宿舍，度过了愉快的童年。

道古桥宿舍的原址是一片墓地，一到夏天的晚上，会有许多萤火虫在空中飞舞，我们把捉来的萤火虫放在瓶子里面，父母就会讲起“车胤囊萤夜读”“悬梁刺股”等励志故事。夏天夜晚，家家户户都到室外乘凉，我们小朋友也是一人一把扇子，扑打着蚊子，坐在小板凳上天南海北侃大山。那时正值大跃进时代，于是自然就有了对共产主义的憧憬，记得杭大图书馆馆长翟墨新的女儿翟小园说：“到了共产主义会是怎么样的？我想树也会在天上走路啦！”

道古桥宿舍里居住着不少杭大的老教授、老先生们，他们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家前面正对着夏承焘先生的家，夏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师，一位高高瘦瘦的老先生，被誉为“一代词宗”，父亲要我称呼他“太老师”。还有一位太老师钟泰先生不住道古桥宿舍，有一次他来我家，父母毕恭毕敬，太老师告诉我要“站如松、坐如钟”。

钟先生是之江大学国文系前主任，夏先生当年还是钟先生招入之江大学的。1950年代院系调整，之江大学国文系并入

浙江师范学院，所以钟先生和杭州大学也颇有渊源。

我父亲蒋礼鸿是钟先生的高足，继承了钟先生考据的学问，1959年就是在道古桥宿舍里，完成了他的著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百多年前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古代文献，由于这些文献多为手抄，夹有许多异体字、俗体字，加上年代久远，文意不甚好懂，称为“天书”。

父亲立志要破译天书。无论寒冬腊月，还是酷暑当头，他都坐在书桌边著述、修改、补充，36年间六易其稿，1959年头版5万字，第六版增补到40多万字。该书荣获了首届国家教委文科一等奖。

2010年7月，浙江大学召开文科大会，会上有一项重要内容是展示浙大百年文科名家。这次展示的文科名家共有50余位，曾经生活在道古桥宿舍里的就有15位之多，他们是：钱南扬、王驾吾、夏承焘、胡士莹、姜亮夫、德梦铁、沈炼之、林淡秋、孙席珍、严群、严德一、陈学恂、蒋礼鸿、徐朔方、郭在贻。

道古桥宿舍还有许多理科名家，如周洵钧、朱福忻、董聿茂、陈士怡、江希明、白正国等等，这里我特别想提到的是周洵钧先生。周先生解放后自美国回来，一直在杭大化学系任教，毕生精力都奉献给祖国，在我看来简直就是杭州大学的钱学森。周先生平易近人，我去他家，周先生知道我在砂轮厂工作，还和我说起砂轮的成分是硅酸盐。一次杭大九三学社组织活动，我随父母一起参加，周先生和夫人唐愫也在其中，席间唐愫阿姨说：“他担心吃不上饭（周先生不是九三学社成员）。”周先生的可爱和公私分明引来一阵笑声。

仲向平先生著作《杭州老房子》中，对道古桥宿舍有这样的描述：“这片绿色小区，曾是传承中国文化的中心，是浙江学术的圣地，也是新西溪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文化名人的群落”。此话不虚。

第三章：山雨欲来风满楼

反动标语来无踪去无影

1965年已经是文革的前夕，国家搞四清运动，政治气氛已经十分紧张，此时我读初二。

一个冬天的早上，已是天寒地冻，室外结了厚厚的冰。突然学校通知说有反动标语，组织全校的学生到现场，为的是提供反动标语的有关信息。

原来在学校的宣传窗玻璃上有人用手指将玻璃上厚厚的霜溶化，写下了“打倒现代”几个字。学校认为“打倒现代”就是打倒社会主义。

全校一共18个班级(初中每年级4个班，高中每年级2个班)，等后面的班级轮到以后，岂知由于气候转暖，冰霜消融，原来有“打倒现代”的玻璃窗已经是水气一片，反动标语荡然无存。

虽然反标不在了，但是查还是要查下去的。于是乎中外名捕：白玉堂、展昭、福尔摩斯、柯南·道尔一起上马，恩威并施终于将原凶逮个正着！

岂知审了半天，却道出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原凶乃是吾等同窗莫某某。莫某某交代那一刻他原本是想在霜花上书写“打倒现代修正主义”几个大字。安知写到“打倒现代”时，

被一高年级同学在脑后吃了一个“笃栗子”（杭州话，用手指的第二个关节敲打脑壳）。莫某吃亏后便急起追赶某人，把“修正主义”四个字丢到了爪哇国去了。

此话虽合逻辑，但缺少旁证。莫某某涉险过关，盖因他是“红五类”子弟，根子正，苗子壮。

所谓“红五类”文革中指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及其子弟。“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弟。

屈辱的年代

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其实文革前已经火药味很浓了，我因为写了一篇作文，赞扬父亲蒋礼鸿用教会学校的奖学金完成学业，差一点被开除学籍。

到1966年夏季，文革已经波及到我的学校杭大附中。有一天学校的学生把已经调离学校的书记朱联揪回学校，进行批斗。他们将朱联带上高帽子（一种纸做的帽子，戴在头上就像阴朝地府的白无常，用以对人的污辱）。我们初二甲班，在学校是有名的革命班级，因为班里干部子弟、工人子弟占多数。班里有一位同学，将一瓶黑墨水倒在朱联头上，搞得她满脸漆黑，惨不忍睹。朱联因为是杭州大学党委书记陈烙痕的内人，在杭大附中“一手遮天”，积了许多的怨。记得有一次她来我班上听课，我正好和同桌的同学说了几句话，没想到她后来上来一把揪住我的耳朵。

文革中杭大附中揪出几位老师当牛鬼蛇神，其中有历史老师叶葆汉、语文老师金敏。有一天晚上，学校在大操场批斗叶老师。操场上灯光大作，叶老师站在前面，革命小将不断的喊口号，叶老师脸色刷白。叶老师的两个儿子叶舒宁、叶舒立也是附中的学生，想必心里一定不好受，不远的将来，我就体会到这种心情了。

语文老师金敏由于“之乎者也”，也成为了牛鬼蛇神。金老师抽烟，革命小将就将炮竹藏在香烟里让他抽，被炸得脸上出血。

文革的风暴在杭大远比附中激烈，我父亲蒋礼鸿因为秉性

耿直，又是搞语言的，在上课时指出毛泽东语言不规范，在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毛泽东有一篇支持刚果金反美的文章，有“前赴后继”一词，父亲认为是“前仆后继”，“赴”走过，“仆”倒下。今查辞海中用“仆”，现代汉语字典用“赴”。自古无“赴”，自毛泽东起才有“赴”，胡锦涛讲话也用“赴”。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毛泽东解释“千夫”指敌人，父亲说“千夫”是老百姓。毛泽东说“各位同志们”，父亲说复数重复。听我妈还说解放后父亲拍马屁作对联“毛泽东……蒸蒸日上，蒋介石……江河日下”把毛、蒋并列。父亲上课举例子，正面的例子从来不从《毛选》上选。听尹俊骅学长说，文革大字报贴老爸说毛诗平仄不调，则第一次听到。

一天晚上，一群学生冲到我家门口，把我父亲揪到外面，大喊“打倒现行反革命蒋礼鸿！”，此时我母亲和姐姐均躲在房里，我一个人冲到客厅，看着学生批斗我父亲。我靠着桌子，浑身发抖。一位学生大喊：“向毛主席下跪！”父亲无奈跪下双膝。那一夜听说学生还到林琼家造反，林琼在解放前是地下工作者，深得周恩来的赏识。居然有学生大喊“扒了她的衣服！”这一夜成为我终生难忘的屈辱！

从那天开始，父亲就被迫接受劳动改造。夏天他们这些曾经的专家学者被赶到农田里除草，回家时被太阳晒得浑身通红。接着又被关进牛棚审查，直至我离家到黑龙江插队，父亲也没有回家过。吴思雷编著的《夏承焘轶闻》中说，父亲他们一批牛鬼蛇神每天要从杭大到解放路上去批判批斗，至少要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吧，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有几次我在路上遇到父亲，他穿着破旧的衣服，胸前挂着“现行反革命”的

牌子，父子俩相见不能相认，现在的年轻人是不能体会到其中的感受的。

父亲由于是教会学校毕业的，英语很好，造反派就逼他翻译《毛泽东语录》。有一个叫许良山的学生看得不顺眼了，敲打他的头部。许良山在文革后听说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也有好的学生，有一位叫唐佳文的学生，当时也是看管牛鬼蛇神的。他在离开杭大的前夜偷偷到我家窗前，向我父母告别。善良的人终究不会被人忘却。

我母亲盛静霞虽然没有被揪出来，但也受到过隔离审查。有一次因为肠梗阻，大便从嘴里冒出来，造反派逼她再吃下去！母亲在我们到黑龙江后，因为肠梗阻到医院开刀，当时没人照应，是蒋绍心服侍她的。

文革中有一次，我班的同学对我进行批斗。他们把我叫到讲台前审问我。

问：“你父亲是什么人？”

答：“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现行反革命。”

问：“你爷爷是干什么的？”

答：“城市平民。”

问：“你奶奶是干什么的？”

答：“家庭妇女。”

问：“你母亲是什么人？”

答：“老师。”

问：“你外公是干什么的？”

答：“资本家。”

问：“你外婆是干什么的？”

答：“家庭妇女。”

“哈哈!地主婆!”

他们把一块牌子挂在我胸前，上面写着“反革命”的字样。还不过瘾，一位同学就用皮带猛抽我的背部。后来杭大原宣传部长的儿子“二娃子”和裘红根等人把事情制止了。

第二天我就写了退学报告，送给当时的班主任毛必林老师，不到学校去了。再回到学校时，已经是大串联以后，参加“红色风暴”造反派组织以后了。以后毛老师将我叫他家，把我的退学报告还给我。

文革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家书抵万金

1966年夏季的一天，杭大附中一批学生冲进我家“破四旧”将我父母蒋礼鸿、盛静霞大量书籍抄走，这些书是我父母毕生购置的。据1995年父亲无私捐赠给杭大中文系粗略有五三轮车，母亲回忆约七千册。同时被抄走的有中文系夏承焘、王驾吾、任铭善、胡士莹、蒋祖怡等先生的书。据说抄家名单是一位中文系子女提供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眼看着与自己朝夕相处，视为命宝的书籍被抄走，父母眼里流露着痛苦而无奈的眼神。

这七千多册书籍大部分是线装书，有历史类如《二十四史》等，有文字研究类如《说文解字》等，有古代体制研究类如《资治通鉴》等，其中亦有明清版本的。还有古典文学研究的《唐诗三百首》等。另有研究类如《诗词曲语词汇释》《敦煌变文集》等等。除此而外，我家还有其他杂书如《本草纲目》等，甚至还有中外小说、毛选、斯大林著作。

看着这些书被抄走，其中还有我喜欢的一些小说如《莎士比亚全集》《一千零一夜》等。我心里实在不甘心，不顾革命小将的阻拦，紧紧盯着一册册书。忽然我眼睛一亮，看到一套解放后新编的《辞海》。这部《辞海》是1960年代初国务院组织新编的，父亲与任铭善先生也参与其中，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一把冲上前，死死抱住这套书说：“这是解放后编的，不是毒草。”革命小将一愣，不耐烦的说：“拿去拿去！”我小心地将它塞到桌子底下。接着看到一套《本草纲目》，我更理直气壮了，扯过来说：“医书也是毒草？”不容分说放到桌下。

这些书被抄走后，放在附中办公楼一楼朝北的一间房间里，初时还按不同姓名整齐码放在乒乓桌上。以后革命小将经不住“封资修”诱惑，撬开锁进去没日没夜的欣赏。他们吃喝拉撒都在里面，书当眠床书当被，那些稀世的典藏古籍甚至随意用来擦屁股！

到了1972年，运动进入疲惫期。杭大中文系有一些还算不上牛鬼蛇神的老教师如胡士莹、蒋祖怡先生，包括我母亲，他们组成一个朝阳小组，连“造反”“革命”也不敢冠之。战战兢兢地向革委会提出，是否能要回那些书？革委会审时度势后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烈日下这几位老先生带着草帽，用钢丝车一车一车拉到杭大中文系办公楼楼下过道里，可怜他们连三轮车也不会踏！一旁附中革命小将恨恨地说：“我们破了四旧，你们把毒草又拉回去！”

这些书拉到中文系过道里，几位先生又把各自的书分捡出来，好在都是命宝，绝对不会弄错了。此刻还有赶过来的人伸手翻捡中意的书，大摇大摆拿回去，老先生们也是敢怒不敢言。

我家的书由我用自行车驮回家，当初不敢去附中拉书，因为我也是附中的人，母亲怕对我不利。这些书回家后已经残缺不全，损失不止什一。有些缺了封面，有缺了内页甚至几十页，线也有很多开脱。最令人痛心的是有几十册一套的古籍，独缺一册或数册。每日里父母用旧信封补封面，用棉线重新穿订，着实花了许多时间。

在那没有书的日子，父亲枯坐青灯，抚摸着那两册《辞海》和《本草纲目》，嘴里会喃喃地说：“这两本书是蒋遂为我留下的！”

狗崽子与看门狗

狗，一种由人类几千年从狼驯化来的动物。狗对人类的忠诚是任何动物无法比拟的。历来有狗被主人遗弃后，百里寻主的传说，也有狗不吃不喝为主子守孝的传说。还有据记载清邓世昌驾舟与倭寇相撞失败落水后，他眷养的狗在水里死死咬住他衣角不放。由此人们也对狗眷恋有加，远的不说，当今贵妇人身着裘皮，怀抱狗崽亲亲热热的情景也算不上一抹亮丽的风景线。

但狗远非如此幸运。自古有“狗屁不通、猪狗不如、狗头狗脑、狗眼看人低、狗咬耗子一嘴毛”等说道。狗命如此不堪也是物种之中的奇葩，百思不得其解，狗的命运为何天上人间，截然不同？

文革初期兴起一种血统论之观点，将年轻学子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子女是红五类，他们是天生的革命接班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子女是黑五类，他们几乎也是专政对象。从理论上讲，叫作“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打地洞”。像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儿子（父亲蒋礼鸿曾对毛泽东个别语法、文字解释等提出不同观点，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自然是忝列黑五类门墙，冠以“狗崽子”的帽子（此时狗比四害之一的鼠类都不如）。

文革中，我亲眼目睹父亲被逼向毛伟人画像下跪嗑头谢罪。被同班学友挂牌（反革命分子）批斗毒打。真正成了一条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犬。也许为了团结最广泛的力量，毛提出“有成

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我们这批狗崽子才有一丝喘息的机会。原本在毒打后我已经向班主任毛必林老师交了退学书，此时也壮着胆子到附中溜溜荡荡。

自考进杭大附中，我一贯从杭大南大门进入，北大门出去，穿过文三街来到附中。也从未想到有何不妥。可是从某一天开始，一位其貌不扬，混在人群中毫无特征的门卫人员，开始阻挠我进入杭大。此人气势汹汹，喳喳呼呼叫嚣不让我进去。开始几次我或者借口去医务室看病，或者乘他扭头之际，溜烟跑进去。有次跑到一半被他抓牢，一把推倒在地上。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何以被一个门卫摔打？以后他远远看到我，就大喊：“蒋礼鸿儿子，就是不许你进去！”自此我才明白，像我这样狗崽子的身份，是可以被一条看门狗欺辱的！再以后，母亲含泪求我，“他当众喊我，蒋礼鸿老婆，不许你儿子进杭大！”我的自尊心彻底被击溃了。

我无意指责那个门卫，更不想把所有的门卫人员称作“看门狗”。即便是那位门卫，他对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如此残忍，也源于那个该死的年代。那个丧心病狂的年代是把人变成鬼，把鬼变成人的年代。也许那位门卫，对于妻子是一位好丈夫，对于父母是一位大孝子，对于子女是一位慈父。多年以后，我还看到那门卫，一如既往恪守自己的职责。再以后听说他过世了，我一点也轻松不起来。我愿为天国的他祈祷，愿他的灵魂远离恶势力。

文革中的“瞎折腾”

我们这拨文化革命中的老三届，在文革中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以后又经历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有人升官、有人发财、有人下岗，经历不一而足。

回想文革中的经历，我只能用“瞎折腾”来描述。

那时候我们杭大附中在文革中分成了三派：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杭大东方红兵团独立纵队、浙江省红色风暴附中分部。红色风暴是后期成立的，与浙江省的大环境有关，最主要的是联总（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和独纵（杭大东方红兵团独立纵队）两大派别。

联总的骨干大都是一些黑五类子女和被打倒的走资派子女，加上一些工农子女；独纵的骨干是红五类子女。

其中最难划分的是革干子女。革干是指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隶属红五类（有关红五类和黑五类可以查阅有关资料，不再详述）。文革最大的宗旨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所以一些干部被先后打倒，那些早期打倒的干部子女就成了黑五类，后期打倒的干部子女当时还是红五类。所以联总和独纵都有干部子女，只是先期打倒的干部子女到了联总，后期打倒的干部子女到了独纵。

依我的情况，父亲蒋礼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自然是只能参加联总。当时有联总的勤务组成员，同为杭大子女的王念生来动员我，旋即参加了联总的下属组织“红色风暴”。参加联总后，就住到学校参加停课闹革命。

文革中，挺有意思的是，领导核心称为“勤务组”，领导

就是勤务组成员，是一种革命化的称谓。

我住到学校是在教学楼的 204 室，室友有：王念生、徐海东、徐小棣、黎体凡、周国强、范洪伟等。那时候革命热情高涨，生活上则是一塌糊涂，臭袜子、臭鞋子一地，棉被都是臭哄哄的，现在想起来就觉得纳闷，怎么就搞成这个样子啦？

联总和独纵都号称自己是造反派，但既然组织不同，就必须有不同的革命目标。当时学校的书记朱联、反动教师叶葆汉、金敏都已经成了死老虎。朱联原来已经调离了附中，以后被揪回来批斗，批斗后回到那个学校。没有革命目标怎么办呢？于是一个荒唐的办法出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学校的党支部在开会时吸收了卢瑞宝、糜懿模老师参加。于是联总说那是扩大的支委会，糜、卢老师也是资产阶级当权派，必须受到批判。独纵说那只是支委扩大会议，糜卢不是当权派。两派为此事闹得不亦乐乎。

以后学校来了一拨又一拨工宣队、军宣队，都为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绞尽脑汁，最后也没有定论。我当时年幼不懂事，一次批斗卢瑞宝老师时还用手电砸他的脑袋，现在想起来非常内疚。在这里我要向卢瑞宝老师表示真诚的道歉！卢瑞宝、糜懿模老师都是我父母蒋礼鸿、盛静霞的学生。卢老师看到我父母总会毕恭毕敬的叫“蒋老师好！”糜懿模老师还参加了我母亲的遗体捐献仪式。

当时文革的狂热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清楚。每当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就要通宵游行，叫作“最高指示不过夜”。

文革中有段时间盛行“文攻武卫”。有一次独纵纠集杭大东方红兵团对联总发起武攻，那天我正好头上长“节子”没在

学校。我坐在家，突然有杭大吕承德的儿子冲到我，用刀捅破纱窗，嘴里嚷着“血债要用血来还！”原来他父亲在武斗中受了伤，他来报仇的。后来听说联总有不少同学受了伤，我赶到医院，见徐海东的身上被泼了硫酸，徐小棣的胳膊被打断了。还听说在武斗的时候，有王心田同学看到对方冲上来，急中生智举起一盆水，嘴里叫着“硫酸来了！”对方吓得屁滚尿流！另有一位绰号叫“左拐儿”的同学，看到对方攻势凶猛，就顺着落水管爬下来逃走，被大家称为“叛徒”。

还有一次杭州延安路有武斗，我和任平去看热闹。突然从后面杀出一彪人马，我们逃之不及，任平的屁股上按了一棍，他恨恨的说：“此仇必报！”我心里好笑，人都没看清楚，谈何报仇？

到了文革后期，联总和独纵也闹得乏了，于是经常以派别为单位组织篮球赛、足球赛的，再到后面一起轰轰烈烈上山下乡，从此融为一家人啦。

十年文革两茫茫

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留下的记忆已淡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在“文革”中苦苦挣扎，受尽屈辱，以至于影响到子女的一生。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越演越烈。我所在的杭大附中（以后更名为学军中学）举办了一次展览会，宣扬阶级斗争，展出了部分同学父母的抗战及解放战争军功章和其它物件。那时我涉世未深，对“阶级斗争”混然不知，写下一篇参观感受。在这篇作文中，我回忆了母亲盛静霞告诉我，父亲蒋礼鸿是教会大学的穷学生，为了完成学业，把学校颁发的金质奖状变换成现钱，支助生活和学习。我本意是要学习父亲那种刻苦学习的精神，没想到捅了马蜂窝。作文交上去不久，我的班长职务被撤消了。50年以后，我才在母亲的遗稿中发现，原本处分并没有那么轻松。学校本来要把我开除学籍！因为有一些老师出面力保我，最终得以保留学籍，撤去班长职务。这件事直到母亲去世，她也没有告诉我，但她自己在内心默默承受着的痛苦一定非常深刻。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了。在一个仲夏夜的晚上，天色漆黑一片，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在我家门前嘎然而止。黑压压的人群围在门口高呼：“蒋礼鸿滚出来！”“蒋礼鸿滚出来！”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我从睡梦中一轱辘翻下床，看到父亲走出家门。我跟着在后面，来到客厅，支撑着桌子，混身发抖地看着窗外。门外学生们紧紧围着父亲振臂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蒋礼鸿！”黑暗中有一个声音高喊：“向毛主席下跪！”

令人惊诧的一幕出现了，我的父亲双膝齐齐整整地跪在地上，向毛泽东谢罪。以后听我母亲讲、经过我对杭大老教师寻问，才知道父亲这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是怎样戴上的。

“文革”前，广大知识分子学《毛选》改造思想。父亲是搞语言教学和研究的，在阅读《毛选》过程中，认为有几处语言不规范，在课堂上提出异议。有一处，毛泽东用“前赴后继”一成语，父亲认为应该是“前仆后继”；另一处毛泽东解释鲁迅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解释“千夫”为敌人，父亲认为应解释为“老百姓”。毛说：“各位同志们：……”，父亲认为复数重复。本来议论最高领袖是忌讳的，但是父亲这样一个书呆子居然没有意识到巨大的危险，还在课堂上公开提出自己的见解，岂有不被打倒，再踩上一只脚的？另外解放后父亲为应顺形势，作过一对联，“毛泽东……蒸蒸日上，蒋介石……江河日下”（大意），被认作把毛、蒋并立，也是一大罪状。

之后，这批造反的学生咋咋呼呼又到别的人家造反去了。这一夜是杭大道古桥宿舍恐怖的一夜，有多少知识分子被揪斗已无从得知，听说老干部林琼被揪斗时，有人竟大喊：“扒了她的衣服！”那一夜，我曾经幸福的四口之家，在黑暗中熬过了漫漫长夜，从此失去了笑脸。

第二天，父亲被勒令到道古桥宿舍八幢前的大草地上除草，一干“牛鬼蛇神”有中文系夏承焘、姜亮夫、任铭善、陈企霞、孙席珍等先生，外语系张君川，数学系徐瑞云等先生。在夏天的烈日下，父亲被晒得浑身通红，回到家汗流浹背、大口喝水、直喘粗气。

紧接着，杭州大学开展了批斗林淡秋、夏承焘的“林夏战役”，父亲作为夏承焘先生的得意门生，被陪斗。每天早上随夏承焘先生和一大帮“牛鬼蛇神”，徒步从杭大出发，到解放街市府大门口游街示众。父亲站在高凳上接受批斗，身前挂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在高凳上站一个多小时再步行回杭大。这样的批斗持续一个多月，父亲满头黑发霎时变成白发。

一天夜里，家里又遭到浩劫。一批杭大附中的学生闯进来“破四旧”。据说是一位杭大子女提供的名单。在那个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的年代，为取得革命群众的宽恕，不惜以自家的珍贵典籍换取同情，是何等的悲哀？我家有几千册书，还有明清版本的，被他们洗劫一空。我实在忍不住，指着一部解放后重新修订的《辞海》说：“这是解放后修订的，难道也是毒草？”又指着《本草纲目》说：“这是医书，不是毒草！”这两套书最终被留下来。在没有书的日子，父亲常常捧着这两套书，嘴里喃喃地说：“这本书是蒋遂为我留下的。”书被搬到附中办公楼一楼的一间房间，最初按照每户人家分开摆放。这些人家有夏承焘、姜亮夫、王驾吾、胡士莹、任铭善、蒋祖怡等先生。以后革命小将经不住毒草的诱惑，打开锁欣赏起来，再以后干脆住进房间，吃喝拉撒全在里面。珍贵的古籍成了手纸，随意践踏，我家的世界名著、莎翁全集不翼而飞。几年后当取回这些书时，已失之二、三成。很多成套的古籍少了其中的几册，封面、后页被撕碎，穿线断裂比比皆是。父亲默默用旧信封制作封面，用棉纱线穿针装订。而那些失去的书，那些不成套的古籍，缺失的封面后页，成了永远的遗憾！

随着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我名正言顺地成为了“狗

崽子”。从杭大南大门进去，北门出来到附中，一直是我上学的路。可是有一天，我被一个其貌不扬的门卫拦住，不让我进杭大的大门。我抗争说：“为什么我不可以走？”，他蛮横地说：“就不让你走！”我乘他不注意溜进去，他箭步上来把我摔在地上，拳脚相加，我口吐鲜血欲哭无泪！回家后母亲含泪说：“你别再走杭大了，他对我说‘蒋礼鸿老婆，不许你儿子从杭大走！’”原来，我之所以不能走杭大，因为我是蒋礼鸿的儿子，是“狗崽子”。“狗崽子”在“看门狗”面前，也是低“狗”一等！

来到附中，更是一场噩梦。我所在的初二甲班是有名的工农子弟班，工农子女、干部子女占大多数。他们强迫我到讲台前接受批斗，非工农干部子女坐在台下观摩。一个粗壮的杭钢子弟，举着一寸多宽的武装带恶狠狠地问我：

“父亲是什么人？”

答：“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现行反革命’。”

问：“母亲是什么人？”

答：“职员。”

问：“爷爷是什么人？”

答：“城市贫民。”

问：“奶奶是什么人？”

答：“家庭妇女。”

问：“外公是什么人？”

答：“资本家。”

问：“外婆是什么人？”

答：“家庭妇女。”

“哈哈，地主婆！”

随后他举起武皮装带抽打我背部。一次比一次抽得狠，顿时背上火辣辣的痛。他还把一块写着“反革命”的硬纸板挂在我胸前！抽打声惊动了教室外，有两个高中同学把那人拉开，我算是躲过一劫。

“文革”中，造反派不但抄了我的家，还硬生生把我家一分为二，分配进外语系一位年轻教师陈纲（改革开放后，陈纲去东欧留学，取得中国第一个旅游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杭大创办旅游系，招收硕、博士研究生。这些都是中国现代旅游史上的No1）。我的杭大道古桥宿舍五幢四号的家是一个约80平米的三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套间。我家住一大房，约13个平方，陈家住两小间，共约14个平方，客厅两家共用。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一个房间里，一大一小两张床。书已扫地出门，家具变卖了，只有两张小办公桌，一个大衣橱和一排箱子，几乎是家徒四壁。陈家也是四口人，陈纲夫妻，他岳母和两岁的女儿。所幸陈家是一个善良的人家，不像有些老先生家住进的造反派，还要受到凌辱。陈纲称我母亲“盛静霞同志”，对我这个“现行反革命”父亲不好称呼，偷偷的叫“蒋先生”。陈夫人于忠屏，岳母姥姥和可爱的小姑娘艳南，没有那么多忌讳，随南南叫我父亲“大大”，母亲“大娘”。当时虽然住房局促，但陈家人的善良多少抚慰了我家受伤的心。善良的人还不止陈纲一家，有位中文系学生唐佳文，离校时乘着夜幕偷偷跑到我家窗外，向我母亲告别，告知父亲在“牛棚”的近况，要我母亲坚强地活下去。但“文革”使人性变得残忍，杭大道古桥宿舍有自杀的老知识分子，自杀的中年教师和家属，失踪的老干部。比起

他们，我家四口人最终安然无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父亲最初在学校接受批斗，还能回家。他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胸前缝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几次我和他面对面走过，两人都低着头，默默无语。亲人相逢不能相识，是何等的感受？以后父亲被关进“牛棚”，强迫劳动改造。每天是不厌其烦的接受批斗，打扫卫生，写交待材料，日复一日。关压牛鬼蛇神的造反派头目养尊处优，个人拥有一个厕所，他指定父亲搞这厕所的卫生。为达到不得看见一点污垢的要求，父亲跪在厕所的便池边，用铅笔刀一刀一刀地刮去污垢。同一“牛棚”的“历史反革命”雪克先生看在眼里，多年后教诲学生说：“你们做学问要像蒋先生搞厕所那样。”无异成为黑色幽默。

这位造反派头目还别出心裁，因为父亲是教会大学毕业，要他把《毛主席语录》翻译成英文。试想一个毕业30年，又是搞汉语研究的学者，用一本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的英语字典，在这样情况下，要完成这个任务，真是天方夜谭。因此父亲稍不服气，他就报以老拳。实在逼得急了，一次父亲在三楼擦玻璃窗时，冒出一个念头，“我这向下一跳，岂非一了百了？”可他随即想到在家日夜盼他回家的妻儿，才收回这个念头，顽强地活下来。这位头目还非常残忍，蒋祖怡先生与他抗争，被他打成残疾。一天夜里，他要我姐姐与蒋祖怡先生儿子蒋绍忠去“牛棚”问话。我姐那时是20岁婷婷玉立的大姑娘，我母亲怕有不测，问蒋绍忠“去不去？”绍忠说“不去！”，结果两人都没有去。“文革”结束后，听人说这位头目触犯法律，下了狱。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统统报销”！

到了1968年年末，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去农村”的号召。我们这帮“狗崽子”在城市里待不下去了。姐姐想和同班的同学去北大荒黑龙江，我则想和任铭善先生儿子任平等好友去余杭农村。本来这就是无奈之举，姐姐远走高飞，父亲关在“牛棚”，我去不远的余杭农村，有事还可赶回来照顾母亲。可是一天早上，附中一位革命战士贴出几大张报名去黑龙江的大红纸张，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人名，我的名字赫然在列！我这位“现行反革命”的儿子无可抗争，加上年幼无知，认了下来（这位同学至今认为是他把我们带到黑山白水，战天斗地，引以为自豪。“文革”思潮的余孽，可悲啊）。我与姐姐在阳台上商量对策，母亲在屋里想必不会一无所知，吃晚饭的时候我俩向母亲摊牌。母亲争辩说她身体不好，父亲在“牛棚”，身边需要有亲人；我们说上山下乡是革命行动，离你远了，但离毛主席近了。母亲被这个“大道理”堵上了嘴，她说：“那我怎么办？”这个时候以前在我家做过钟点保姆的郑阿莲阿姨，帮我们出主意，请她年迈的妈妈住到我家陪我母亲，事情貌似解决了。

1969年3月8日夜（我的17周岁生日），我和姐姐穿着上面发下来的黄皮大衣，雄纠纠地前往“牛棚”向父亲告别。父亲显然没有思想准备，两人都远走高飞，母亲又怎么办？他但同样也抵抗不了这样的事实。姐姐振振有辞的告诉他：“你要好好接受改造，争取宽大处理！”相信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年轻人都会这么说，比起告发父母，检举夫妻的，已经强了许多。

3月9日清晨，阴冷。我们告别母亲，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黑土地的路。母亲坐在家没起身、没言语。陈纲叔叔抱着小南南，用忧郁的目光送我们离开，小南南稚嫩的声音“大姐大

哥早点回来!”在寒风中飘荡……

我们来到寒冷的北大荒，住进临时安排的老乡家。白天脸朝黑土背朝天，拼命干活，晚上忍受着老乡家跳蚤、虱子的轮番进攻。混身被叮咬得化脓出血，不想家里又出了大事。杭大造反派翻出“三反五反”时原之江大学子虚乌有的“黄金案”，把我母亲抓进专案组隔离审查。母亲中年时十二指肠开过刀，饮食稍有不慎，就会引起胃痛。在专案组吃的是冷菜硬饭，引起肠梗阻，痛得在地上打滚，粪便从嘴里喷出来。残忍的造反派竟强迫她把粪便吃下去！肠梗阻是要性命的病，最终母亲被送医院紧急开刀。郑阿莲母亲自己风烛残年，照顾不了。实在举目无亲，童年好友、蒋祖怡先生的幼子蒋绍心，拖着残疾的双腿，在病榻旁拉屎倒尿照顾我母亲，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母亲开刀完，黑龙江大地已银装素裹，大田的农活干完了，姐姐匆匆赶回家。姐姐回家，却被人告发，说是中苏边境战事一触即发，我母亲把她叫回来了。天地良心，告发的还是曾受我父母恩惠的杭大教师家属。居委会找我母亲谈话，不得已我姐姐在春节前被迫返回黑龙江。知青点空无一人，同学们都回杭州过年，姐姐只得投宿到大串联时认识的一位哈尔滨男青年家。三年后姐姐与那位男青年成婚，女方家无一人出席婚礼。姐姐新婚第二天一早，就按当地习俗起床烧饭做家务侍候公婆。姐姐婚后一无户口二无工作，在街道小企业制做刷试管瓶子的小刷子。母亲原中央大学一位同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尚爱松教授知道我姐姐的窘况，找到哈市公安局一位侠义肝胆的熟人，千方百计把姐姐户口落到哈市。

婚后姐夫从农场调回哈尔滨，在木材公司，具体工作是在

松花江上打捞木材。姐姐作为家属分配到木材公司下属太平木材厂。一家人似乎又有了希望。可是下岗风刮起来，姐姐、姐夫双双下岗。姐夫蹬三轮车拉货，姐姐踩缝纫机做衣服，供养一双年幼的儿女。姐夫由于在江上打捞木材，落得腰椎间盘突出，蹬三轮力不从心，只剩下姐姐踩缝纫机维持生活。父母远在天边，只能隔三差五寄一点钱，杯水车薪。他们到了退休年龄，原单位早就倒闭，自己补交养老保险，拿到最低退休金。

我们一同去黑龙江东风阳大队的同学，前后无一不回到南方，唯有我姐姐像飘零的落叶，钉子一般钉在冰天雪地里。以后也曾有父母的学生陈汝法，想用关系把姐姐调去浙江台州；蒋祖怡先生女儿蒋绍恣想把他们调到浙江富阳。但姐姐考虑姐夫是北方人，一帮亲戚也都在北方；两个儿女自幼在北方长大，怕不习惯，宁愿留在北方。登高台兮望故乡，故乡兮不得归……

1972年，我户口回杭后，母亲怕我无所事事学坏，竭力主张我马上去找工作，并说：“哪怕扫马路，也是革命工作。”当时的政策，国营企业三年不招工，通过街道办事处，找到一家“大集体”的杭州砂轮厂，草草上班。砂轮厂工艺技术落后，劳动强度大。我们要从250摄氏度的炉窑中取出沉重的砂轮毛坯；搞基建，两人抬着400斤的老式电焊机踏上竹排，抬上二楼；炼砂轮原料棕刚玉，在1500摄氏度的电炉前操作……

此时父亲从“牛棚”出来，结论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也就是说，这“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带得没错，只是不向他“专政”了。时至今日，我也没明白这顶帽子摘了还是没摘？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一大批“文革”中被耽误的

学子得以进入“象牙塔”，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国家命运。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子女，同样对知识充满向往。可是母亲不主张学文，父亲的命运、她自己的遭遇使得她不希望我重蹈覆辙。我很知趣，不能再伤了母亲的心，转而攻理工。我的学历是初二，数理化像三座大山压在我身上。我买了数十本《数理化自学丛书》，没日没夜自学充电。几十条三角函数公式背得天昏地黑，化学元素表贴在办公室墙上，转眼背一背。领导监视，工作繁忙，学习效果进展缓慢。等到自己觉得可以一博时，已错过 77、78、79 年允许社会人员参加高考的政策。转向成人教育，一口气攻下五年制函授数学本科、三年制夜大计算机大专学历。成人学历不包分配，社会上也不待见，呜呼，“八年抗战”无功而返！以后在不景气的小企业磨难，辗转 10 个大小不一的单位，在到达退休年龄前七个月，再也撑不下去，失业回家，苦等退休。

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父亲是学有专攻的语言学家，母亲是清新婉约的古典诗词专家。他们躲过了 1957 年的“反右”运动，却没有躲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夺去父亲精力最旺盛的岁月，以至于他到谢世还没完成《史记》《康熙字典》校诂的宏愿。

翻出两张“文革”前的全家福老照片，网友说：“你那时笑得多么开心，现在怎么不苟言笑了？”端详着老照片，我也很纳闷，这是童年幸福的我吗？岁月流逝淡忘了往事。一家人的“文革”往事，只是苍海一粟，“文革”余孽、“文革”思潮还在暗涛汹涌，揭开岁月伤疤，唯愿那一幕不要在后辈身上出现。

第四章：冰雪覆盖着三江平原

八千里路风和雪

1968年，文革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但是大批学生滞留在学校，造成了进不了，也出不去的局面，毛泽东看在眼里提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一时间“上山下乡”成为牵动大多数城市家庭神经的最热门话题。中学里这批学生成为日后著名的“老三届”。

浙江省原来没有支边(知青到边远省份)的任务。支边是北京、天津、上海三大直辖市的任务，因为三大直辖市农村面积太小，知青只得到其它省份，尤其是边缘省份去。但是浙江省有一批革命小将志存高远，到中央强烈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闹革命，所以中央文革批准了浙江省支边的要求。

我所在的中学杭大附中(日后改名为学军中学)，文革中形成了三大造反派组织：联总(革命造反联合总部，隶属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独纵(杭州大学东方红兵团附中独立纵队)、红暴(隶属浙江省红色暴动组织)。三大组织既有派系斗争，也有融合的方面。我所在的组织是联总，其中由大部分出生成份不太好的学生组成。毛泽东的“上山下乡”最高指示下达后，校园里一片欢腾。当即就有许多革命小将贴出了响应号召的大字报，一时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成为是否革命的试金石。在这其中到边疆去比到农村去更加革命。

同学陈贤达是最早贴出到边疆去的大字报的。陈的父亲陈世振是之江大学的教务长，解放后去了美国。陈贤达身体极为健壮，人称“奥美”。陈的一家在解放后吃尽了苦头，文革中有一次贤达、贤成两兄弟在宝石山上遭遇宝石新村一帮干部子弟的毒打，头破血流。母亲戴育民是医务人员，之江山上许多孩子是她接生的，极善良，和我母亲是镇江的同乡。尼克松访问中国后，陈家在环城东路工人新村分到一所房子，我和任平去玩，陈的外甥喊我“叔叔”戴医师立即纠正他叫“舅舅”。在那种时刻，陈贤达表示到边疆也是迫不得已的举动。

我姐姐盛逊早就和一帮同学相约去边疆，当时我父亲蒋礼鸿在牛棚里，母亲盛静霞基本上也同意她的想法。我是打算留在浙江农村的，因为几个要好的朋友任平、徐小多、黄荔生等都准备到浙江农村，也知道我如果到边疆家里就只剩下母亲一个人了。但在心目中也向往到边疆。

一天早上，联总领袖王念生等贴出了报名到黑龙江的大字报，我的名字也赫然在内，并且没有通知我本人。可以说这张大字报确定了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再到学校去要求改变去向，因为我父亲蒋礼鸿被确认为“现行反革命”，在文革中是最低人一等的。反过来我只好坚定了去边疆的决心。

我姐姐和我商量怎样去说服母亲，当时我们在阳台上商议，母亲在房里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内容，当然心里很难受。因此我们用“到边疆去，离母亲远了，离毛主席近了”的理由说服母

亲，大势所趋母亲也只能同意了。毕竟母亲身体不好，身边没有子女是问题。好心的郑阿莲阿姨让她的母亲来陪我妈妈，日后我母亲一直对阿莲阿姨的母亲存有感激之情，在她有生之年一直接济着她。

离家的时间过得很快，有关部门发给我们黄色的棉衣、棉裤和大衣，穿在身上有一种革命军人的气概。离开家乡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姐姐穿着“军装”去牛棚告别父亲。在昏暗的过道上，父亲穿着破旧的衣服，胸前订有“现行反革命”的牌子，黯然无语，失去了谦谦君子的风度。姐姐对他说“你要好好接受改造，争取宽大处理。”我站在一边心里很不是滋味。

离别的时候终于到来了。1969年3月9日，在我17周岁生日的第二天，我们姐弟俩告别母亲前去学校集合。母亲由阿莲阿姨的母亲陪着，没有出门。没有眼泪，我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北去的路程。

学校用专车送我们到杭州闸口火车站。闸口火车站是一个很小的货运车站，连像样的月台也没有。天色蒙蒙，寒风阵阵，车下聚集了前来送行的同学。此时离家时强忍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车上车下紧拉着手，嚎啕大哭。尹俊龙手拿一台照相机不断的拍下这一历史时刻，可是却有维持次序的解放军官兵将胶卷全部爆光，永远失去了这一珍贵的回忆！

知青专列缓缓启动，带着我们的梦想，驶离杭州，驶离美丽的西子湖。知青专列是临时列车，开开停停，时间非常的漫长。当列车开过长江，到达华北平原时，一幕情景使人震惊。华北大地远没有江南那样富裕，土地也是灰蒙蒙的，非常贫瘠。我们看到在铁路两旁，有许多农民在水塘里筛选泥土中的煤灰，

他们是拿去当燃料的。有同学在列车上丢下面包，他们感激的说：“你们真是大好人啊！”

列车越向北方行驶，天气越来越冷，过了山海关，已是白茫茫一片冰雪了。过了哈尔滨，突然列车上发生了一阵骚动。我们杭大附中的同学是在一列车厢，几位女同学在车厢的结合部遭到了另外车厢的知青骚扰。这是一帮号称“海潮六乌龟”的人。他们冲到我们车厢大打出手，此时我们也奋起抗争，由林博、王心田等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将他们打出车厢。此时车厢的结合部成了争斗的焦点，他们要冲进来，我们要将他们打出去。情急之下有人拆下座位，把结合部堵上。双方在结合部投掷随手可以抓到的东西，茶缸、饭盒等都成了武器。列车驶到佳木斯停下来，这批人冲到列车下，砸碎玻璃，用灭火机向车窗内狂喷，我们用棉衣将车窗堵住。终于佳木斯军管会出面来阻止了。当兵的叱责我们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大感冤枉，这是东北留给我第一个坏印象。

苏增武、黎体凡等下车接受治疗，列车向最后的铁路站福利屯进发。到福利屯时已经是后半夜了。下车后才感觉到真正的东北是如此寒冷。星光稀疏，寒风直向棉衣中钻进去，双脚冻得直跳。脸上结了厚厚的霜。

一群农民在车站上大喊“东山的！”、“龙阳的！”……原来他们是来接我们的，我们跟着他们到各自大队的汽车上，向最后的目的地进发。

福利屯到我们插队的二龙山公社有 280 多里路，早上 8 点左右到了公社所在地二龙山，此时阳光普照，黑土地一览无遗的展现在我们眼前。到公社所在地后，又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原来我们去的大队是东山大队，由于知青太多，他们接待不了，要分一批去东风阳大队。而我姐姐的要好同学都去东山，我的要好同学去东风阳，最后姐姐放弃去东山，和我一起去了东风阳。

在二龙山我们吃了早餐，是小米稀饭、馒头、玉米大饼就咸菜。虽然不习惯，但是吃得很多，毕竟整整一个夜晚没吃东西了。

我们分到东风阳一队和东风阳二队。

一队有：余莉莉、张学雅、朱克瑜、张韵华、盛逊、王瑜、尹俊贤、孙连、张怡庭、余旅滨、潘克非、张以维、应晶扬。

二队有：王亦新、忻龙英、洪佩英、沈乐乐、胡大萌、周锡英、张静玲、苏增武、王招官、徐小棣、徐明、吴迪、蒋遂。

我们坐上马车，车上响起一阵歌声：“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前苏联歌曲《三套车》）

车把式大鞭一甩，“东风阳，我们来了！”

我们的新家东风阳大队离我们越来越近……

我们新的家园

到目的地东风阳大队后，我们被热情的村民接到家里。由于刚到农村，还没有为我们知识青年盖好房子，就住进了房东家里，我们二队男生的房东是周跃文，一位高大健壮的男人，贫农。

北方农村的屋子一般分为三个开间，中间是厨房，两边是住人的房间。厨房左右都有灶头，烟道连着房间的炕，用于取暖。东西两边的屋子南面是大炕，我们6个男生睡在炕上，每个人只有60厘米左右的地盘。

西面是房东的屋子，有男主人、女主人、4个孩子和他们的小姨住。4个孩子三男一女，最大的男孩已经可以下地干活了，小女孩只有3岁。

东风阳大队没有电，晚上是点煤油灯的，晚上睡觉时躺在炕上要把灯吹灭，我们练就了一米外吹灯的绝技。

房子是用土胚垒的，上面盖了厚厚的草。墙也是土胚，用报纸糊上显得干净一些。前面有两扇窗，好一点的人家上了玻璃，困难的就糊上油纸。

吃饭的时候就在炕上放上小炕桌，矮矮的需要盘着腿坐在炕上，我盘不来腿就站在下面吃饭。

晚上睡觉时，由于烟道从一头通过另一头，睡在炕尾的人最冷，而睡在炕头的人却热得受不了。到睡觉的时候才知道真正的考验在等着我们。半夜里被跳蚤咬醒，发现身上已经是红一块、紫一块了。由于东北天冷，晚上房东的猪、狗都是进屋的，所以带来了大量的跳蚤。第一年我被跳蚤咬得浑身化脓。

情到急处我也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用毛巾做成床单，这样跳蚤钻在毛巾的细线里就跳不起来，便于捕捉，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和我一样的知青有很多，有些人由于血型的关系却不被跳蚤咬。

最初的时候，由队里派一名社员给我们做饭，工分是队里发的。那名社员叫李文义，是贫农，据说是因为父亲抽大烟抽穷了，冬天还光着脚在雪地里跑。李是队里少有的党员，因为早婚早育，党组织对他进行教育，他说：“我能为了党员把孩子扔了？”就自动退党了。

初来乍到，我们吃不惯北方的粗粮，政府给我们发了大米、白面。但是粗粮还是要吃的，苞米楂子、玉米粉、高粱、小米都吃。最难吃的是玉米面，做成窝窝头后实在是吃不下去。后来发现了秘密，用生大葱就窝窝头，先吃一口生大葱，等满嘴辣了赶紧把窝窝头咽下去。农村的条件艰苦，只有等屯子里有人杀猪了才能吃得上肉，一两个月一次。老农说：“苞米楂子、咸鸭蛋，吱吱的！”

以后由于和李文义产生了一些矛盾，再加上南北的口味不同，我们辞去李自己做饭。我还算是会做做饭的，但是真的做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第一次做饭，我做馒头，由于没有掌握好放碱的数量，馒头做得又黄又硬，好像苔菜饼。当时难过得饭也没吃，倒是同学们都没有责备我。慢慢的我的手艺也好起来了。现在我切菜“咚、咚、咚”手起刀落，都是那时切土豆丝练出来的。包饺子是我和邻居陈纲教授（原杭州大学旅游学院院长）家姥姥学的，也派上了用处。

做饭最难的是打水。大队里有两口井，井很深有 30 多米

吧，要用轱辘把水摇上来，盛水的是柳条筐，本来就重，冬天结了冰加上水就更重了。轱辘要一口气摇上来，否则就会滚下去，加上冬天井边结冰，更难了。有一次一队的余莉莉就是因为没有控制好，轱辘滚下去把头打破了。

东北大平原一望无边，由于没有山，土里连石头也没有，所以乡村的道路都是泥路，到下雨的时候满是泥泞，脚插下去就是一腿的泥。

东风阳大队离公社所在地二龙山有六里路，到杭大附中其他同学的住处龙阳大队等也是六里以上。平时下地劳动也有五六里的路程。下地劳动多数是走着去的，也有运气好的，就坐牛车，牛车悠悠，好不惬意。

到公社去，多数可以搭上马车。东北的车把式很热情，大鞭子一甩，两耳生风！

到了来年，小队为我们知青盖起了新房，总算有个固定的小窝了。我们也养鸡养猪养狗，但是自己搞得干净，就没有跳蚤了。

贫下老中农

毛泽东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一次屯里开会，张队长说：“贫下老中农们。”把大家都逗乐了，从此我们知青就把“贫下中农”喊成“贫下老中农”。

初到东风阳大队，队里党支部就召开了知青会议，其中重要一条是叫我们认识队里的“地、富、反、坏”。当晚在队部把屯里叫“老井家”的地主喊来让我们知青认识，以便和他划分界线。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所谓的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并不特别的仇恨，在讲到阶级斗争的公开场合，地主们是要低头的，但是在平时，一概称兄道弟。当时有“老井家”并不当一回事，在台上东看西看毫不在意，我气愤之下上去打了“老井家”一下，日后屯里就传来知青“邪火”的说法。

东北的阶级划分和南方不同，不是以土地的多少计算，原因东北的土地实在是太多了，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开垦。阶级成分是按财产计算的。我们的房东周跃文因为在土改前，家里有六七匹马被土匪抢走了，所以成了贫农。前面讲到的李文义也是因为父亲抽大烟抽穷了，成了贫农。

东北还有一个怪现象，划分成分不是看父亲而是看爷爷的，这是因为土改时间太早，那时的爸爸辈还没有到划分成分的年龄。因此我们有些知青虽然父亲是革命干部，爷爷却是地主，所以在当时也被划入地主子弟的范畴，对他们来说是受到了奇耻大辱。不过那些干部子弟最后还是因为父亲的关系大都进入部队，离开了农村。

我们东风阳大队有位支书姓王，据说是土改时的带头人，

屯子里对他很尊重。我们得知王支书时他已经生病生得不轻了。我们一队和二队的知青筹划以后，决定用我们自己的钱送王支书到哈尔滨去治病。我们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由同学徐小棣送他到哈尔滨治病。但是由于他病得实在不轻，最终医院说治不了了，再接了回来。不久王支书去世，王支书的三哥，人称“三大爷”，对我们知青非常感激。三大爷住在福利屯，是铁路的最后一站，许多知青回家时都到他家借宿，回来时的包裹也寄到他家，有便车再去他家取。

东北人实在，对知青也很关心。我的房东大嫂常常和我拉家常，有时候一拉可以拉几个小时。秋收时，我因为生得瘦小割黄豆落在队伍很后面，有几个屯里的小伙子会帮我把剩下的黄豆割完。到了端午节，房东大嫂会把几十个煮鸡蛋送给我。

有一次，拉高粱杆的马车突然抬起来把我压在车尾，再压下去就会把我压死。这时被队长徐贵看到了，他大喊：“快赶马车！蒋遂被压住了。”车把式大鞭甩起，马车朝前一冲，车尾抬了起来，我才免于被压，想起来非常后怕。

夏天铲地，队里说南方人会挑水，就安排我干送水的活，其实也是照顾我。

说实在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并无多大的意义。首先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在屯里并无明显的区分，有些地富子女在屯里还是人才，往往干一些技术活，如木工、瓦工、播种等等，有些地富子女因为有些文化，还担任小学的教师。

农村人由于受小农经济的影响，一般比较贪小。有时他们看到我们手里有他中意的东西，会开玩笑说：“给我吧？”，如果你也笑说：“给你吧？”他就毫不客气的把东西取走，我就

上过这样的当。

上面说到的三大爷，当包裹寄到他家后，往往会掉东西，其实也是被他取走了。不知道其他的知青是否这样认为，反正我是从来不寄东西到他家的。有一年他说要我回家给他带几双皮鞋，我情知他不会付钱，就没有给他带，回来后他很不高兴，嘴里骂骂咧咧，我暗自好笑。

知青中有许多人为了和贫下中农搞好关系，常常到他们家串门，我生性腼腆，不喜交际，从来是不去串门的。有贫下中农在知青回家时要知青带这带那，但是钱总是一概不给的，带的东西有吃的也有穿的，最多是的药品“镇痛剂”。起先我们不知道，原来“镇痛剂”里含有吗啡，多吃了会上瘾。东北农村直到1949年后抽大烟的人还是很多，多吃“镇痛剂”可以代替大烟，有的知青就不知不觉成为传播“毒品”的人。前面说到的王支书就是抽大烟把身体抽坏的。

南方的小吃比较多，知青带去后也给当地农民品尝。最有趣的是他们吃山核桃，说：“那么好吃，怎么就咽不下去？”原来他们把山核桃的壳和肉一起吃下去了。牛肉干他们叫不上名字，就叫“那个越嚼越有味的”。

农村文化生活贫乏，有一次屯里的驻军放电影《红色娘子军》。男女老少都去观看。看到女兵们穿着短军裤，大姑娘小媳妇大惊，说：“哎哟妈呀，怎么穿大裤衩子？”

农民在田间地头劳动，最喜欢说黄段子，现在叫“性骚扰”，是一种原始的发泄吧。有时也动手，有一次一群小媳妇把一个老农摁在地头，扒下裤子，撒了一把土在他裤档里，老农嘿嘿地直笑。

农民好赌，屯里治保主任的家里就设赌局。田间地头，休息的农民就用纸牌赌博，但是一般输赢不大。有一位农民说那年他赢了七八百块钱，到北京等地做了一次旅游，算是物有所值，不义之财做了正当的用处。

说了这些，也许有的知青会有不同看法，给我带上个“污蔑贫下中农”的大帽子。但是我这人从来是报忧不报喜的，说实在的我并未感觉到贫下中农再教育给我留下什么精神财富。有的知青反倒是偷鸡摸狗，被村民所唾弃。

黑土地上的春耕、夏种和秋收

初到黑土地，便被那绚丽多彩的北国风光所吸引住了，那是一种与杭州小家碧玉所完全不同的气势，村里贫下中农的粗犷生活习惯更是与我们有千差万别的不同。初来乍到我们更多的是新鲜感觉。

安顿完生活起居后，春天的脚步也慢慢的来到了黑土地。农村的最大事项春耕开始了，一时间村子里人声鼎沸，耕马嘶叫。我们怀着莫明的兴奋，投入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主课耕种中去。

清晨我们随着春耕的队伍向田间开拔。小队里的土地既有就在村子边的，也有远在几里外的。有时候我们就坐牛车，晃晃悠悠的向地里进发。村民们嘻嘻哈哈的说笑着，我们也开心地观望一览无遗的黑土地。

东北农村那时的春耕还是非常原始，在前面由两三匹马或者驴子拉着犁，一位懂行的村民在犁后把舵，接着由两三个人在犁开的土地上用脚把新翻的土地踩实，最后才是播种的村民将种子播撒下去，当一遍土地撒上种子后，第二遍耕种的时候就把前一次撒上种子的土地盖上，完成一垅土地的播种。

我们知识青年既不会扶犁，也不会播种，就只有踩地的行当可以做了。踩地在那里叫作“踩格子”每个踩格子的人手拿一根棍子作拐杖，以保持身体的平衡。须知，东北种庄稼的地分为两种，一种是熟地，相对比较好踩；还有一种是种植不久的生荒地，还有许多没有腐烂的草根，踩起来七高八低，所以一定要用棍子保持平衡。我们用来保持平衡的棍子，也就是拐

杖，是一种叫作“黄玻璃”的木材做的，非常轻盈。

我们跟在扶犁手的后面，一脚深一脚浅的在新长征的路上迈进，一上午走过的路不下十几里。累是不用说的，怪只怪我们是城里人，没有吃过种地的苦，现在毛主席让我们来体会“汗滴禾下土”的艰辛了。

也有兴奋的时候。每当土地被犁开一道黑油油的口子，会有成群的海鸥前来觅食。蓝天白云下海鸥翩翩起舞，在我们身边穿梭，既美丽又浪漫。这时候就会情不自禁的哼起苏联歌曲，疲惫顿时消失一半。

十几二十天以后，种子就发芽了，这时候野草也随之生长。田间管理进入到铲地的阶段。铲地就是把田间的野草铲除掉，整个夏种期间需要铲三遍地。铲地需要非常仔细，否则把青苗铲掉就犯错误了。农民们铲地的技术非常好，速度也很快，知识青年往往跟不上趟。我由于自小是左撇子（以后改为右手），所以能做到左右开工，累了就把铲子换到左手。村民们看到我的绝技，啧啧称赞：“两手！两手！”也有些农村的孩子跟着大人下地，两个孩子包一条垅，称为是“半拉子”。

铲地最辛苦是在夏天，天虽然没有杭州热，但是尤其是玉米已经长到快一人高了，钻在玉米地里铲地，往往会被玉米叶子把脸割破，划得红一条、青一条的。再就是东北的蚊子实在可恶，它们晚上天冷不出来，却在阳光下成群结队的攻击人。农民们都把头包起来，有些大男人把自己家小媳妇的围巾包上，搞得男不男，女不女，还乐颠颠的。有一次我用手拍打身上的蚊子，一数手掌上竟有 57 只！

秋华果实，庄稼一片黄色，农村进入到丰收的季节。首先

收割的是麦子，割麦子的镰刀是那种可以削发如泥的。村民在麦田里割麦子就像跳舞般潇洒，随着一个大转身，大片大片的麦子整整齐齐倒在地下。一次在欢乐的气氛中，一位中年妇女性子起来，竟把小布衫撩起，晃着两只白花花的大乳房拼命的割向前去，村民们嗷嗷大叫，急起直追，欢声一片。

可是象割麦子这样轻松的活并不多，收割一般都由男性壮劳力承担。有一次我与村民一起割黄豆，黄豆杆非常结实，我累得浑身酸痛也跟不上队伍。到休息的时候我还远远的落在后面，两个好心的年轻人看到这里，就帮我从另一头割起来。以后天越来越冷，开始割玉米了，那天我拼命的向前割还是赶不上队伍，天色渐晚，前面的村民已经割完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荒芜的田野里。实在是累得趴下了，也没有一个人来帮我，望着头上惨白的月光，我再也忍不住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守护丰收果实

一到秋天，黑土地一片金色，庄稼都到了成熟期。东北农村的一些好吃懒做的农民，更会乘月黑天高去到庄稼地里偷些粮食，这样即便是不挣工分，也能解决半年的粮食。队里的领导对此有些头痛，于是就安排人晚上值班，叫作“打更”。

由于村里人沾亲带故，打更的人即使看到有人偷粮食也往往会放过一马，于是队里领导就想到了我们这些知识青年。他们认为我们和村子里的农民没有瓜葛，干事一定会认认真真的。

于是我们男生大多都当起“打更”官。初秋时节天气还不太冷，但是到了晚上就不得不穿起棉衣。我们手拿镰刀（当作防身的工具）荡悠在村子的周边、庄稼地里。半夜时分村里一片寂静，只有老牛的咀嚼声和偶而传来一阵犬吠。没事的时候数数星星，欣赏欣赏月色美景。

也有例外，有一次我打更的时候突然看到村子北面升起一颗照明弹！因为我们村子里驻有一支空军雷达兵，我赶紧跌煞摔倒跑到大队部汇报，大队部有干部睡觉的。于是他们又和雷达部队联系，至于这颗照明弹是谁放的，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中苏边境形势严峻，珍宝岛战争爆发不久，自然就联系到“苏修”身上去了。

知识青年都年轻，晚上不睡觉熬一两天还行，时间长了那里吃得消啊？所以慢慢的到了后半夜就溜回家睡觉去了，至于有没有贼还去管它吗？有一次两个“打更”的跑回家睡得迷迷糊糊的，被队长从棉被里揪了出来，原来那天村子里进了狼，还吃掉一头小牛。队长也是善人，没把他们怎么样。

有一次在打更的时候，被我抓到了村小学的冯老师，知识分子还敢偷窃？我大怒，于是就拽他到大队部去！他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那肯丢脸呀？于是在地头拉扯起来，最后我总算念及他是教书育人的，不想让他太失面子，让他把粮食倒村里的晒谷场上，放了他一马。渐渐天越来越冷了，庄稼地上的小米、苞米、黄豆都收割起来，堆在地里等马车拉回晒谷场脱粒。半夜有一天，我又逮到一个小偷，一看竟然是小队的会计，平时对知青也不错，我放过他就更显得心安理得了。

庄稼进场后（晒谷场），场地上堆满了，这才是看护的重点。场地上有一个“地窝子”，说得好听些就是能钻人的小洞，里面有个小土炕。晚上打更时就钻在地窝子里，外面是刺骨的寒风。到了看场（在场地上看收割上来待脱粒的庄稼）的时候，我已经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堕落了。某天和另外一个看场的同学偷了一旅行袋的黄豆，准备带回杭州。最后时刻，我良心发现，又把这袋黄豆倒回场，完成了一次灵魂的拯救。

高高的兴安岭

1971年冬天，我所在的黑龙江富锦县二龙山东凤阳大队有一个到小兴安岭修路的名额。当时我对小兴安岭充满神秘感，并且儿时朋友蒋绍心的姐姐蒋绍恣和姐夫张秀森在小兴安岭的伊春市发电厂工作，我很想借此机会去看看他们。于是我就缠着队长要求这个名额，在我的不断要求下，队长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们一行人在公社集合，坐火车和汽车一路兼程赶到目的地营区。这些修路的民工中有另外两位知识青年，是二龙山公社荣胜大队的，由于年代久远，只记得一位叫“阿三”，另一位就叫不出名字了。

我们住进了毡毛搭建的帐篷，睡的是大炕，帐篷有炉子生起火，外面是呼啸的寒风。整个帐篷住了二十几位民工，帐篷里充满着男人的体臭，几盏汽灯在头上闪闪发光。

我们的工作是把卡车运来的石料铺在路面上，然后用压路机压实。工作辛苦是不用说的，半天下来手上都起了泡，晚上回到帐篷第一件事就是睡觉，此时对帐篷里发出各种臭气都已经没有感觉了。

农民都有小农思想，几天下来有人动起歪脑筋了，把一些大树的杆子铺在路基里，这样可以节约劳动力。不想这事很快被林区的筑路工人发现了，于是一场战争一触即发，工人和民工几乎动起手来。到底是工人阶级觉悟高，在筑路队领导的协调下，工人和民工很快达成了协议，两边的头头手拉手又成了好朋友。

我们平时吃的主要是馒头、苞米面，偶而会吃一顿大米，那大米是备战粮，吃到嘴里会有一股霉腥味。菜肴则是酸菜汤，上面漂着几片肉片，吃的时候小心的用筷子夹起来放到嘴里，因为平时工作量大，也顾不得好吃不好吃了。

时间长了，修路队的民工分成了两派，那两个知识青年也加入到两派之中去，我基本上保持中立。有一次为了一件小事，两派动起手来，“阿三”大打出手，我只在一边观望。于是有民工就说：“蒋遂，我卑服你！”

一个多月以后，修路的工作基本上差不多了，于是我就动起去看绍恣的念头。早上我从林区赶到火车站，坐的是林区的顺风车。到了火车站以后，爬上一辆到伊春市的货车，货车在寒风中走走停停，大约两个小时后到了伊春，这时我已经被冻得几乎说不出话了。赶紧下来到车站暖暖身子，再向别人打听发电厂的地点。当年伊春发电厂的大学生不多，于是绍恣和秀森被称为“蒋大学、张大学”，一问便知。当我终于来到绍恣家的小园子时，天色已经快黑了下來。

绍恣看到我大吃一惊，一问我一天没有吃饭了，于是煮了整整一盆面条，我狼吞虎咽吃个精光！我在绍恣家住了三天，帮他们劈木材，和秀森到几里地以外去开荒，准备来年种地。最有趣的是我们拿了电力工人用的脚铐去树上采松子，这些松子我带回到杭州，很长时间都没有吃完。

告别绍恣后，我又搭火车回林区。火车站离我们的驻地还有二三十里的路，这时顺风车就不太好搭了，林间的马路静静悄悄只有我一个行人。我这人天生胆子大，有一次半夜里有事要通知六里路外的龙阳大队，我手拿一把镰刀就上路了。我一

路走来，既没有遇到山上的东北虎，也没有遇到黑瞎子（熊），到是看到一只黄鼠狼在夕阳下闪烁着金黄色的皮毛，煞是好看。终于在最后几公里的地方遇到了林区的卡车，我顺利的回到了驻地。

“吃啦？”“吃了！”

东北人热情，每每遇到人就问：“吃啦？”于是就回答：“吃了！”

我们从江南杭州来到黑龙江，在生活遇到不少问题，尤其是在吃上面更为突出。

刚到农村时，政府给我们配备了细粮，有大米、白面。但是我们既然是到广阔天地来扎根农村的，自然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所以那些粗粮也要习惯起来，加上以后政府的配给没有了，就只能吃粗粮了。

东北的粗粮大致有苞米、高粱、小米等等。苞米是挤压成碎颗拿来煮饭，叫作“苞米楂子”，也有磨成粉的，叫苞米面，苞米面可以做成大饼子。苞米楂子要煮许多时间才烂，而且吃在嘴里口感非常粗糙，感觉到了喉咙口就下不去了。所以我们知识青年都不太愿意吃苞米楂子。

我们平时吃得最多的是小米饭，小米饭不扎嘴，只是味道和大米不同，但是可以吃下去。还有一种叫作“粘米”，也是小米类的，有粘性，东北人都用来做粘豆包，吃起来最上口了。最不能忍受的是高粱，高粱米饭又粗又扎，根本没办法咽下去。

刚到东北时，由于在饮食上不习惯，不少知青都面黄肌瘦，有时候为了吃一顿大米饭我们会赶到县城，记得有一次我和张以维在县里吃了一斤半的大米饭。

在菜肴方面，东北农村吃得最多的是葱蒜、大酱、酸菜、土豆。大酱是用黄豆腌制的，几乎家家都做，每家都会放一个大缸。由于腌制大酱时天气尚暖，大缸里就会长满蛆虫，吃酱

的时候把蛆虫挑出来再上酱，我看了是吃不下去的。酸菜和土豆主要是冬节的菜肴，我在农村腌制的酸菜口感好，连村民也交口称赞。土豆一般是切丝炒来吃的，所以我到现在还练就了一手切丝的本事。

到了春天，蔬菜多起来了，最早的是韭菜，接着豆苗、菠菜、豆角都上来了，所以选择的余地就大起来了。东北人不会做菜，像毛豆我们是炒来吃，他们则把整支毛豆在大锅里煮了，拎在手里吃。东北大地上蘑菇很多，天一打雷就会长出来，称作“雷窝子”。我们用蘑菇炒毛豆，村民们吃了啧啧称奇。

村子里差不多一个月有一次村民杀猪的，于是就能吃上猪肉。猪肉一般都用来包饺子，有韭菜饺子、粉条饺子、白菜饺子等等。有时候为了解决“油水”的问题，用油渣包饺子，这是最开心的事情。村民们杀猪都不浪费，下水也不丢掉，有种做法叫“血肠”，把猪血灌到大肠里蒸着吃，我是不愿意吃的。东北农民爱吃猪肉，对于鸡鸭就不太感冒，有时候我们去买鸡，论个买，一只一、二块钱。还有贫农说到过年时买不起猪肉，就杀两小鸡过年，我们知青听了暗暗好笑，那不很好吗？到了端午节，房东大娘送我几十个鸡蛋、鸭蛋和鹅蛋，都吃不完。

我们知青也养猪，龙阳的知青养的猪经常吃馒头，长得个大，有四百多斤，杀了猪以后请我们附中的同学去饱餐了一顿。

搭 车

三江平原幅员广阔，一览无遗的黑土地望不到边。而公社所在地离最近的火车站福利屯有 280 里路（据王招官同学提供）。

人们说衣食住行，是人生不可缺的，所以知青在黑土地也要遇到“行”的问题。更何况黑龙江地广人稀，“行”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我们在东北坐过的车归纳起来主要有马车、牛车、汽车和火车。

坐牛车一般是下地劳动或者收工的时候，因为下地种庄稼需要不少物资，所以要用牛车运到田间地头。牛车也不是每次都有坐的，要看是否有空位。牛车最大的特点是“慢悠悠”的，坐在上面就象现在坐公车一样，不用担心会迟到。于是坐上牛车，看看天际的彩云，听听老乡们的唠嗑，不由自主的就到了地头。

相比牛车而言，马匹有更大的力量，行走速度更快，所以就担任更加重要的运输任务。农村的马车一般都是三套车，也有少数是四套车的。中间一匹叫辕马，主要是用于驾驭车子的，边上各有两匹马，叫“拉帮套”的。我们一坐上车就要情不自禁的哼起前苏联歌曲《三套车》。我们小队队长周耀文的父亲有一手驾车的好手艺，人称“老把式”，他驾的车除了辕马，前面拉帮套的是三个驴子。驴子生性调皮，一般很难驾驭，老把式不但能驾驭，而且一次就驾驭三头驴子，真是威风八面！

一般我们到公社所在地或者其它知青点，都会坐马车。驾

车的农民看到我们穿着黄色的棉衣就知道我们是知青，会很热情的请我们上车。

到再远的地方如县城就不能坐马车，更不能坐牛车啦，于是就坐汽车。有县里的长途汽车，也有在道上跑的各式各样的卡车。这些卡车主要是一些运粮的车子和修路和车子。

有一次我们小队四位同学：徐小棣、徐明、吴迪和我到几十里外的大草甸去采黄花菜，坐上了到抚远修路的卡车，并说好了等他们回来再搭回去。到下午的时间，天下起了大雨，可是左等右等也不见卡车回来。我们看到田间有辆拖拉机，就四个人挤到里面准备过夜。坐在里面又挤又冷，熬到天黑实在受不了了，于是前往附近的兵团借宿。我们喝了兵团战士给我们的小米稀饭，睡在热腾腾的火炕上，不知不觉到了天亮。第二天在回家的路上忽然看到了昨天的卡车，原来因为雨大他们也回不来了。

当然也不是总能遇到好心人的。1971年冬天我回杭州的时候，在公社所在地，已经加入公社粮库的林博为我联系了一辆运粮的卡车。开始坐在上面还挺安耽的，快到福利屯的时候，那卡车弯到一家粮库去卸货。那驾驶员毫不客气的把我赶下车，我再三解释是林博让我跟这趟车的，他就是不听。等他开车的时候，我一番身爬上卡车，并在车厢里躲了起来。谁知他在后视镜里看到了，马上停车把我的行李丢到水沟里，把我赶下了车。

眼看着卡车绝尘而去，福利屯还遥遥无期，我只能背起行李默默的踏上公路向福利屯走去，此时离福利屯大约还有二十几里路。好在不久我遇到了一辆马车，车把式很热情的邀我上

车，顺利的到了福利屯。此时此刻我真想说，什么才是人间冷暖！

我们知青由于体力原因，挣的工分不多，回杭州的时候都舍不得花钱买火车票。于是就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逃票。有到站后钻狗洞逃票的、有和列车员拉关系逃票的、也有修改过期车票的，总之只要不花钱都行。

1969年深秋，我和徐小棣回杭州。当时在福利屯，我们从很远的地方通过没人管的道口走进车站，然后爬上到哈尔滨的列车。第二天清晨我们竟看到许多村民背着工具爬上车，原来他们是到十几里远的地里收割庄稼的。到哈尔滨以后，我们又走了很多路，在一座天桥的上面找到一个窟窿钻了出去。再后来想想实在没有勇气逃票了，才买了回杭州的车票。

听说我们大队的女生王瑜和尹骏贤一到火车上就和列车员搓关系，大讲知识青年的痛苦，于是好心的列车员一路让她们坐到上海。也听说徐小棣和张静玲在回黑龙江时，在一个华北平原不知名的小站被赶下车，在风雪中行走了许多路，才到达前面一个小站。至于这些说法是否真实，只有请当事人来证实了。

我想每个到过黑龙江的知青都会有搭车的经历，由他们自己写出来会比我更加精彩。

感恩知青岁月

以前写博客是因为有人鼓舞，在写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回忆了一些知青时代的往事。随着博友喜欢，加上一些前插友的兴趣，有关这方面的博文也就多写了一些。

我这人率性，也不大愿意做一些理论上的分析。只是觉得有些事乘现在还没患上老年痴呆时写出来，以免以后忘记了。

在写写往事的同时，也看了一些有关知青的文章，不知不觉中有些感想，故而记录下来。

看到有人说“知青”是个伪命题。现在想想真是千真万确。知青主要是文革中的“老三届”还有前期一些到农村、到边疆去的青年人（以浙江省为例，有文革前到新疆建设兵团的，有到宁夏插队的）。老实说文革中的老三届，在学校里泡了三年，停课闹革命，究竟学到了多少知识？就我本人而言，读中学的时候是1964年，没有好好学习知识，所幸文革来了，不用为成绩不好而头痛了。当然也有老高三的学生，倒是读完了整整三年高中，但又在学校混了三年，那些学到的知识多多少少也扔到爪哇国里去了。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是个美好的号召。直到以后才知道，那时城市因为生产停工，大批适龄青年没有办法安排工作，才想出了这个安置人的办法，说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其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唯独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知道。

那时的人天真，上面说什么就相信什么，一句“知识青年”就把几千万年青人叫得热血沸腾、晕头转向、舍生忘死。

中国人对一件事物的描述不外乎分为三个级别，好的、一般的、差的。对知青岁月，我大概也可以归纳出三种情况：感恩的、认命的、绝望的。

感谢知青岁月的，是那些文化精英、达官贵人。他们认为正是因为知青岁月磨砺了意志，强壮了体魄，才使得他们达到了做人的最高准则。其实在我看来，这似乎只对了一半，那些文化精英，其实本来就是读书的好苗子，不经过这个时代他们也一定会读出水准，干出水平。倒是那些达官贵人，确乎其应该感谢知青岁月。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他们可以学到传统教育所学不到的许多东西，可以掌握做事当官的本事（这里只指贪官，不指清官），所以他们才是最感谢那个年代的人。

认命知青岁月的，是一些没出息，又平平淡淡的人，我即属此列。俗话说“时也、运也、命也。”一个人的命运多多半不是靠自己努力可以掌握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只是教育的一厢情愿，吃苦也白吃，吃了也做不上“人上人”，才是大多数人的现实。既然掌握不了命运，就认命吧！认命的好处是可以安安稳稳的做人，既不会伤害别人，也不会沉伦自己，平安即是福气。

绝望知青岁月的，是那些受伤害最深的人。想想吧，那些受尽折磨，一生潦倒，甚至在广阔天地丢了性命的人，他们不感到绝望，谁还会绝望！！如果适身处地的想想，那位年轻的同学徐明姑娘，她都将 19 岁的生命遗弃在黑土地上了，她还感恩？她能认命吗？

“文化革命”和“知识青年”的问题一直被主流社会所回

避，也许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今天说了些实话，也不怕担心而招来杀身之患。有不同看法的插友、同学以及不同观点的人，欢迎前来争鸣。

第五章：随笔

闲话杭大路

昨天在网上瞎溜，在 19 楼上看到一篇《泛杭大路上的悠
然时光》，该文作者是一位女大学生。也许是年岁尚轻，她对
杭大路以前的事叙述不多，就想在这里作一些补充，当然我讲
的多数都是老底子的事情。

杭大路有正名，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我想这与杭大路逐
渐重要起来是有关系的。我 1957 年随父亲蒋礼鸿、母亲盛静
霞从体育场路 262 号搬到新建的杭州大学（期时还是浙江师范
学院，一年后成立杭州大学）时，这条路还只是黄沙铺就的石
子路，与相交的西溪路是一个德行。我在博文《古桥遗梦》中
描述的西溪路和杭大路极为相象。我是这样描述西溪路的：

桥梁跨经的杭徽路（现在叫作西溪路），是一条黄沙铺成
的道路，现在称之为“马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一片泥泞。
路边是大片的稻田，有零星的土地上长满了瓜果蔬菜，别有一
番田野风趣。

杭大路斜插过去就是黄龙洞，现在的新西湖十景。那时候
我们去黄龙洞要对准那保石山上三颗硕大的树。现在封山育林，
一片绿色，那三颗参天大树已经不可再觅，冥冥之中我还常常
仰望山头寻找那三颗大树，其实是在寻找童年的梦。

那时候，路的两边几无建筑，右边是牛奶场，种植了大片的蔬菜，左边是铁路林场，种植的是一些树苗，用于铁路周边的绿化。再就是一片一片的稻田，春天来临，稻田里一片蛙声，现代人已经听不到那此起彼伏的蛙声了。

那时路的右边也有一些建筑，是一些茅草屋，住的是当地的农民。茅草屋又矮又小，而且没有电灯，看了令人心酸，就会想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杭州西湖消防中队，从岳坟搬到这路边。那时候消防中队的大门是正对着路的，不象现在缩在里面，为的是给商业让路。

杭大路的变迁经历过四个阶段：黄沙路、水泥路、道路整治、道路拓宽。前两个过程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过程在改革开放以后。

当这路铺上水泥以后，开始通公交车了。那公交车是 16 路车，从浙江大学到平海街。16 路公交那时是要通过西溪路的，所以杭大人进城就能坐上公交车了。那时这块地方还很偏僻，人们都叫“进城”去，现在城市扩大，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

杭大路的掘起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就是第三个阶段。路的右边建起了世贸中心，左边建起黄龙饭店。那黄龙饭店是五星级饭店，承担接待外宾的任务。世贸中心则是杭州第一个大型展示场所。现在，由于世贸中心的面积不及杭州和平会展中心，已经退而其次。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一些重要的展示还是离不开世贸中心的。

除了这两个大型建筑以外，右边掘起不少的楼群。那楼群用现在的眼光看起来还很落后，是一些农民房，多数是小旅馆。

那小旅馆虽然不太起眼，我父亲的博士生任继昉来杭州时还住过。现在任继昉是湖北大学的教授，著名语源学研究专家。想必现在的专家教授不会再住这样的小旅馆了。除此而外也有茶楼，挂着大红灯笼十分扎眼。再就是农民们开的小店了，当然也不都是农民开的。我们宿舍的郑安东先生的儿子，也在那里开过一家小店。我们称他为“万元户”。

路右边还建起两座饭店，一座叫“新世界”，一座叫“绿晶大酒店”。两座大饭店气派豪华，绿晶是仿欧式的建筑，新世界的台阶有近十层，走上台阶恍然有种登天的感觉。一时间杭大路上达官贵人、佳丽粉黛如云，一个个粉墨登场。安知好景不长，那两座建筑居然是违章建筑，有关部门下达了拆迁的命令。但这两座饭店可是有来头的，硬是挺在那里不动，连光明日报也作了报道。最终邪不压正，终于被拆除了。想那新世界大饭店，南面的大门是斜着的，正所谓歪门邪道终究要被人民唾弃，也显示了当局反腐败的铁腕。

杭大路周边被定位为黄龙商贸区，现在的状况不必描述，有兴趣去看看便可。

杭大路终究是以杭州大学命名的，杭州大学在度过百年校庆以后，被新的浙江大学合并。现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原来的杭州大学所在地）还有百年校庆的“世纪之光”纪念雕塑，在默默的讲述杭州大学的辉煌；西溪校区的大门背面，还有“求是育英”四个锈迹斑斑（现已更换，2015.5.10 注）的金字，在默默的讲述杭州大学的渊源。

杭州大学道古桥宿舍是个不可小觑之处，那里名人云集，书声琅琅。2009年5月，有都市周报发表了一篇《一墙之隔，

隐了多少杭大新村的春光》的美文，作者周笑纹也参考了我的博文《古桥遗梦》。仅就杭大路而言，我就经常看到一些著名大师在那上面迈步。我父母也曾相互搀扶着漫步在杭大路上，夕阳在他们的身后留下了长长的倩影……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我看到王驾吾先生迈步在杭大路上，腰杆笔直，闲庭信步；严群先生由内人搀扶着缓缓走在路上；徐朔方先生与学生一起走在路上，边走边谈着学问；郭在贻先生迈着急促的步子走在杭大路上，神情若有所思……

前不久看到杭大路和西溪路交叉的地方，竖起一座雕塑。那雕塑是由一叠书本组成，其中还有线装书的样子。查看有关网页，才知道那雕塑是为了纪念杭大路上的文化底蕴而建。这雕塑也忒难看了，不伦不类，也没有文字说明其含意。如果真要建宏扬文化的雕塑，我以为可以将曾经居住在道古桥宿舍（杭大新村）的一些国学大师、文化名人、科学家塑成一个群像，当然代价不菲，有关部门是否下得了这笔资金呢？

闲话西溪路

2011年4月28日写了篇《闲话杭大路》的博文，兴致上来，一发不可收了。和杭大路交叉的唯有西溪路一条，西溪路不象杭大路只有千把米长，从东头的松木场到西头的留下镇延绵不绝，浩浩荡荡。

有关西溪路自然少不了讲讲“西溪”。自从杭州把西溪湿地开发出来以后，有关西溪的报道如铺天盖地。我写的西溪路自然做不到象一些“名记”那样令人赞不绝口，只是我生活在那里的一点点小小的感悟。

我有些博文也有与西溪路有关联，如《魂来怒捲江潮白》《沉默的丰碑》《童年》《古桥遗梦》等。当然为了完成这篇文章也会摘录一些相关的章节，自己抄自己不算是剽窃吧。

西溪的出名，有赖于南宋皇帝佬儿一句名言：“西溪且留下”。泥马渡康王后，赵构狼狈不堪窜到杭州，见西溪美景就想打住，在这里建行宫，于是传下了这千古绝句。杭州乃中国七大古都，天下美食口留余香、江南美女君子好逑，谁个不想在杭州留下千年基业？怎奈时下杭州房价太高，于是就有愤愤不平之作家写下了檄文声讨。哪篇文章我已经查不出来了，是刊登在《浙江作家》上的。那文章说有位叫做“王留下”的年轻人，看上美若天仙的“钱西溪”，因为买不起杭州的房子，不能获取西溪的秦晋之好。神经错乱，在天桥上狂奔，令人啼血！

闲话打住，还是说说我所知道的西溪，当然还是老底子的事儿。

西溪路旧时叫作杭徽路，是连接杭州到安徽的交通要道。杭徽路是一条黄沙铺成的道路，现在称之为“马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一片泥泞。路边是大片的稻田，有零星的土地上长满了瓜果蔬菜，别有一番田野风趣。

西溪路东头是松木场，当年的松木场河道交叉，碧水连天，众多船只在松木场进行木材、蔬菜的交易，很是壮观。我们一帮小学生每每路过松木场，可以看到鱼船上的鸬鹚，水底的甲鱼和下水道出口处密集的白条鱼。松木场现在已经只是一个概念，遗存在保俶路、体育场路交叉口的雕塑小品，远远不能体现当年的盛况。

路东头有一处浙江省军区的干休所。这干休所没有建起来以前，是一个解放军的汽车连，我们有时候也叫它作加油站。那加油站面积硕大，里面是参天的古樟树，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去参观时，就见到解放牌大卡车在园木上通行，校场练兵，英姿飒爽。干休所那些功勋卓著的老红军、老将军、老干部在平淡的外表下，流淌着革命热血。附近一些中小学时常会请他们去作爱国主义教育。

往西不足百米有一座牌坊，是淞沪抗日战争纪念坊，上书“浩气长存”。现在牌坊已经快要被越来越多的房屋和熙熙攘攘的来往车辆所淹没。行人无意间望去，上面书有“浩气壮湖山魂来怒捲江潮白，英名缅袍泽劫后新滋墓草青”、“华表接青霄一角湖山归战魂，墓门萋碧草十年汗马念前功”两副楹联。前一副为民国时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民政厅厅长，全省保安司令黄绍竑所题，后一副为蒋介石的侍卫长、88师师长，时任浙江省保安处长的俞济时所题。

原先牌坊建在一池荷花中央，是一个圈起来的小型岛屿，岛屿上还有一些小型的房子，应该是相当于庙宇之类的建筑。在牌坊左面，是一排排牺牲战士的墓葬，整整齐齐排在那里。墓葬应该是棺木的，长度有一个人形，墓葬前的墓碑上书写着牺牲战士的姓名。夕阳下，墓地寂静而庄严，向人述说着淞沪战争的悲壮，仿佛还能听到血腥的厮杀！在墓地的右前方，有一座不大的纪念塔，尖尖的塔形直指苍天，记得上面还有国民党青天白日的徽章。现在的牌坊是杭州市人民政府重新修复的。每到清明时节，偶而会看到几个老人，来到这里敬献花圈，看到他们颤颤抖抖的背影，也许是阵亡将士的后人。

经过淞沪抗日战争纪念坊，是原来的杭州大学教师宿舍，旧称道古桥宿舍，现在叫作杭大新村。原杭大虽然不是国家重点大学，也云集了天下名师，有言国学教育“北大是地主，杭大是富农”。2010年7月，浙江大学召开文科大会，展示了浙大百年文科名家。这次展示的文科名家共有50多位。据我细数了一下，这50位名家，曾经生活在杭大新村的共有15位。他们是：钱南扬、王驾吾、夏承焘、胡士莹、姜亮夫、德梦铁、沈炼之、林淡秋、孙席珍、严群、严德一、陈学恂、蒋礼鸿、徐朔方、郭在贻。

杭大新村除“百年文科名家”外，还有不少的文科名家，他们没入名家的名录也许是有其道理，浙江大学校方也说了，对文科名家还要不断补充。就我所知，还有任铭善、徐规、陆维钊等等，都算得上是文科名家。文科名家而外，还有理科名家，如周洵钧、朱福忻、董聿茂、陈士怡、江希明、白正国等等。

2003 年左右，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原杭大政治系毕业）有感于杭大新村的破败，要在原址拆建新宿舍，改善教师住房条件。但也有一些不知好歹的教师和教师的遗孀后裔，因条件未符心愿拒绝搬迁。此事闹得很僵，最后浙大在西溪校园内建起“启真名苑”将大部分教师搬迁过去，遗留下来是个别不肯搬迁之徒。谁想那次不成功的拆建换来的是，杭大新村列入了“杭州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得以保存下这批历史人文厚重的老建筑。

2009 年 5 月，有都市周报周笑纹发表了一篇《一墙之隔，隐了多少杭大新村的春光》之美文。现在的杭大新村春光不再，一到夜晚阴森恐怖，仿佛又回到了“富望公墓”的年代。据网载西湖区有意把杭大新村打造成类似“上海新天地”那样的集餐饮、商业、娱乐、文化休闲的去处，真真是可惜煞人也。

杭大新村西端，旧时有道古桥。我在博文《古桥遗梦》中尽情释放了我对道古桥的怀念。我在道古桥边生活了 60 余年，岂知这“道古桥”是大有来历的。原来那桥是为了纪念元宋时代著名科学家秦九韶而建。秦九韶（约 1202—1261），字道古，四川安岳人。先后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做官，1261 年左右被贬至梅州（今广东梅县），不久死于任所。他与李冶，杨辉，朱世杰并称宋元数学四大家。

老底子，那道古桥是一座水泥建筑的桥梁，桥栏很矮，南面的桥栏内侧有条水管，粗黑的铸铁管很是醒目。桥身也不太高，坡度不大。道古桥下面流淌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在道古桥北不到 20 米的地方与沿山河交汇。这条不知名的小河发源地在宝石山麓西面，源头是“白沙泉”。童年的我还在小河上

看到摇橹的船娘。小河弯弯流经农田，河两岸垂柳轻拂，还长着一名曰茭藕的植物。时值 1960 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众生的生机大成问题。杭大中文系教授蒋祖怡夫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表姐沈月秋将茭藕的块茎磨成粉，做成茭藕粉，供我们小孩充饥，对我们来说实乃人间美食也。

再往西，我就不太熟悉了，闲聊是也。

往西直到老和山山麓之下，是著名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所在地。浙大有“老浙大”之称和“新浙大”之称。老浙大在大学路上，是较早的浙大校园。新浙大是指四校合并后的浙大，现主校区在紫金港。另有旧校区西溪校区（杭州大学）、玉泉校区（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浙江农业大学），原来还有湖滨校区（浙江医科大学）。湖滨校区早些年土地出让，已复不存在。玉泉校区的建设是解放后，院系调整后的浙江大学，可以称为“中浙大”。只不过有些难听，但历史终归是历史，是抹不去的。

老和山下是古荡湾。古荡以前是以“镇”设置的，现在大概设为“街道”了吧，我不太清楚。古荡也是西溪湿地的一部分，未经建设时和西溪湿地没什么不同。记得小时候，物质生活不太富裕，而古荡地处城郊，农产品相对丰富。有一次我和姐姐赶到古荡买肉。那天早上正下着雪，我们“踏雪买肉”。听着头上乌鸦的刮噪，穿过白雪覆盖的小桥，想象着飘香的肉味，对店小二大喝一声：“来一斤猪肉！”

古荡还有一个去处，是杭州有名的“兔儿泉”。“鳞砌苔封鹅子石，泉出清胜兔儿泉。”这是清嘉庆年间，杭州诗人龚自珍描写杭州兔儿泉的两句诗。兔儿泉水据说含有“氡”（一种

化学元素)，对身体大有好处，这是我听已故杭大化学系教授吕荣山先生说的。于是便有杭州市民前去取水，那些市民也不自重，将清冽的泉水弄得细菌繁衍。政府正为此提出整改方案。

翻过炮台新村，前面便是龙驹坞，那是杭州人（除非活着离开这个城市）的必经之地，杭州殡仪馆。杭州殡仪馆原先建在凤山门外，著名的辛亥革命党人应梦卿时任馆长，以后搬到龙驹坞。殡仪馆几经改建，气派不凡，天下第一厅恍若天厅，是去极乐世界之门。老百姓则偏安旁边的小厅。但凡是达官贵人，草民百姓最后走的都是同一条路，都化为尘土一掬，何来贵贱高低之分？

现在有说殡葬行业存在暴利，老百姓“死不起”。前些天内人郭敏俐出席胡缜的追悼会，说是又有新的服务。原先逝者去往焚尸炉时是用手推车前行，现在有八位小伙子，清一色气宇轩昂提供抬尸服务。那逝者是拎在手中或是扛在肩上自然是不一样的。一些亲人想想也是最后一朝了，白花花的银子花出去是对老人的孝敬，便忍痛出手。

出了鬼门关，前面是“杨家牌楼”。杨家牌楼何以命名，据说有一杨姓太监安葬在这里。以前只有地名，没有牌楼，现在建起牌楼，活脱脱是个令人敬佩之处。那年头我被造反派差遣到杨家牌楼劳动改造，住破庙、采茶叶，也欣赏田园牧歌。

往前是“营门口”，那营是解放军野战军的军营。1979年部队出征南疆，部队深夜悄然出发，回来时锣鼓喧天。不知道有多少热血青年血洒疆场。

自古有多少文人“投笔从戎”，现在这军营里也出了教授专家。那便是杭州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生卫军英，这是他

当年的学历，现在怎样不得而知。卫军英系军人之后，中文系陆坚教授的高足。他现在转而研究市场营销之类学问，著名企业“娃哈哈”曾聘他为高参。卫军英的博客常有描写老杭大的博文，比如《为在天国的母校校庆日写几句话》等等。

放马杀去，便是那民风淳厚、小桥流水的留下镇。留下正在迈入现代城市的进程之中，据悉，留下将要建设杭州市最大的收藏品市场。

文物宝藏、古玩字画，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化遗存，且留下！

闲话杭大子女

1958年杭州市政府成立杭州大学，1998年杭州大学并入新浙江大学，共计40年时间。57年那会儿，政府在西溪湿地东的松木场附近，建起了浙师院校园，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在校园南面，越过沿山河建起教师宿舍。我家从体育场路262号原浙江师范学院教师宿舍搬了过来。

杭州大学应该以之江大学为它的源头。之江大学是美国传教士所建，最早是在宁波办学，搬到杭州后更名为之江文理学院，再改为之江大学。解放后，我国有一次高校院系调整的举措，是按苏联模式办学。将之江大学的理科并入浙江大学，文科并入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不久杭州大学成立，浙江师范学院也归入杭州大学。

杭大初创时期教师宿舍只有道古桥宿舍，就是沿山河南面的那个宿舍，以后叫河南宿舍，再叫作杭大新村。再后来，将西溪河东的省委党校宿舍也并入杭大教师宿舍之列，以后叫河东宿舍，再叫文三新村。再后来，又建立了庆丰村宿舍。就我所知，杭大还有体育场路宿舍和其它一些零星的宿舍，如文三街的马腾路宿舍、灵隐的中天竺宿舍等等。

我基本上是住在道古桥宿舍的，期间有3年到黑龙江插队落户，7年时间在河东宿舍。

杭大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是杭州大学的辉煌还留在我记忆之中。那时候道古桥宿舍大师云集，斐声国内外。每当夜幕降临，大师们在静谧的宿舍里青灯苦读，让我们这些在外面玩耍的孩子们感到很是惊奇，会不自觉的站在窗台下偷望。

话说名师出高徒，道古桥宿舍的孩子们也有秉承父母天资的佼佼者。

1993年我参加挚友蒋绍心父亲葬礼。绍心父亲蒋祖怡乃杭大中文系教授，追悼会大厅写有“一门七杰”之挽联。初时纳闷，细想也是。蒋家一门传承国学，代有人才。绍心祖父是当代名士蒋伯潜，解放后任浙江省首届人民代表、古籍部主任，专心研究国学，著有《经与经学》《十三经概论》《经学纂要》《诸子通考》《诸子学纂要》《中国国文教学法》《校讎目录学》《字与词》《章与句》《体裁与风格》《诗与词》《散文与骈文》等，与郁达夫、蒋百里、陈布雷等交好。父亲蒋祖怡为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专家。

蒋家子女个个了得，大哥蒋绍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汉语专家；大姐蒋绍惠，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小姐蒋绍恣，杭州电力设计院院长；小哥蒋绍忠，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总经济师；绍心乃高级工程师，浙江大学直线电机研究所研究员。

国学大师姜亮夫，独生女姜昆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姜先生一生著作宏富。姜昆武女士为完成父亲未尽之事业，组织编辑姜氏浩瀚无当的全著，勇往直前，心力憔悴。

历史系教授黎子耀先生长子黎体瓔，为浙江医科大学教授，肿瘤学专家。黎体瓔是原医科大学校长郑树的得意门生，救治过无数病人。对杭大老人的病痛也关怀备至，是个热心肠的仁医。

心理学专家王承绪之子王重鸣，以未获大学学历，而考入我国心理学奠基人陈立教授门下。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前常务

副院长，浙江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主任，人力资源与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企业管理和工业心理学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企业管理博士生导师。

汉语史专家任铭善之子任平，博士生导师，著名书法家。

除这些赫赫有名的杭大子女外，更多的是默默无名者。

由于一系列政治运动，也给杭大子女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最先接受痛苦的是那些父母被带上右派帽子的子女。他们会受到人们异样的眼光看待，小伙伴也会喊他们叫“右派儿子”。任铭善先生的女儿任珠，品学兼优，却被拒在大学门外。后经她舅舅（老革命干部）的努力才进入南京炼油厂工作。以后自强不息，取得大学文凭，在杭州炼油厂担任教育培训工作。

文革开始后，杭大子女大多数遭劫。有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有的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也有的父亲打成了历史反革命或者现行反革命，右派这个话题也被摆到桌面上。在那段日子里，这些年岁不大的孩子心里所受的煎熬是非常沉重的。有些人的父母被关进了牛棚，有些被游街示威，有些家庭被抄家，更有少数父母承受不了痛苦自杀身亡。作为“黑五类”的子女也在运动中受到冲击、批斗，甚至毒打。我本人就被附中的同班同学用皮带抽打。还有人被逼站在杭大教学大楼示众。有原之江大学教务长陈世振的儿子陈贤达兄弟，被一帮省委干部子弟在保石山上追打，头破血流。

1969年，在毛泽东上山下乡号召下，杭大子女大都被派遣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我一起到黑龙江富锦县二龙山公社东风阳大队插队的杭大子女有：盛逊（我姐姐）、王瑜、孙连、王亦新、洪佩英、沈乐乐、胡大萌、王招官。另有在其

它公社或大队插队的如：黎体凡、王岳洛、胡缜、王心田、周立、徐明、王念生、何健健、李寅等。到浙江农村插队的有任平、黄荔生等等。几乎所有的杭大子女都因父母的身份被迫下放到农村，以上举的只是一小部分。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对杭大子女都带来无限的痛苦。好在文革终于结束，国家迎来了重生的机会。杭大子女得以重振信心，踏上新长征的征途。但是经历过种种痛苦以后，能童心不泯者并非多数，除少数一些杭大子女取得不斐成绩外，大多数都默默无闻地工作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适遇社会变革，失业下岗者也有。也有些杭大子女，由于种种原因离我们而去，留下的只是亲人的悲痛和同辈的思念。

随着四校合并，杭州大学消失在历史中，杭大子女这个群体终究也会随之而消失。万一有杭大子女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如果没有提到你的姓名，或者没有叙述到你的事迹，请不要介怀。这只是杭大子女的一个缩影，某一段小小的历史，一篇小小的随笔。

渐行渐远的杭大子女，
不论你在人间或者天堂，
不论你是否辉煌、充实、平庸、潦倒，
只要你比我过得好！

闲话杭大情结

“杭大”是杭州大学的简称，从1958年杭州市政府决定创立杭州大学至1998年新浙江大学成立，杭州大学并入新浙大为止，前后经历了40年。

40年对一所大学无论如何都不算长久，但是杭州大学的历史追溯起来也很久远，前身为1897年建立的求是书院和1845年建立的育英书院。1952年中国高校经历了“院系调整”的阶段，院系调整是按照苏联模式办学，其孰是孰非留待历史评判。杭州一些高校如浙江大学、私立之江大学的文科并入新建的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师范学院在原之江大学的校址秦望山建校。1958年成立杭州大学时，浙江师范学院也并入了杭州大学。

杭州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在建校的40年中，为浙江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浙江省的经济文化发展。1997年4月15日，值此杭州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历时两天的杭州大学“211工程”立项论证会圆满结束。根据杭州大学“211工程”整体建设规划，“九五”期间建设项目包括重点学科建设、教学科研基础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三大类。其中学科建设是“211工程”建设的重点，该校工业心理学、数学、有机化学、中国古代语言文学、中国古代史、教育学、计算机应用、生物工程学、城乡规划与海洋工程、经济与工商管理等十大学科将被列入“211工程”重点立项项目，作为杭州大学“九五”期间学科建设重点。

然而，这一重大的学科建设未曾实施，杭州大学就在1998

年并入了新浙江大学。对于新浙江大学的这一合并工程，是否是一个行政命令，连当时的浙大校长潘云鹤也含糊其辞，说是一些教授的意愿。现任的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水，时任浙江省副省长当时也说，“浙大若不合并，四校也能发展得很好”。

杭州大学虽然只有短短的 40 年时间，但其历史渊源却非常的久远。除上面说的浙江师范学院，还可以追溯到浙江大学、之江大学。杭州大学百年校庆就是把之江大学作为学校历史的源头之一的。然而就之江大学的历史而言，我在网上查阅到之江大学的历史远不止 115 年（以杭州大学百年校庆的时间计算）。

之江大学的历史在百度上是这样说的：

“之江大学的前身是宁波崇信义塾（Boys Boarding School），是 1845 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清道光二十五年）麦卡第（MC Carte M D）等人创办的，当时崇信义塾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程度。1867 年（同治六年）崇信义塾从宁波迁到杭州，先在皮市巷，后在大塔儿巷，改名为育英义塾（Presbyterian Boy 'S School），分正、预两科，各 4 年，1880 年由美国传教士裘德生（Rev Junius Judson）任校长，以英文课为主、中文为次之，规定圣经为必修课，学生必须做礼拜，课程有中国经学、教义问答、圣经见证、哲学、算术代数、几何、历史、地理、化学、作文、辩论、音乐。1887 年秋天，育英义塾举行第一次毕业典礼，1880 年开始注重理科、搞科学实验，举办通俗科学知识讲演，传授西洋科学知识。1897 年，正式称育英义塾为“育英书院”（Hangchow Presbyterian College）。从 1890 年起增设英文科为学生深造作准备，学生人数增加到

近百人。由于原来校舍狭小，从1907年起，在杭州秦望山麓二龙头修理建新校舍，经过3年规划经营，主要建筑如教学大楼、宿舍、图书馆、实验室先后落成，该处三面环山，面临钱塘江，又当六和塔西侧，地势开阔，江山如画，学校占地面积300余亩。从1910年起南北长老会合作共组校董会，其中有叔美容（J E Shoemaker）、艾斯北（J M Espey）等代表北长老会；司徒雷登（J Leighton Stuart）、布林恩（J、M Espey）等代表南长老会。1911年2月正式迁入新校舍，因地处钱塘江湾曲处，成“之”字形故取名之江学堂。1914年因办之江大学计划实现有改名为之江大学（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由美国传教士王令赓为校长（E L Mattox），学生增加140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到校讲话，他非常感激传教士在他们所创办的学校里所做的工作，并同师生合影留念。1912年一座天文台建在山颠完工，也称作为‘费城观象台’。”这样看来，之江大学的历史应该追溯到166年前的之江大学前身宁波崇信义塾（Boys Boarding School）。不知道当时杭州大学的领导是怎么算的？

当然就杭州大学来说，也不应该只看到之江大学的历史而抹杀了浙江大学也曾经是杭大的源头之一。即便是解放前，之江大学也有许多教授同时任浙江大学的教授，如夏承焘先生、任铭善先生等。杭州大学成立后，也有许多教授是老浙大在院系调整中转到杭大来的，如陆维钊先生、蒋祖怡先生等。杭州大学一些著名教授如徐步奎先生、徐规先生则是浙大的毕业生。

杭州张程鹏先生曾作文说：

杭州之江大学是我省最早建立的高等学府之一，前身最早

为 1845 年（清道光二十五年）设在宁波的崇信义塾，1867 年迁入杭州，称育英义塾，后改为育英书院，校址在城内皮市巷与大塔儿巷相交之处（现仍留有“美国北长老会”墙界碑），1911 年迁于月轮山六和塔西，风景秀丽的秦望山麓，面对钱塘江，取名为“之江学堂”，1914 年正式改名为‘之江大学’（由于学校位于钱塘江畔，钱塘江呈‘之’字形，故取名为之江大学）。

之江大学曾聘有很多享誉海内外的教授，如我国早期的机械工程留美博士廖慰慈、白郁筠、李思良；铁道工程博士应尚才；古代文学及词专家夏承焘，古典文学专家王季思，古代文学及先秦文学专家王驾吾、胡士莹，经济学家胡继瑗、王公维，古典文学家、我国著名的书法家陆维钊（后调入浙江美院）。学生中有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林汉达，《莎士比亚全集》的首译者朱生豪，敦煌学研究专家蒋礼鸿，台湾著名女作家琦君（潘希珍）等，此外还有不少国内外知名学者如金仲华、马叙伦、陈植、郁达夫、李笠、刘平候、顾思辑等。之江大学的教育模式也为现今高校教育所借鉴。

这里说的“为现今高校教育所借鉴”也指浙江大学，在浙大成立之际，也借鉴了之江大学的办学经验。所以我认为要客观的评价历史，原浙江大学个别人总是以“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视人，而杭州大学等合并进去的大学好象都是后娘养的，这样不好。

我也算半个杭大人。因为我父母蒋礼鸿、盛静霞都是之江大学的教师，我父亲还是之江毕业的。我在 1957 年随父母搬到杭州大学的道古桥宿舍，以后又在杭州大学完成了基础数学

和计算机应用两个专业的学习。虽然都是成人教育，但那时在1983年我读的基础数学专业还是公费生，就是由国家包学费的，应该说和在校生没有多大的区别。

自然我也少不了杭大情结。

一个学生怀有“母校情结”，是对自己在母校获取知识的一种感激之情，也称之为“感恩”。是对这所学校、学校的教师对我们获得知识而付出劳动的“感恩”。老杭大人的这种感恩之情在网络上屡有表现。本来“母校情结”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怀疑的，但是也有另类。

早几年有浙江省的政协委员提出要将“杭州大学”冠名于“杭州师范大学”，理由是“杭州大学”是金名片，弃之不用太可惜了，于是引起一片争议。一些老杭大人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杭州师范大学与杭州大学没有什么历史渊源，认为如此一来，老杭大人没有了自己精神寄托，等等等等。

我的观点是，杭州师范大学的发展成长靠的是自身的努力，之于用不用“杭州大学”的名片是无所谓的。象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名校，也没有因为不是“北京大学”而处于末流。这种争论最终也没有结果，看来理智之人不在少数。

重要的是如何保持杭州大学的优势，在新浙江大学的发展历程中，继承和发扬杭州大学，尤其是杭大文科的优势才是根本。网上有许多议论，说浙江大学的很多学科带头人都打点行装离开浙大，就我所熟悉的有廖可斌、包伟民等人已经离开浙大。也有浙大的领导说把这些人像“神”一样供奉起来，他们对浙大还这样那样的不满意。我觉得这种说法本身就很小儿科的，他们难道愿意只做“神”而不做学问，如果浙大供养了一

大批“神”而不是杰出的学者、科学家，浙大干脆变为神学院得了。

新浙大成立之初，聘请了著名作家金庸先生任人文学院院长。但谁都知道，金庸是作家而非教育家，聘请他的目的只是“拉虎皮作大旗”增加浙大的“知名度”。但是这个知名度不是体现在学术上，而多多少少是体现在娱乐界的。金庸先生断不能象著名学者蔡培源、陈寅恪、季羨林这样的大师，担纲起振兴浙大文科之责。最终金庸先生也请辞人文学院院长之职而避免落下话柄。

去年（2010年）浙大召开了文科大会，吹响了文科振兴的号角，我殷切希望第五代学者能担纲起振兴文科的重任。这也许是我杭大情结最好的诠释。

岳母如娘

岳母陈丽清享年 94 岁，是在我母亲盛静霞去世后一天（2006 年 4 月 17 日）中风的，至 2007 年 4 月 2 日去世。

岳母曾经也是大户人家的三小姐，长得端庄美丽。年轻时她享的福我不太清楚，只听内人敏琮表哥陈海瑞说，岳母家以前的金条是可以麻袋装的。

原先岳母住在杭州隆兴路的私宅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解放后交通改造，院子被拆除，搬到皇亲巷的一个单间。

岳母家有姐妹三位和一位哥哥，所以敏琮的表哥表姐特多，有大姨妈的孩子李松阳表哥、二姨妈的孩子陈月华表姐，舅舅的孩子陈海岗表哥、陈海桥表姐、陈海瑞表哥、陈军表姐、陈海玲表姐、陈伟表哥、陈坚表姐、陈海英表妹。

解放后舅舅家因为孩子多，生活过得很艰难，有时候到了吃不上饭的时候，他们就会结伴到我岳母家吃饭。以后陈海玲表姐的公公婆婆、小叔子牛儿等也三天两头去岳母家吃饭。

二姨妈过世早，岳母将表姐陈月华接到杭州抚养，结婚时我岳母给她置办嫁妆。有一次表哥李松阳在银行工作时少了钱，他诚恐诚惶，岳母为他补上了钱款，使他保住在银行的工作。

岳父因为在抗战时参加中美战地服务团，被下放到农村，家里的开销全由岳母承担。岳母手里的银子也慢慢的花完了，再加上文革时把一些值钱的戒子等扔到了井里，更是一如贫洗。

为了生存，岳母解放后上中专学习会计，在杭州市饮食服务公司工作。文革中她所在的下城区饮食店我还去吃过面，不知道是不是岳母给我开的票？

敏琨兄妹在岳母的辛勤劳作下过得还算殷实。

岳母其实是维系陈家的纽带，虽然她不善言谈，但是心地善良，陈家的晚辈都非常的尊重她，喊她“亲亲娘”。每到过年过节总要带上儿女、礼物前去看望她，她就要给孙辈们发红包。至今陈家的晚辈还在来往，就是得益于她的善良。

和岳母相处 30 年，觉得有必要整理一下思绪，为我这一位平凡的岳母写一点什么。

首先，我觉得岳母是一位荣辱不惊的长者。在我的思想中，总是认为我自己出生在一个既不富裕又不贫穷的家庭，诸事想得开。所以认为如果生活过于贫穷会造成贪婪，生活过于富裕会造成心理反差。但是岳母不是这样的人，她从一位一掷千金的小姐，到以后的贫困她都能坦然处之，丝毫看不出沮丧。在她身上体现了一种难得的“和谐”。她处事不惊的态度使我们晚辈深受启发，不论怎样我们都会乐观向上的生活。

她用善良维系着陈家这一大家庭。现代人由于生活所累，多了一份压力，少了一份亲情，即使是兄弟姐妹也为钱勾心斗角。陈家的晚辈多数是普通的老百姓，但是岳母同样是那么的关心他们，使他们在父母去世后还能在她身上感受到长辈的爱护。他们有什么不愉快的事都愿意向我岳母倾诉，她总是在精神上给予支持。

岳母的脾气极好，对于我岳父这样一位坏脾气的人，她也能和他共同相处几十年，使我的内人敏琨能有一个健康的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敏琨在我家侍候公婆，在单位认真工作，与母亲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我父亲生病十几年，敏琨就像对自己的父亲一样侍候他，我母亲病重时敏琨请事假跑医院。岳母

曾经对人说过：“只有孝敬公婆，才能孝顺父母。”

不论是邻居、单位同事都说岳母脾气好，别人有困难她无论如何也要帮助，哪怕借钱也在所不惜。

我觉得唱高调是没有用的。什么“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只是一种姿态。真正能够像岳母那样生活，才能在潜移默化中创造和谐的社会。

岳母如娘！

老有所乐

前天是传统的小年夜，也就是腊月二九，一早内人郭敏琍到医院去照看中风的母亲了。楼上徐规先生的女儿楚加在门外说：

“新年快乐！”

我苦笑。

“过年吃什么？”

我说：“吃屎！”

她大吃一惊。

缘何“吃屎”？听我慢慢道来。

小年夜前一天，晚七点。敏琍的表姐陈坚打电话来，说敏琍的父亲郭光懋倒在阳台上了，丈人 85 岁，平时身体不错。我们立马打的赶过去。

丈人郭光懋和儿子住在一起。由于种种原因，关系紧张。丈人和敏琍的哥哥早就不在一起吃饭了。前年丈母娘中风住院，亲戚朋友就张罗着使他们（丈人丈母和哥哥嫂子）一同在一起吃饭，有关的经济开支也和哥哥嫂子谈了，他们虽然不情愿，在亲戚朋友的一再做工作下也默认了。但是丈人坚决不同意，使得本来家庭矛盾有望缓而失去了一次机会。

我们赶到后，丈人已经由表姐陈坚扶进屋子。他由于想在阳台上用痰盂小便不慎摔倒，扶阳台上的自行车、电扇反被车子压住，在阳台上光着下身躺了 4 个小时。

扶到床上后，他老人家又尿湿了裤子，满床都是尿。我赶紧给他换衣服、裤子，擦屁股，衣服带回家洗。

由于哥哥嫂子第二天要到上海女儿家，第二天我们把他老人家接到我家。

到家以后，敏琮将新的棉被、床单取出来给他老人家安排好。他说要拉屎，说是已经几天大便不畅了，可是拉了半天他说没有拉下多少。我找来“开塞露”帮他打到肛门里，并叮嘱他忍一忍，可是不久他还说拉不下来，我又试了一颗“开塞露”还是不行。

晚饭让他吃，他说我家的饭硬，要吃面包，我儿子跑去买面包，他又说不是这种。

没办法我又找来“苳蓉通便”剂让他吃了一小瓶。晚上睡下后，他来劲了，两小时一次上厕所，也不知道拉没拉下来。他起来我也得起来，刚睡下，朦朦胧胧他又起来了。半夜里看他还是拉不下来，我又给他吃了一小瓶“苳蓉通便”剂，一夜无眠。

第二天，年三十。早上让他吃饭，又说我家饭硬，硬是要他吃了一些。

敏琮到医院看母亲去了。

十点左右，看到他屋里灯亮起，开门只闻到一阵屎臭！一看他把屎拉在裤子里了，“苳蓉通便”剂威力可见一斑，裤子上、地上满是屎。

我只能让他光着屁股站着，先把裤子扔到盆里，再打热水将他的宝贝屁屁擦个干净。服侍他睡下后，把满地的大便擦干净。

此时正好是徐楚加问：“过年吃什么？”，我便没好气说：“吃屎！”

费了半天的劲，把臭哄哄的拖把洗干净挂出去，再回来对付裤子和毛巾。我把裤子和毛巾反复用清水冲洗，大便的水才一次比一次清爽。以后再用热水烫、用洗衣机甩干挂出去。

一身臭气、满头大汗，大粪战场清理完毕，完全符合 ISO9001:2000 标准和 14000 环境认证标准。回过头来打电话向敏珺如实禀报。

丈人光着屁股睡下，我留了个心眼再不让他穿裤子，用纸尿片将他的宝贝屁屁包起来，叮嘱他说来了大便千万不要动，喊我就行。心中暗想这回大便怎耐我何？

天可怜见！打开电脑看了一会新闻，博客还没打开，丈人又喊了。

赶紧过去，本以为有了纸尿裤没事，掀开被子一看，尿不湿，尿满床，真个是“满城尽带黄金甲”。

赶紧将镜头倒退到十点，擦屁，洗被。快进！还没到点，敏珺回来了！

丈人郭光懋脾气和屎一样臭，什么事都要和小辈倒着来。以前过年请他吃饭，好好一句“坐下来吃”，他就非要站着吃。

早上叫他吃饭，我煮了稀饭，煎了水饺，想他这几天没怎么好好吃，再说拉屎也拉完了，肚皮也空了，他硬是不肯多吃，中午更是不起来吃饭了。

其实我也知道他这明为拌嘴，实为谦让。但是事情到了过分的份上就应了“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的老话，虽然不太贴切，意思就是那个意思。还有一个老年人的通病，他们似乎在“自我道德完成”却使小辈无所从适。更有一个通病就是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老年人应该受到关怀的道理是至高无上的，现在媒体都在唱一个调：“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但是也不能完全由着他们的性子。更有甚者将年轻人疑似不孝子孙，他们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承受了太多的压力，还要照顾老人，并非只是唠唠家常，还要拉屎擦尿，容易吗？

到丈母医院，每次坐公交时看到车上大部分是老年人，免费坐车。跌跌撞撞，为了赶到东赶到西买便宜货，万一出了车祸谁负责？政府？儿女？

内人的幸福生活

杭州市金色年华老年公寓外牆上有句口号，叫作“幸福生活从退休开始”。经常有人会问我，内人退休以后，是怎样生活的？

内人郭敏琍是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的多媒体教室管理员，退休时间应该在 2006 年暑假。

可是内人没有等到退休那一刻。2006 年 3 月份，我母亲身体日见不好，而我又不容易请假，所以内人请了假赶到敬老院陪母亲体检。检查结果很不理想，就将母亲送到杭州市中医院。医生告诉我们，母亲的病情熬不到一个半月了，于是内人请示了领导，就留在医院照顾妈妈。

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内人每天早上烧好可口的饭菜，送到医院里。那饭菜是有五个人吃的：母亲、我、内人、我姐姐还有护理员魏化琴。我是抽中午时间去医院看望妈妈，姐姐从哈尔滨回来侍候妈妈的。妈妈吃的饭菜要尽量可口，好在内人有一手好厨艺，总能满足妈妈的口味。内人烧菜送菜到医院，就拿凳子坐在妈妈身边，她知道这个时候病人最希望看到自己的亲人待在身边。

2006 年 4 月 16 日早上，妈妈慈祥地离开了我们。内人本打算妈妈的后事办完后再去上班，坚持到退休的那天。谁知第二天她的哥哥打来电话，她自己的母亲也中风了，已经送到医院，恰好也是杭州市中医院。

内人忍住刚刚失去婆婆的悲痛，坚持办完我母亲的后事，又赶赴医院照料自己的妈妈。我岳母的病情也很严重，她已经

不能说话，也表现出不配合治疗的态度，不吃一口东西。旁人怎么喂她都不张嘴，于是我出马喂岳母吃饭，在我的耐心侍候下，岳母终于开口吃饭了。由于岳母已经 90 岁了，很难治愈。我们联系了浙江老年关怀医院，将岳母送到那里。

岳母虽然愿意开口吃饭，但中风后的病情只能吃流汁。内人就每天烧好肉质的流质送到医院。风风雨雨一来一去就是两年，直到岳母 2008 年 4 月 2 日去世。期间我看内人太辛苦，休息天的时候就替内人去送流质，但是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她在忙碌。

母亲中风期间，内人还有她父亲和哥哥一起生活，由于一些私人原因，哥哥也不太照顾老人。所以她一头挑着母亲，一头还要顾着父亲。

最要命的是 2007 年除夕前夜，老父亲在阳台上跌倒了。他居然碍于面子，不叫哥哥前来帮忙，到晚上内人的表姐去他家，才发现老人躺在阳台冰冷的水泥地上好几个小时了。经此折腾，老人的小便出了问题，送到医院后插了导尿管回到家里。老人的导尿管差不多一个月要换一次，医生嘱咐他要多喝水冲洗导尿管，老人就是不乐意喝水。最后导尿管更换的时间越来越短，医生说实在不行就在腹部做引流，接了管子导尿。

岳母过世了，岳父在家一个人瞎摸，终于出了大事。前年 11 月份，老人的腿骨又摔断了。医生说要动手术，同时也说明手术的风险很大，毕竟是 86 岁的年纪了。内人对医生表示理解，并说如果出现意外，不要进行痛苦的抢救，让老人安然而去。由于我们经历的事情太多，手术签字也不知道经过多少次了，并没有担心真的会出意外。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单单发生

了，进手术室两个小时的时间，医生跑出来，说麻醉后老人心跳停止了，呼吸停止了，血压没有了，正在进行抢救。一会儿老人被推出手术室，嘴里插着呼吸器送到 ICU 室。当天我们咨询了许多医生，他们说 80 多岁的老人插了呼吸器肯定是没救了，不如让他过去，也好减少痛苦。内人晚上整整痛哭了一夜，和我商量就不如让老人走去。于是我联系“好乐天礼仪公司”准备将老人送到那里，公司陈慧萍主任由于我母亲在她那里办的遗体捐献仪式，和我们关系挺好，同意了我们的想法，准备一早派车将老人接到她那里。早上接到 ICU 室的电话，内人以为老人不行了，紧张得要命。谁知接了电话却说老人要吃早点，内人忙问呼吸器还在吗？医生说已经取下了。也不知道老人硬是要折腾我们，还是命不该绝？

鬼门关上走了一趟的老人，手术自然是做不了，医生说他们不再负责，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好在岳母曾经在浙江老年医院住过，我们人头也熟，所以把老人送进那个他说是“等死”的医院。

一年多过去了，内人重复着岳母住院的经历，奔波在去医院的路上照应父亲。唉，天可怜见！

当然，辛苦归辛苦，快乐还是有的，这就叫“苦并快乐着”！

敏琨在杭州大学，以后的浙江大学工作多年，理应获得分配住房的权利，那时父母都考虑大局，劝她不要去分房子。以后挨过父母去世，儿子也大了，需要房子成家立业。2009 年夏天，物价随着金融风暴有所下降，于是我们打算把房子装修装修。那段时间我失业在家，于是夫妇俩一起忙碌装修。以后我找到新的工作后，装修的事就只有内人一个人关心了。

其实我们请的装修工人都挺好的，督不督工都无所谓。但内人注定是个劳碌命，她总要到现场，哪怕是出出主意也是好的。那时正是盛夏，杭州的天气又酷热，她从杭大新村赶到紫金港，中间要走 20 多分的路，人都快烤焦了。中午的时候在食堂吃个快餐，蹲在地下车库里凉快凉快，下午又得赶回家做饭。我有时候在想，女人的活力为什么比男人还强？

3 个月的劳碌换来一套漂亮的住房，那是北欧风格。我们和儿子都这样想，房子只要干净整洁便好，奢侈不是我们所要的。

我早上 7 点上班，内人这时候也起来了。一天的劳作大致上是这样子的：早上先打扫房间，那地是一定要跪在上面擦的，桌面、凳子和橱子也是要擦干净的。把衣服晒出去，然后去菜场买菜。上午要不就去医院送可口的菜给她老父亲，要不就去紫金港查查卫生。下午常常去一位同事家，帮她照看照看老父亲，聊聊天什么的。中午由于只就我们俩人，饭菜都比较简单，晚上做一顿丰盛的晚宴，吃完饭一般与我一起出去散散步。有时候也在大门口与邻居聊天。

一天辛苦下来，晚上洗个热水澡，那洗澡的习惯可是几十年沿续下来的，一年 365 天，天天不落下来的。一切打理完毕后，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看看电视啦。她最喜欢看的是“找对象”的花头，什么“灰尘（非诚）勿扰”、“爱情连连看”。一边看一边叫：“老公，痛！”，也难怪，一天劳作下来，哪有这不痛那痛那的？

内人在高等学府工作，穿衣总是要鲜光水亮的，她说这是一种对人的尊重，要对得起老师和学生。但我也常常笑她“董

进不出道”，杭州话的意思是虽然漂亮，但不时髦，那鞋跟总是一尘不染的。

内人为人也风趣，常常会冒出来一起彩色语言，语不惊人誓不休。诸如：

唐伯虎古画（老底子的话）。

狗屎干糖拌拌（炒米粉）。

烟头热气不分！

豆芽菜长得比亭柱粗（嫩着呢）！

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也要退休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内人一直以来有个心愿，要到敦煌去一次。她常常问我：“樊锦诗（浙江杭州市人，1938年7月出生于北平。现任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退休了吗？”她公公蒋礼鸿是敦煌学大师，她要到那里去朝拜朝拜。届时我一定会陪她到大漠欣赏莫高窟、月牙泉的风光，寻找父亲的影子。

人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

一直想写一篇关于陈从周教授的文章。陈从周（1918~2000），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古园林专家。

陈从周先生生前在同济大学建筑系任教近50年，毕生致力于保护和弘扬中国古建筑尤其是园林建筑文化，成果瞩目，著作等身。著有《说园》《苏州园林》《扬州园林》《中国民居》《绍兴石桥》《岱庙建筑》《园林谈丛》《装修图集》《上海近代建筑史稿》等学术专著，其中《说园》最为精辟，“谈景言情、论虚说实、文笔清丽”，影响力之大，远及日、俄、英、美、法、意、西班牙等地。

陈从周先生不仅对于古建筑、古园林理论有着深入的研究、独到的见解，还参与了大量实际工程的设计建造，如设计修复了豫园东部、龙华塔、宁波天一阁、如皋水绘园，设计建造了云南楠园等大量园林建筑，并把苏州网师园以“明轩”的形式移建到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成为将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世界之现代第一人。

陈从周先生还是一位知名的散文作家和画家，是张大千先生的入室弟子。1948年，他30岁时，在上海开办个人画展，以“一丝柳，一寸柔情”，蜚声上海画坛。随后出版《陈从周画集》，张大千慨然为之题签。中年以后，所绘兰、竹，评家称为“意多于笔，趣多于法，自出机杼，脱尽前人窠臼”。1978年冬，他应邀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设计“明轩”，贝聿铭雅嘱他写就长卷水墨丹青《名园青霄图卷》，复请国内文化耆宿、书法名家题咏，现存纽约贝氏园，成为一件极为珍贵的书

画名品。作为散文作家，出版过《书带集》《春苔集》《帘青集》《随宜集》《世缘集》，以及40余万字的《梓室余墨》等散文作品。

杭州有两处著名的园林，一座是西泠印社，一座是郭庄。西泠印社得益于吴昌石等人建立的社团“西泠印社”。早年是文人雅士聚集之地，现在更是杭州的一张金名片，印社副社长陈振濂说，加入了西泠印社，就踏入了上流会社云云。

西泠印社建立在杭州的孤山上，是观望西湖最好的去处，许多西湖全景照片都是在那里拍摄的。内有多处明清古建筑遗址，园林精雅，景致幽绝，人文景观荟萃，摩崖题刻随处可见，有“湖山最胜”之称。

早年父亲蒋礼鸿经常带我到西泠印社去，他喜欢那里的氛围。久而久之与那边的小店营业员也颇为熟悉起来，父亲经常给我买一角两角的印石，回来学习篆刻。

郭庄，原名“端友别墅”，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原来印象中郭庄只是一座破旧的建筑，居住着不知何许人的老宿舍。1989年经过重新修整，使其园林的面目才显现出来，恢复了本来面目。郭庄的特色是园内有水景，园外有西湖，大气精致浑然一体，在中国园林中是不可多见的佳品。

全国各地都有受陈先生保护的古建筑和古园林，陈先生参与了杭州许多古建筑、古园林的恢复和修善，西泠印社和郭庄无异是最重要的两座。陈从周与人谈起，他为拯救西湖的两处名胜出了力。确实如此，西泠印社和郭庄的保护和修复仰仗了他的大力。

陈先生是地道的杭州人，幼时曾住过杭州市上城区华藏寺

巷。这一带的旧房都已经改建成崭新的住宅小区时。他眯起眼深思起来，似乎记起当年仰望华藏寺巷口陈宅的情景。这在他所写的诗歌中有所反映：“故园杨柳又如丝，重过东城步转迟。我有幽怀忘不得，华藏巷口立多时。”

陈先生十几岁时住在何处呢？这在他所写的散文《故居》中是这样提到的：“父亲自立后，在杭州城北青莎镇散花滩建造了房子……散花滩又名仓基上，四面环水，有三座桥通市上，三洞的华光桥，一洞的黑桥，还有一座叫宝庆桥。”杭州人民为了纪念他，在此地建起了青莎公园。

青莎公园坐落在杭州大关桥西，我经常要从这里路过，可只看到公园的牌楼和牌楼上“青莎公园”的题字，一般人很难看出青莎公园与陈先生的联系。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青莎镇所在地）也鲜见与陈先生关联。

陈从周与杭州不解的情缘，不应该在这些历史遗存中消失。如果小河直街与青莎公园能展示陈先生与杭州的情缘，则是杭州的大幸，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的大幸。

对于政府规划的不合理之处，他总是扮演仗义执言的角色，有时甚至像头愤怒的狮子，直到那些妄自尊大的瞎指挥者低头认错，改过自新。这种不愉快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一般情况下，他的暴烈情绪总能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但是，一次激烈的争吵让陈从周成了无辜的牺牲品——过度的激动导致老年中风，这种病痛一直伴随着陈从周的最后岁月。据说，当时的主政者竭力主张将徐家汇的一幢历史悠久的建筑拆除以保证地铁工程的顺利实施，陈从周认为开了这样的先例会对以后的古建筑保护造成极大的威胁，因而是不理智的。这位狂妄的主政者也

许听惯了漂亮话，显然没把它放在心上。这种没有教养的举止让陈从周难以忍受，他拍案而起，准备将这位地方官数落一番。但是不幸发生了，与会者注意到陈从周呼吸困难，面色蜡黄，神色黯然，摇摇欲坠，于是人们以最快的速度将其送往附近的医院。

中风的好处在于他可以躲避开许多无聊而又碍于情面的会议，但也给他的身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灾难性打击。陈从周在最后的岁月里仍然试图挣扎着移动他那双苍白、瘦削的手来写作关于他所热爱的诗词、昆曲、园林和亲友，这种美好的愿望终于在2000年3月16日凌晨划上了令人悲痛的句号。

呜呼！一代宗师驾鹤仙去，竟然令人如此悲恨！陈先生不但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守护者，也是著名的诗人，艺术家，更是一位鄙视权贵的伟大战士！自古中国有云：“文死谏，武死战”。而在现代社会中如陈先生者能有几人？

人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杭州不应该忘却陈从周。

之江才子朱生豪

朱生豪，一个逝去的名字。朱生豪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68年了，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朱生豪这个名字，但是大多数人必定知道英国剧作家、诗人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一生写了三十七部戏剧，其中《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等，已经被广大的中国读者所耳熟能详。

莎士比亚的剧作，作为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进入中国广大读者的心田，得益于一个人的功绩，他就是翻译家朱生豪。

朱生豪，1912年出生在嘉兴一个商人家庭。勤而好学，5岁入嘉兴开明初小就读。后入嘉兴县第一高级小学。毕业后经插班考试，升入嘉兴秀州中学初二年级，其中、英文成绩优异。高中时期开始写诗，并练习翻译。1929年中学毕业，保送杭州之江大学深造并享受奖学金待遇。

在之江大学，他主修中国文学系，选修英文辅系。对历代作家、中外诗人的名篇佳作广泛涉猎，而且臧否得失，独具卓见。大学二年级时参加“之江诗社”，他的才华深得教师和同学的称赞。“之江诗社”的社长，“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评价他说：“阅朱生豪唐诗人短论七则，多前人未发之论，爽利无比。聪明才力，在余师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其人今年才二十岁，渊默若处子，轻易不发一言。闻英文甚深，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不易之才也。”

朱生豪在大学期间接触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并对这位英国

剧作大师非常欣赏，也燃起了要将莎士比亚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强烈想法。

1933年7月，朱生豪大学毕业后到上海世界书局工作，任英文编辑。参与编撰《英汉求解，作文，文法，辨义四用辞典》。1935年与世界书局正式签订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合同。

朱生豪虽然是木讷之人，但是在翻译工作中他的勇气和毅力却是常人所不具备的。

1936年第一部译作《暴风雨》脱稿，8月写成《译者题记》。这一年将历年诗稿整理成册，共三集。到1937年7月先后译出《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十二夜》等喜剧。

朱生豪的翻译是在日寇侵略中国的非常时期进行的，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朱生豪逃出寓所，随身只带有牛津版莎氏全集和部分译稿。寓所被焚，世界书局被占为军营，已交付的全部译稿被焚。8月回嘉兴，继续译莎。11月嘉兴沦陷后避难乡下。1938年下半年重返世界书局，抓紧时间进行翻译。1941年12月日军占领上海，冲入“中美日报”馆，朱生豪混在排字工人中逃出，丢失再次收集的全部资料与译稿。

1942年5月朱生豪与之江才女宋清如结婚，6月与妻子去常熟岳母家居住，至年底补译出《暴风雨》等9部喜剧。然后再返嘉兴定居。他闭门不出，工具书仅两本字典，继续全心投入翻译，译出莎剧重要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哈姆莱特》等。同年秋健康日衰，但仍握笔不辍，在1943年中译出莎氏悲剧8种，杂剧10种。

1944年初朱生豪带病译出《约翰王》、《理查二世》、《理查四世》等4部莎士比亚历史剧，4月写完《译者自叙》，编《莎翁年谱》。其时他一直忍受着长期的病痛，体力日衰，在勉强支撑着译出《亨利五世》第一、二幕后，确诊为肺结核，卧床不起。他悲痛地说：“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命也要把它译完！”12月病情日益严重，终于在1944年12月26日抛下年轻的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儿子，含恨离开人间，年仅32岁。

朱生豪，一个逝去的灵魂，一个寂寞而充满激情的灵魂！当我们在欣赏莎士比亚名著时，我们永远不会忘却，在战火中用年轻的生命打开中国莎士比亚剧作之门的朱生豪。

风萧萧兮宜水寒，将军一去兮不复返

历史上总有一些曾经的著名人物，随着时间的流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与那些所谓的“歌星”、“明星”不同，那是一些创造或改变了历史的人。他们被人遗忘，但他们却“名垂青史”，在历史上留下一抹重彩。

杭州南山陵园“侨一区”，静静的安葬着一位鲜为人知的人物，他就是兵学泰斗，一代儒将蒋百里。蒋百里内人左梅在抗战胜利后，雇船将蒋百里的灵柩从广西宜山运到杭州凤凰山下南山陵园安葬。至此，杭州又接纳了一位人称“兵学怪才”的蒋百里。1984年蒋百里女婿杭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其妻著名音乐家蒋英（蒋百里的三女）将百里夫人骨灰送至杭州，将其与父亲合葬。

蒋百里的墓显得普通平实，不象时下那些显赫墓葬，用上好花岗岩砌成，保持着过去年代的质朴。山风吹拂着青松，寂静的天空传来一声鸟鸣，站在这样的墓葬前，你很难想像，那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

蒋百里（1882—1938）字方震，浙江海宁人。1899年考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学习军事，1906年赴德国研习军事。1903年在东京主编《浙江潮》。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中国最早的军事院校）。1938年5月起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此前一直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国民党高级军事顾问、陆军上将。蒋百里是把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其代表作《国防论》凝聚着他一生军事著作的精华。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1901~1980）评价蒋百里：“百里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军事学家，他的学生多是典兵大将，他的军事著作虽不算多，而片语只字都可作兵学经典……百里先生的淹博宏通，实是一位罕有的学者、儒将。”

蒋百里写过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文史学家曹聚仁（1900~1972）说蒋百里本人正像达·芬奇有多方面的光芒。“百里先生一生既为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也擅长文史研究，诗词都不错，字也写得很好，说话滔滔不绝、风趣横溢。”

1905年，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根据日本军部规定，士官榜首由天皇亲自赐刀。这项殊荣被一个中国人获得，成为日本陆军历史上的一段尴尬，军界耿耿于怀，以至从下一届起，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获得第二名的是蒋百里的密友蔡锷，后来成为著名的“护国将军”。

蒋百里认为自己在日本学的只是初级军事，而中国国防应当取法乎上，学习德国陆军，遂赴德国军队深造。他才华出色很快崭露头角，著名军事学家伯卢麦将军非常欣赏他，拍着他的肩膀说：“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将出现一位伟大的军事学家，这也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

蒋百里以他出类拔萃的军事才华，在抗战前20年就断言，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并拟就多种国防计划。“七七事变”后，他发表《抗战的基本观念》等文，驳斥“速胜论”和“速败论”，认定战争将相持下去，但中国必胜。收录其一生军事思想精华的《国防论》，于1937年出版，他在扉页上题辞：“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蒋百里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几年就正确预测了日军的行动路线，并且在中国第一个提出了持久战，依靠人多、地大、资源丰富的优势，与敌进行消耗战的构想。第一个提出了散武于民、军民结合，开展敌后游击战、正面战场两条路线与敌作战的方案。第一个把中国军队的建设放在世界的角度去思考，并创造了一系列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战略理论研究。

1938年8月蒋百里任代理陆军大学校校长，在抗日战争的危亡之际，蒋百里本想把自己的全部才智奉献给抗战事业，却因蒋介石的消极抵抗，得不到信任，郁郁寡欢，结劳成疾，病逝于广西宜山，时年56岁。蒋百里逝世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

民国时著名记者陶菊隐(1898~1989)曾说，他早在青少年时代就闻蒋百里盛名，“初以为他是个须髯如戟的伟丈夫，而见面之下，温文尔雅不类其人。”在陶菊隐眼中，步兵科毕业的蒋百里马术绝佳，骑马根本不用缰绳、马鞍和马鞭，只是上马时缺少一股子赳赳武夫的劲头，“他这个武学生，到头来还是脱不了书生本色的。”他的德国友人回忆，秋天橡树落叶中，有人席地而坐，朗诵歌德的作品，丰神俊朗如神仙中人，这人便是蒋百里。

蒋百里虽然给人以一种温文尔雅的印象，但他终究是位军人。他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在就职训话中发誓：“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

半年后，蒋百里向陆军部请求拨款未果。1913年6月18日清晨5时，他召集全校师生两千余人紧急训话。他身着军服、佩指挥刀，站在尚武堂石阶上沉痛地说：“我初到本校时，曾

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你们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随即掏出手枪，朝自己胸部开枪倒在血泊中。蒋百里以性命换取诺言，不但震惊了朝野，也让人看到了“仆之殉职，虽轻若鸿毛，而与军人之气节有关”的铁血将军的气概！

蒋百里中枪并命垂一线，在救治过程中，一位美丽的日本女护士佐藤屋子小姐在护理他的过程中，进入到蒋百里的心田。在佐藤小姐的遵遵诱导下，蒋百里放弃了轻生的念头，他对佐藤小姐说：“我听你的话，不再轻生了。可以后遇到生死关头，没有像你这样的姑娘在我身边提醒，谁来鼓励我的勇气呢？”一语双关，道出蒋百里的心迹，佐藤小姐也心领神会。

由于偏见，佐藤父母对他们的事情持反对态度。蒋百里遂赴日本面见佐藤父母求婚，佐藤父母看到蒋百里如此衷爱女儿，终于同意婚事。1914年秋蒋百里在塘沽码头迎娶新娘，在天津德国饭店与佐藤小姐结成百年之好。

婚后，蒋百里为夫人取了一个汉文名字“左梅”。他还在家乡浙江硖石东山西麓购地数亩植梅二百株，号曰“梅园”。左梅内人婚后不再说日语，五个女儿均不学日语。抗战云起，左梅内人说：“中日交战，是日本军阀侵略的过错！”1937年，蒋百里将自己的轿车捐给国家支援抗战，而左梅内人变卖首饰等，买来布匹、纱布，与女儿们一起，赶制军衣及绷带纱布，送往前线，救护伤病员。

蒋百里与左梅的婚姻成为抗日战争的一段佳话，1978年左梅内人病逝于北京，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为“蒋佐梅”，一个传统的中国名字。

1947年蒋百里的灵柩从广西起棺运至杭州，时隔9年开棺时竟然尸身不朽。生前至交竺可桢（前浙江大学校长1890～1974）大哭：“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一时众人泣不成声！

风萧萧兮宜水寒，将军一去兮不复返！

魂来怒捲江潮白

杭州西溪路东首，旧时称松木场，有一座书有“浩气长存”的纪念牌坊。牌坊已经快要被越来越多的房屋和熙熙攘攘的来往车辆所淹没。行人无意间望去，上面书有“浩气壮湖山魂来怒捲江潮白，英名缅袍泽劫后新滋墓草青”“华表接青霄一角湖山归战魂，墓门萋碧草十年汗马念前功”两副楹联。前一幅为时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民政厅厅长、全省保安司令的黄绍竑所题，后一幅为国民革命军 88 师长、蒋介石的侍卫长、时任浙江省保安处长的俞济时所题。

黄绍竑，字季宽，广西容县人，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生。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步兵科。1922 年任李宗仁自治军第二支队司令，同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1924 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黄绍竑曾两次主持浙政。1934 年 12 月，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民政厅厅长，全省保安司令。

黄绍竑是近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新桂系三雄之一，与李宗仁、白崇禧齐名。黄绍竑抗战时期在浙江，与周恩来多有交往。1939 年周恩来莅浙视察，对浙省报界发表“巡视观感”：“本人此次来浙，纯系访晤黄主席，途经淳安、桐庐、于潜、萧山、绍兴诸县，印象殊佳。此前察访后方，行踪所到，每嫌抗敌阵容散漫，民气奢糜，及履浙土，不由不令人心折。民众抗战情绪高张，攻势政治，有条不紊，各般情形均较邻省出色……”

新中国建立前夕，黄绍竑清醒认识到广大民众的愿望，对

蒋介石政权彻底失去信任。参加了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刘斐、李蒸等人为代表的和平谈判代表团，出席国共谈判。国共谈判破裂后，脱离国民党政权，辗转香港，最后回到祖国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绍竑历任政务院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文革”期间，遭受“四人帮”的迫害，两次服毒，一次割腕，于1967年8月31日自杀成功。粉碎“四人帮”后，他的冤案得到平反。1982年12月29日，民革中央在北京为他召开了追悼会。

黄绍竑一生，经历了我国近现代的政治风云，走过了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凤凰涅槃，重塑了他不凡的人生。

拥李为首 戎马一生

黄绍竑，广西容县黎村镇山咀村人，生于1885年。父玉梁，前清孝廉，后改习医学。清末废科举后，向族人倡议，持祖产办学，以课黄族少男少女。

黄绍竑7岁入学，聪明过人，每试名列前茅。13岁时，入广西陆军小学堂第四期学习军事。1911年11月7日，广西宣告独立，响应辛亥革命。黄随“学生军北伐敢死队”开到武汉参战。1912年，入武昌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学习，1914年结业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16年毕业后回广西百色，在马晓军的陆军模范营当连副。以后升为连长，模范营扩编为团时，黄任营长。李宗仁在玉林地区发展队伍之时，通过黄的

堂兄把黄绍竑拉了过来，但是，黄绍竑这个人一向志向高远，不愿意羁于闭塞，谋求梧州一带猎取新的富贵功名，事前，他和李宗仁打了招呼，李宗仁当时虽然自己时运艰难，还是给黄绍竑足够的地盘和军饷，然而他深知黄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慨然应允黄绍竑的主张，另外送给开拔费用，可是，黄绍竑拉走自己的队伍时还顺便带走了李宗仁前来接防的两个营，这让李部上下大为气愤，均表示要对黄动武，宗仁以大局为重，拒绝同室操戈，此事让黄绍竑倍加感激，就此奠定黄绍竑一生低首宗仁的基础。未几，黄绍竑以讨贼军 3000 人自报于宗仁的门下，集结属下，公推宗仁为首。李黄结盟就此开始。李宗仁经常说：“洪杨之失败，非曾左之功也，洪杨内讧自毁其事业也。”新桂系自起事以来就以此为戒，时时加以惕厉。中原大战之后，黄绍竑再度背离宗仁，以不损害新桂系团体利益为前提，宗仁也再度任其发展，而后无论是抗战还是大选，黄绍竑虽则不再是桂系的首脑，但是奔走呼号不减于他人，而一手促成白崇禧出掌兵权，为新桂系最后一逞，策划宗仁竞选，使得新桂系登上中国政坛的顶峰，黄绍竑功出第一。而黄绍竑同李济深计议，以白崇禧数十万广西子弟兵响应毛泽东的建议进而赢得新桂系在建国以后的特殊地位，如蒙采纳，新桂系当不让傅作义、董其武一席，惜乎，白崇禧短视而未果。文革初起，黄绍竑刚毅不弯、自杀殒命，宗仁闻之，不禁老泪纵横道：“季宽天分最高，天假以年，必能为国家民族作出更大贡献。以黄绍竑一生之于新桂系忽明忽暗而终不改其志的举动，益知宗仁之领袖群伦的才干之大、胸怀之宽。以此格物，焉有不胜？”

主持浙政 功绩卓著

黄绍竑曾三度主政浙江。前两次，他的任期总共不过一年多；“八一三”淞沪会战落幕，当日寇铁蹄横虐，京（南京）杭危在旦夕，黄绍竑又被蒋介石紧急点调浙江，这一次他干了整整八年。其间的作为，颇多可圈可点之处。

1934年12月，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民政厅厅长，全省保安司令。1932年1月28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淞沪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驻浙第八十八师赴沪支援，阵亡官佐士兵一千四百二十一名。浙江省国民政府为了表彰牺牲官兵，建了一座“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八师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牌坊”，这座牌坊坐落在杭州松木场，上有黄绍竑写于1935年的题词“浩气壮湖山魂来怒捲江潮白，英名缅甸泽劫后新滋墓草青”，充分表现了黄绍竑的抗日爱国立场。

黄绍竑入主浙江时，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逐步形成，华北的红军接受了改编并积极参与了忻口会战等战役，还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但在浙闽边境，闽浙边根据地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国共双方虽然停止了战斗，但部队依然对峙，随时都有发生摩擦的可能。黄绍竑顺应全民抗战的历史潮流，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晤。1938年3、4月间，借去武汉出席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之机，黄绍竑与周恩来进行会谈，回到永康方岩后又与中共代表黄昂等进行会谈。经过多次谈判磋商，最终达成四点协议：中共闽浙边区武装部队开赴苏皖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并确定赴皖路线；中共部队经过时，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团队不予为难，并给予补给上的方便；中共留在后方的家属不再从事政治活动，省政府保证其安全；准许中

共在丽水或温州设立办事处。至此，国民党正式承认中共在浙江的合法地位，在浙江境内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正式形成了浙江全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黄绍竑深信自己主持浙政以来，排难破阻，建武装、搞兵工，没有背悖“师事勾践”的初衷，是在恪尽抗战中每一个爱国者应尽的匹夫之责。他不能忘怀与周恩来的两度重逢——1938年年底，黄赴重庆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会下，他在神仙洞的李济深寓所，同周恩来不期而遇，在场的还有冯玉祥、李宗仁以及中共的秦邦宪、叶剑英等。黄略述浙事。冯玉祥快人快语：“这才算是抗战工作！”周恩来感叹说，“现在到处都发生摩擦（指国民党右翼势力蓄意与共产党闹冲突），只有季宽先生那里还没有发生摩擦”，并表示欲“到浙江看看”。1939年春，周恩来果真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莅浙视察。黄绍竑等陪同周恩来参观了铁工总厂的生产线，查看了工人宿舍和大食堂。临别前，周对浙省报界发表“巡视观感”：“本人此次来浙，纯系访晤黄主席，途经淳安、桐庐、于潜、萧山、绍兴诸县，印象殊佳。此前察访后方，行踪所到，每嫌抗敌阵容散漫，民气奢糜，及履浙土，不由不令人心折。民众抗战情绪紧张，攻势政治，有条不紊，各般情形均较邻省出色……”周恩来对黄绍竑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赞扬，进一步巩固了在浙江刚刚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然而，黄绍竑在浙江致力抗战的种种行为，终究还是越来越深地刺痛了某些人的神经。于是，彼辈便联起手来，同黄绍竑分庭抗礼，不单在省临时参议会上对黄围攻发难，甚至直接运动到蒋介石跟前“告御状”，企图将黄从浙江轰走。1940年

夏天，蒋电令黄绍竑把浙江各县区的政工队，全部划隶黄埔派控制的省三青团“统一领导”，原来的“战时政训团”、“青训团”一类机构，皆行解散；下一年，又指派亲信俞济时将抗日自卫团悉数接管，改编为下辖三个师的暂九军和一个独立师，归由第三战区直接指挥，原浙江省国民抗日自卫团总司令部则被一纸撤销；再下一年的3月间，国民政府军政部的数名要员“光临”大港头，他们同黄绍竑摊牌：“交出”铁工总厂，“收归中央办理”。至此，黄绍竑前一阵在浙江“放开手脚干一番”所取得的几项最重要的成果，已经荡然无存。

此后，黄绍竑在检讨主持浙江这段经历时说：“抗战时期，我在浙江整整做了八年，别人认为是蒋介石的信任，其实是整整受了八年气。”

北平和谈 与蒋决裂

蒋介石当选“总统”后，实行“宪法”，改组了所谓联合政府。黄被委任为监察院副院长，后来当选为立法院委员，辞去副院长，仍然居住上海。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谈八项条件。不久，代总统李宗仁发出愿意接受八项条件的声明，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刘斐、李蒸等人为代表，组成和平谈判代表团。4月1日，代表团到达北平。双方谈判前，黄绍竑同中共代表团林伯渠、叶剑英进行了个别交谈。随后，他与刘斐受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接见，并共进午餐。在交谈中，他赞同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4月10

日，双方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正式举行会议，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宣读了和平条款，然后发给南京代表讨论，黄认为，条款是可以接受的。11日，黄绍竑同屈武受南京代表们推举，携条款回南京请李宗仁签字。临行前，周恩来在六国饭店召见黄，勉励他努力完成这任务。他回答说：“照我看来至多是五十对五十的希望，或者还要少一些，我努力去进行就是了。”次日，周恩来又亲自到机场送行，更加激发了黄的责任感。

李宗仁看了条款没有签字。16日，何应钦召开行政院会议讨论。受到吴铁城、黄少谷、顾祝同、阎锡山等人的反对，最后，何宣布和平条款不能接受，由行政院作出答复。这时，他又看到李宗仁、白崇禧妄图依赖美援划江而治，拒不签字。黄知此事无可挽回，恐在南京反受其害，遂于24日急急忙忙飞抵广州转往香港。

不久，南京、上海相继解放。黄绍竑与刘斐联络贺耀祖、龙云等44人，于8月13日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表示与国民党党权、政府断绝关系，坚决向人民靠拢，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随后，他不畏风险，在香港奔走呼号，得到了在港的立法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高级将领的响应。9月，黄应中共邀请，前往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他心情格外激动，情不自禁地填了一首《木兰词》词曰：“……海天明月最关情，深夜照人明里去”。

沉默的丰碑

最近各大电视台正在热播电视剧《中国远征军》，前段时间播出的《滇西 1944》，都是反映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场景。虽然远征军的战斗离我们杭州很远，但是有那么一座丰碑矗立在杭州，这里安葬着淞沪抗战中牺牲的国民党 88 师将士。

我自幼生活在杭州西溪路东首，旧称松木场，这座书有“浩气长存”的纪念牌坊就在那里。现在牌坊已经快要被越来越多的房屋和熙熙攘攘的来往车辆所淹没。行人无意间望去，上面书有“浩气壮湖山魂来怒捲江潮白，英名缅袍泽劫后新滋墓草青”、“华表接青霄一角战魂规湖山，墓门萋碧草十年汗马念前功”两副楹联。前一幅为时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民政厅厅长，全省保安司令的黄绍竑所题，后一副为 88 师师长，蒋介石的侍卫长，时任浙江省保安处长的俞济时所题。

我从 1957 年随父母搬到不久成立的杭州大学，这座牌坊就一直陪伴我度过童年、少年、青年，直至现在。原先牌坊建在一池荷花中央，是一个圈起来的小型岛屿，岛屿上还有一些小型的房子，应该是相当于庙宇之类的建筑吧。这些房子里当时住着一些人，据说是公路建筑单位的工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某一天早上，大约五点多钟，岛屿起火了，冲天的大火映红了半个天空。我家住杭大道古桥宿舍五幢四号，前面隔着四幢和杭大幼儿园，还能看到冲天的火苗。紧接着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原来是杭州大学的大学生跑步前来灭火，又过了一会儿，一阵脚步声又传了过来，浙江大学的学生也赶来救火。那时还

没有消防车，学生们用荷花池里的水灭火。

大火被泼灭了，但那些建筑物已经烧光了，以后这座牌坊就孤零零矗立在荷花池中央。

在牌坊右面，是一排排牺牲战士的墓葬，整整齐齐排在那里。墓葬应该是棺木的，长度有一个人形的长度，墓葬前的墓碑上书写着牺牲战士的姓名。夕阳下，墓地寂静而庄严，向人述说着淞沪战争的悲壮，仿佛还能听到血腥的厮杀！在墓地的左前方，有一座不大的纪念塔，尖尖的塔形直指苍穹，记得上面还有国民党青天白日的徽章，其它的由于年代久远，都已经记不得了。

文革中，墓地被毁，纪念塔被拆除，牌坊上的“浩气长存”字样，黄绍竑、俞济时所题楹联也被覆盖了，取而代之的是“伟大的……”字样。再以后荷花池也被填埋了，整个墓地上建起了住房。

现在的牌坊是杭州市人民政府重新修复的，虽然恢复了原样，但是仔细看，隐隐约约还能看到上面残留着的“伟大的……”。每到清明时节，偶而会看到几个老人，来到这里敬献花圈，看到他们颤颤抖抖的背影，我想他们一定是阵亡将士的后人。

世谊陆维钊先生

某日在报纸上看到有关“新西湖名人”的报道，杭州学者丁云川等建议，将陆维钊、孙宝琦、胡则3位杭州名人新列入名单中。

2007年4月12钱江晚报《人文 口述历史》上的一段话“展示他们眼中历史人物的性格，不溢美、不隐恶、不注水、不以‘心得’夺眼球。”这和我写博客的宗旨颇为相似，我也对《人文 口述历史》有一定的兴趣，有时间我会陆续转载一些我博客上对先人的怀念文章。

我家1955年从之江山搬到体育场路262号大院，这个大院有中文系的教师吕漠野先生、刘操南先生、蒋祖怡先生、陆维钊先生和我家。我们一帮孩子就在这个大院里成为朝夕相处的朋友。那年我3岁，自然记得的事情很少了。隐隐约约记得陆先生有个儿子小名叫作“石球”以后知道叫陆招怀、陆先生的小女儿陆招菊，那时叫“小妹”。

以后搬到杭州大学道古桥宿舍，这些人家还基本上住在一起。我家住五幢四号，陆先生家住四幢六号。

杭大中文系的蒋祖怡先生住陆先生楼下，称陆先生为“陆公”，除了陆先生比蒋先生大数岁外，更主要的原因是陆先生和蒋先生的父亲蒋伯潜先生是同好，故蒋祖怡是将他当作长辈看待的。蒋伯潜先生是浙江教育界的名人，曾经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古籍部主任。解放后还担任过浙江省第一届人大代表。蒋伯潜先生和郁达夫、钱学森、蒋百里等富阳名人都有渊源关系。

我的父母蒋礼鸿、盛静霞都对陆维钊先生非常尊敬。母亲说陆先生棋、琴、书、画样样精通。陆先生在中国美院的家中，我还看到过墙上挂的古筝。

记得有一年我父母去农村搞社教工作，一段时间家里没有了大人，他们把我姐姐盛逊托付到陆先生家，把我托付到蒋祖怡先生家，我们两姐弟在他们家住过一段时间。

陆先生 1920 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师从竺可桢先生攻读气象地理。1921 年因足患“流火”，不宜野外实习，改学文史，为此学习期限延长一年。受业于柳翼谋、吴瞿庵、王伯沆诸名师，在文学和书学等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陆先生从杭州大学中文系调到前浙江美院（现中国美院）除上面说的潘天寿教授希望他去美院教古典文学外，据我母亲盛静霞告诉我，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杭大在道古桥宿舍建了一个食堂，当时陆先生说过：“我看这个食堂迟早要垮。”由此得罪了杭大的个别领导。听我母亲盛静霞讲，陆先生调到美院以后，还非常怀念杭大中文系的朋友。

陆先生搬到美院宿舍去后，我父母有好几次带我到陆先生家去。陆先生的家在美院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房子是杭州人称作“板壁房子”，在一个墙门里。到陆先生的书房要走过木制的楼梯，楼梯上堆着杂物。从书房的窗户望去，可以看到西湖的美景，风从板壁的间隙里钻进来。这些房子现在都已经不见踪影了，如果保留下来则是名人故居。

那时候我因为年纪小，不清楚我父母为何敬仰陆先生，只记得陆先生是一个高高大大但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人。1980 年陆先生逝世后，我父亲写下了追思的挽联：

数朋辈鱼贯同归非久论资有在，

剩文字蟬虬未到尚容掩泪查看。

我因古文底子太差，就问父亲是什么意思，父亲解释说：“‘数朋辈鱼贯同归非久论资有在’是说朋友们一个一个的去世了，我也将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剩文字蟬虬未到尚容掩泪查看’是说剩下朋友著作乘现在尚未被书虫侵蚀还能‘掩泪’相看。”

陆先生的字，我父亲称赞为“集篆、魏、隶、草于一体”是乃集大成者也。陆先生不像某些人到处提词，我只在杭州的岳庙看到陆先生题写的“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有人不明就里把陆先生当成外交部的陆维钊了。

专著《陆维钊》上说：“陆维钊以书法名世，在一般人眼中，他是当代的书法大师。其实书法只是他晚年的成就而已，他更是一个古典文学学者，曾先后在清华研究院、浙江大学等校执教，协助叶恭绰编纂《全清词钞》，撰有《中国文学史》。当年潘天寿把他从杭州大学商调到浙江美术学院，本意也是请他去做专职的古典文学教授。”

我想今后推选“新西湖名人”等，不要太注重吸引眼球，如果只是混个眼熟，名人就太多了，俗了。

1995年我父亲因病去世，陆先生的公子陆招怀因为是医学界的，在父亲生前多次到医院看望，并提供了不少的帮助。以后我把编辑的父亲纪念文集《书魂》寄他一份，春节时收到他的贺年卡，想必已是收到此书了。

陆先生过世后，据说陆师母搬到栖霞岭，以后又搬到杭大体育场宿舍，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文章不著一字空

闲遐之际想起杭州大学已故郭在贻先生。在贻先生有言：“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在贻先生是我父亲的学生，也曾师承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在汉语史与敦煌学研究中贡献杰出，名列浙江大学百年文科名家。在贻先生英年早逝，在五十岁生日前一天去世，真正是“长使英雄泪满襟”。如果在贻先生不是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态度，想必发表的文字还会更多，但是在贻先生为了保证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却宁可“文章不著一字空”，其行为表率使人感叹，也使人崇敬！

略为说几句：

在贻先生住我家隔壁，虽然他过世已有二十六年了（在贻先生去世于1989年1月），昔日种种还历历在目。现在在贻先生的书斋还保持着原来的模样，那是内夫人彭娜琪女士对在贻先生深切的眷念。母亲盛静霞在《吊在贻弟》的诗文中这样写到：

可奈才高命短何？抚膺徒有泪滂沱。
星沉雾海光芒在，人到中年坎坷多。
座上滔滔惟我辈，窗前橐橐喜君过。
人天异路谁能信，一任年华逐逝波。

其注释有：“【窗前句】云从素寡言，然常往在贻家纵谈。两家比邻，在贻常自我家侧门来访。”

在贻先生的脾气与家父相似，也是“素寡言”。有一年九

三学社开会，在贻先生也在其中，就有唐愷先生（母亲前中大同学，杭州大学生物系教授，著名化学家周洵钧先生的夫人）指着在贻先生说：“一看就是蒋礼鸿的弟子！”在贻先生与父亲一样，经常排队购物时还手不释卷，连前面人走上去了也浑然不觉。

父亲 70 岁生日时，在贻先生有条幅“有所不言，无所不知”相赠，这幅字我还保留着，常常会使我想起学者著述的态度。

还有，在贻先生在某著作中称“亮夫先生，云从师”。母亲问我，是先生重，还是师重？我想都没想就说：“当然是师重呀！”于是母亲说你错了，应该是“先生”在前，“师”在后，使我又长了不少知识。

母亲有言“人到中年坎坷多”，我也很有体会，我经常看到在贻先生穿着球鞋，到米店去背米回家。

当时招收博士生时，一些学生都向在贻先生门里挤，唯父亲只有湖南大学的任继昉，还是代培生，大概是怕父亲过于严厉吧。在贻先生去世后，这些学生转到父亲名下，有梁晓虹、蒋骥骋、方一新。父亲一一培养出师，算是对在贻先生一个交待。

在贻先生去世后，前几年还有学生到郭家帮帮忙，做些家务，现在这些学生也是大佬了，不见有人进门。

想起了“啊呀呀”

1975年，因久居杭大河南宿舍的家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剥夺了一半，那一半两度住进杭大外语系年轻教师陈纲和外语系另一位华侨女教师徐瑞香，我又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在陈纲撮合下，与同是外语系劳逸君老师对换了房子，搬到杭大河东宿舍。

河南宿舍的房子是二层的青灰墙，仿俄式建筑。我家1957年进住的五幢和四幢、六幢、十幢、十一幢是三室一厅，一厨一卫，是河南宿舍最宽大的房子，上下两层共八户人家。母亲曾告诉我，这屋子是给副教授及以上级别住的，而我父母两位讲师，也享受到这样待遇。也不独如此，蒋祖怡先生当年也是讲师，蒋妈妈沈月秋没工作，但有绍慧、绍愚、绍恣、绍忠和绍心五位子女，又有蒋家奶奶，学校照顾住进四幢；隔壁俞子龙、赵璧青夫妇也是级别不到子女多。想想那时学校够温馨，有人情，摆到现在断断不会这样安排。怪不得有人总要怀念毛时代，谁叫改革开放人人都钻进铜板的方孔里？

文革中搬进陈纲老师，这三室一厅也不是容易住两家的。陈纲和我家商量，他家住两个独立小屋，我家住大屋，客厅两家合用。我家四口人住一个屋着实不方便，到1970年代初，学校把墙一隔，成了两家均有独立空间，厨卫共用。陈家实际面积缩小，总有些不开心，我家还只有一个单间，也还是不方便。

我家搬到河东宿舍二幢一楼，那是办公室式的建筑，中间一条走廊，分住曹天麟医师、徐招娣夫妇和我家三户人家。三

户人家各有南北两个屋子，厨房共用。对面是杭大幼儿园分部，由一位张老师负责以混合班形式教学。

二幢是河东宿舍最短的一幢，又有幼儿园，人家不多。二层住两位老干部，一位姓宗，另一位姓陈，各居东西两半，六间住房，够宽大。三楼则挤了六户人家，其中有数学系谢庭藩、政治系盛斯猷；有我小学同学沈叔培、沈叔洪两兄弟，他们因父亲打成右派从河南宿舍搬过来的；另有外语系朱炯强，一户王姓，另一户徐姓家庭。

搬去以后，与邻居很快活络起来，夏天晚上，家家户户搬凳子、竹躺椅到户外空地乘凉。就数盛斯猷老师话多，用扇子指着女儿小米说：“我每天对她‘革命大批判’！”嘴里唠唠叨叨说“洋人”如何如何，日后女儿嫁了德国夫婿，生了混血外孙，不知他情何以堪？指着以后任计量学院院长的谢庭藩，说乡下人穿了西装还是乡下人，哪有我们城里人的气派？盛老师还由衷地说：“蒋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搬过来，是河东的荣幸！”

盛老师是政治系教师，夫人程怀玉是数学系教师。一双儿女叫小力、小米，盛老师说“盛”不好听，儿女都姓程。一天父亲对我说程老师是隋朝大将军程咬金的妹妹，我不解，父亲说：“咬金怀玉也。”恍然大悟！女儿小米生在大饥荒年代，故曰“小米”，以后小米出国，嫌这名字不好听，请我父亲改作“盛明之”。盛老师家还有一位年长的老保姆，小力、小米当作亲奶奶一样，那时根本干不了家务活了，就由程老师侍候着。

1978年夏秋，杭大在河东三幢前造了五幢，两室一厅。我家和盛老师家都搬过去了。都住一楼，中门隔地理系侯伟玲老师，外语系王正成老师。前面院子都是打通的，可以互相走动，

不似现在打起围墙各自为政。

1979年我内人敏琍生下儿子蒋凝，也还是在五幢。那时我们都喜欢女孩，连名字爷爷也取好叫“蒋萱”，“萱”，萱草忘忧也！结果生了个男孩，报户口时我已出了门，父亲叫住我说：“就叫‘蒋凝’吧！萱，毕竟是女孩的名字。”以后知道，唐朝有大学士蒋凝，貌美人称滴水观音。

蒋凝儿时长得胖，皮肤雪白，邻居都喜欢他。到四个月即会发声，“爹”，叫爷爷，会叫“灯”，出门说“去”。到一岁，无话不会，一次他坐在阳台发呆，盛老师隔着两家问蒋凝，“你在干什么？”，我在里屋哼了一声“无聊之极”，他就大喊“无聊之极”！引得盛老师大笑。蒋凝和盛老师熟了，一见他就大叫“啊呀呀”，以后连程老师也叫“啊呀呀妈妈”，盛愤愤然，说：“你才是啊呀呀！”

1982年我家搬回到河南宿舍，“啊呀呀”不久搬到杭大庆丰村宿舍。

1986年，沈善洪出任杭州大学校长。杭大领导班子和重要部门调整充实了一批年富力强的专家学者，为杭大发展奠定了极好的基础，也是杭大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党委书记是生物系薛艳庄教授；副书记董如宾是哲学系教授，副书记马裕祥是地理系教授；副校长夏越炯是地理系教授，副校长郑小明是化学系教授；教务处长中文系陆坚教授；人事处长历史系张新仪教授；外事处长陈新镒教授……“啊呀呀”被任命为核心部门校长办公室主任。

有一天，“啊呀呀”陪沈校长来我家探视父亲，沈校长一是拜访杭大杰出专家学者，二是商讨治校大计。我不好意思进

去听，估计父亲这样的书笃头也无大计可施，至于有没有微观方面建议不得而知。

杭大东南角建起宾馆“杭州大学专家楼”，“啊呀呀”说费了不少力气。其它特别贡献有没有就不清楚了，但在校长办公室这样关键职务上，协调各方矛盾，为校长排忧解难，没有极强的工作能力是不可能做好的。

内人原单位杭州钮扣厂倒闭，商调进杭大内部办的大集体“誊印社”，“啊呀呀”在中间做了不少工作。

内人进“誊印社”不久，一天午后，我在家休息，夫人赶回家含泪告诉我“啊呀呀”车祸去世了！原来他中午工作到很迟，骑自行车赶回家吃饭时，在天目山路，被一辆装满钢材、速度飞快的巨大卡车撞翻，从身上碾过，当场去世！

我们赶到他家，站了整整一屋子的人，每个人眼里含着泪水、满脸悲伤。“啊呀呀妈妈”在里屋，我们不方便进去，就对小力、小米说：“劝劝你妈妈！”小力说：“怎么劝？我们也悲痛着！”

追悼会那天，我们赶过去。鲜花中的“啊呀呀”通过整容，还是失去原来的面貌。“啊呀呀妈妈”已经伤心得没了力气，坐在椅子上。小力夫人徐丽华抱着几个月大的孩子。悼辞讲什么，什么人主持会议，都已记不得了！只记得躺在鲜花中的“啊呀呀”墨镜后面似乎有一双眼睛，直直地盯着苍穹！分明感到，他不甘心，他不甘心啊！

刚改善住房，他没住上几年！

身为校办主任，他还没施展拳脚！

职称升上副教授，还有上升空间！

刚做了爷爷，还没享受天伦之乐！
早年参加革命，晚年本可享受离休待遇！
改革开放还只是雏形，他没看到更好的日子！

.....

呜呼！悲乎？

以后再没去过他家！偶而在杭大路上遇到“啊呀呀妈妈”，她说是来看数学系老同事任愚夫教授的。

2013年，杭大老校长沈善洪去世，我与夫人参加追悼会，与“啊呀呀妈妈”不期而遇。我告诉他有了小孙子，把手机上孩子的照片翻给她看。她说小力也有外孙了，也把她曾外孙照片从手机上翻出来给我看！我心里涌出一丝悲苍，“啊呀呀”要是还在，不也做了“阿太”？回过头来，暗自骂了一句：“你这没出息的！”

杭大“教授楼”的那些年，那些事

某天，在院子大门口抽烟，遇到毕伟，毕伟是 27 幢毕敖洪先生的公子。平日里与毕伟素无交往，这天他过来看母亲王老师，不知碰到什么“机头运”，我向他笑笑、点点头，他就驻下脚来，与我聊起来。

寒暄几句，他张口说：“你可知道，我们这杭大新村 27、28 幢，可是藏龙卧虎之地？”

答曰：“不知。”

毕伟说：“我儿子在英国留学，遇一北大访问学者，学者听闻他幼年住在此地，说：‘杭大新村 27、28 幢是藏龙卧虎地。’”

杭大新村 27、28 幢在一个单独的小院里。两幢六层楼水泥结构老房子，始建于 1982 年，每户 72 平方米建筑面积，共 72 家房客。当时造这两幢房子是为了解决老教授、老干部住房困难，又称“教授楼”。小院隔壁是老杭大餐厅“留食”，留食以价廉物美著称，声名远播，这“教授楼”与之相比，显得默默无闻。

1982 年夏季，“教授楼”落成，分配住房时，那叫一个“盛况”！按照资历排队选房。第一名是体育系胡士焯教授，他说：“一个客厅七扇门，不要，不要！”下面坐的人自然暗暗窃喜。我家是第二名，母亲选中 27 幢中单元一楼。以后经常有人问：“盛先生，你为什么选一楼？”母亲答：“接地气！”她是考虑年纪大，上楼下楼不方便。除了正而八经的老教授，一些较年轻有为的“副教授”也享受到分房的待遇。他们因为资历稍浅，

多数选到一楼。恰好 27 幢一楼自东向西四家都是中文系的，依次为祝鸿熹、郭在贻、蒋礼鸿、陆坚。祝、郭、陆三位以示向先生蒋礼鸿的尊重，前面的小园子都不打围墙隔开，互通有无，这很不多见。

历经 33 年，“教授楼”已是凋零。有搬到浙大紫荆文苑、启真名苑的；有老人过世后家属把房子卖掉的；有新搬进来的浙大员工；有把房子租掉的……满眼望去，尽是一些陌生面孔。闲话打住，自然要说说这里的龙和虎。

家父蒋礼鸿，字“云从”。已故。“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覩”，出《易经·乾卦》。家父属龙。1934 年由教会嘉兴秀州中学保送教会之江大学。历任之江大学、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中央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师。1945 年著作《商君书锥指》获教育部“学术和美术作品”三等奖，此书收入现代版《诸子集成》（中华书局出版）。1959 年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其后 36 年间六易其稿，获人民大学“吴玉章奖金”一等奖，教育部首届人文社科一等奖。国务院发文的“延退教授”（俗称终身教授），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获得者，博士生导师。

古典文学专家徐步奎，字“朔方”，已故。著有《牡丹亭校注》《〈长生殿〉校注》《〈牡丹亭〉校注》《汤显祖诗文集编年笺校》《汤显祖全集》（笺校）《汤显祖年谱》、《汤显祖评传》《论汤显祖及其他》等。徐也是杭州大学终身教授，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获得者，博士生导师。徐先生在学术上与家父交流甚广，他的著作家父也曾帮助审阅。他与我母亲同为古典文学教研室同事，两家私交也很好。

历史学家徐规，已故。杭州大学终身教授，国务院专家特

殊津贴获得者，博士生导师。徐先生大部分著作收入《怀素集》，“素”，陈乐素先生。学生将自己一生呕心沥血研究所得归功于先生教诲，这样的情怀只恐以后不再有了。

语言学家郭在贻，已故。郭在贻曾任国学大师姜亮夫助手，也是家父的学生。郭先生原本是姜亮夫、蒋礼鸿的铁定接班人，怎耐老天无情，在 50 周岁前一天因肝癌逝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郭先生家务负担重，经常看到他脚穿球鞋、肩担大米，走在回家路上。郭先生亦是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获得者，博士生导师。

除这四位外，担任博导的还有数学系王兴华、斯咸亮，中文系祝鸿熹、陆坚，那时都还是小字辈。有物理系，后任杭州应用工程技术学院院长的竺树声。

有杭州大学副校长金锵、党委副书记董如宾，老干部徐秀敏、曹隐农、郭宣朝等。

令我难忘的还有几位长者。

杭大心理系已故朱锡侯教授。朱先生是民国最后一届公派留学生，1937 年赴法国里昂大学攻心理学、美学及神经生理学，获理科博士学位。1942 年进入巴黎大学心理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攻生理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归国后任云南大学医学院生理学及实验室主任教授，兼文法学院心理学及美学教授。反右时因为与胡风莫须有的关系打成右派，朱先生不服，跳楼自杀未遂，摔断了脊梁。

文革后朱先生被请到杭州大学，开创了杭大心理系，不知道现在的浙大心理系还有几位知道这位开山鼻祖？朱先生自打摔断了脊梁，走路要亲友搀扶，弯腰曲膝非常困难。有一天看到朱先生在园子里做气功疗法。一位气功师在背后十米处念

念有词，双手作推扶状。朱先生则独立站着，上下摇摆身子，真不知是否有用？

朱先生早年去法国留学，留下夫人樊小芄在国内。正是抗战艰苦岁月，梵先生就任民国广播站播音员，1949年后因此事受牵联，一辈子没有工作。朱先生在世时，梵先生不愁吃喝，朱上课，梵在后面板书，倒也其乐融融。朱先生去世后，梵先生没了生活来源，靠两位女儿新天、新地奉养。吃喝倒过得去，生了病无医保，就苦了。

樊先生病重，被120接走，我看着她已没有了人形，不久即去世。《瓯风》主编方韶毅曾想寻找梵先生，我告他已去世，他唏嘘不已。文化老人一个一个离世是令人伤感的事情。

1983年我读数学系函授数学专业，函授部有位教授王海先生。王先生恰好住28幢。王先生平时不上课，有一次上微分课，来的是王先生。王先生说：“任课老师病了，我没办法，没办法。”好象内疚的倒是他。听王先生上课是一种享受，讲到三维坐标，他用手比划着，形像又生动，数学往往被认为是一门枯燥的学科，在王先生这里却不是。

王先生脾气好，温文尔雅。听他女儿王玲玲说，他原是浙师院民进负责人，反右时因言获罪，是学校几大右派之一。我实在想不通王先生这样好脾气也会为民请命？亦或受到这等打击改了脾气？

王先生过世一如他的好脾气，无声无息，直到很久没看到他，才知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教授楼”还有一位长我33岁的“哥哥”，教育系张定璋教授，你说奇也不奇？

原来父亲抗战时，在温州师范学校、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

院任教，张先生同时也是那个时期，两所学校的学生。用张先生的话“两过其门而未入”，但他还是把父亲尊为先生，看见我“弟弟”、“弟弟”的叫。

听母亲说，文革前张先生有位极其美丽的妻子，文革中受迫害自杀身亡。以后张先生续了弦，是一位上海女人。那年张先生与父亲在浙医二院同一个病房住院，张夫人来看他，不知什么令张先生不满了，嘴里吐出一句：“你到此地目的何在？”，我和内人郭敏珺抿着嘴笑，文化人说话就是不一样！

悄悄的，张先生也过世了。张先生过世后将遗体捐献给浙大医学院。猛然忆及，1995年我父亲过世后捐献遗体，张先生和我说，百年以后他也要捐。我只当他是说说的，没想到他竟兑现了。这才使我对“一言九鼎”有了切切实实的体会！悄悄的张夫人卖了房子回去上海，这“教授楼”似乎从来没有过这位张先生……

走在楼道里，冥冥中常常会听见一声悠扬的“好啊~~”，那是已故化学系吕荣山教授从另外那个世界发出的声音！吕先生的“好啊~~”是有名的，至今28幢田维嘉女士还清楚记得。而在那个时候，听到吕先生一声吼，我就会不耐烦，“好，有什么好？道德败坏，小偷成群，肉欲横流！”终于有一次吕先生回应了，“我年纪大了，还争什么争？”现在想想不无道理，再怎么着，生活还是要过的。

这“教授楼”有着太多的故事，这72家房客都有出彩的往事。如果从“教授楼”诞生那天起，就认真记录，足可以写出像蒲松龄那样的《聊斋》。

只可惜，只可惜……

道古桥宿舍的那些年，那些事

1957年，我随父母蒋礼鸿、盛静霞从杭州体育场路262号浙江师范学院宿舍搬迁到松木场浙师院道古桥宿舍。

一年后，浙师院与新成立的杭州大学合并，命名为杭州大学。这道古桥宿舍也成为杭州大学的教职员工宿舍。

1949年以后，大陆教育史上有两次大的变革，一次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一次是改革开放后的高校大合并。第一次调整，之江大学消失了，第二次合并，杭州大学消失了。我“有幸”经历过这两次变革，在第一次变革中，浙师院经历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浙江师范学院的建立大致情况是：1951年政府颁布了接管外资开办的教育与医疗机构条例。之江大学被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丹接收。1952年，浙江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系部分教师，之江大学文理学院、以及解放后创办的俄文专科学校和设在浙大的浙江师范专科学校合并，成为浙江师范学院，院址在原之江大学。

啰啰嗦嗦补上这么一段，也是弥补我对杭州大学校史的认知。

从体育场路搬到道古桥，是我经历的第一次“上山下乡”。杭州自有“出了小北门就是乡下”之说，262号恰在小北门以内。道古桥周边是一片农田、河网，宝石山、将军山近在咫尺。

概况

道古桥宿舍南面是杭徽路（现西溪路），跨过杭徽路还有

26、27 两幢工友宿舍；东面是省府沿山河宿舍；西面是杭大路，当时并无路名；北面是沿山河，沿山河原本也没有，是一片水泽，以后来了解放军开挖出来的。因为西边有“道古桥”，遂称为“道古桥宿舍”。

道古桥宿舍当初有十幢二层小楼（1、2、3、4、5、6、10、11、26、27 幢），四幢三层楼（13、14、16、17 幢），不久后兴建了三层楼 15 幢，再以后建起二层楼 8 幢。

其中建筑风貌上最有代表性，也是面积最大的是 4、5、6、10、11 幢，青砖黛瓦仿俄罗斯风格，上下各四户人家，三室一厅一厨一卫。这五幢住的大多是知名教授和校领导，但也并非完全如此。我家父母两位讲师也获得入住，蒋祖怡先生当时也是讲师，因为上有老母，下有五位子女也住在这里。知名教授有夏承焘、孙席珍、王璠、姜亮夫、徐瑞云、任铭善、董律茂、王驾吾等；校领导焦梦晓、朱子英、陈烙痕、刘活源等，实在多得数不过来……

1、2、3、13、14 幢每户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大多是讲师级居住，也有老红军易树青、著名人物陈启霞、中文系总支书记孔成九等。

16、17 幢一户两室，单独厨房，合用卫生间，同一走廊出入。

15 幢是后造的，中间是走廊，厨房卫生间合用，每户房间一、二间不等，既有教师也有职员职工。

杭徽路（后称西溪路）对面是工友宿舍 26、27 幢，一室一厅，单独厨卫，条件相当艰苦。

8 幢是后建的，结构与 4、5、6、10、11 幢相似，两单元

其中一个单元是招待所和古籍研究所，另一单元住张君川教授、老干部徐秀敏等。

大师

道古桥宿舍专家学者云集，随便找一个都是重量级人物。2010年7月，浙江大学召开文科大会，评出浙大百年文科名家五十余人。这其中有道古桥的钱南扬、王驾吾、夏承焘、胡士莹、姜亮夫、德梦铁、沈炼之、林淡秋、孙席珍、严群、严德一、陈学恂、蒋礼鸿、徐朔方。但是他们更像是高晓声为赵忠祥《岁月随想》作序中所说是“名人中的普通人”，他说：“有的人仅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或职业范围是名人，甚至名如丰碑，彪炳史册。但是，超出专业领域和职业范围，也许就没有多少人熟悉他们的名字了。”

即便是这样，名气的大小还是有区别的。如我熟知的夏承焘、姜亮夫等属于前者，孙席珍即属于后者。我倒是很喜欢聊聊这些“名人中的普通人”。

钱南扬，中文系教授。钱先生反右时，被杭州大学扫地出门。孰不知这扫地出门是“开除公职”，至所以用了引号，是因为这种方式灭绝人性！钱先生被开除公职后，生活无着落，居无定所，寄宿在友人家里，生活由友人支助。称作沦为乞丐也不为过。

所幸南京大学中文系陈中凡老先生冒着政治风险，向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郭影秋同志竭诚举荐钱先生，说他是戏曲研究领域中之难得的人才，是南戏专家。

以后钱先生不负陈中凡、郭影秋所望，偏隅南京大学一角，

孜孜不倦，成为南戏研究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奠定了南戏研究的学科基础。

据悉有关方面至今未就“开除公职”一事忏悔和平反，却将钱先生列为浙大的文科名家，弱弱的问一句，他到底是浙大的还是南大的名家？

孙席珍，中文系教授。早年听母亲说，鲁迅先生对他十分赏识，称他为“诗孩”。文革中学生批判他为“爱情”教授。由于《孙席珍评传》，始对他了解更多一些。

无疑，孙先生是属于鲁迅那个时代的。孙先生幼年聪慧，否则也得不到“诗孩”的美誉。不但如此，孙先生年轻时还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与共产党失联，直至文革后，以古稀之年重新恢复党籍，可见孙先生一生坚定志向，令人敬佩。非但如此，孙先生大革命中与党失联，还与娇妻失联。以后孙先生又娶妻生子。解放后孙先生辗转得知前妻还健在，将其接到杭州，安置在灵隐白乐桥畔，供奉生活起居。孩子们也经常去白乐桥看她。不想文革中又成罪名一状。

孙先生成名于鲁迅赏识，但又和鲁迅交恶。《孙席珍评传》著者王瑗曾向其公子孙小昭打听，但小昭讳莫如深，也许他也知之甚少。依我看这才是孙先生的“文人风骨”，不奉迎、不媚俗，今天的“文化人”有几个能摆着梯子不向上爬的？

德梦铁，外语系教授。德先生是著名化学家王琏的妻子，拉脱维亚犹太人，第一批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那时候德先生住六幢一号，我家住五幢四号，抬头就能望到。德先生家的园子是用竹篱笆围起来的，篱笆用柏油漆过。透过篱笆缝可以看到德先生是一位高大丰满的白种女人，如果当面遇到，我们

则叫她“苏联妈妈”。

德先生跟随王璉先生在中国生活多年，在杭大教授俄语和德语，自然成就斐然，选作浙大文科百年名家无可厚非。文革初期王璉先生遭劫匪袭击身亡，德先生受到冲击。她给周恩来写信，被拦截公布在外语系二楼走廊上，其中有几句话：“在二战中我的六位亲人都被法西斯杀害了，现在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丈夫也被歹徒害死了，请中国政府给我帮助……”

以后德先生不知去向。因为年幼时对这位“苏联妈妈”颇有印象，我一直在寻找她的足迹。有传闻说她回了前苏联；又有说文革中在干校溺水身亡；又有说是亡故在解放军 117 医院。以后再查到同学兼插友王亦新是王璉先生侄女，满怀信心向她打听，她回说“受迫害致死无疑”！最近听说她是文革后期因脑溢血突发在外语系走廊上摔倒，送医院紧急抢救无效死亡。德先生死亡对我而言始终是一个谜，这谜底是否能揭开呢？

童趣

道古桥宿舍最初是建在坟场上的。何以如此说？夏季夜晚空气中飘洒的星星点点，除了萤火虫听妈妈告诉我还有一种磷火，说是从人骨硫化以后产生的。那个时候不时可以看到被泥土半掩着的人骨和骷髅。胆子大的男孩子还会手持人骨相互打架，把骷髅拿来当足球踢。如果你还不相信，我可以告诉你四幢二号蒋祖怡先生家的园子里，有一块“福望公墓”的石碑。那时候我会和蒋先生的小儿子绍心坐在上面玩。好在大人们都是党教育出来的无神论者，我们小孩子更不把这坟场当回事儿。也会有例外。在炎热的夏季，晚上家家户户都在室外乘凉。没

有空调，甚至电风扇也是奢侈品的时代，在夏季晚上享受自然风的吹拂是不二的选择。一般大人们会先在地上扑上水解解暑气，孩子们搬个小矮凳坐在一起胡侃大山。那是一个信口开河而想像力丰富的时代，大跃进的宣传画在校内中文系大楼的西面整堵墙上，稻穗上站着满脸微笑的孩子；小高炉喷射出火红的铁水；宣传口号是“三年赶超英国，十年赶超美国”。于是就有了念想，杭大图书馆馆长翟墨新女儿翟小园，坐在小矮凳上，托着腮帮子诚挚地说：“到了共产主义会是什么样，我想树也会在天上走路了……”

有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的孩子，乘着夜深人静，讲起鬼故事，大家蓦然想起是坐在坟场的土地上，不禁毛骨耸然，一个个溜回家躺在木地板上，悄然睡去。

男孩子天生是好战分子。经常分成两派战斗。那时由于道古桥宿舍还处在建筑收尾阶段，各种建筑材料到处都是，杂草丛生，黑夜里随便躲在哪里都不易发现。有次晚上，两个阵营对阵。躲在黑影里的双方不断用土块袭击对方，虽然看不清对方的脸，手里的土块却没有停止过。我一伸手把一撮草从地上连根带土拨起来，又抛手扔了出去……第二天回顾战况时，中文系胡伦清先生的孙子胡潮生说：“介大一钵头烂污泥抛到我脸上！”

决战是要武器的，那时的父母很少给孩子买玩具。宿舍里堆有不少脚手架，是用竹排做的。抽出一根，用菜刀剪子削成宝剑状，打磨光滑，就成了一柄利剑。再请父亲在剑上写上“青龙宝剑”四字，拿在手里兴奋地冲出去。我的对手是党委书记焦梦晓的大儿子焦新新，两人一碰在一起举起剑一阵乱砍。焦

书记在一边兴致勃勃地观看，嘴里喊：“好剑法！”其实我们的剑都是冲着剑去砍，根本不伤人。

竹排的用处太大了。初夏有许多学飞的幼鸟，常常被孩子们捉住饲养。养鸟要有笼子，小学高年级时，化学系周洵钧先生的公子周立有一只从龙翔桥花鸟市场买的鸟笼。我没有鸟笼，自知父母也不会给我买，就找了两根竹排的竹子自己做鸟笼。父亲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更增加了我的决心！我用上工具菜刀、剪刀、榔头、锥子和砂皮。最困难的工序有两道：一、在鸟笼的竹架子上锥孔，弄不好扎在手上鲜血直流。这孔有几十个，因为偷了懒把孔排得疏了一些，做成的笼子个头小的鸟会钻出来；二、削小细竹条，直径约 2.5 毫米，要削成圆柱形，也有几十条。以上工序完成后用小钉子把架子钉起来，这个过程还要把小细竹条穿好。终于一只像模像样的鸟笼做成了！父亲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所谓“爱屋及鸟”，我的鸟笼子住过三只小鸟，一只是白头翁、一只是麻雀，还有一只个头比麻雀还小，略带金色的羽毛。正是这只鸟个头较小，常常从笼子里钻出来。

也有不幸的鸟儿。1958 年 2 月，政府发动“除四害”运动，麻雀居四害末尾，平反则是以后的事。那年寒冬的一个早上，爸爸带我去打麻雀。天蒙蒙亮，跟着爸爸到杭大，爸爸把他的棉帽子捂在我头上，我手里拿着铜火熄的盖子和小木棍。打麻雀的方式匪夷所思，一大群人手里拿着锅瓦瓢盆用木棍敲打，用声音把天上飞的麻雀震下来。好一场人民战争，我跟着爸爸拼命用木棍敲打铜火熄的盖子，小手冻得通红。终于一只小生灵被震得晕头转向，掉到健身房前面的路上。大家赶上去

一看，是一只形似麻雀的小鸟！

作孽

道古桥宿舍从来都不是世外桃源，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成为一些孩子的噩梦。我家搬到道古桥不久，后面六幢二号搬来中文系任铭善先生一家。任先生和我父亲是好友，他俩是江大学的同学，任先生比父亲高两届，学术上互相切磋。由于这层关系任先生的公子任平很快和我成为朋友。

可是任先生一家在六幢二号没住多久，就悄然搬去了杭大河东宿舍，原来任先生被划上右派了。任公子任平，小名“小宝”，就此带上了“右派儿子”的帽子。在我的朋友和同学中，被带上这顶帽子的有好几个。吴游，父亲是教育系的吴向先生；杨卫平，母亲是人口发展与研究所韩常先先生；王重鸣，父亲是教育系王承绪先生；沈叔培、沈叔洪兄弟，其父亲情况不了解……

右派分子不但本人受到批判、斗争，被降职、降薪，还有最大的打击恐怕是对其子女实施不公正的对待。如任铭善先生女儿任珠，虽已被大学录取，但因为父亲问题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右派儿子”这顶帽子究竟有多沉重，我当时并无体会。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我被带上“现行反革命儿子”的帽子，才体会到了。

1966年夏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我所在的杭州大学附属中学将原党支部书记朱联揪回附中。我在初二甲班是一个“红五类”为主的班级，同学们血气方刚。班里几个同学将朱联带上报纸糊的高帽子，剪去一半头发，把墨汁泼

在她脸上，拉上台批斗。

仲夏夜，刚躺下睡觉，被一阵嘈杂声惊醒！黑暗中一大帮学生冲到我家阳台大喊：“蒋礼鸿滚出来！”父亲开门出去，我紧跟着来到客厅，双手扶着桌子的边缘。学生们此起彼伏高喊：“打倒现行反革命蒋礼鸿！”我在屋里嗦嗦发抖。怒吼中有人大喊：“向毛主席下跪！”那夜，道古桥经历了最黑暗的一夜。到处是狂热的学生，许多人受到批判。在批斗老干部林琼时，竟有学生喊出：“扒了她的衣服！”

第二天，爸爸被勒令和其他被打倒的人如任铭善先生、张君川先生、夏承焘先生、徐瑞云先生等，去八幢前草地上削草。一天下来，疲惫不堪，身上被太阳晒得通红。以后大批人被关进“牛棚”，他们每天从杭大出发步行到位于解放街的杭州市市府前接受批斗。爸爸在“牛棚”，造反派头目要他负责打扫这头目的私人厕所，不得有一丁点臭味。爸爸只能跪在厕所地上用小刀一点一点刮去污渍。

再以后道古桥宿舍不断传来不堪忍受批斗凌辱而自杀的、病逝的消息。

1966年底，杭大化学系泰斗、一级教授王璠先生在寓所被抢劫犯袭击身亡。出事那天正好夫人德梦铁先生和保姆都不在家。一年多以后案情告破，是住在松木场河东的浙江农业大学学生王汉臣所为。因王带了一只550多元（当时价）的奥米茄手表，被人识破。王最终被判了死缓，大概因为被杀的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死缓”不用说，就是刀下留人了。

文革时，父亲是大学讲师，根本不够“反动学术权威”的格。因为是搞语言的，曾在课堂上对毛泽东“前赴后继”的“赴”

提出不同意见，就此打成现行反革命。而我顶着这顶“反革命儿子”的帽子度过三年屈辱的日子，直到上山下乡，远赴黑龙江插队时，还在上山下乡表格上填写父亲是“被群众揪出来的现行反革命”。

有了“反革命儿子”的帽子，天堂有路不得走。本来我去附中上学都是从杭大南大门进，北门出，穿过文三街直达附中。可是从某一天开始，南大门有个其貌不扬的门卫，不让我走了。争辩也没用，无需理由，他说：“就是不让你走！”甚至一把将我推到地上。以后母亲含泪和我说：“他说，蒋礼鸿老婆，叫你反革命儿子不许从杭大走！”泪奔！

学校停课了，革命还是要“闹”的，称之为“停课闹革命”；杭大不能穿过，学校还是要去的，班里有同学通知我某日去班里报到。一到班级教室，没多少人，几个“红五类”子弟把我叫到讲台上站立。其中一位同学问：“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答：“被群众揪出来的现行反革命。”

问：“你母亲是干什么的？”

答：“职员。”

问：“爷爷是干什么的？”

答：“城市贫民。”

问：“奶奶是干什么的？”

答：“家庭妇女。”

问：“外公是干什么的？”

答：“资本家。”

问：“外婆是干什么的？”

答：“家庭妇女。”

“地主婆，哈哈！”

接着一位粗壮的同学举起一条一寸多粗的皮带，在我背上猛抽。抽打声惊动了过路的同学，杭大宣传部长李林刚的儿子“二娃子”（大名李树勤）和裘富根（后更名裘红根）把皮带夺走，把那位同学拉开了。

回家后，不敢告诉妈妈，愤然写了一封退学书，要去宁夏农村（1965 届高三胡潮生因为父亲历史问题没考上大学去了宁夏农村，还有隔壁俞小燕等）云云，交给了住在道古桥宿舍 15 幢的班主任毛必林老师。

1968 年底，杭大附中掀起上山下乡高潮，有人私自把我报了去黑龙江插队的名。因为是现行反革命儿子，很无奈，同时也向往黑土地。姐姐早就打算去黑龙江，妈妈也同意了，我又走了，父亲在“牛棚”，家里只剩妈妈了。道古桥宿舍金阿康师傅的妻子郑阿莲阿姨看不下去了，让她母亲来我家陪妈妈，这才解了燃眉之急。我和姐姐去黑龙江，不久，妈妈被所谓“之江大学间谍案”关进了专案组。妈妈肠胃不好，年轻时开过刀，在专案组犯了肠梗阻。大便从口中喷出来，造反派残忍的要她吃下去！妈妈的肠梗阻必须开刀，可是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的童年好友蒋绍心，拖着残疾的双腿前后照料，涉险过关。如果说这辈子最大的悔恨是什么，就是当妈妈需要我的时候，没有在她身边。

尾声

2004 年，张曦出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是杭大政治系毕业的老学子，有感于道古桥宿舍（已更名为杭大新村）的

破败和老杭大教师居住条件困难，决定对道古桥宿舍重建。当时整个道古桥宿舍约有 300 户人家。拆迁自然是个困难的工作，大部分人家搬离家园后，仍有部分不愿搬迁。以后这些人更是结成了联盟，誓死维护杭大新村和个人利益，甚至与浙大对簿公堂。一方是 200 多户人家和浙大签订了搬迁协议；另一方是绝不妥协的钉子户，拆，拆不了；拖，拖不起。最终浙大只能在西溪校园内圈一块地，建起启真名苑，将杭大新村拆迁户安置进去。

2013 年 3 月 5 日，杭大新村被列为杭州市第四批历史建筑。可是矗立的告示石碑上却只有 23、24 幢（原道古桥宿舍 10、11 幢），其它大量的建筑物语焉未详。在为杭大新村列为历史建筑而得以保留的欣喜之余，我有种隐隐约约的担忧，这童年的家园，被仲向平先生在《杭州老房子·续》中所言“西溪文化的发祥地”的道古桥宿舍真能保留下来吗？

注：

最近联系到王璘先生侄子王文中，他提供了如下信息。

1.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暴徒乘文革期间社会秩序混乱之际，闯入家门抢劫钱财，先生被重伤头部，不幸逝世。
2. 文革中，伯父惨死，伯母也蒙冤成了苏修特务。一个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给中国的国际友人，她将自己彻底变成了一个中国人，但最后却死在了中国的牢狱中，连一个亲人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有亲人陪在她身边了。
3. 令人惋惜的是，“文革”初期，德梦铁先生被污蔑为“反动学术权威”和“祖师婆”备受非人折磨，后因所谓“国际间谍”

梦萦秦望山

问题受到隔离审查和强迫劳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66年“祖师爷”王璘先生死于非命后，她备感凄凉无助。身患高血压的德先生得不到应有的药物和看护，抱憾谢世。

最近的距离在远方

“朋友”，是个既古老又时髦的称呼，其伸缩性之大，恐怕冠各种称呼之首了。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离我家不过百步之遥，友情可以追述到我三四岁时。可是他已经至少八年没踏进我家大门，虽然有QQ，聊天不过两三句话。但他却是我心目中份量最重的朋友，至于他是否这样认为，我觉得无所谓。

他，是原杭大中文系副系主任蒋祖怡先生的小儿子蒋绍心。

祖怡先生与家父蒋礼鸿、家母盛静霞都是杭大中文系同事，这同事要追溯到浙江师范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浙江大学的中文系和之江大学国文系都调整到浙江师范学院，浙师院办学在原之江大学校址。由于我父亲是老之江的，本来就住之江中方教师宿舍龙头的十间头（之江是教会大学，由美国南北长老会办，学校有中方教师和外籍教师），祖怡先生从老浙大调来，有幸住入二龙头原外籍教师宿舍上红房子（据说这房子司徒雷登住过）。母亲和我说起过，在之江山上，她和父亲到祖怡先生家，看到有一小男孩在床上爬。这孩子得了一种先天性的残疾，叫作“马蹄型内翻掌”，这孩子就是绍心。

1955年，浙师院中文系从之江山搬到体育场路，现在的《浙江日报》所在地，教师也搬下山。我们家搬到体育场路262号，那是个大院，在现在的中国电信所在地，264号边上还有个尼姑庵。大院里除我家还有中文系蒋祖怡、吕漠野、刘操南、陆维钊先生；另有杜振江先生是电工，卢婉君女士以后是杭大幼儿园教师；一位叶光庭先生，恕我实在搞不清他是什么部门

的。

大院里有这么些家庭，孩子自然不少。我唯有和绍心最玩得来，因为年龄上他属牛，比我大三岁（我属龙）。那大院挺大的，有主楼，上下两层每层两家，住中文系教师；有门房住杜家；有偏房住叶家；卢家住哪儿已记不得了。院墙高高包围着主楼，之间是通道。记得有一次我和绍心“过家家”，他手里拿着母亲给的土豆，和我一边吃，一边围着主楼转，嘴里说：“这是‘饭饱’。”大家要奇怪了，绍心不是“马蹄型内翻掌”怎么会走路？原来他穿了一双特殊的皮鞋，鞋帮上有铁轂扣在小腿上，加强了脚掌力量。当然穿这鞋走路并不容易，所以绍心从小练就了异于常人的坚强性格。

在 262 号还有一件事记忆犹新，和绍心家有关。绍心祖父去世了，来接他的是一辆三轮摩托车。那摩托车右边的座位经过加长，正好躺一个人，能盖上盖子，这车那时也叫“香蕉车”，那接尸的棺材像个大香蕉。在温暖的阳光下，老人被接到那个叫作“极乐世界”的地方，很久很久，直到有了互联网，我才知道那是一位名人。

绍心祖父叫蒋伯潜，浙江富阳人氏，蒋家在富阳大源新关乡是望族。伯潜先生研究经学，这在当下是绝学。他还担任过杭州第二中学校长，不知为什么，杭二中校史上居然没有他。解放后担任浙江图书馆研究部主任，省、市第一届人大代表。伯潜先生交游广泛，郁达夫、蒋百里等都是他同好，国民党“文胆”陈布雷是他的学生。

1957 年，浙师院在松木场建起新校舍，之江山上和体育场路的教师都搬去那里的道古桥宿舍。宿舍以道古桥命名，是

因为西边有一座以“道古”命名的古桥。“道古”是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的“字”，此桥是纪念秦九韶的。一年后浙师院和省委党校合并组建杭州大学（省委党校以后又分出去单独建校。1949年以后，大陆的学校够折腾的）。

绍心家住在道古桥宿舍四幢二号，我家住五幢四号，中间隔着一条小路。绍心家是我去得最多的，用绍心妈妈（我叫她蒋妈妈，绍心也叫我妈蒋妈妈）的话说，她家的抽屉我比自己家的还要熟悉。每到吃中饭的时候，爸爸就跑到绍心家后门喊：“蒋遂，吃饭了。”绍心聪明，会不少玩意儿，约举之：他会用半把破剪刀刻石章，这手艺也传给了我；大饥荒时期，肚子饿得“咕咕”叫，他用父亲的钢板蜡纸刻“麸皮馒头”票，用皮鞋油刷印在黄板纸上，以假充真和我一起买馒头吃；会安装收音机，从矿石机、电子管机到晶体管机，为他日后成为电子学专家打下坚实基础，我也因此学会装矿石收音机，还得到杭州市小学生安装矿石收音机比赛第五名。1960年代初我父母去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我“安置”到绍心家，姐姐“安置”到陆维钊先生家。我和绍心吃一锅饭，睡一张床，亲密无间。蒋妈妈在我上学时还用一個旧信封装一袋炒米粉，加一瓢糖供我课间充饥。

绍心读初三时，家里为他做了“马蹄型内翻掌”矫正手术。这手术本应该越早做越好，无奈绍心哥哥姐姐有四位，家里有年迈的奶奶，母亲又没工作，实在负担不起，手术后也达不到正常双脚的功能。手术后绍心打了厚厚的石膏，待除下石膏，脱下厚厚一层的皮！绍心在康复间段，为了给他解闷，我把他背到自己家、任平家去玩，就像背着一位好兄弟。

1966年，文革狂飚兴起，我们一帮杭大子女受到父辈被打倒的痛苦。绍心家和我家多次被“抄家”，据绍心邻居张小国（小毛）说，看到绍心奶奶留存的金戒子等器物被造反派抄家据为己有。我们一帮“狗崽子”只好抱团熬过苦难的日子。1966年后一个国庆日，我和任平（小宝）架着绍心翻上宝石山，越过初阳台到葛岭看烟火。也曾和绍心、任平一起去上海“串连”。

1968年底，“上山下乡”的运动来了，任平去余杭大陆公社七贤桥，我去了黑龙江二龙山公社东风阳。绍心看小伙伴一个个离开，也闹着要去黑龙江。蒋妈妈含泪为他缝制丝棉棉裤，是为他残疾的双腿挡一挡寒风。一帮邻居再三劝阻，绍心才断了去黑龙江的念头。以后根据他的兴趣爱好，被街道分配到大集体工厂——杭州大众无线电厂。

1969年夏秋季，我母亲受“之江大学间谍案”专案组迫害，肠梗阻急需手术。我和姐姐在黑龙江，父亲在“牛棚”，家里没一个亲人。绍心自动担任起照顾工作，拖着残疾的双腿，忙前忙后，使我母亲转危为安。由于我当时远在黑龙江，具体细节不太清楚，昨天和住在我家的老邻居于忠屏阿姨（文革中，绍心、任平和我家都腾出一半，安置杭大的年轻教师）说起，她啧啧地说：“那时可亏得有绍心照顾，要不大娘可怎么办啊！”

祖怡先生在文革中，与造反派争斗，气得中风，自此也落下腿脚的残疾，要拄着拐棍行走。文革后他又挑起培养研究生的重任。但经过文革“停课闹革命”、上山下乡，年轻学生的学习自然有脱节。他带研究生非常吃力，一次他和我说起：“他们《文心雕龙》看不懂！”

绍心虽有两位哥哥（大哥绍愚，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导；小哥绍忠，浙大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浙大总经济师）两位姐姐（大姐绍惠，北师大数学系教授；小姐绍恣，杭州电力设计院院长）但只他和父母住。父母日见年迈，还有更老的奶奶，都得靠绍心照顾。祖怡先生为培养人才耗尽心血，还得了严重的白内障，他要开刀恢复视力继续工作。所有的人都劝他放弃开刀，他不听，说为了工作他宁可睁着眼睛死，不愿瞎着眼睛生！结果正如人们的预料，祖怡先生手术后一蹶不振没多久就去世了。那个年代医院没有护工，也请不起保姆，伺候父亲直至过世，重担几乎都在绍心身上。他还告诉一个只有我知道的秘密，为给父亲看病，他还不时从绵薄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负担医药费。

俗话说“是金子总会闪光”，绍心虽有残疾，但聪明绝顶，又孝顺长辈，一位美丽善良的同事姑娘温时美对他早就心有所属，以后结为连理，又有了乖巧的儿子宇强。

时美的父母都是离休干部，父亲做过杭州莫干山中学领导，母亲做过杭州外国语学校领导。两位高堂对乘龙快婿满意透顶，这样的女婿打着灯笼难找。

花开总有花谢时，任你再怎么辉煌也挡不住自然规律。绍心岳父住进杭州市中医院，岳母住进杭州市福利中心（敬老院）多年。时美两位哥哥，一位在美国，一位不管事，重担落在她身上。绍心心痛夫人，又把这活儿揽下来，骑着自行车两头跑（幸亏绍心会骑自行车，附中同学称他为“盛行太保”），以后坐公交跑。给老人请了保姆，保姆要回家过年、奔丧，还得妥善安置；自费药、紧俏药要托关系弄进来……久病无孝子，他

还得做“孝婿”！岳父卧床多年成了植物人；岳母又住进了市中医院，生命垂危，靠打白蛋白吊命。天那！这日子怎么过？问起他，一脸的坦然。

不是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看到前途吗？”绍心也自有他的快乐开心。

凭着他绝顶的聪明，无比的坚韧，在电子学方面闯出一片天地。大小电子产品，大到用直线电机驱动的电梯，小到用超声波清洗隐型眼睛镜片的清洁器，琳琅满目数不胜数。慕名前来请他开发产品的有浙江大学直线电机研究所、国企大佬华北油田、温州土豪及杭州的企业家。这帮小子得了新产品技术，管理又跟不上，又找他，气得他大骂“畜生”！

儿子宇强逐渐长大成人，在绍心“设计”下，出国留学，考研攻博，在一家研究和生产超高压输变电路的德国公司任职。中国广博的大地正需要这种远距离超高压输变电技术。宇强身在德国，心系祖国，成了这项技术的推广者和中德友谊的纽带，近次还在上海浦东建起中德合资公司，成了一名“洋买办”。儿子步步成长，背后凝聚着老子的心血，绍心除为他确定人生方向，还在专业技术上通过互联网遥控指导，排忧解难。

宇强到了年纪，娶了老婆（兼同学），又带她去德国，以后有了一个女儿文沪。这一下绍心在互联网上换不了文沪的尿片，只得与夫人轮流去德国帮助照看小孙女。据绍心 QQ 空间描述，这小孙女会拉着绍心饱经风霜的手渐渐进入梦乡，绍心则可以享受这片刻的安宁祥和。

和传统家庭出来的孩子一样，绍心不注重外在的仪表，穿衣乱搭介成为我内人的笑柄。闲时和朋友在小饭店“撮”一顿

是开心一刻。他最大的爱好是烟，烟不离手。有一年 10 月 1 日国庆节，单位按老传统布置打扫卫生，绍心稳坐钓鱼台纹丝不动，性急了说：“老子就是这样子，你们管不了我，连我妈从来也不管我！”同事有微词，老总挂不下脸来，带几位女同事冲进办公室来搞卫生，桌子下，墙角里扫出来的纸烟盒装满了一麻袋！

君子之交淡如水，友谊像一杯甘甜的茶；最近的距离在远方。不行！我得去看看他，喝他的新茶，抽他的好烟……

注：

本文应杭大旅游系主任陈纲教授女儿陈艳南作。陈艳南，可参阅拙著《往事琐忆——与陈纲教授一家的情缘》，她说对绍心大哥哥已淡忘了。

往事琐忆

——与陈纲教授一家的情缘

今天接到凡凡微信，说下午和姐姐南南来看我夫妻俩。凡凡、南南所谓何人？乃杭州大学旅游系（后更名旅游学院）主任陈纲教授一双儿女陈一凡、陈艳南。

敲门进来是一位高高大大的年轻人和一位淳朴端庄的女子。凡凡、南南虽已是在陈纲叔叔告别仪式上见过，看见凡凡直觉中感到长得很像叔叔，南南也像她妈妈于忠屏。

两位年轻人带来不少水果礼品，听着他们“大哥，大哥！”的叫，往事不觉涌上心头……

1966年，文革兴起。先是父亲蒋礼鸿被“革命群众”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以后家里所有书籍被“破四旧”（除被我力争下来的《辞海》《本草纲目》）。再接着家被腾出一半，分配给年轻教师。

有一天，一位年轻人到我家，自谓是来看房子的。他高大帅气、温文尔雅，说话声带着磁音，是标准的普通话，尤其一双眼睛很深邃，令人过目难忘。他把封条撕了，看完房子说：“这房子我要了。”看他毫不思索的样子，令我有点吃惊！

再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快到冬天了，搬进一家人。男主人是外语系陈纲老师，那位早些时候来看房的年轻教师；女主人叫于忠屏，尚在哈尔滨大学读最后一个学期；一位高高胖胖的老太太，是于的母亲。忠屏阿姨此时手里抱着一个小女孩，两岁半大。小女孩长得雪白雪白的，一双大眼睛扑楞扑楞的，说

起话来“咿咿呀呀”奶声奶气的。那女孩叫“南南”，学名陈艳南。

以后慢慢得知，陈纲是浙江武义人，在哈尔滨大学读俄语，又读到研究生。于忠屏是哈尔滨人，与陈纲同一学校，郎才女貌，结为夫妻。

当时在文革之中，陈纲叫我母亲“盛静霞同志”，我父亲在“牛棚”基本不回家。以后父亲从牛棚出来，叔叔背着人叫他“蒋先生”。于忠屏不是杭大的，没那么多顾忌，跟孩子叫我父母“大大”、“大娘”，“大大”是北方叫法，翻译过来是“大爷”的意思。

陈家人对我家很好，这在文革这个特殊年代并不多见。就在杭大道古桥宿舍，听说有些年轻教师搬进教授家耀武扬威，两家关系非常紧张。叔叔有时上街，会对我妈妈说：“盛静霞同志，有什么需要我上街帮你买吗？”有一年冬天，我姐在浙江麻纺厂学工劳动，被一根木刺扎进大拇指，不久后化脓溃烂。看了很多医院，医生说要截指。叔叔骑着自行车，顶着寒风驮姐姐去浙江医院治疗，保住了那只手指。

姥姥是典型的东北人，特喜欢“唠嗑”，看见大人小孩都会说上半天的话。一时间道古桥宿舍的人们都会聚到这里，叔叔外语系的同事、工农兵学员成了我们“家”的高朋。那时姥姥包饺子，我在一边跟着学，也学会了和面、擀皮子。很多年以后，别人说我包饺子的技能是在东北插队落户时学会的，我自豪地告诉他们：“我这是和陈纲家姥姥学的！”姐姐则跟着姥姥学会踩缝纫机，裁剪衣服。

南南在我们“家”一点一点大起来，学会了标准的普通话，

其实是哈尔滨方言，比普通话还好听。跟着我叫大哥，我很庆幸有这样一位小妹妹，没事陪着她玩。还记得她有一辆小汽车玩具，要我和她在客厅面对面开来开去，小嘴叫着：“大哥，蹲下，蹲下！”道古桥宿舍一帮小女孩也喜欢和小南南玩，甚至把纱窗用手指抠一个洞，把里面插销拨开爬进来，真是疯狂啊！

以后，凡凡出生在这里，阿姨在小房间支了一个摇篮。有次凡凡躺在摇篮里乱踢乱动，我以为他要尿尿，抱起来到厕所，他居然尿出来了。晚上乘凉的时候，听到阿姨对人说：“蒋遂给凡凡把尿！”那时候都用煤饼炉子煮饭、炒菜、烧水，煤饼炉不用时，把下面风门关上，炉口压一铁块，既保持炉火不灭，又节省煤饼。凡凡小时候淘气得很，用手去摸放在地上的铁块。那铁块还有余热，凡凡被烫得叫起来，姥姥冷眼看着他，嘴里蹦出一个“该！”字，这小鬼头学着姥姥的口气，也朗声说一个“该！”字。凡凡小时候好说话，南南叫他“烦老屁”，今天不知他俩还记不记得？

凡凡出生前有段时间，阿姨还没调到杭州，姥姥也跟着阿姨去了哈尔滨，南南被送到叔叔武义老家。一次南南被老家人带回来杭州，穿着一条土拉巴几的长裙子。许是老家人审美观出了问题，南南走后，叔叔坐在门前小矮凳上，满脸愁容，坐下又站起。半天后，嘴里蹦出一句：“不行！我得把她接回来。”第二天他一早赶去坐长途汽车，接南南去了。那时是文革中“停课闹革命”，不愁没人和她玩。

1968年底，杭大附中的学生要下乡插队落户了。姐姐和附中一帮同学执意去黑龙江，我被一帮革命同学擅自也报了去

黑龙江的名。这既打破了我与任平、徐小多、黄荔生去余杭农村插队的打算，妈妈也愁坏了；爸爸在“牛棚”没有发言权。陈家人看在眼里，特殊年代也不好多说什么。而有一位南下的老干部却说东北不冷，“冬天我还穿单鞋呢！”陈家人和她成了明显的对比。1969年3月9日，我和姐姐离家去黑龙江，那是一个冰冷灰暗的早上。叔叔抱着南南送我们出门。南南嘴里喊着：“大姐，大哥早点回来！”叔叔脸色凝重……

三年后，按政策我户口迁回杭州，姐姐又去了黑龙江。送姐姐上火车回到家已是晚上，我端起碗吃饭，泪珠不由的落到饭碗里。叔叔阿姨看到了，叔叔说：“他心里难受！”阿姨轻轻拍着我的背，心情才转凉为暖。

一个屋檐下的故事许是还没讲完，亲！你有兴趣听我念叨吗？

夜访纯真年代书吧 与朱锦绣老师拉家常

互联网的兴起，经济大潮的冲击，使得实体书店及其经营遇到空前未有的困境。然而杭州有一家书吧，却在萧瑟寒风中坚挺 15 年，其中还经历了难以承受的厄运，在主人的悉心培育下，朝着多方位经营策划迈开脚步，越走越开阔，越走越辉煌。这家书吧，就是杭州文学爱好者心中的圣地——纯真年代。

关注书吧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些年，旅游业还不如现在在盛行，地处宝石山麓，保俶塔下刚刚建立的书吧，我以为不会有太多人路过。犹如朝圣者的各路“文青”、雅士，除非对书吧及主人有所了解，才会被磁石般的吸引，而这是要经过炼狱般磨练的。

我能想像书吧的主人，如何在彷徨中前行，固执地坚守信念，在那一份树影婆娑，寒风弄影的静谧夜晚，独捧一册书，荡涤心中的浮躁，期待到天明……

而后，在网上看到男主人身患重疾，更令我担忧，这份来之不易的情怀会不会轰然倒下？所幸绿荫中那一盏灯火并未熄灭，令我对女主人更有一番敬佩。想像之中，女主人到底是一位女强人，还是充满艺术气质的女性？非亲眼目睹，难下定论。昨天，在充满书香的书吧里，习习秋风的抚慰下，终于释怀。

话得从今年春节说起。由于微信的博兴，使我这足不出户之人，扩大了触角半径。一次在学友微信圈中，不知天高地厚地提出搞一册母校（杭大附中）回忆录。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竟然得到反响和支持。我也是面子十足之人，如此这般只有假

戏真做，混充一个“主编”职务而已。天佑敝人，在试探编辑数十期电子文刊《风云岁月——我的杭大附中》之后，陆陆续续收集了几十篇文章，编撰了23万余字的母校回忆录。

回忆录还等数篇约稿尚未收齐，这车也就慢慢刹了下来。余音绕梁，这乐章怎么续篇？我也出生读书人之家，虽无建树，对读书还是稍有一些“爱好”，兼学友中也不乏文人骚客。便动起一个念头，组织一个“读书会”，以读书的名义，扩充大脑，雅聚人生。有了这个歪点子、馊主意，自然得“策划”“策划”。所幸有人愿担任讲师，有人愿做忠实听众，读书会雏形渐渐浮出水面。但地点是个问题。既要有情趣，又要有好酒好菜伺候，还得方便泊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某日看到一条信息，群友和纯真年代书吧女主人朱锦绣老师是密友。为此不仅寻找雅聚地点，也勾起我想目睹朱老师庐山真面目的欲望。在群友牵线搭桥下，我与朱老师成为微信好友，互赠手机号码。朱老师听闻我有读书会计划，她也有举办“夕阳晨读”的策划，彼此不谋而合。昨晚六点有余，我兴冲冲应朱老师之约，登上夜幕中的宝石山。

走过熙熙攘攘的保俶路，踏上狭窄幽暗的宝石山一路。路上偶而遇到一些游玩的情侣，路边五六十年代建造的老房子，与时代气氛明显地不搭。一路匆匆走过，没来得及细想细看，半山腰书吧的灯光已亮在头顶。

稍事休息，吸上一支烟调整情绪，进入书吧。书吧里三两位读书之人，与服务员小伙说明来意，在稍等之际聊上几句。未几，朱老师从楼上款款下来。朱老师引我坐入左手边的小客厅，含笑说：“喝点什么？”我答曰：“绿茶。”细细端详这位

书吧女主人，衣着“锦绣”皮肤保养极好，温文尔雅似乎感觉不到“女强人”的气息，平静恬淡却从容不迫。

对话自然进入主题。朱老师打开手提电脑，向我介绍“夕阳晨读”的考量。宝石山上沐浴着晨光，许多年逾花甲的老人在这里锻炼身体，亲近大自然。这是一帮经历过时代风雨，矢志不渝对生活充满感恩的人，上辈渐渐淡去，孙辈茁壮成长。其中许多人路过书吧会被这里浓厚的文化气息吸引。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使他们晚年生活更加充实，一个老人们在初阳照耀下，听取文化名人宣讲作品的情景，化作了具体的策划，夕阳无限好，催人更奋进。

我对朱老师的策划，拍案击掌，叹曰：“好方案！”而后也介绍了我的读书会方案。朱老师静静听完我的讲述，提出她的看法，她觉得两个方案，一个对外吸引参与，一个对内重在同学情谊。我在朱老师介绍“夕阳晨读”时，亦已有所判别，双方心照不宣。

话题不知不觉中，由“公事”转入到私事。方知朱老师是温州人，在十年浩劫中，为避免“上山下乡”，小学没读完就辍学进厂工作，那时大约也没什么“童工”的法律。以后凭着执着，聪明考取了厦门大学外语系，那年是1979年。以后朱老师进入校长视野担任校长助理，这也为她打下了行走“江湖”的基础。

一位温州女子，为什么爱上杭州男人杭州的山山水水，她不说我也不问。两地分居自然不是良策，朱老师决意要亲近杭州山水，离开厦大。一石激起千层浪，从校长到下面普通教师均不解，在厦大有如此美好前程，竟然要弃她而去，你朱锦绣

脑子进了哪门子水？朱老师去意已决，不惜“私奔”，事已至此，似乎闹僵了，谁也不让谁。但是，山不转水转，一日校长邀请她去家小坐，朱老师心怀忐忑，期期艾艾跨入校长府邸。校长大意是说：“小朱啊！你在厦大干得好好的，你要离开，我是舍不得呀！年轻人要终日相守，我也理解，必竟我也过来人。罢了罢了！放你一条生路，日后不要忘了老夫呀！”（此话乃我杜撰，如有不妥，愿担法律责任）至此杭州宝石山麓多了一对形影不离的情侣，厦门大学少了一位风风火火的干将。

创业艰辛，只字不提。夫君离去，也显平静。只是说到子承父业，朱老师才显往日风采，娓娓道来，这是她的精神寄托，母性情怀，对丈夫的依恋。孩子已是28岁，高大英俊，活脱脱一个帅哥！我不仅以“知己”的心态，打探孩子的恋情。朱老师说，有一位上海女孩，与孩子已相恋七年，情深意笃。我插嘴说：“也该考虑婚姻大事了。”她说，女孩在上海有很好的前程，婚姻暂时还得搁置。

我心中暗自思量，当年朱老师为追随夫君放弃在厦大的前程，而今孩子为恋人前程放弃厮守，区区一代人，观念已是变了。变已变了，唯有在改变中守住自己不变的追求，心中一盏灯！这大约也是朱老师内心的想法？

夜幕更深，秋虫低鸣，是该到告别的时候了。我取出两本《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合集》赠给朱老师，她也送我两册《纯真年代》，一副文人的俗套。

我虚长朱老师三岁，她戏称自己为“小妹”。我说，“依你的经历学识，我该称你老师！”这是我内心由衷的想法。

义子

网络常爆某星拜某人为“干爹”，这些星多半是“义女”。义女们与干爹关系几何？负面的多一些，正面不多或者未听说过。但这“父子”或“父女”关系密切自不待言，不但密切还包含一种亲情。亲情值得赞赏，前提是不要有利益纠葛，否则成了一种交易，就不好了。

话说我的户口簿有八个人，其中有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与户主我的关系注为“非亲属”。

关子就不卖了，这位年轻人叫吴非，夫人暴春燕（燕子），孩子吴澍丰（旦旦）。

吴非曾外祖父名钟泰，字钟山，南京市人，1924~1938年任杭州之江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家父1934年入之江大学国文系就学，成为钟山先生学子，1938年后家父大学毕业，时钟山先生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又力邀家父前去任讲师和钟山先生助教。同时到师院外语系还有著名学者钱锺书，以后钱氏与家父成为挚友（题外语）。

钟山先生对家父非常欣赏、尽心提携，家父也对钟山先生执父子之道。在钟山先生严父慈母般栽培下，家父从一位贫家弟子，成为小有成就的学者，其专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受学界推崇，均离不开钟山先生。

吴非从东北辽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他母亲谭芳送他来杭州就学，始见第一面。四年以后他本科毕业企图考浙大研究生，但有个死规定，本科毕业后户口须迁出学校。如此若考取研究生户口再迁进来岂不麻烦？再说读研也是想留在

杭州。纠结之时，杭州正好有个户口新政，本科生毕业户口可留杭州，但落户要自找门路。于是谭芳与我商量想把儿子户口落在我家。

想到古语“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想到钟山先生对家父的恩惠，没有丝毫犹豫，爽快答应下来。以后吴非研究生毕业，留在杭州创业，燕子、旦旦户口落到我家，顺理成章。去年春节，吴非看我夫妻俩孤孤零零，便邀我们去他家过年，躺在他家书香满屋的卧室，随手拍几张照片发到微信，措词费思量，便取名曰《在义子家过年》。第二天忐忑不安地与吴非父亲“汇报”，他说：“很好啊！”

“义子”的好处是，他们既不会窥视我的财产，又给予我满满的亲情，赚大了！

我的兄弟凤苟

初识凤苟是2009年端午后。那时浙大紫金港港湾家园新房已到手两年了，儿子年纪也老大不小，需有所准备才好，所以着手开始装修房子。凤苟本行是木工，一开始并未进场。工程由小吴师傅负责，他还是水电工。

内人郭敏琮是劳心之人，每天从浙大西溪校区的杭大新村坐公交赶到紫金港的港湾家园，充分体会到四校合并，浙大之大和杭州的炎炎夏日。而我尚未到退休年龄，在浙大西溪校区宿管办担任“楼长”职务。继而因上峰看不惯我在楼长职务上与管理员打成一片，爬上爬下搞卫生弄得土头灰脑，有失上下级之分。再就是在处理管理员、学生关系上一些失误，将我贬到西临宿舍楼做管理员兼卫生员。所以这监工的活只得由内人担任，我则休息天一同前往。

内人心底善良，善于和底层民众打成一片，与装修工一干人等交心交底和睦相处，名为“监工”，实为交友。慢慢的，凤苟也进场干活了。

居家装修乃系统工程，其中的道道和技术含量远非外行可以掌握，如果硬要指挥弄得内行讨厌了外行，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吧。所以我们的策略是攻心为上，充分信任劳苦大众。此计省了不少麻烦，但也留下祸根。

慢慢熟了，才知道小吴是凤苟的师弟，凤苟则是小吴的姐夫。由小吴牵线，凤苟娶了小吴如花似玉的表妹。

说来凤苟也身世悲苦。父亲曾是千岛湖排岭镇一国企的大厨，因为人诚恳老实，被小人馋言，全家贬到大山深处的农村，

那是个至今连小车也进不去的地方。

凤苟四兄弟两姐妹，按农村乡俗，姐妹嫁人已算外人。有一位哥哥，年幼时手掌烫伤，因不懂医疗常识，母亲将他手掌包裹起来，造成手指手掌粘连，成了残疾人。早几年母亲中风，缺医少药，凤苟硬是放弃手中活计回家陪母亲几个月，直至送终！临了，母亲再三叮嘱凤苟照顾好这位残疾哥哥，因为凤苟是她四个儿子中最出息的。

有一次，凤苟讲到那位馋言他父亲的小人在排岭镇时有遇到，我问他：“你还记恨于他吗？”他沉思半晌，说：“都过去了！”我实在是很佩服他，半世恩仇化作清风，需要多大的胸怀？

依我个人的阅历，书读得多，并不一定素养高。凤苟这样基本在农村长大的人，在农耕文化熏陶下，传统文化影响下，方知“怨怨相报何时了”。凤苟识大体、讲诚信，办事认真到苛刻的地步，对人热情到掏心窝的程度，是我愿意和他交往的原因。又使我记起，一次遇到初中同学，他告诉我已然是教授。说起师道尊严，我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她居然不屑地说“……只是职务行为”。把教书育人只等同职务行为，可叹啊！

凤苟做木匠活，自有绝招。在安装房门时，二百来斤一扇门，居然一个人妥妥放好。他告诉我，门框离地面要有一毫米距离，以防止地表水侵入门框，真是闻所未闻，也想不到有位仁兄会精确到这地步。进门鞋橱家家都有，他给做成百叶窗的，以利通风。

如果以为凤苟只是个出色的木匠，真是屈了他了。他搞装

潢多年，水电泥工、木工油漆，甚至网络家电都了然于心。平日里一位展览公司老板长期雇他做技术总监，一有展会就由他创意、设计和监工，按日支付丰厚报酬。有次聊天，他说展会搞得多了，老温、陈至立、李克强都见过。因他长得像马云，我调侃他说：“老温一见，吃惊得说，小马改装修啦？陈至立在一边说，小马有出息！李克强干脆说，国务院装修全交给你啦！”他听了哈哈大笑。

凤苟是潮人，手机是“双枪将”，QQ、微信玩得滴溜溜转，边工作边塞着蓝牙耳机欣赏中外名曲。一有成果创意，就发张图片给客户现场汇报。更重要的是，他通过网络了解专业上的最新进展，对新材料、新工艺总能第一时间采用，这可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去年春上，港湾家园的房子因为没去居住，下水道堵塞，成了泽国。重新装修改造的任务自然交给凤苟。这是个烂活，一般人是不愿干的，凤苟二话没说接了下来。屋里家生没处去，统统塞进厨房厕所，我把钥匙一交万事就不管了。凤苟每天一早来开门，晚上最后锁门离开。手下人不解地问，东家这么信任你？他自豪的说，“是我兄弟！”

对上次装修落下的问题如墙面开裂，都一一加以重做。厕所缺防水层造成外壁浸水，他大骂小吴做的不是良心活，寻思三四天，找来进口玻璃胶封堵。完工后不忘加一句，“我是终身维修的！”

一来二去，和凤苟成了朋友。以前他叫我“蒋老师”，现在叫“蒋兄”。半夜三更发条微信来聊上几句。知道他的辛苦，常想帮他拉些活计，常常眼看谈成了，又泡了汤！倒是家里不

时有些烂活要他帮助，二话不说骑着电驴风驰电掣般赶来，不收材料费和工钱还要请我吃饭。朋友有事找人干活，给他个电话，谈妥了第二天出发，最后还信誓旦旦的说：“蒋老师的朋友，是要重点关照的！”

过年过节，送我农家土猪肉、千岛湖活鱼。无以为报，请他吃个饭，喝喝茶。

哦！忘了，凤苟姓“王”，差点把他的祖宗忘了禀告。

怀念蒋祖怡先生

我家从浙江师范学院所在的之江山上，搬到体育场路 262 号中文系宿舍。中文系则搬到现在浙江日报馆处教学办公。几经变迁，浙报那里已觅不到浙师院中文系的痕迹，只有东面的御跸社区，居住着浙大教职员工，还能使人联想到与浙师院的关系。

对于不太了解历史的，还不得不费力解释几句：1952 年院系调整，之江大学文理学院、浙江大学文学院组建为浙江师范学院；1958 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杭州大学组建新杭州大学；1998 年，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杭州大学组建新浙江大学。

作为中文系教师宿舍的 262 号早已拆除，现址是杭州电信大楼。这是一个有围墙的院落，据说做过日寇的宪兵司令部，在院落里的一口水井中曾捞起过枪枝和手榴弹。紧挨着有一个尼姑庵，以后知道叫“水福庵”。居住的中文系教师有陆维钊、吕漠野、蒋祖怡、刘操南、叶光庭和我家。另有电工杜振江先生和卢婉君女士，卢女士是以后杭大幼儿园教师。

由于这些教师中蒋祖怡先生小儿子蒋绍心年龄和我差得并不大，所以成为好朋友。1956 年早春的一个下午，院子里来了一辆奇怪的车子。那是一辆三轮摩托，只是右手那个座位改成香蕉状的棺木，原来是殡仪馆的专用车。在春寒料峭中，接走一位逝去的老人，这老人是蒋祖怡先生的父亲蒋伯潜先生。伯潜先生名启龙，又名尹耕，以字行。当时是浙江省、杭州市人民代表，浙江省文史馆研究员。伯潜先生世居杭州市富阳区大

源镇新关乡，此地山清水秀。三十余年前我因公去过，还识得一些蒋姓人士，大概与伯潜先生有宗族关系。伯潜先生家境贫寒但是苦读不辍，卓然成为文史大家、教育专家。著有《体裁与风格》（上，下）、《诸子与理学》《经与经学》等专著，为东西方人士推崇。经学，当代几为绝学。记得有杭州大学古籍所沈文倬先生的文章有人说看不懂，时任杭大校长沈善洪先生说：“看不懂的学问才是真学问！”伯潜先生的学问恰恰是这种“真学问”。但是伯潜先生不但研究这种高深的学问，还曾为世界书局编撰高初中国文课本 12 册，世界书局总编辑署曰“蒋氏国文”，他曾在多所大、中学校任教。

1957 年，浙师院在杭州市西郊建新校宿，264 号宿舍的住户均搬到名曰“道古桥宿舍”的新居。蒋祖怡先生住四幢，我家住五幢。四幢还有中文系夏承焘、姜亮夫、胡士莹、陆维钊、钱南扬、吕漠野、胡伦清。

蒋祖怡先生自浙江师范学院起至文革，一直担任中文系副系主任。那时中文系主任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如王西彦、姜亮夫等，年富力强的蒋祖怡先生则担任了更多的具体工作。众所周知，那是一个“运动”不断的年代，既要做好正常的教学工作，又要应付各种各样的运动。记得蒋祖怡先生经常到我家，找我父母谈心。蒋祖怡先生为应付复杂的工作，烟抽得很凶。我那时还是小孩子，经常到蒋家玩，常常闻到厕所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直到成年后回忆起来，才知道那是一股烟味。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了，蒋祖怡先生也难逃厄运。杭大中文系的先生们家中书籍被附中的革命小将抄走，蒋祖怡先生家也在此例。我记得他家有全套的《鲁迅全集》

也被当毒草抄走，那些珍贵的线装古籍就更不用说了。以后几次抄家已不限于书籍，连蒋祖怡先生老母的一些首饰也被抄走。邻居老红军张殿生的女儿张晓国亲见造反派在蒋家阳台上瓜分首饰。作为中文系副系主任，蒋祖怡先生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批斗甚至关进“牛棚”。在“牛棚”中，蒋祖怡先生与造反派抗争，被毒打身体至残，以后只能拄着双拐行走。蒋祖怡先生过早去世，文革中的摧残是直接的原因。

噩梦般的文革终于结束了，知识分子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郭沫若语）。蒋祖怡先生和广大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拖着病体，迎接春天的到来。副系主任自然无声无息的结束了，他仍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他要做的事太多了。文革十年失去宝贵的时间，他要从舍曾经的研究工作，他出版的著作《全辽诗话》送给我父母，至今还在我的案头。他要整理伯潜先生遗著，发表了《先严蒋伯潜传略》。他还要指导研究生。有一次他不无担心地和我说，那些研究生“《文心雕龙》看不懂！”文革造成高等院校学生知识结构断裂，蒋祖怡先生带研究生要付出多大的心血？

他焦虑、急躁，拼命地工作。终于他的病体承受不了了。中风、严重白内障，双眼几近失明。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竟然要求做白内障手术！我母亲去他家劝慰他，他说：“宁愿睁着眼睛死，不愿瞎着眼睛生！”他还是一心想着工作！亲人、老友的劝解他丝毫不为所动！万般无耐之下，家人只得同意他手术！大家担心的结局，还是出现了，手术后不久，蒋祖怡先生溘然长逝！他的生命定格在公元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一日，享年八十岁！

蒋祖怡先生家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从我与蒋绍心的亲密接触中，从很多小事中都能感受到。六十年代，我父母去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把我托付到蒋祖怡先生家（姐姐托付到陆维钊先生家）。蒋祖怡先生家非常节俭，蒋妈妈做菜时蒸的是极小的鱼，却每天用一旧信封装一袋炒米粉加一匙糖，供我课间充饥。蒋祖怡先生老母一直由蒋祖怡先生奉养。文革时蒋家的房子被一分为二，住进另外人家。蒋家只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却让奶奶独居一间小房（奶奶耳聋，叫我“遂遂”）。蒋祖怡先生育有五位子女，按年龄依次为绍惠（女）、绍愚、绍恣（女）、绍忠、绍心。蒋祖怡先生家，是典型的“耕读传家”。伯潜先生自富阳大源新关乡走出，博览群书、著述立说、教育救国；蒋祖怡先生继承国学，著作等身，为杭大中文系费心费力，使中文系享誉“北大是地主，杭大是富农”；绍愚先生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得家族真传；绍惠是北京师范大学数学教授；绍恣是杭州市电力研究院院长；绍忠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绍心是电子学专家。

杭大中文系的老先生，我见过的不少，由于年龄、学识诸原因，真正了解的却不多。但我愿尽自己的绵力，记录下点点滴滴，供后世敬仰、缅怀。

想在百度上搜索一张蒋祖怡先生像片，但百度条目上蒋祖怡先生的像却是另一位同名同姓者的像。这种情况遇到不止一次了，我太先生钟泰的像也被同名者顶替，以后花了很大力气才改过来。

搭伙记

挚友任平有一篇《“搭伙”记事》刊登在香港《大公报》上。该文记叙了文革前，他父亲任铭善先生去浙江诸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杭大中文系教师大多去搞“社教”，我的父母蒋礼鸿、盛静霞也在其中。）任平母亲马素娥女士在杭州一所小学做校长，忙于工作只有周末才回家。任平的吃饭成了问题，于是任先生马老师将任平托付到夏承焘先生家“搭伙”。

此文勾起我相似的回忆，这个时候我也被托付到中文系蒋祖怡先生家“搭伙”，非但搭伙，而且还是寄“存”！再后来，由于学校搬迁，中午吃饭路太远，我还到任平家搭过伙。

“社教”，也称为“四清” 百度文摘有：

四清运动是指 1963 年至 1966 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由于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认识这一危局使得中国共产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决定在城乡发动四清运动。刘少奇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

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使毛泽东非常不满。1962 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斥责刘少奇说：“你急什么？”

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这一切，促使毛泽东认为必须“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于是，在毛泽东看来，开展阶级斗争，已势在必行。

从国际形势看，主要的因素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周边局势的恶化，引发毛泽东对“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新中国建国后中苏关系经历了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由“四清”发展到“世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中国拖入到暗无天日的时代，这又是后话了。

我的父母亲参加“社教”是1964年，他们俩分派到浙江金华磐安农村和绍兴柯桥农村。至于谁在磐安，谁在柯桥已记不清了，只觉得他们下农村是家常便饭，正常的教学任务和科研也不搞了，学生也一起到农村去了。

那时节，家里本有一个保姆叫“苏兰”，大约是浙江兰溪人。她负责家里一应家务事，父母只管工作，我们姐弟俩只管读书。苏兰在我家时间不短，户口也落在我家。由于整个国民

经济的不景气，单位要裁人，城市人口要疏散到农村。（1962年，杭大历史系教授黎子耀先生夫人帅芳、历史系教授胡玉堂夫人章曼丽、组织部长李林岗夫人张众平等都是在那时辞去公职的）苏兰也要疏散回兰溪农村。苏兰对疏散极为不满，某日居然在父亲书房挂的一张毛泽东手持草帽的国画上，用菜刀猛砍几刀！我父母一见大吃一惊，立即向居委会主任张众平汇报，苏兰则立即被遣送回原籍（没把她定为反革命，估计看她没文化，又是农村人，已是大幸）。

就这样，我们姐弟俩吃饭也成了问题。老杭大中文系的先生们，不但学术上相互切磋，而且情感上也很融洽，于是父母把我托付给同是道古桥宿舍邻居的中文系副系主任蒋祖怡先生家，把姐姐托付给中文系陆维钊先生家。（陆先生不久后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在的中国美院）

我到祖怡先生家，不但搭伙，也睡在他家。祖怡先生上有老母，下有五个子女，依次为：绍惠、绍愚、绍恣、绍忠、绍心。蒋妈妈操持家务。祖怡先生也去农村搞“社教”，绍惠、绍愚求学去了北京，家里只有奶奶、蒋妈妈和恣、忠、心三位子女。1963年还是大饥荒的年代，蒋妈妈为保证孩子们的健康动足了脑筋。她把小河边菱藕的块经取来，滤出淀粉做成“藕粉”，把我和绍心从黄龙洞后山打下来的毛栗果磨成粉做“米糕”。每天早上，她用一個旧信封装半袋炒米粉，加一瓢糖，给我和绍心用来课间充饥。有时候运气好，蒋妈妈弄来一些极小的“猫鱼儿”，在油里干炸给我们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慈样的奶奶、祖怡先生、蒋妈妈早已过世。

紧接着1963年下半年，我就学的杭师附小（现文三小学

所在地)，在文三街、文二街之间的求智巷，建起小学“本部”（现学军小学所在地）。我升入五年级后搬到本部。这样一来，上学的距离远了，常常会迟到。记得为上学不迟到，冬天天朦朦亮就上路，有时星光还未隐去。中午回家吃饭，也是紧赶慢赶，很难吃上一口囫圇饭。父母心疼我，就和家住河东宿舍（现文三新村）的任铭善先生商量，让我中午在他家搭伙。自然是没有问题！

其实任平家原来也是在道古桥宿舍，他家在六幢二号，我家在五幢四号，透过我家后窗，可以看到他家，开了后门去他家更方便。我们两家的友谊可以追述到三十年代。抗战前，我父亲和心叔先生（任先生字）同在杭州之江大学国文系读书，心叔先生早我父亲两年入学。两人同样的先生，搞同一种学问。任先生铁骨铮铮，从不人云亦云，是极有学识和人品之人。1949年以后，受当局赏识，被派到华东革大深造，又被任命为浙江师范学院副教务长。正当任先生以为可以在新时代大干一场，报效国家的时候，他落入了“阳谋”的圈套，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是年，45岁年富力强的的心叔先生，却拖着人力车，将刚入住六幢二号的家，搬去河东宿舍的两居室（六幢二号是三室一厅一厨一卫）。

待到我去心叔先生家搭伙时，那顶“右派”帽子虽已摘除，境况未有多大改善。我每天去搭伙，任平母亲马素娥老师都不在家（她在“城里”一所小学任教），吃饭时只有任先生父亲和一位老保姆“屠妈”。任先生吃饭不苟言笑，有时候默默地在我碗里夹几筷子菜。屠妈烧的菜清新可口，以素为主。至今和祖怡先生家“猫鱼儿”一样映象深刻的菜是“螺狮”。任平

还不忘在一旁解释：“螺狮是穷人的荤菜。”至今想起来任先生这样杰出的学者，沦落为“穷人”叫人如何不伤怀？（1959年，周恩来确定要重编《辞海》，任先生“带帽”参加编辑，被誉为解决问题的“刀子”）

那位屠妈，原本杭州人氏，有后辈。看到任先生一家遭此横祸，甘心情愿留在任先生家照顾起居，且不要一文钱的报酬。这位无甚“文化”的善良老太太，她身上闪耀的传统文化光芒，令我无地自容！且不要鄙视传统，当我们都变得贪婪，这世界会变得其妙无穷？在任先生家搭伙的经历，随着这些住在道古桥宿舍子女的父母聘请老杭大职工李承德夫人王大妈，集体送饭而止于此。

两段“搭伙”往事，穿越半个世纪，被挚友任平的《“搭伙”记事》唤醒，小而又小，然而它折射的是时代大背景。在及时行乐的今天，我是否应该彻底遗忘？亲们，你的答案是什么？

五十八年的感动

去年 10 月 25 日接到原杭州大学中文系陆坚教授电话，说两位中文系学子吴承德、童汀苗先生要请我去一家餐厅小聚，在湖滨银泰“丰和日丽”餐厅设宴。我告诉陆坚先生，儿子出差在外他们三人就不来了。

不久又接陆坚先生微信，对两人作大致介绍：“蒋遂：你好！明天中午吃饭就是五个人。请你们的叫吴承德，原是宁波卫生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作陪的是童汀苗，原是浙江话剧团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我也是算作陪的。”至于宴请的原因，他又说：“……不客气，应该的。我们三人都同一年级的同学。吴和童是同一班的，他们关系一向很好。我和他们不同班。这次吴专程来杭州请你们一聚，主要表示对蒋、盛二位老师的深深怀念和敬意。……我们是五七级、六一届。你不用回请，吴承德明天上午十一点到杭，中午吃好饭马上就回宁波。如果你手头还有《神仙眷侣》，建议送他们一人一本。”

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有一点小激动，往事悠悠，岁月无痕，58 年前的学子，还记得当年的老师，还要专程赶到杭州，就为宴请老师的子女，怕也是不多！

周六上午 11 点，与陆坚先生打的前往湖滨银泰。因为和陆坚是老熟人，在车上一路聊起来。这老熟人陆坚先费点笔墨说一说。陆坚是中文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古典文学，和我妈妈一个路数。百度介绍说：“陆坚，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多次应邀作为客座教授或非常勤研究员赴日本讲学或进行合作研究，现任中国诗学会理事、中国词学会

理事、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山水旅游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是唐宋诗词，独著、合著或主编的著作有十八部，论文八十余篇。曾获浙江省省级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两次，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次，三等奖四次。”其实这一大堆头衔是当下“砖家”、“叫兽”的常态，记得他著有《陈亮传》想查证一下，可是，这“可恶”的百度接下来又说陆坚是计算机专家“被载入美国西部名人录、科学与工程名人录和世界名人录。”你说叫人气也不气？

陆坚曾任杭大中文系主任、教务处处长、杭州大学党委委员。1982年搬到杭大新村27幢60号14室，和我家对门，这样的邻居做了很多年，直至他搬走。由于“混”得熟了，我内人叫他“陆兄弟”；我儿子叫他“陆伯伯”，叫他夫人“何妈妈”。刚搬来时，弄不清他两个女儿名字，我三岁的儿子居然说：“大的叫陆越，小的叫陆隼！”有一次我儿子得罪爷爷，被爷爷拖到厕所里一顿“忽辣面”（杭州俚语，暴打）关键时刻“陆伯伯”挺身而出把我儿子“救”了出去。十年前《蒋礼鸿集》出版，陆坚在校对注释上花了不少心血，“劳务费”分文不取。

到了湖滨银泰，我们仨犹如“瓜佬儿”进城，摸不着头脑。何为“瓜佬”？再费心解释一下。1958年华夏大地实现“人民公社”，土地集体所有，“贫下中农”乃至“地富反坏”干活拿“工分”，年底结账。由于此举打击了农民积极性，到年底居然“工分”不抵口粮，名为“倒挂”。杭州市民中的“一小撮”人极为看不起他们，曰之“倒挂佬”，简称“挂佬”，又嫌“挂佬”直白，改作“瓜佬”。“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真是无限啊！

摸摸索索来到“丰和日丽”餐厅，童汀苗先生已在门口恭候，引入“贵宾包厢”318号。吴承德先生与我及内人握手言欢。说起宴请的原因，吴先生说看到网上流传我《杭大“教授楼”那些年，那些事……》《道古桥宿舍那些年，那些事……》等“拙文”，回想起做我父母学生的往事，与刚从香港返回的童先生约定，专程从宁波赶来看望与宴请我们。童先生则于4月14日，我在西湖区双峰村九通茶庄召开《杭大附中回忆录》研讨会，他们在隔壁西湖人家举行同学会时有一次相会，真是“偶遇不如相见”。

说得最多的还是我父母。童先生、陆先生说我父亲是教他们时间最长的老师，教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童先生说原来收藏有父亲的上课讲义，厚厚一沓油印本。由于“文革”、搬迁，以后不知所踪。我说自幼看到父亲抽屉里有钢板、铁笔、蜡纸，父亲的讲义都是他手工刻上去的。我母亲还说过我父亲和任铭善先生都可以不打底稿，一口气将讲义刻在蜡纸上，不做一丁点改动。大家又是一通感叹，叹曰这样的学者今后没有了！吴先生说起第一堂课是我母亲上的。还说有一次上《诗经》，同学们要她用传统方法“吟唱”，母亲说“下次，下次”。吴先生以为这是戏语，没想到“下次”开课，母亲就用古律“唱”将起来。吴先生这样说，无非是讲做人要有“诚信”，母亲这样言传身教，为的是宏扬传统文化中的精粹。

前段时间写《搭伙记》，记载我父母下乡搞“四清”，我在蒋祖怡先生家搭伙（姐姐在陆维钊先生家搭伙）之事，记不清下乡时间和地点。正好三位都是亲历者，陆坚很明确说是1964年11月份。因为他们对“四清”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地点

童先生帮我分析说应该是在浙江诸暨磐山。我之前说是“磐安”，童先生说是磐石，因为那是蒋鼎文的故乡。童先生的分析帮我印证了母亲曾说那是出国民党高官的地方。

陆先生随和，童先生儒雅，吴先生则非常直率。说起“四清”，吴先生作为工作组成员，见田间地头有散落的小块荒地，就建议社员用来耕种，收入七分归公，三分归己。农民们有了这份收入自然高兴，吴先生也为自己的“创新”沾沾自喜。很快，上面领导下来开会了。一声“谁是吴承德？”把吴先生从会场上“拎”出来，吴先生懵懵懂懂地说：“我是！”“知道不，你是在搞‘资本主义’尾巴！”吴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好在吴先生与社员打成一片，“三同”加“一同”，涉险过关。“三同”者，“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同”，学会了抽烟。

现代社会，微信“萌哒哒”！三位先生都有微信。吴先生把合影传到朋友圈，须臾便有反应，一位上海老学生说我“像蒋先生多一点”。我觉得，“形似”，不如更应该“神似”多一点！

《杭大附中回忆录》前言

此书是根据电子文刊《风云岁月——我的杭大附中》基础上整理、增补删减而成。

杭大附中，犹如杭州大学随风飘逝，且比杭州大学更加淡出人们记忆。早年有位熟人打车说：“去杭大！”的哥径自将他拉到杭州大厦，令他啼笑皆非。杭大附中更只有在学军中学校史中窥得其名。然而，有一种“母校情结”，对于我们曾经求学求真的学子、在其工作的教职员工，杭大附中的校名是那么刻骨铭心，须臾不能忘怀。更有一群特殊人群，文革中的“老三届”，是随着杭大附中之名消失而被驱逐到“广阔天地”、白山黑水之中。“杭大附中”，其实映衬出我们青春的记忆、无边的往事，这就是本书刊行的目的。

曾记得，在借用保俶塔小学场地，简陋如工棚的临时教室里传来的朗朗书声。

曾记得，那慈祥如父母的校长，谆谆育导，开启人生征途。

曾记得，那风华正茂、学识渊博的老师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

曾记得，那树荫下的操场，我们角逐体育金牌。

曾记得，那眩目的舞台上，我们翩翩起舞。

呵！曾记得，曾记得……

母校，您承载了我们多少美好的回忆。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只恐怕，这本小书，记不下我们所有的思念，所有的爱！

忽如一夜狂飙来，千枝万朵梨花折！正当高三学长紧张备考高等学府之际、初一学弟学妹信心满怀准备六载学年改为五年之时，一声春雷敲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鼓。

命运从此改变，国家宣布停止高考！已优先入取军事院校的蒋鲁辉、侯兰儒目瞪口呆；准备放弃高考的尹俊骅莫名惆怅；对无须紧张备考而兴高采烈的同学，李杭愤然说：“你们高兴得太早了！”是啊，有谁知道，有谁知道，命运之舟驶向何方？

业已调离附中的朱联书记被揪回来，剃成阴阳头、泼上墨汁、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叶葆汉、金敏、朱金鉴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大会批斗、强迫劳动；大批学子的父母被宣布为走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资本家地主婆。血统论掀起狂飚，昔日同窗好友手足相残，高高举起的皮鞭疾风暴雨般抽打稚嫩肉体！破四旧，革命小将踢开杭大老教授家门，将一车车珍贵典藏悉数抄走。狂热！革命大串连，挤破头皮、扒火车进京一睹红太阳耀眼的光辉，两脚踏步走，死也要死在天安门广场上！派性肆虐，为分清“扩大的支委会”还是“支委扩大会”而成立了革命战斗队联总（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独纵（杭大东方红兵团独立纵队）两派辩论会一逐高低；杀向社会，“冲锋战斗队”占领市府大字报高墙；省联总、红暴派又分化了附中的派系。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一句轻描淡写的“要武嘛。”打开了全国武斗的“潘多拉魔盒”。1967年7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更是将动乱升级到了武装冲突阶段。

血肉横飞、生灵涂炭，数以万计生命瞬间魂飞魄散。附

中自然也非世外桃源，殴打“狗崽子”和“牛鬼蛇神”，各派间冲突事件不断。至1967年8月22日一场暴戾的武斗拉开序幕！由小规模冲突，引起更大的械斗，联总独纵双方不断调兵遣将。比古代冷兵器时代更原始野蛮，棍棒夹着现代物质硫酸抛向对方，鲜血在飞溅，混杂着肉体烧灼的臭味，身影在地上打滚，骨裂声声刺耳不绝。狂热、狂燥、狂暴！人性冥灭，年轻学子变成盖世太保、党卫军，“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8年8月26日，毛泽东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工宣队开进附中，随后军宣队也进驻到附中。消灭山头、控制局面、成立杭大附中革命委员会。

附属中学被指为“封、资、修”的产物，在全国统统取消。1968年11月，母校依更名学军路的文三街，改名学军中学。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整整六届“老三届”学子被赶出学校，下放农村。浙江余杭农村；乔司、长兴农场；黑龙江抚远、同江、富锦、依兰农村；鹤立河农场；虎林兵团；大兴安岭林场；投亲靠友……老三届像尘埃般悄然撒落。

懵懂者兴高采烈、糊涂者人云亦云、抗拒者咬牙切齿、聪明者使尽手法！说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扎根农村一辈子，绝大多数人真正体会到远离故乡、被时代抛弃、被现实压垮的痛苦。远赴黑龙江富锦二龙山公社北山大队的初三徐明姑娘，在割草备燃料归程时，在大草甸被马车生生压死、同伴鲁

新压断胳膊！多少年后听说徐老先生每晚抱着爱女骨灰盒入眠，惨，惨，惨！二龙山公社东风阳大队，是我插队所在地，当我侥幸以“特照”回杭后，同窗好友们还在那里苦熬。至 1975 年，最后的两位女知青洪佩英、忻龙英在拿到“病退”通知前夕，月黑风高之际遭遇黑衣人抢劫，所幸是一只手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多少事难回望，多少事不知晓，多少事不想再写下去！

.....

积极挣扎、调动智商，只为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1978 年 10 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一场灾难划上一个极不圆满的句号。

时隔 37 年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把经历过的遥远往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因为我们已有资本，我们衣且暖、食甘美、住有宅、且歌且舞且行。还缺一点什么？锦衣足食是生活的一种状态，但不是全部，人之将老，回忆成为主旋律。将对母校的美妙记忆，留在字里行间。我们经历过的磨难，或者耿耿于怀，或者悄然忘却，或者藏匿内心，但都不希望再重复一次。因此我们用笔、用心揭开岁月的伤疤，警示后人，也给自己一个交待。

人生是一种态度，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校——杭大附中。

《风云岁月》电子文刊第四期卷首语

本期刊登任平和俞志新两篇大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两篇文章加起来约有一万五千字，差不多要算是中篇了；之所以迫不及待放在一起刊登，是因为两位仁兄投稿已久，皇天不负有心人；之所以认为看客必能静下心来阅读，是因为文章各具特色。

先说《读书记》不能不说说著者任平。任平教授于我等凡夫俗子中乃凤毛麟角也，颇能与张梦新学长、陶士和学长、郭羽诞学长并列四大教授。当然叱咤风云的浙商代表尹俊骅学长、痴心于教育事业的任继长学长、教坛新秀的特级教师张学雅学长，等等等等，也均为附中长脸。

任平家学渊远流长，其祖父任雨楼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在江苏如东双甸镇兴办乡学，造福一方。其父任铭善先生，出之江大学，曾任之江、浙大教授，浙师院副教务长。任先生才华横溢，于国学之外善书法、治印，能写折之梅花。夏承焘先生有诗云：“事事输君到画花，墨团羞对玉槎丫，不如听我说归梦，湖月圆时船到家。”“玉槎丫”，梅。然而任先生禀性耿直，1957年以言论获罪，幽幽不得志。任平母马素娥女士，从事教育事业终身，曾任之江大学附小、古荡小学等校长之职。在这样的家庭成长，加上有附中一千名师如金敏先生、余学瑞先生、史佩珍先生、尤丽华先生、叶信昌先生、朱德忠先生等悉心指导，任平自然不同凡响。闲话少述，还是请读大作吧。

文革至今还是敏感话题，邓小平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

阶级斗争，指出文革是巨大灾难，对我国造成无法弥补的文化和经济损失，但是至今还有人在为文革招魂。志新的《文革杂忆》以自己的视野对文革来胧去脉作出评述，不失为一家之言。

志新的文章在叙述过中兼或带有对附中文革中种种情况描述，读来似乎又回到那个疯狂的年代。其中有关“武斗”，我当时恰好没有在，但是所见所闻均不在少数。想到那些同窗学友，在武斗中兵戎相见，血肉横飞，这样的场景难道还要几十年（十几年？）再来一次？

读毕，捂卷长思，中华民族经历的苦难太多太久，何以还有人人为文革唱赞歌？为什么，为什么？

任有成学长的《在那青春萌动的日子里》则是另一种风格。有成学长以短小精干见长，着墨不多但栩栩如生，称作“记忆的碎片”恐怕再合适不过。作为“近讯”却成功穿越半个世纪到附中，令人叫绝！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谁都能写，点点滴滴弥足珍贵。可喜的是更多学友已在尝试这样的写作，甚合我意！

两篇悼念文章本应放在三期《清明特编》，由于没赶趟，在本期中作为《续》刊出。对李国良（李国樑）老师而言，这篇竟然是第三篇了。何以这位普普通通的历史老师有这样的殊荣？我觉得最根本一点是李老师没有“架子”。“架子”这个东西往往自己觉不得，也未必是大毛病，但拒人于不是千里之外，也令人疏远。李老师未必才华横溢，但恰恰是他的朴直，使人怀念。

张丽容老师 1972 年进校任数学教师，这时已经不叫杭大附中。推荐人有些犹豫，问我能不能用，我回答：“登！为什么不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的想法是，附中与学军一

脉相承，哪一个也不能否定，更不能排斥。虽然我们中一些学友对更名耿耿于怀，我尤其如此。但应该尊重历史，这不是搞回忆录的态度吗？一味排斥学军，让我们的老师们，他们都早已跨过历史的鸿沟了，如何面对？让又重新回到母校执教的同学如王川玲、张学雅等情何以堪？

张丽容老师的人品勿容质疑，这篇悼文有情有义。直到看了程正洛老师的《简介》，更加心潮澎湃，神驰万里。张老师生 1951 年，出于建筑工人家庭，她不折不扣是一位“老三届”，或许还是我的同届！她 1972 年走上教坛，我同年因“特照”回杭州。现在她已经告别了这个令人又爱又恨的世界，而我还在苟且偷生，苟且偷生啊！

《风云岁月》电子文刊第六期卷首语

川玲学长的《尘封的记忆》重头戏是在常山白石插队的经历。常山曾经是浙江贫困县，白石更加贫困。从文章描述中可以看到那里血吸虫横行，农民苦不堪言。病人肚子大到看不到自己的脚，这是何等悲惨？不由想到“绿水青山枉自多，华陀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诗写于1958年，而10年后瘟君依然在。川玲她们五位年轻姑娘在这样环境下，住在泥垒成的屋子里，每天重复着繁重的体力劳动。

所幸的是人性没有泯灭，有一次两位姑娘迷失在深山里，几十位村民打着火把进山寻找她们。此景此情，我想也许是川玲“扎根农村”很重要的精神支柱吧！上山下乡固然锻炼了人，但这不能成为肯定这条错误路线的理由。广大“知识青年”在逆境中苦熬、抗争、奋斗恰恰证明这是一条错误路线，当今亲历过上山下乡的领导人，心里再明白不过了。

1973年，为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大学开始高考。川玲经过激烈的竞争，有幸被浙大录取。正当她兴高采烈之时，却被堂而皇之的理由告之，要她留在农村，而她的名额却被公社干部子女顶替。真是欲哭无泪啊……有人说那个年代没有腐败，川玲的经历不是一个最好的回答吗？只有亲历的，才是真实的。且不说还有多少“知青”被“潜规则”，被生活所迫放

弃抗争，甚至客死异乡。人可以善良但不可糊涂，更不可为虎作伥。

所幸 1975 年川玲终于脱离农村，回到父母身边。俞芳校长和王蛟书记又请她回母校代课。凭着对母校的感恩，凭着在艰难险阻中磨练的意志，她从代课到转正；从高中学历到完成大学梦。一步一个脚印，走得踏实而辉煌！

川玲的回忆跨度远远超过十年浩劫，在《风云》中还是头一篇，我欣赏这篇文章，也不止步于创刊初期的时间构想。事实上在保持原定设想的构架下，我们已在尝试突破附中与学军的鸿沟；在论坛中吸纳与附中无关但支持《风云》的朋友。海纳百川，方显英雄本色！同样有一个“川”，川玲你赞同吗？

我想说，从母校出来，又反哺母校的，还有任继长、郁昭陵、张学雅、娄彦飞、余之惠、俞唯上、李小怡、童银江、王兵、王刚……这是一片赤子之心啊！

林鹤年老师如今 87 岁了，真正称得上“松鹤延年”！《我们这支队伍》既称得上回忆，又是实实在在的展望。展望什么？

“但时间又会把一批批新的老人带进这支队伍来。学校是永恒的，我们这支队伍也是永恒的。”多么风趣，多么寓意深刻。

林老师笔下的大军，居然发展到 100 多人，令人震惊。昔日的老师们退居三尺讲台后，生活得有滋有味，这是一支高素质、高涵养的队伍，所思、所想、所行自然不同凡响。如今又有程正洛老师、史佩珍老师、吴亚南老师、黄洵燕老师以及王川玲学长、娄彦飞学长等加入到我们微信“附中回忆录论坛”，为《风云》撰稿增色。

当我们这些昔日的学子也步入老龄时，我们的恩师又一次

站在不是讲台上为我们上起人生之课。“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向他们深深鞠躬，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特殊的年代，会有特殊的记忆，196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雷锋”。大家学雷锋、人人做好事，一时间成为社会的共识。当年我为了学雷锋竟把马路边、泥土中捡到的扣子交给老师，期许得到学雷锋的认可，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慨万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雷锋也有重新审视和评价的必要。无可否认，雷锋现象是政治需要、路线斗争的需要。但是善良的人们，尤其是极其单纯的青少年，却以真情投入到这场政治运动中。海东的《“小虎子”与“辅导员”》真实详细地为我们描述了附中一支名为“小虎子”的学雷锋突击队。

这篇文章通篇读下来，最大的感受是“小虎子”们的单纯、善良、无私奉献，同时也包括班主任卢瑞宝老师和附中的校长书记。感谢海东为附中、为我们留下了这一珍贵的史料。千秋功罪，谁人予以评说？

本人拙作《反动标语来无踪去无影》是一则“冷幽默”，起因荒唐结果出人意料。我想说，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无所不在，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随随便便作一个涂鸦，由于意外的效果竟然引起草木皆兵，由于自然现象令人啼笑皆非。人们终日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任有成学长的《纪念徐朔方老师》有话要说。徐朔方何许人？在专业范围之外知道者也许不多。“朔方”是先生的字，名步奎，杭州大学终身教授、浙大百年文科名家之一。徐先生研究的是古典文学，主要领域在汤显祖等明、清戏曲。但现代文学、外语均不差。我曾拜读过他的现代诗，不同与他人的是，

他把古典诗词的韵律溶入现代诗，朗朗上口。

徐先生不是老古董，穿牛仔裤、游泳、骑自行车。个性极强，有一次我父亲的学生要我求徐先生开方便之门，被徐先生一口回绝。有成学长的文章使我又怀念起故人。

《烟雨西溪——杭大新村记忆》后记

我自幼生活在杭大新村，至今已整整一个甲子了。那里的一草一木对于我如此亲切，曾经工作生活在那里的文化名人、专家、教授我闭上眼就会展现在脑海里。2018年3月6日，杭州市及西湖区领导实地考察杭大新村，指示要把杭大新村改造提升为历史文化街区。

本着对杭大新村的热爱，我着意收集杭大新村的文字资料、历史图片，同时鼓励杭大新村的子女撰写回忆文章，寻访当年在此生活过的前辈和后人，一一动员和鼓励他们重拾历史，汇忆成文。期望给未来的杭大新村历史文化街区留下一份比较翔实的历史记忆和史料。

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朋友的热心支持。杭大新村的子女中：著名语言学家任铭善公子、编委任平撰写了《前言》和回忆文章；化学系教授戚文彬女儿戚志坚联系了生物系教授陈士怡姪女陈慧萱、数学系资深讲师黄祥楸女儿黄百铭、书画家陆维钊先生公子陆昭徽、物理系副教授王惠熹女儿王川玲、教育系教授陈学恂女儿陈敏、中文系总支书记孔成九女儿孔丽娜、历史系教授倪士毅女儿倪赛英、化学系教授金松寿公子金观源、历史系教授胡玉堂女儿胡大苏、中文系教授蒋礼鸿女儿盛逊等，都在短时间内写成文章，回忆在杭大新村度过的美好时光和人生经历。甚至地理系教授毕敖洪儿媳陈瑞、历史系副教授叶作舟外孙女洪迎、地理系教授严德一外孙张宏也参加到回忆中。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曾经的助手计伟强、傅杰先生回忆了在大师身边的情景。著名学者郭世佑提供了怀念沈善洪校

长的美文。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年逾八十的杭大中文系老学子陆坚教授和顾志兴研究员，特别支持撰写回忆文章，多次和我协商，提供照片，并且不顾年迈体弱，身体力行写出高质量的、长篇回忆杭大新村恩师们鲜为人知的往事文章。病榻诗人张延，系中文系张仲浦教授公子，患帕金森症十余年，也艰难提笔，满怀深情地回忆了注入文化名人灵魂的家园。远在大洋彼岸的中文系教授徐朔方公子徐礼扬先生撰文叹曰：“在外漂泊了整26年，我想我是有点想家了。”家——杭大新村的家。原杭大校长陈立先生女儿陈亦平、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女儿姜昆武教授、杭大新村老住户沈一兵教授等提供了信息。众多杭大子女提供了父辈的珍贵照片。

成书过程中，获得档案馆马景娣馆长、校史研究者许高渝教授、浙江记协秘书长陈建华先生大力支持。感谢原杭州大学副校长金锵教授为本书作序，杭大历史系胡玉堂教授女儿胡大苏为本书作序。编委任平、祝毅、岳耀勇、陈欣文为此书出版通力合作。

需要说明一下，本书收录的文章，绝大多数是新鲜出炉的，并未在公开出版物上刊登过。感谢老杭大公众号的陈欣文先生，不遗余力先行在互联网推送。另有数篇已刊文章实为佳作，得到作者同意选入。本书收录的文章基本按照供稿时间排列，《文化名人风采》中的照片参照《杭州大学教授志》排列。

特别令人悲伤的是作者任珠女士未及看到本书刊行，骤然逝世！这更使我意识到责任重大。

因编者水平有限，涉及范围和深度均不足。不当和缺点错误，还请儒雅的阅者指正。

《枉凝眉》开卷

爱妻郭敏琍秉承公公婆婆为医学事业捐献遗体，是有大爱之人，宣扬敏琍也是一份社会责任。敏琍逝世后，承亲朋好友关切爱护，无以为报，一直思考怎么办？如何将传统、平凡、善良、美丽、开朗、活泼的敏琍展示予人。着手为敏琍办追思会，从数千张照片挑出一小部分制成相册送人，谢于祁小妹妹、袁琼芳小朋友都鼓励我把与敏琍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成书。我才疏学浅难胜大任。某日去“无语良师碑”看望三位逝去的亲人，路上得一灵感，或可将在微信中对敏琍的思念整理出文字，以飨读者。

初试获万余文字，遍摘录遍思考，亦可将捐献仪式上敏琍单位、浙大医学院的致辞，我的“悼亡妻”一并纳入。还有杭州日报、钱江晚报、澎湃新闻的报道。曾经写过的《内人的幸福生活》（原名：《夫人的幸福生活》，经学长张梦新指正，应作内人解）等等。原意此篇命名《孤蝶》，后改作《生死恋》，再改作《生生死死九回肠》。这“九回肠”记得是母亲的诗词，但一时查不到，但我确信是她的诗词。计划不如变化快，或许随着时间推移还有许多变化。基本体例按敏琍逝世后的日记时间为序，间或插入种种回忆。而回忆事件因为思维是散发性的，不能尽按时间次序，我尽量记录下时间。一种尝试，不知成体统否？或许前无古人，不知后有来者否？我自成长后性格张怪，与他人相去甚远，也许继承了父亲“狷者”的个性。但是我坚信，每个人在法治和道德的范畴内，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人的生活方式，我可以不认同，但我不会指责他人。对人评头论足是我最讨厌的事情。

第六章：游记

温州寻故之旅

一、引子

网络上结识永嘉马鸣（陈文辉）先生，他一度对温州地域文化感兴趣，经他的热心引荐，于是又识得方韶毅先生。有“书痴”、“猎书狂人”之称的方君，著有介绍温籍文人的《民国文化隐者录》。他致力于温州文化脉络的研究，广罗温州文化典籍，钩沉乡土历史，其用典之广、研究之深，令人赞叹。他说：“温州是个被误解的城市，商名之下，似乎一片文化沙漠。其实，走出温州的不仅是商人，还有文化人。”

因父亲蒋礼鸿曾在温州避日寇之难，与温州颇有些缘分，后来与温州文化界人士一直多有往来，方兄希望我把父亲与温州的情缘描述一番，遂写下《蒋礼鸿与温州》一文，刊登于《瓯风》杂志。

父亲于1938年除夕，从安徽屯溪至温州投奔恩师夏瞿禅（承焘）先生，并识得吴鹭山（天五）先生，春节后去平阳郑楼省立师范学校任教，在温师结识张宪文先生。文革后，父亲为编撰《汉语大词典》任副主编，领导浙江省杭州、金华、温州三个编写组，又带过研究生——原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袁泽仁，与温州文化界人士苏渊雷、游汝杰、吴思雷、马骅、

马锡鉴、陈增杰等人均有交往。

约三十年前，我曾任浙江省磨料磨具生产许可证审核组成员，两赴温州。那是改革开放的前期，温州已呈现出经济快速发展的态势，还有“要看资本主义，请到温州去”的坊间传言。温州的服装大包小包销往全国各地。一大早满街都是摆地摊卖油条的公务员。最有意思是温州的出租车，一种叫作“菲亚特”的小轿车，小小的身子像个甲壳虫，乘客要从前面爬进去才能坐到后排，价格是不管到哪里都只五块钱。那次回杭州时，从晚上五点上车，到达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了，原因是到处都在修路，走走停停。

温州经济最终被承认，被仿效，成为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快速发展模式之一。其实温州还是一个以“永嘉学派”为代表，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之邦。比如，温州宋代戏文（南戏），既合乎“阳春白雪”又不离“下里巴人”，堪为雅俗文化完美结合的艺术典范；有明代“帝师”之称的刘伯温，还有清末朴学大师孙诒让等。当代更有词学大师夏承焘、历史学家徐规、数学家苏步青等名家，可谓连绵不绝，声名远播。

暑期来临，内人郭敏琍终年劳碌，就想带她外出去散散心。我最想去平阳郑楼寻访一下父亲的足迹，探访父亲的朋友或者后人。温州友人非常赞同我重游故地，看看温州的新面貌，畅游永嘉楠溪江。素未谋面，热心如方韶毅先生者，办事果敢、雷厉风行，将行程安排得有条有理，连我想见的人都一一联络到位！就此，我对这次“文化寻故之旅温州行”充满着期待！

二、温故

2011年7月8日，赶赴售票处购买去温车票，岂知保俶路上的售票点已经拆除，又赶到学院路售票点，排了将近40分钟的队，购到去温州的动车D3211号、回程是动车D5456。遂告之马鸣、方韶毅两位，方先生在QQ上问：“住宿有何要求？”我回说：“无啥要求，只一个标准间即可。”

7月16日上午7:50，乘上去温州的动车D3211号。一路上温度适宜，车外的天空时而飘过片片白云，时而下起几滴小雨，车内只有摄氏24度。过了台州以后，动车渐次穿越许多隧道，过隧道时，耳压极大，有一种刺痛的感觉。于是知道孙中山先生早年梦想建金温铁路而不成，是因为地形复杂，山路崎岖所致。11:14动车准时到达温州南站，马鸣、方韶毅已在站门口等待。

进入市区以后，便随方韶毅来到温州著名小吃“天一角”，四个人一起闲聊一起用餐。随后到国贸大酒店安顿下来，放下行李。方韶毅告诉我们，温州大学校史博物馆热情邀请我们前去，参观有关父亲事迹的陈列，于是我们迫不及待驱车前往温大。

温州大学位于温州高教园区，进入大门，给人有种浙大紫金港的感觉，地域广阔，设施完善，一条碧波荡漾的河流穿越校区，名花林木满园生辉。来到温大校史馆，温州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林娟娟女士、校史博物馆馆长金小进先生、校史博物馆研究员张索先生均已在门前等候，如此热情，很使我感动。

林娟娟女士首先对我们来访表示非常欢迎，并深情地回忆了父亲任教时为温师带来的好学风气。张索研究员是父亲在温

师的学生张宪文先生族侄，平时注重校史研究但并不常亲临讲解，这次破例为我们介绍博物馆一应陈列。我们看到父亲的像片挂在博物馆之醒目位置，展橱里陈列着父亲的手稿，那是我们不曾看到过的原稿。陈列的书籍相当齐全，除有大部头的《蒋礼鸿集》，单册的《蒋礼鸿语言文字论丛》、《类篇考索》等，居然还有未曾公开出版的《书魂——蒋礼鸿教授纪念文集》！就此知道张索先生在收集资料方面是花费了何等精力，其心思之慎密，令人动容。

博物馆将《汉语大词典》作为学校的重大成果，放置在显著位置，其中资料、照片众多，我们也尽自己所能，帮助博物馆辨认某些照片上的人物，如一张照片上有浙江古籍出版社蒋金德先生未署其名，我们立即将些情况告诉张索先生，他非常重视，谓一张照片之人物辨认是何其重要，并立即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将蒋金德先生的名字记录下来，以便日后补录。

我们一行人细细看来，慢慢走去，不觉快到晚餐时间，林娟娟书记表示要为我们接风，并按原计划邀请父亲的故人及后裔、学生参加会面，我们不好推托自然应承下来。接风摆在温州“金谷大酒店”。

出席宴席的除日间熟悉的林娟娟书记、张索先生、方韶毅、马鸣外，还有温州图书馆卢礼阳先生、书法博士周延先生，另外就是我最期待见到的几位：

张宪文先生公子张纯浙；温州大学教授陈增杰；温州大学教授袁泽仁；温州大学教授马贝加。

张纯浙先生现是温州鹿城区人大代表，他父亲张宪文先生70余年前与父亲相识在平阳郑楼。这天我与他两人再次紧紧

握手，是一种父辈之间友谊的传承，此时此刻我恍若是在梦中！纯浙先生赠我《张宪文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集》《仰云楼文录》，我还赠他《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合集》。席间还与他聊起他的女儿，当年在浙江工业大学读书，应宪文先生要求来我家看望过我们。得知小姑娘现在环保局上班，令人欣慰。

增杰先生则赠我《陈增杰文集》，并内附言：

蒋遂仁兄指正

谨设令尊大人教诲之恩书内蒋礼鸿先生和汉语大词典文
为纪念蒋先生作 又第二二页三一页三六页九三页二三 0
页五二六页援引先生鸿论

陈增杰敬赠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六日

我也以《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合集》回赠陈先生。

泽仁先生自父亲过世后，少有见面，一晃十数年矣！当年泽仁先生在给我父亲的信中，还对我儿子提起“时常想念他的胖伯伯”，今天的胖伯伯似乎与原来的样子所差无几，只是头发又少了些。讲起当年的话题，自然又是一番感慨。泽仁先生最令我感动的是，当年研究生毕业，其它人都托路子、开后门留在省城杭州，而他却甘愿回到温州师范（现在的温州大学），后担任起中文系系主任之职，数十年来为温师培养出大批学生，使温州的文化与经济也得益于这些人才。我觉得人处在什么位置固然重要，但能够发出怎样的光芒才是更为重要的，泽仁先生正是做到了这一点。

马贝加先生则是我中学的同学，她父亲马锡鉴先生是温州

名流，与我父母都有交往。席间她还回忆起在中学时，我与她同是一个造反派组织“红色风暴”的同仁。她现在退而不休，还在搞她的汉语研究。

席间，温州图书馆卢礼阳先生赠我《仰云楼文录》与《张宪文纪念册》各一部。

林娟娟书记的安排，使我达成到温州的第一个心愿：探访父亲的朋友或者后人。席间我饮自微醉，大家依依不舍，挥泪作别！

三、楠溪江行

7月17日，按原计划访问平阳郑楼温师旧址，因那边正值行政区调整，一时找不到接头的人，遂先作楠溪江古村落游。是日，在永嘉乡贤黄伟（龙湾区环保研究所所长）引导下，与我们夫妇同行的还有浙大博士朱文信，马鸣与方韶毅及其小女方沅芷，坐上温州文化创意企业雅集老总赖冠州先生的奔驰车出发。

路经市区，黄伟停车，向我们介绍张璠碑。该碑在温州鹿城区人民西路妙果寺西侧，为明嘉靖皇帝赐大学士张璠御碑所建的亭。原设在张璠家庙中，建国后移此。木构建筑，面阔三间，四面回廊，亭内有汉白玉石碑三座；中为御制诗碑刻有张璠像，东西碑为嘉靖皇帝所书张璠名字碑，上各有“广运之宝”玺文，左右仿刻“御笔”、“嘉靖”两圆形图章。东碑刻“赐永嘉张元辅名”，下列“孚敬”两字；西碑刻“赐永嘉张元辅字”，下列“茂恭”两字。

然后驱车经瓯江大桥，直趋永嘉。轿车一上大桥，天色突

变，磅礴大雨从天而降。滔滔瓯江波浪翻滚、远处群山烟雨濛濛，惊雷响处、天崩地裂！约经一个小时，轿车驶入楠溪江畔笔架山下古村落“苍坡村”，彼时雨停。

黄伟介绍说，古村落谓“笔、墨、纸、砚”，村中有一乡道由鹅卵石铺就，宽不过五尺，由东至西直指笔架山，是为“笔”；两方碧水是为“砚”；砚台两旁搁置长4.5米、厚0.5米、宽0.3米、端头打斜的条石是为“墨”；整个村庄就是一张“纸”。由此可以看出楠溪江流域村民对耕读的热衷，也很好地解释了温州地区民众注重文化的原由。古村落的祠堂里还有摆放着练身的石锁，有一百斤的、二百斤的、三百斤的等等，黄伟介绍说，村落的读书人除重视读书而外，还重视健身，是为文武双双不落。

村东头有“望兄亭”一座，原来是因村内有位村民哥哥住在一里外另一村落，每每哥哥探视完弟弟回去时，弟弟都要相送，而哥哥也会回送。久而久之，哥哥对弟弟说，不必再送了，于是弟弟就建起这座“望兄亭”探视回家的哥哥，而哥哥也在那一头建起一座“送弟阁”。兄弟相约，每每其中一位回到村落，就以点灯为记，通报平安。此种情境，诠释了乡民间的亲情，是中华民族美德也。

整个村落的建筑大多以宋代建筑为主，村中人不多，大多是一些老人和孩子，和中国时下大多数的农村没有什么差别。参观的人也不多，与江苏周庄、安徽宏村、浙江乌镇相比，没有那样喧嚣的场面。村里的旅游管理似乎也是由本村自己管理，处于一种原始的管理状态。

当我们继续参观村落时，已是雨过天晴，远处群山露出一

片翠色！我们忙不叠取出相机一阵狂拍。

离开苍坡村，驱车前往楠溪江有名的“狮子峰”，一路上星星点点的古村落繁多。方韶毅介绍说，这楠溪江乃国家级风景名胜名胜区，但由于管理不善，有碍名声。一些古村落曾发生莫名大火，疑为村民想建新居始然，如果有关领导再不重视当有毁损古村落之嫌。

中午吃饭是在著名景点“狮子峰”的农家餐馆，黄伟等忙不迭点了许多当地的特产，有江溪之中的鱼、虾、蟹，有放养的农家土鸡，还有一种不知名的野花炒成的菜，席间还饮畅了楠溪江和雁荡山啤酒。

狮子峰下楠溪江里有不少游客戏水，小姑娘方沅芷让马鸣为她捉溪鱼数条，放在塑料瓶里，临走又请马鸣放回水里，马鸣问她：“为啥不带回家去玩？”沅芷说：“拿回家小鱼要死的。”可见小姑娘有好生之德，还随时将丢弃的塑料瓶等放入废垃圾箱内，又有环保意识，可喜可贺。

一路驱车下来，黄伟又带我们到古村落之“琵琶井”参观。该井设计为琵琶形状，下入井内是一节一节的台阶，是为方便妇幼取水，极具安全功能。去到“琵琶井”一路是鹅卵石铺就的道路，在古树参天的树荫下格外古朴幽静，路边常有些小小的路亭，马鸣告诉我说，这些路亭除有放置柴火的作用外，还兼有为乞丐提供一个遮风挡雨落脚处。古村落的村民有如此仁心，民风岂有不淳厚矣！

黄伟热心有加，相约再到他的“贤林阁文化驿站”一坐。该处以永嘉山水为庭院，凭东瓯文脉为背景，是为永嘉黄屿长寿村乡间别墅，供文化人休闲聚会养生。永嘉文化界人士吴振

生先生，高远先生、杨丽和女士也前来聚谈。稍后黄伟向大家赠书，方韶毅向吴振生先生等人赠书，大家纷纷签名并合影留念。

四、郑楼寻梦

一直以来，对郑楼就有一种思念，70余年前，父亲踏入郑楼，开始他的从教生涯，也是在郑楼识得温州文化名人张宪文先生。父亲那首小令：

上廊林影故娉婷，客子明朝又远征。
未免些些黯别情，且休停，
认取郑楼月一分。

令我浮想联翩。由于听说郑楼人去楼空，已经锁上大门，于是方韶毅联系郑楼当地政府，得到乐意接待的消息后，于18日驱车前去郑楼。

我原以为郑楼即是温州师范的校舍，在路上才得知，郑楼原是一个地名，而温师是建立在郑楼的。近一小时路程，到达郑楼，方韶毅联系镇政府，工作人员林一凡前来陪同。马鸣事先打了预防针，说前去实地未必想像之中那样，务必有所准备，有时不如保持心中一份期盼更好，我完然不顾。

林一凡先将我们带到温师后边，谓前门也许有锁。这是一片泽地，碧水连天，一座八角形小亭矗立眼前，再看题匾，是为“溯初亭”。温师早年由贤士黄群（溯初）投资所建。溯初亭碧瓦红庭，一看便知是事后重修，是不是在旧亭基础上再建，

虽有立碑，未加注意，总之离我想象之中的溯初亭大相径庭。

绕到前门，锁居然未上，推门进入，只见蒿草丛生，蛛网结地，不见一丝生气。小林说那当年的建筑尽悉无存，止有两座 50 年代建造的苏式教学楼尚在，推门进入，一片狼籍，天花板均已脱落，只见黑板上书有：

温师院曾经的辉煌，而今休也！人去楼空……

据张宪文先生《记在郑楼温师的逝水流年》记载，1984 年底，他来到郑楼，那时温师已被改作平职农技学校。听小林说以后又改作某学校附中，再以后被人拍买所得作为驾校存在。现驾校已不再，由于土地是教学用地，所以还未改作它用，只是当地政府已无权对它作处置。小林说，早几时有政协委员前来视察，似有恢复师范旧居的想法，但此种想法据我看来，实属困难，个中原因不说自明！

某不才，平仄不解，押韵不通，仿效父亲小令作阙如下，谄笑方家：

上廊林影已无存，游子今日又朝圣。
未免些些黯惆怅，且休停，
留取郑楼月一分。

五、后记

短短三天很快流逝，也到了我们结束此行的时候了。19 日方韶毅又前来送行，旅馆资费也一定要由他解决，临行前相约韶毅有机会到杭州再聚，挥手惜别！

此番温州之行，访故人，窥旧地，虽有遗憾但收获颇丰。与我 30 年前来温州，感觉温州正与日俱进，变化巨大。温州的街区已不像先前那样狭小，人民的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大街小巷奔跑的既有奔驰、奥迪、宝马那样的豪车，也有现代、福特、标致那样的经济实用型轿车；早市整理店铺的小年轻拖地抹桌、擦拭展品，传承了温州人的勤快。然而温州也有时下的城市通病，交通拥堵、房价高居不下、名校一席难求。此等垢病亦非温州有识之士可以解决，乃是世界性难题。

历史与文化只有传承、梳理、光大，方能事半功倍。相信温州在一批热心乡邦文化事业的有识之士努力下，定然会还以温州历史文化之真面目，使人在热衷温州经济模式的同时，也看到温州文化深厚的积淀。

探访“老杭大民宿”

轰轰烈烈的四校合并（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转眼过去 17 年了，建校 40 年的杭州大学始终无法令人忘怀。

从网络上始知，在余杭径山镇有一个叫作“老杭大民宿”的去处。今年五月间，与内人驱车冒着倾盆大雨前去探访。老杭大民宿位于径山镇小古城，是个名曰“慢谷”的开发项目其中之一。

民宿在一片水田之中，背靠茂密的山间竹林。整个建筑院落由中国美术学院设计，时尚而不失怀古风格，由主楼、餐厅、主人自住房组成。

院子是一片绿茵嫣然的草地，坐在遮阳伞下品茗，可以看到面前水田之中起落飞扬的鸬鹚，把你的思绪带向远方……

主楼有一楼大厅，二、三楼客房。一楼大厅有接待客人的吧台，休闲沙发。最重要的是两架硕大的书架，书架上安放着杭大人捐赠的与杭大有关的书籍。在这中间我看到附中学长张梦新主编的《杭州新闻史》；怀念任平父亲任心叔先生的《文心梅韵》和任先生的著作《无授室文存》。也看到余杭人引以为骄傲的《章太炎全集》（全集中有一部书是我父亲断句的，因为太炎先生那个时代是不用标点的）。以后我赠送的《之江大学的神仙眷侣——蒋礼鸿与盛静霞》《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合集》也加入其中。主楼和大厅都悬挂着任平手书“老杭大”，用挑剔的眼光看，杭大的历史文存还不太丰富，是否与主人将精力投入“经济效益”有关？

二、三楼是客房，共七间都用与杭大有关的地名命名，如“文三街”、“下宁桥”等等，三楼的房间是榻榻米的布置，租金从480元/间/天到上千元不等。有意思的是民宿只有网络而无电视，向工作人员打听，说主人提倡夜深静读，不提倡娱乐。我倒是觉得主人立意很好，但也有不为读书而来的客人，在一楼大厅放一架电视，既不妨碍读书，又可提供娱乐，岂不更好？

与工作人员闲聊，这民宿已是声名远播。双休日客房是要预约的，问：“非双休日客房是否可打折？”答：“要问问主人。”看来在管理上还有潜力可挖。来客也有把整个民宿客房包下来，两三家合伙过个周末。有在这里过新年，吃年夜饭的（自带材料，自己加工），也有上海江苏远道而来的客人，据悉小古城要去上海等地推荐，年轻貌美的女镇长担纲主讲。

有了前次探访，取到主人朱早先生的名片并加微信好友。朱早先生早年杭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供职杭州电视台，与我好友宋一洲、沈一克相熟。以后转战房地产，百度上有介绍云：“2003年任金成房产集团副总裁，负责房地产营销和企业文化、旅游等项目。2009年兼任杭州金巴登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主要负责杭州市余杭区径山小古城“休闲之窗”项目。”

端午，与朱总相约再赴民宿，遗憾的是朱总贵人事多，他指定总裁助理何伟利女士全程陪同。清晨，一干人兴冲冲奔赴老杭大民宿。同行有亲如姐姐的赵晖女士，1995年我父亲蒋礼鸿住院，与赵姐父亲赵恩生教授同一病房，因相似的文化背景，两家如亲人般。赵教授系浙江肿瘤医院副院长，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中国大百科全书·肿瘤篇》编委。周波、钱江夫妻，周波女士为浙大职员，与我内人是好友，钱江先生供职市政府宣传部门。田维嘉、金文兴夫妻，田维嘉女士父亲田

志伟先生是杭大物理系教授，省政协常委，田维嘉与内人是好友，金文兴先生供职杭州电信部门。

到了民宿，何伟利女士早早在门口恭迎。一干人等自然参观、拍照、喝茶，那茶是著名的余杭径山茶，茶圣陆羽即是“径山茶”开山鼻祖，此地还有陆羽遗存。何伟利女士娓娓道来，这民宿只是小古城“慢谷”项目之一，还有“阳光农场”、“金色池塘”和“有机蔬菜基地”另三个项目。

我们在何女士陪同下，先来到阳光农场。古色古香的门楼还悬挂着上次活动“西溪河畔的回声”大红横幅。何女士介绍说，农场的土地低价出租给市民，由农场负责耕种管理。都市人可以带着子女前来体验生活，收获归租客所有。农场有茅草顶亭子下大片喝茶用餐场地，适合搞如同学会等活动，百把人不在话下。眼前水盈盈的蔬菜瓜果，架上的串串葡萄，一洗都市尘埃。

再上车，来到金色池塘。眼前是一片浩淼的池塘，周边既有临池的钓台，也有深入到水中间的钓台，何女士介绍说，还经常会有大型垂钓团体来此活动。说话间，只见一条约五、六斤的大鱼钓上水面，活蹦乱跳。池塘边有一样式特别的亭子，上书“发呆亭”三个大字，据说此名系朱总出。习习凉风下，你自然可坐在这里尽情发呆，抛弃红尘的烦恼。中餐在金色池塘的“茶径”餐厅用膳，这餐厅是得了什么设计大奖的，只可惜忘了什么设计大奖。

第三次到民宿，是和杭大新村邻居沈丽娟、韩盼兮、黄成坤老师去的，这样好的地方，自然要介绍出去，更何况还有一种“杭大情结”！这次追加了“有机蔬菜基地”，基地的自动化大棚令人耳目一新。

西塘游记

2015年9月3日，天气晴好，与内人作西塘游。

西塘位于浙江嘉善，资料介绍乃一典型江南水乡，摄印作品中的西塘展现出潺潺流淌的河水，河边上那木质的走廊很是吸引我。

高速公路车流稀疏，大约一个多小时到达嘉善，按照路牌指引，很快到达古镇西塘。没承想西塘界外小车排起长龙，有些后悔在节假日出游。

进入古镇先如厕减轻负担，这洗手间居然很有特色。洗手间宽大明亮一尘不染，丝毫没有异味，竟然还有休息室。休息室置有沙发，更有电视机，一干人等一身轻松后陷在沙发里观看九三大阅兵，心情不错！

古镇门票120元/人，对于我们杭州不收门票的情况有些不太习惯，入乡随俗，好在60岁以后门票价减半。进门后，这西塘入口粉墙黛瓦，河塘月色，乍一看“现代化”得很，心中未免嘀咕，这是古镇的风貌？随大流吧！跟着众人穿过树影遮掩的小路前行，古镇的“古”方才羞羞搭搭地掀起盖头，露出水乡面貌。

沿河，是熙熙攘攘、比肩接踵的人群，河中驶来坐着身穿桔黄色救生衣游客的木船。沿街，一排排小店珠光宝器琳琅满目，空气中传播着羊肉串的气味。小店里的老板及娘，一开口吐出北方口音，许是招商引资的功劳。总算还有些小店出售当地土特产品，“老太臭豆腐”据称是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遍地开花，遗臭万年。西塘颇具特色的民族服饰，却大多

由外地人经营，让人有些惊诧。

一番游步，一番观赏，不免有些考量。其实这江南水乡，改革开放前比比皆是，那时并没有人当宝，及至开放后，建设新农村，毁了绝大多数处，剩下未曾摧毁的却成为了宝物，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此番游西塘，一为证实西塘不必游，二来还有一个念想未了。西塘曾经有我一位老姐姐，而今她已随风而去，睹物思情是也。

2000年冬天，我在嘉兴的堂姐蒋淑琴去世，我星夜赶往嘉兴。推开门伸进头去，家里正在举行道场，一片“阿弥陀佛”之声。甥男甥女看到我说：“舅舅来了。”席间有一位穿着杭嘉湖平原特有的蓝花布衣老太太，颤抖抖起身，拉起我的手喊我“小弟”。我纳闷起来，从来没有听说有这么个老姐姐呀。外甥女马上介绍说：“这是我妈妈的姐姐，紫宝。”

既然是我淑琴堂姐的姐姐，就是我的姐姐。紫宝姐姐仔细地端详着我，说：“一看就是蒋家的人！”岁月的流失并没有冲淡她对蒋家人的印象。于是我们俩手拉手聊起了家常。

我告诉紫宝姐姐，父亲蒋礼鸿已经于1995年过世，母亲还安在。她关切的：“问你妈妈现在身体还好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我也问她你现在哪里，生活过得好吗？她告诉我她现在西塘，子女都在乡镇企业工作，孙辈也都长大了，在学校念书。家里装上了电话，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半夜12点，我和甥男甥女把淑琴姐姐送到嘉兴市殡仪馆，据说赶在前面烧头炉是吉利的。我们在殡仪馆熬到天明，冻得

“飕飕”的。办完丧事后，我赶回杭州，起身时紫宝姐姐拉着我的手，一付不舍的样子。我默默地拍着紫宝姐姐的手，没有向她要电话。我心里知道也许我和紫宝姐姐就象这世上的两颗尘埃，再不会相遇。

回到家，我疑惑地问妈妈：“我怎么有个紫宝姐姐，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呀？”妈妈肯定的告诉我，是有个紫宝姐姐。

妈妈说紫宝原来是个孤儿，流落在嘉兴街头。我的伯父蒋礼仪看她可怜，就把她领回家里，认作女儿。自此我才知道紫宝姐姐的来历。伯父对紫宝姐姐疼爱有加，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对待。谁知天下竟有如此恶人，淑琴的舅舅偷偷的把紫宝卖到西塘，从此亲人分离，天各一方。

以后，外甥女告诉我紫宝姐姐去世了。她去世前，一大帮我的甥男甥女一起去西塘看她，紫宝姐姐逢人便说，“我娘家人看我来了！”可见她对家是那么依恋，对养父一往情深。可怜的紫宝姐姐！写到此我已泪流满面……

烟花三月下扬州

记住这一天，公元前 486 年前的今天（9 月 27 日），一个城市诞生了，她叫“扬州”！对于我这毫无历史感的人，这“公元前 486 年”，即距今天整整 2500 年，足以震撼到我，也许也会震撼您？

扬州由春秋时代吴王夫差挖邗沟，筑邗城开始，几经变迁，几经兴衰延绵至今。由史记载，这里有春秋时代的邗沟（古运河）用于漕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确立了扬州的交通枢纽地位。汉代兴盛、唐代繁茂、明清鼎盛。李太白一句“烟花三月下扬州”道出了文人墨客对扬州的眷恋。清兵屠城，扬州浴火重生，废墟中留下了汉隋帝王陵墓、唐宋古城遗址，前朝私家园林……

扬州之于我，是我故乡，我母亲盛静霞的出生地，自然，血管中流淌着对扬州的思念。

母亲原籍镇江，与扬州隔江而望。据说盛氏在镇江有宗谱，势必也是一个大族，镇江盛家搬迁到扬州是什么原因，年代已久不得而知了。至于母亲为什么说自己是扬州人，学者何宗恒曾问询过她。她说：“因为江南人看不起江北人，索性说自己是扬州人了。”

1917 年农历初春的二十三日，母亲降生在扬州湾子街。自扬中实验小学、扬州中学，19 岁的母亲走入南京中央大学。这 19 年的生涯是母亲与扬州的情缘。在我少年时，母亲常常向我说起扬州的瘦西湖、平山堂，我还时常吃到亲戚从扬州寄来的“金果粉”……

抗战胜利，母亲随中央大学返回南京，带新婚不久的夫婿蒋礼鸿回扬州省亲。岂知我外祖母对我父亲并不满意，说：“家里一些田产没有，见了人一点言谈世务不懂，‘堂堂二小姐’不乘飞机回来，让他在房里叠被，带回一个‘小当差’。”母亲气愤之下离开扬州，直至1956年，外祖母去世多年后，才带全家回扬州。那也是我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

扬州盛家老宅是清朝建筑，有前后进、厢房、客座、柴房和院子，是外祖父买入的。1958年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除母亲留下客座，其它被收归政府。收归政府后，一位远亲宋玉珍还留在那里，守卫着盛家不多的遗产（以后处理家产，有满满一皮箱古字画被另一位宋姓远亲取走，母亲至死都不知道）。另一家张姓房客也留了下来。1986年前后，母亲觉得再不会回故乡定居，遂以低价将客座卖给挤住在盛家门房的肖姓四口之家。

母亲一世低调，在中央大学得名师汪辟疆（名国垣，号辟疆，晚号方湖，江西彭泽人）、吴梅（字瞿安，号霜厓，江苏苏州人）、汪东（原名东宝，后改名东，字旭初，号寄庵，别号寄生、梦秋。江苏吴县人）、唐圭璋（字季特，满族人，江苏南京人）、卢前（原名正绅，字冀野，自号饮虹、小疏，江苏南京人）等指点，于古典诗词颇有创见。

2007年，《扬州晚报》为挖掘扬州历史名人，主编朱广盛（网名邗上老人）联系到我。我尽记忆提供了母亲的情况，又向北京表姐袁义淑了解外祖父情况，一并提供给朱广盛先生。是年4月27日，《扬州晚报》以“解密新闻”整版刊登了朱先生撰文的《才女人生诗意留霞》，又发布母亲年轻时照片倩影，此时距母亲谢世一年又11天。

我自 1956 年首次回乡，以后串连、下乡、工作期间又三次去过，不过都是行色匆匆，内人郭敏琍也随单位旅游去过扬州。上月底有几天空闲，两人一同去扬州，用内人话说是“回扬州婆婆家”。一路之上，车经湖州、长兴、溧阳、镇江，天色由雨转晴，心情也豁然开朗。及至到长江边、过润扬大桥，扬州掀开盖头，展示在眼前。扬州给我以过去大不相同的印象，道路宽广、绿化成荫、高楼大厦疏而不密。坐在宽敞明亮的公交车里，感觉真是出了天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又到天堂！意想不到的，同行中有一位杭州女士、扬州媳妇。她嫁到扬州 30 余年了，此次去杭州探望老父亲而归扬州。它乡遇故知，分外亲切！她指点我们去旅馆的路，我向她询问扬州与杭州的比较。她说扬州人亲切、温和，生活成本不高，比起杭州的高消费、拥堵，扬州实在是个宜居的好地方。以她双重身份说出来的话，不由得使人不信。

找到网上预订的扬州个园东侧百时快捷酒店安顿下来，一室一卫、一床一桌，虽然狭窄尚能安身。要命的是酒店的 wifi 时断时续，内人坐在门口才能上网，交涉全然无用，看在酒店 88 元/天的费用，暂且将就吧。而后打电话给盛家老宅房客张同济先生，问清他现在的居所“阳光水岸花园”小区，坐上公交前往。张同济，幼时称他“小济”哥哥。1981 年他在杭州钱江铁道部疗养院疗养时，曾来我家拜望母亲。三年前再来杭州，凭印象找到我家，以后保持联系。小济哥哥毕业于北京铁道学院，在安徽蚌埠铁路分局工作到退休，告老回乡。母亲在扬州中学《树人堂下》纪念集上的介绍资料就是他操办的。见到哥哥嫂子，大家分外开心，聊起我第一次回扬州，小济哥哥坚持是 1955 年，说是那年他刚刚小学毕业。而我印象深刻，1956

年 12 级台风中心过杭州，从扬州回家，家里的家具都被学校派人集中到中间，因为房子已漏水，这台风是有据可查的。然而我并未争辩，区区一件小事，何须搞得一清二楚？水太清则无鱼。后来当他查看到当年的气象资料及杭州的有关报道，小济哥哥立即在微信中对我说：“有气象数据佐证，的确是我记错了！”小济哥哥是有心人，请我们吃最正宗的扬州狮子头、煨干丝、炒软兜（鳝鱼背），使我重温幼时感觉，真乃人生一大快事！

第二天一早我俩迫不及待起床，前去游览扬州风景名胜。瘦西湖在薄霭中向我们展开英姿。纤细秀丽的瘦西湖与杭州西湖相比，似乎互换了一种角色，瘦西湖宛如一位江南少女丰姿绰约，杭州西湖倒反而是大气开放，不失北派豪爽。世界就是如此奇妙，人生也常有角色互换的时候，所以须得胜不骄败不馁。跨上高高的五亭桥，亭角上风铃发出清脆的铃声，招唤游子回乡。极目望去，瘦西湖西侧水域尽数开发，十八里水路曲曲弯弯。辗转从瘦西湖北门走出，不远处即望到大明寺高塔。大明寺是著名东渡日本高僧鉴真出家之处。而我幼时在母亲嘴里，常常听到大明寺却是叫“平山堂”。大明寺高上山颠，扬州市政府花大力气二次开发，古代栖灵宝塔毁于兵火，眼前高塔则是现代兴建，容岁月变迁方能成为古物，一时之感想！

盛家老宅，当是最想见的去处，何况还有杭州媳妇回扬州婆婆家！以前回老宅方位路数皆熟悉，现时多年不回故里，城市变化，不知所以。凭着先进科技“百度地图”导航，穿过大街小巷摸索到老宅。扬州早年为某政要居住地，此人下令老城不能拆，以免找不到回家之路，无形中保留了古城，诚可叹也！扬州小巷有的宽不过一公尺，两人交汇得侧身而过也，这也有

说道。古时有人建房，紧挨着邻居家，其父说：“让他一尺又何妨？”邻居闻之，也让一尺，此即“二尺巷”之来历。中华文化糟粕甚多，也有精华，此一例也。湾子街被政府确定为“历史文化街区”，盛家老宅门前挂有“扬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牌匾，湾子街够得上此殊荣的仅此两座建筑。老宅门口一老年男子在整理木材。我和他说是盛静霞儿子，他连连说：“知道，知道！”老邻居尚存小济的哥哥张同甲。我想看看老宅，但是后进已锁了门，从门缝张进去，是在搞装修。客座也改得面目全非，铁将军把门。唯有同甲哥哥住的前进，小院花开，依然如故！

扬州人有喝早茶习惯，邀上亲朋三两人，品味花色早点，一派悠然自得。一日走进饭庄，问服务员：“可有水晶包子？”那厮想必不是本地人，一脸茫然。旁边一位衣着整洁的中年男子插话：“水晶包子即三丁包。”陌路相逢，坐下来与男子闲聊，我说因母亲是古典诗词名家，所以回扬州省亲。他搭话说不久前去世的张充和，“张氏四兰”祖籍非安徽，而是扬州。他对扬州故掌侃侃道来，如数家珍，不由使我大吃一惊！一位看似普通的扬州市民对家乡之了解、之自豪、之崇敬，如潜龙在水，深藏不露。故乡啊，我为你骄傲！

临别，约《扬州晚报》朱广胜先生一晤，朱先生带晚报记者张庆萍女士一同前来。相约明年春上，再次“烟花三月下扬州”。数日后，张记《才女盛静霞之子回扬寻根》三篇新闻报道发表在《扬州晚报》上。

耳边回荡着费翔的歌——《故乡的云》：

“回来吧，回来吧！浪迹天涯的游子……”

南通，叫我如何不恋你

一、引子

2015年10月3日我夫妻俩与周波、钱江夫妇一起去南通旅游。因周波在浙大教育学院担任研究生秘书，为学生分忧解难，深得研究生喜爱，有“妈妈”美誉。在浙大教育学院就读的南通研究生人数众多，国庆长假“儿女”们一定要请“妈妈”、“爸爸”到南通游览，周波捎带我们“舅舅”、“舅妈”一同前往。

中餐在周家吃了水饺，12:30由钱公子津开车送到杭州汽车北站。前两天津津在网上订了票，直奔自动取票机，周波操作了几次均不成功。询问一位刚取了票的小姑娘，她说可能这台机器有问题，需换一台试试。周波干脆请她代劳，小姑娘倒也爽快，换一台机器一次操作成功，总算有惊无险！通过安检口，站内人声沸腾，一派繁忙！

大巴驶上国道线，左边是高速公路。路况不太好，颠簸得很厉害。写微信也很困难，一不小心就把内容全删了。为了省高速过路费，可怜的司机、可怜的乘客！

6时许，车过长江大桥，桥下百舸争流，码头上起重机长臂刺穿青天。不久南通汽车东站赫然矗立在眼前。周波的学生甲，在路边停车接我们上去，一路开往市区。华灯初上，市区星星点点展现在眼前。道路宽敞笔直，车流稀疏，学生甲始终以60码速度前行。到了某繁华综合体（因行色匆匆，人名地名未知其详）北疆饭店喀纳斯包厢，一干甲、乙、丙、丁……与“妈妈”热情拥抱，坐将下来“胡吃海喝”，子女们轮流向

“爸妈”敬酒，“舅舅”我也只得频频起身，以示谢意。席间得知这些学生都是南通各地中小学教师，为提高自身教学科研水平报考了浙大教育学院在职研究生。因为还得养家糊口，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南通杭州两地奔波。而在职研究生又不被导师重视，学习、论文答辩犹如爬山涉水艰难险阻。令人感叹，令人赞叹！

二、濠河

南通城不大，古时称通州。濠河之内为旧城所在，濠河亦即护城河。吃毕，子女强烈要我等坐游船濠河一游，盛情难却，恭敬不如从命！坐上游船，缓缓驶去。濠河两岸灯火通明，水榭楼阁映入水中，时而幽幽垂柳，时而闪闪霓虹。游船上导游娓娓道来，字正腔圆，国语水平不输央视名嘴。南通城古今的历史，如痴如醉在空气中传播。

三、狼山

逾日，吃过早饭学生甲又开车接我们去南通著名佛教胜地——狼山，到狼山学生戊负责导游。整个狼山区域由狼山、马鞍山、黄泥山、剑山和军山组成，西临长江。狼山为五山之首，是全国八小佛教名山之首，号称“江海第一山”。车到狼山，停车场非常宽广，每辆小车停车费5元/次，令我们杭州人何等羡慕！狼山海拔108米，在杭州只能算上一座小小山，登上它比登杭州宝石山还要轻松。怎耐南通城非风景旅游城市，景点不多，加上又是“八小佛教名山”，遇上长假，登临者众。我们随比肩接踵的人流，一步步向上攀登，快到山顶，有一烈

士墓居山道边，上书“白雅雨墓——南通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墓地不大，古朴庄严。心里纳闷，这白烈士所谓何人，为何葬于山颠？

原来，白雅雨清同治七年（公元 1868 年）生于南通，居城南白陆巷。自小天资聪慧，18 岁时考中秀才，先后入江阴南菁书院和上海南洋公学就读。光绪二十六年（公元 1890 年）任聘于南洋公学附中、澄衷学堂执教史地，1908 年任聘于北洋法政学堂，同年创建我国第一个地理学会——中国地学会，任编辑部长，1910 年创办我国第一个地理学期刊——《地学杂志》。1904 年随蔡元培加入光复会（后随蔡一起入同盟会）。任教天津时，组织了天津共和会，在教书生涯中，培养了不少革命青年。武昌起义后，白雅雨在北方策应发起滦州起义，成立北方革命军军政府，任革命军参谋长。只可惜由于叛徒出卖，起义军在向天津进攻途中，遭清军阻击，在古冶被捕不久遇害。1912 年 9 月，灵柩运抵南通，葬狼山。1915 年为纪念烈士牺牲三周年而立碑，碑文“白烈士雅雨之墓”为张謇（謇，与简同音）所书，碑阴刻墓志铭，为江谦所撰，张謇书，1914 年阴历十一月立。熙熙攘攘的人流，路经白雅雨墓，是否还会怀念这位为推翻帝制、争取民主的斗士？

四、博物馆

下午，学生己、庚、辛、壬陪伴我们参观南通博物苑。南通博物苑为中国第一家公共博物馆，始建于 1905 年，由南通近代创城人张謇创办。其时张謇将建设中的通州师范学校公共植物园规建为“博物苑”，隶属通州师范学校，张謇出任苑总

理。以后在历史的长河中，几经变迁，形成现在的局面，被国务院设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博物苑看似和其他博物馆没啥大的不同，要看就得看出与众不同之处。果然看到，博物苑内陈立有块一古砚，古砚背后文字拓片显示为郑燮（郑板桥）所有。问工作人员，板桥是南通人？对方说是。进一步查阅百度，方知郑燮为江苏兴化人，与南通无涉。不知郑燮的出生地亦或祖籍是否存在争议？更不知是否有借名人上位之嫌，史家倒是可以考证一番。无独有偶，博物苑创始人张謇与古代出使西域的张骞，名极相似。南通人对张骞是否南通人，说法也不明，但没有大肆吹嘘，这倒显示了一种大气和大度。南通还是以博物馆见长的城市，珠算博物馆、计量博物馆、蓝印花布博物馆、风筝博物馆、濠河博物馆、纺织博物馆、城市博物馆、长寿博物馆、地毯艺术博物馆、个簃艺术馆、沈寿艺术馆，有如此多博物馆的城市实在是罕见，依我之见，南通大可打出博物馆城的名片。

五、水绘园

第三天一早，毛校长（学生己）、沈校长（学生庚）、周主任（学生辛）又驱车带我们直奔如皋水绘园。由于时间长了，慢慢得知一些学生情况，方知姓氏与职务。水绘园为明末清初文人冒襄（字辟疆、号巢民）私家花园。冒襄一生著述丰厚，有《先世前征录》《朴巢诗文集》《芥茶汇抄》《水绘园诗文集》《影梅庵忆语》《寒碧孤吟》等。《影梅庵忆语》洋洋 4000 言记叙了他和董小宛缠绵悱恻的爱情，乃忆语体文字鼻祖。

六、文脉

南通文脉厚重，南通人最推崇的是张謇。张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省海门市长乐镇（今南通属地）。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近代南通城为张謇所创立。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开拓者，上海海洋大学创始人。

我对南通也有一份特殊的情感。父亲1934年就读杭州之江大学，四年大学生涯为他打下了安身立命的资本。在这四年中一位南通籍教授徐益修（昂）对他的学问人品产生很大影响。37年日寇攻入杭州，之江大学迁移和解散，益修先生回到南通。先生回乡后，日寇知先生名望，要任他伪职，先生坚辞不受。父亲作诗叹曰：“钟子严严徐子真，两翁辉映典型存。饥犹择食温而厉，（抗日战争时，徐师拒敌伪之招，曰：‘饥犹择食’。）俭执辞调道亦尊。……”（钟子，钟钟山（泰）先生，与徐益修先生同为之江大学国文系教授，江苏南京人。49年土改、66年文革因对实行的政策不满，两次辞去大学教授之职。50年代应周恩来邀请，在长春举办国学院，传播国学。）

南通还有一位老人也令我很是尊重，即如东双甸镇任雨楼先生。任先生雨楼，是为双甸镇望族，信奉“教育救国”，日本留学事成之后回乡兴办教育，其谪孙任平先生告知，双甸镇中小学均雨楼先生创建。何以知道雨楼先生？侃一侃个中原由。始知雨楼先生，是在王元化先生主办的《学林》中看到父亲作《任心叔先生传略》一文。任心叔（铭善）为雨楼先生公子，任平父亲。何以心叔先生传略，由家父撰写。因心叔先生与家

父同在之江大学就学，任先生入学早父亲两年，两人志趣相投成莫逆之交。以后分分合合，在之江、浙师院、杭大共事，两人合作撰写《古汉语通论》一书。任、蒋（我父亲）个性均孤傲，从不与人合作，《通论》则唯一破例。

挚友徐小多得知我游南通，提供信息：“南通厉害的人不少，有张謇、徐益修、赵丹、李方膺、韩紫石、范曾、郁钧剑。”任平说：“双甸中小学是我祖父创办，丰利小学以前我母（注：马素娥）是校长。都有我书写的碑存校内。”更令人惊诧的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有王驾吾、陆坚、陈坚、肖瑞峰前后四位系主任，都是南通人，这恐怕在南通历史乃至中国教育史上，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奇观。

七、寻访

为此，我极希望能去双甸或丰利，亲炙任、马两家的办学之地。沈校长得知我的愿望，说他就是丰利小学毕业，家在丰利。当下一合计，立马驱车一个多小时，奔丰利而去！到了丰利，沈校长联系到丰利小学退休狄校长，他热情邀我们去狄宅小叙。狄校长身材修长，透过镜片一双睿智和蔼的眼睛闪闪发亮，79岁的老人浑身充满活力。

他说丰利小学已有111年历史，是当年张謇创办中国的第一所南通师范学校，为解决毕业生就业，又建起丰利小学。小学兴办之初，困难重重，有新旧教育思维的冲突，有师资不稳定，有校长畏难情绪。为坚持办学张謇多次找校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不惜动用县令大人向校长施压，提供实际帮助，终于使学校坚持并发扬光大！

马素娥马老师 1949 年后担任校长，狄校长就是她学生。由于狄校长聪明好学，非常得马老师欣赏喜爱。狄校长每逢年过节，马老师父亲马久襄（一位热心且医术精湛的老中医）为邻里书写春联，他在一旁为马老先生磨墨，他还是马老师女儿任珠的同窗，一直保持着联系。马老师为提高丰利小学教学质量，设立了以她父母命名的“马罗奖学金”，“马”、“罗”分别是她父母的姓。每年获“马罗奖学金”的学生被学校安排坐豪车在镇上招摇过市，恰似古代中状元一般风光！

八、结语

告别狄校长驱车返回南通，不仅仅为学生们热情相助、奔袭百里访问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所感动，也为自己说走就走的旅游方式所吃惊！

短短三天南通游，使我学到在书本上没学到的许许多多，也挖掘出意想不到的东西，甚至有向南通当局建言的想法，意外多多，惊喜连连！每人对旅行的感受是不同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而知，行而思。

是为记。

西出阳关有故人

自幼熟读唐人王之涣的《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广袤的黄土高原，凄凉的幽幽羌笛，对我这江浙后人有一种无比神秘的诱惑。我虽然出生在江南郁郁葱葱的水乡之地，也曾在东北黑土地摸打滚爬数年，但对充满“西北风”的黄土高原却从未亲近过。

丙申春节得闲数天，内人说想去甘肃武威看望老叔叔郭光华。光华叔已高寿 93 岁，几年未见，想得紧。自然是“妇唱夫随”，儿子在网上订得机票，又作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早年叔叔支援大西北建设，来到人迹罕至的甘肃武威，将自己的漫漫人生抛洒在“丝绸之路”的铁路沿线，从此结婚生子，在窑洞中繁衍出三男三女的兴隆人家，继而又有了第三代，堂堂二十余人。

岳父祖上是浙江诸暨望族，先祖曾是清朝四品大员，父亲为杭州造币厂技正，故岳父一家久居杭州。岳父兄弟七位，他排行老二，光华叔是老三。早年光华叔因为是铁路职工，有免费坐火车的优待，常来杭州看望二哥和小住。这几年腿脚不便，子女们不让他出远门。内人堂弟妹建平、建民、建军、敏玲、敏秀、敏娴均到过杭州，小妹敏娴还找了杭州夫婿定居杭州。

武威乃丝绸之路重镇，河西走廊咽喉要道。因汉武帝为彰显大汉帝国军队的“武功军威”而得名，古时又称“凉州”。

曾经管辖敦煌、酒泉、张掖、凉州四地。千年变迁，武威辖区一变再变，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武威市还辖 1 个市辖区凉州区、民勤县、古浪县 2 个县和 1 个藏族自治县天祝藏族自治县。

武威古往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火熊熊连绵不绝，骠骑将军霍去病曾出陇右击匈奴于此。也是天朝旅游标志“马踏飞燕”出土之地，随着这些年经济增长，被命名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对外开放城市，2005 年被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2012 年 10 月被命名为“中国葡萄酒城”。显然，对旅游者来讲，也不失为一个好去处。

10 日晨坐上直达兰州中川机场的东航客机，于 10 点许平安到达。根据建平弟提示又坐上到武威的大巴，大巴驶出机场直奔武威，黄土高原一览无遗展现在眼前！与江南满目葱郁的景色截然不同，黄土地被千年风雨侵蚀得沟沟壑壑，夹带着结雪，狰狞而古朴，动人心魄。参天的杨树直指苍穹，在深邃的蓝天白云下展视着生命的顽强。大地苍茫！

车到武威，通知大弟媳冬梅前来接车，未想到二妹敏秀与夫婿建勇先期到达。姐妹几年未见，还记得容貌，毕竟是骨肉之亲。驱车前往叔叔家路上又与小弟建军、冬梅、敏娴的车相遇，一路驶入武南镇老叔家小区。老叔叔端坐在客厅，乡音无改鬓毛衰！

此前因没法确定是否去武威，只告诉叔叔有可能。他却一次次叨念：“敏琮怎么还没来？”子女怕他过于激动，当天上午才告诉他敏琮已到兰州了，马上进入武威地界。他连午睡也放弃了，直楞楞盯着大门，不言一语……急步上前握住叔叔枯

稿的双手，匆匆用杭州话讲出一通报喜不报忧的消息，叔叔时而颌首，时而陷入沉思，小妹敏娴在一旁悄声说：“他心里明白着呢！”（指岳父去世）大妹敏玲在一旁催促：“还没吃午饭吧？快吃，快吃！”气氛才热络起来。敏玲忙进忙出，弟妹们告诉说，自从婶娘过世后，敏玲把久病的婆婆交给刚退休的丈夫雷刚侍候，自己搬回来服侍老爸。本是一大家子，还要照料弟妹小辈，完全把母亲的担子挑了起来，令人唏嘘不已！

是夜，下榻在铁路公寓（招待所），由大弟建平一手操办。公寓刚刚装修过，设施齐全、干净整洁。建平文革后期下乡，以后招工进铁路系统，像他老爸那样将自己身家性命都交给了铁路。他吃苦耐劳，诚实可信，被领导欣赏负责后勤，我们住进这不对外开放的招待所，纯属建平的功劳。老叔的子女，三男三女除二妹敏秀夫妻在地方工作，小妹敏娴到南方定居外，其他都在武威铁路工作，连媳妇、女婿也是。

第二天，叔叔一家执意在金轮大酒店设宴招待我俩。这包厢奇大无比，用菜只能在玻璃圆盘上转悠，根本够不到对面的菜肴。除二弟妹瑞清带儿子外出嘉峪关探亲；外甥张卓夫妇在新疆乌鲁木齐未归（张卓身为特警，节假日全无）；侄女越伦及男友春节前回来后又北漂，其余人包括第三代都齐聚在一起，连我俩共十六人。

葡萄美酒夜光杯、牛羊鲜烹面皮酥，大西北的美味佳肴着实让我俩大饱口福及眼福。更让人动容的是叔叔一大家子和睦相亲，大弟主外、大妹主内；弟妹帮扶，女婿可人、媳妇孝顺；晚辈们一个个水灵灵的招人疼爱！自从经济高速发展以来，人们掉入“孔方兄”钱眼，子女算计父母钱财，媳妇向婆婆耍泼，

亲情孝道伦丧……尤以沿海发达地区更甚。而在这个大西北经济不甚发达的地区，却还保留着中华传统美德。谁之故，谁之过？……

下午稍事休息，建勇、建军驱两辆轿车带我们去名胜白塔寺游览。白塔寺又名百塔寺。白塔是藏传佛教保存藏经、舍利的去处，多为白色。此寺白塔众多，故又名曰“百塔”。此寺不但白塔多，更重要是西藏归入元朝的协商签约之地。1260年始，藏传佛教萨迦派法王赴凉州（武威）与蒙古汗国皇子阔端会谈元藏统一、并达成了协议。此后元、明、清均按此协议治理西藏，使西藏归于大中华版图。756年来，白塔寺几建几毁，初，元末毁于兵祸，1927年，凉州发生7.5级大地震，白塔寺又遭到更大程度破坏，留下倒塌后8米高的灵骨塔基座和数块石碑。最后一次破坏在文革期间，“农业学大寨”全部夷为农田。现在看到的仅为重修后的部分白塔、放生池和一座博物馆，不到原址四分之一，且不是原物。佛教在中国历史上有其重要地位，道、释、儒，基督、伊斯兰对社会发展均起过重要推动，取其精华，方能惠民。

第三日，清早推开窗户，那扬扬洒洒的白雪已然悄然落下，大地一片晶银。些许，老叔叔说要外出走路。子女说：“下雪了，冷着呢！”，不为所动。只能将他鞋帽大衣穿戴停当，我自告奋勇“护驾”。出得门，叔叔一路在前，他要为我做向导，悔不当初呀！一路走去，叔叔为我介绍，这是文化宫还有体育馆，那是第二医院，还有银行、菜市场……从他喃喃细语中，听得出当年为支援大西北，他将根扎在这里，谈不上豪言壮语，也听不出懊恼，随着岁月的流逝自然而然接受命运的安排。感

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即便你的根不在这里，你也得把乡愁埋进深深的心田……

晚上与叔叔聊天，他说：“你们来了，就应该去下敦煌！”原来此行只想见见叔叔，没有做另外安排，加上有管孙子的任务，就想早点回去。叔叔的一句话，却拨动了内人心弦。1992年底，内人陪同父亲蒋礼鸿去北京领取吴玉章学术一等奖，该奖奖励父亲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对敦煌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1996年是书获国家高教首届人文科学一等奖），她就萌生出到敦煌朝圣的梦想，但俗事繁忙，一直未成行。现在敦煌咫尺眼前，怎不使她心动？几位弟弟妹妹都是铁路上的，他们提议晚上坐车去，第二天晚上又坐车回的建议，车票他们可以轻松搞定。内人为人豪爽，一拍即合。于是弟妹们搞定车票，我联系参观事宜，浙江大学的院士级教授张涌泉，敦煌学家又是父亲的学生，涌泉兄立刻和敦煌研究院联系，最终确定以贵宾身份接待。

第四天早上，与叔叔告别，前往雷台游览，然后晚上直接坐车赴敦煌。老叔叔穿上大衣、带上帽子，执意将我们送到门外。我和内人含笑与叔叔告别，转身时泪水却在眼眶里打转！车行渐远，老叔叔还执着手杖站在冰天雪地里眺望远去的车影……

1969年，在武威雷台发现了一座东汉时期的墓葬，并发掘出了铜人、铜车、铜牛、陶器等220余件文物。其中还有39匹神态各异、活灵活现的铜马。且有一匹铜马，重7.15公斤，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厘米。马头顶带花缨微扬，昂首扬尾，尾打飘结，三足腾空，右后足蹄踏一飞鸟，飞鸟展

翅，惊愕回首。这尊塑像引起考古界异常重视，健硕的骏马、神奇的飞鸟，还有重力学上稳定的结构（据说因磁力学原因，塑像离开武威，就会倒下）郭沫若氏将它定名为“马踏飞燕”。以后“马踏飞燕”被确定为国家旅游标志。

其时，对骏马脚下的飞鸟，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除郭氏的“飞燕”说，还有“云雀”说、“隼”说等等。“马踏飞燕”也有称为“马超龙雀”、“铜奔马”、“马袭乌鸦”、“鹰（鹞）掠马”、“马踏飞隼”、“凌云奔马”等。依我之见，这飞鸟竟为何种鸟类并不重要。这尊塑像本是艺术品，骏马脚踏飞鸟只有在夸张的浪漫主义情怀下，才会得以展现。悲哀的是，国人只会在这里喋喋不休，就像四大发明的火药，我们只会用来制作烟花爆竹，西方列强却用洋枪洋炮打开我们的国门。沉睡的狮，何时才真正成为“醒狮”？

雷台转出，弟姐们带我们品尝大西北特有的面点“拨鱼子”和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之称的极品驴肉。又去了二妹敏秀和大弟建平的新居。夜幕降临，在告别声中踏上去敦煌的列车。一夜星光，繁星点点，第五天晨，敦煌，我们来了！

敦煌自铁轨铺到此后始设市，人口 20 万，常住人口 5 万。敦煌民风淳厚，正值春节，大街上常有市民在舞狮子、踩高翘。与以往不同，敦煌研究院在大漠中新建了数字中心。数字中心有两个放映大厅，前一个正面大屏幕放映莫高窟始建的历史，后一个是圆顶式 360 度银幕，放映佛窟内部影像。影片气势恢宏，音乐振憾人心，前者使人领略到世代佛徒开凿洞窟的艰辛，后者展现了佛窟内部极致的庄严肃穆。出数字中心，研究院的旅游大巴送游人直达莫高窟。

到莫高窟接待中心，研究院为我们指派了导游小王姑娘。小王说，除正常开放的十个洞窟，还为我们打开两个精美的、供研究用的内部“特窟”，未曾参观，已觉此行不虚。一边走，一边看，小王一边细细讲来，我也不时提出疑问，并以我对莫高窟的了解，提出自己的看法（得益于年幼时父亲对我讲述），这等交流可不是一般的游客可享受到的。

莫高窟依山傍水。此地乃古代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古时商贾云集、物产富饶。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众善男信女在此开凿佛窟，绵延不绝至元代，后转衰弱。有些佛窟，仅开凿至完工就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时间，足见供养人的虔诚（供养人即开凿和维护者）。佛窟大小各异，形体各式，传承了域内外和不同时代特色。窟内佛像既有木骨泥胎的丰润，又有凿石泥塑的伟岸。四壁和窟顶俱是精美壁画，不留一些空白。有许多壁画以“图说”的形式，转述佛缘，例如释迦牟尼舍身饲虎，既讲述佛主的前身，又传达了善缘。飞天、歌伎、胡旋舞者……栩栩如生。

小王介绍说，有些洞窟经不断修善，多者壁画先后竟有七层。可是壁画还有开“天窗”的，她指着一处空白说，这是当年前来掠宝的外国人所为，他们用粘贴的手法，将壁画掠走。

说到掠夺，当不能不说莫高窟藏经洞。1900年6月，王道士圆箒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4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小王特意带我们去了藏经洞，那洞长宽高不及两米，还没有现代公寓的厕所大，很难想像居然会藏有5万多卷文献。王道士向当地行政长官求救，但长官熟视无睹，再者王

道士也非具有崇高理想的“共产党员”，故而拿出部份变卖钱财。由此，藏经洞内宝物发现消息传播甚广。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俄人鄂登堡等均前来或与王道士交易，或私下掠夺，故而绝大多数文献被弄到英、法、日、俄罗斯等国，成为“吾国学术伤心史”。而现代中国学者正是在大英帝国博物馆等处发现并领略到敦煌文献的巨大研究价值。于是就有学者王重民、姜亮夫、向达等人辗转抄录带回祖国（条件所限，还没有摄影、复印手段）。此后才有中国学人的研究并形成一门独特的学科“敦煌学”。经中国学者不懈的努力，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尴尬局面。

带便说几句，敦煌文献均由手工抄录，且抄录者都是民间的匠人。由于古代文字不规范，繁体字中有些笔划太多，有些匠人就用“俗字”替换，更间有假借字、错字，王重民等抄录时也会出现一些错误。所以敦煌文献之难以释读被寓为“难以上天梯”。父亲早年注意到这部“天梯”，并立志要破译敦煌文献。1959年，他的论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出版了，该书对文献中难以解读的字、词进行释文、释义。此后36年间，他不断对《通释》加以修改、订正、补充直至过世。《通释》共出版了六版，篇幅由五万多字增加到四十余万，为学术界罕见。《通释》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深厚的训诂学功力，得到学界认同，杭大历史系徐规教授言：“撼山易，撼《通释》结论难。”

再说说王道士圆箒。说到王某总会和西方掠夺者联系起来，帮凶也。王某偶然发现藏经洞，乃“天降大任于斯人”之可遇不可求，否则藏经洞不知还会隐秘多少岁月，或许永无天日。试想或者还有“藏经洞”之类还在敦煌或某一处，等待贵人的

来到。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某的功劳地位不可或缺。王某是为清除窟内积沙才发现藏经洞，此举本为行善，主观意图也是好的，谈不上窥视宝藏。王某发现藏经洞时首先向地方长官汇报求救，该死的大清官员腐败透顶，却对文献狗屁不通，说帮凶，唯天朝数第一。王某本是贱民，要说对金钱“泰山压顶不弯腰”，似柳下惠“坐怀不乱”是不可能的。他用卖得的钱财修善了三个洞窟，虽然杯水车薪也还值得称道。没有任何文献记载王某是否用不义之财建豪宅、购宝骏、取小妾，不敢妄议。网传王某女儿认为敦煌文献是王家私产，欲向国家索赔，也显见王某教女“有方”，终究不是圣人。

莫高窟藏经洞，为何要将这么多文献藏秘在此？有“避难说”、“废弃说”等等，说不尽的莫高窟，道不尽的藏经洞……

惜别莫高窟，去那不得不看的鸣沙山和月牙泉。车未到，满目金碧辉煌的鸣沙山已矗立在眼前。瓦蓝瓦蓝的天空下，鸣沙山庄严肃穆，沙漠驼铃随着早春的风声飘向远方。大漠中、高山顶，旅者化作朵朵小花，人类在大自然中显得如此渺小，人啊，何必张狂自大？月牙泉上结了厚厚的冰，泉边枯槁的芦苇瑟瑟颤动，月牙泉曾经的碧水绿草，日见衰败。

夜，赶赴最后一站兰州，第六日晨抵达。大妹夫雷刚带我们去老字号“马有财”面馆品味最最正宗的兰州拉面，满口辛辣，混身冒汗。一路向北溜达，领略依伊斯兰庙宇的圆型尖顶。须臾，黄河水越过眼帘，滚滚向东流去。苍穹之下似乎听见清袁枚曰：“黄河千年清可待，如此人如不可再！”

感慨乎？

第七章：小说

尔乙的故事

第一章 惊雷

海州市，江南的一座颇有特色的文化名城。海州市不大，却有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基督教大学，名曰“育贤大学”。育贤大学座落在城西曲江边上的九龙山麓。解放后，基督徒离开学校，中方教师的生活似乎未受影响。清晨，庄严肃穆的钟楼上传来混厚的钟声。一干教书育人的先生们行色匆匆，跨过宿舍区与教学区之间的情侣桥，进入教室、实验室、图书馆……

这些日子，与往日不同的是，一位娴静标致的女先生，已多日不见从此走过，而女先生的先生今天也未及遇见。他们本是一对恩爱夫妻，先生毕业于斯，教书于斯；女先生毕业于东都市名校“合字大学”。八年抗战，女先生随校流浪到陪都重庆，先生经同事介绍，不远千里越过日寇封锁线，来到陪都与女先生相会。先生与女先生因情生愫，结为伉俪。抗战胜利后，夫妻两人双双回到复校的育贤大学，把家安顿下来，以后有了女儿巽雅。

此刻，女先生正躺在医院的产科病房，她即将临盆。先生在病房外搓着手，来回不停踱着步子，一脸焦急。

这是一个初春的早晨，天色暗淡，春风中夹带着丝丝的水气。女先生的孩子，在娘肚里即经磨难。女先生生怀六甲之际，还念念不忘教学，挺着大肚子走到情侣桥边，石阶湿滑，一跤摔在桥上，动了胎气。难产，当时不兴剖腹产，幸好接生的大夫是一位日本战俘，水平高强，孩子总算来到人世，这是一个男孩，体重六磅半，折合 4.875 市斤。

照说新生儿降生，必有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涕哭。这孩子不然。孩子紧闭双目，气若游丝，女先生惊恐万分！日本大夫见状也颇为紧张。但大夫毕竟经过大风雨，迅即将孩子倒提起来，在臀部拍打！窗外乌云密布，大雨磅礴，一条闪电划过长空。乍的一声春雷，迅雷不及掩耳！雷声过后，产房壁上的挂钟定格在 1952 年 3 月 31 日上午 10 点 15 分。孩子竟“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女先生破泣而笑，门外先生长长吐出一口气，跌坐在长椅上。外婆双手合十，嘴里喃喃道：“阿弥陀佛，那闪电分明是天龙下凡啊！”

第二章 初成长

巽雅因为妈生了小弟弟，兴奋不已。爸说：“巽雅，妈和小弟要回家啦，你去接吗？”巽雅跳着双脚说：“要去，要去！”转身对身边小伙伴说：“不跟你们玩了，我有小弟弟啦！”爷俩下了山，坐上隔一小时一趟的公交车，来到城里医院。回家当然不能坐公交了，爸雇了两辆黄包车，巽雅硬梆梆和妈、小弟挤上一辆黄包车，爸只好和行李用另一辆车。

一路上，巽雅叽叽喳喳嚷嚷个不停，“小弟，看那是小蝴

蝶！”“小弟，江边的树发芽啦！”爸爱恋地说：“巽雅，别吵醒小弟。”“爸！小弟叫什么名字呀！”妈说：“小弟名字爸早取好了，叫‘尔乙’！”巽雅瞪着大眼珠说：“‘尔乙’？为什么呀？”爸笑笑说：“以后你就明白了。”

黄包车夫哼哼哈哈喘着粗气将一家四口拉到九龙山育贤大学宿舍。尔乙的出现惹得邻居先生们纷纷前来观看。有师母说：“剑鞘啊，这孩子才这一点大，可难养呢！”“剑鞘”，女先生的“字”。传统文化中，名字的来历是“名”由父母所起，在出生后就起好了；“字”是自己起的，起于弱冠之时。“字”由自己成年后起，可表达自己的志向和爱好。可这种现像已消失，怪可惜的。女先生说：“有虎啸呢，我们会养好的。”“虎啸”，先生的字。先生在一旁忙说：“就是吃大苦，也要把孩子养大！”说起尔乙出生那一刻，众人一片唏嘘！

尔乙出生后，妈奶水不足。先生和女先生请了奶娘。先生平日里一介书生，脱了长袍卷起袖子洗尿片。一手抱着尔乙在屋里晃悠哄他睡觉，一手捧着书之乎哉也。奶娘逢人便说：“先生好！马桶都是他倒的。”

尔乙乖得很，喝完奶闭着小眼就睡觉。一天先生的同事好友尘海先生过家来聊天，捏着尔乙的小腿小胳膊说：“这下子长得好了！”谁知40天后，有一天夜里尔乙“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先生抱着来回哄着，小家伙硬是不睡，折腾了四个小时，先生一声长叹败下阵来。以后有别家的保姆偷偷告诉女先生，奶娘没奶了！女先生推开小房，奶娘正在屋里抹泪。原来奶娘和一位学校工友勾搭上怀了孕，回了奶。奶娘自觉对不起孩子，向女先生磕头捣蒜卷起铺盖走人。

奶娘还是要请的。经人介绍，找到一位年岁颇大的对江农妇。这农妇慈眉善眼，穿着利索。女先生很满意。抗战时，对江农村有不少农妇被日寇强奸种下性病。先生和女先生不放心，拉奶娘去校医室抽了血。校医室没有化验性病的手段，先生拿着血样送城里医院化验。路上遇到一位骑脚踏车的学生，学生说：“先生，我脚踏车带你去！”先生坐到脚踏车后面，学生一路飞奔下山。冲到山下，脚踏车碰到一块石子，先生倒在地上磕破了头。

事毕，先生包着头回到家，女先生大吃一惊说：“你怎么把头摔破了？”先生把来龙去脉告诉女先生，说：“没事，尔乙又有新奶娘啦。”

奶娘虽因年岁大，乳汁不太丰富，但心底善良。每天除哺乳外，又倒腾用蔬菜汁、水果汁喂尔乙。夏天怕孩子热，晚上弄个“竹榻”放在楼下露天里，支四根小竹杆挂上蚊帐。奶娘和尔乙躲在帐子里，她一边用蒲扇为尔乙扇凉，一边指着满天繁星给尔乙讲牛郎织女的故事，一边“依依呀呀”唱着乡下人的摇篮曲。尔乙很快地进入梦乡中，快到后半夜山风大起来，奶娘又把尔乙抱回家。

至此，先生和女先生又可以安下心来读书写字了。尔乙“见风长大”，“呀呀”学语，姗姗学步。一天，巽雅拉着尔乙的小手，奶娘在后面“保驾”，跌跌冲冲越过情侣桥，来到教学区大草坪。

第三章 那山那水

育贤大学有着最美丽森林大学称誉。教学区高高低低的山梁上，遮天蔽日的树荫下，一座座西式建筑若隐若现。有大钟楼、科学馆、实验室、图书馆、礼拜堂、医疗站；有学生宿舍韦斋、东斋、西斋和外籍教师公寓白斋、绿斋、灰斋、红斋、上红斋；最高处是天文台。但上红斋、天文台已无踪可寻。抗战时整个育贤大学被日寇霸占为司令部。日寇在九龙山筑工事，将天文台炸掉取其钢筋。上红斋、部分中方教师宿舍也被随意拆毁。杀害留校员工、捣毁实验设备、焚烧图书资料，更是罄竹难书！

教学区的建筑中，有些是师生捐助的，如实验室；有些是大企业家捐赠的，如钟楼；也有基督徒捐赠的，礼拜堂即是。礼拜堂又叫“约克堂”，是美国著名基督徒约克家族捐赠的。约克堂是典型的北美风格，青灰色墙体透着冷俊的光辉，圆型拱门则充满着温馨。红斋的庭台柱子，是拜占庭风格。总之建筑风格令人过目难忘……

绿树成荫，最常见的是香樟树，其次是各种乔木。建校初期，校方认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特别重视植树。九龙山原本树木稀少，称作荒山秃岭亦不为过。总务处聘来苗木专家，招民工从四周山岭扛来未成年小树植入校区，一年又一年，科学馆右侧的香樟长成了参天大树，其它树苗，亦如是。

九龙山，其实是九条伸向曲江的小山脊。相传远古时九龙下界，卧伏于此。是年，焦阳似火，饿莩遍野，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九龙不忍，吐出奔涌龙涎。一时间龙涎汇成滔滔曲江，

早情就此解除，九龙却化作山脊，常卧于此。育贤大学的中方宿舍区居头龙头，教学区在二龙头，中间山坳，溪水潺潺。校方为方便先生们上课，在小溪上架起木桥。年轻学子经不住诱惑，春心荡漾，人约黄昏下。久而久之，这无名之小桥，被冠以“情侣桥”是也。

第四章 象牙塔

基督教徒离开学校后，当局接管下来。看似平静如象牙塔般的育贤大学，先生们照旧读书写字上课。细心体察，波澜不惊的表像下，暗潮涌动，终于，冲出决口，一泄千里。

一个深沉的夜晚，月黑风高。尔乙与往常一样依偎在奶娘怀里睡觉。朦胧中尔乙听见窗外传来一声声低沉的抽泣声。既而抽泣变为撕心裂肺的嚎哭。奶娘用手拍打着尔乙，嘴里轻轻地说：“阿宝，莫怕，莫怕。”惊恐的双眼却盯着黑乎乎的夜空。第二天，师母们交头结耳，窃窃私语：“罪过啊，厉师母昨晚没了！”“厉先生平日里连蚂蚁也怕踩死，忒有介大胆子匿藏黄金？”“呸，呸，呸！别胡说八道，厉先生不是那种人。”……师母们低声叹息，拨浪鼓般摇着头，各干各去。先生们整顿装束，行色匆匆跨过情侣桥，去听工作组对“黄金案”最新通报。从那以后，少见厉先生形只影单的身影。既使在路上遇见，他也低垂着花白的头，侧身而过。

事情一件件接踵而来，胡先生发配回了老家。临行，胡先生来家向尔乙爹告别，眼里含着悲愤的泪，作揖道：“虎兄，心不甘耶！说我宣扬‘封建帝王’，黑板上画了几个仕女也算

数？”尔乙娘忙在一边说：“胡先生想开，想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许应了尔乙娘的话，以后胡先生又被美专聘去，传授诗书画，流芳百世乃是后话。女先生转身向先生说：“看看胡先生吧，得低头时且低头。”先生一脸怒火，掷地有声：“我几年不读线装书，怎能奈何我？”说是这样说，家里气氛明显变了，只有尔乙跳跳蹦蹦不知所以。尔乙闹得欢了，巽雅过来抓住他说：“乖，阿姐和你採‘乌米饭’去！”

读书人愚纯，当局号召大鸣大放。交心，分不清“阳谋”和“阴谋”。为社稷想，落得一顶大“帽子”。尘海先生身为教务长，进言，被痛批；检讨，被弟子一条条批驳，还上了“头版头条”，这顶帽子戴成了“极右”。心气极高的尘海先生被拉下教务长宝座，降俸禄、扫厕所，还得使便池明亮如镜！伟人诗作平仄不调，写个把错别字，先生以为不然，为日后埋下祸根的种子，“不是不报，时间未到……”

第五章 育贤子弟

尔乙三岁了。九龙山上的小松鼠，“金龟子”已拴不住他的心。尔乙娘对他说：“宝，你该上幼儿园了！”尔乙不干，说：“我不要，我不要！宝要阿姆！”奶娘在一边抹泪说：“听你娘的话，我的阿宝长大了。”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奶娘的丈夫来接她回家。一步一回头，奶娘挎着蓝花布小包裹下了山。尔乙牵着爹娘的手，站在山荫道上喊：“阿姆，你要过江来家家看我呀！”

孩子忘性大，第二天尔乙穿上小碎花衬衫跳跳蹦蹦去上幼

儿园。这幼儿园是育贤大学办的附属幼儿园，院长对女先生说：“来啦，您可放心了，这孩子不‘怵’幼儿园。”尔儿昂起头向着院长说：“我叫尔乙，三岁了，我上幼儿园啦！”尔乙在幼儿园，第一天很乖，第二天也很乖。到了第三天上，一口咬住小朋友下巴。先生听了生气，扬起手一巴掌下来，尔乙小屁屁上立马起了五道红印子。女先生顾不得温柔，一掌推开先生说：“打孩子不仁道，你可记住，没有下一次！”先生硬是愣住了，半晌没回过神来，一摆手说：“罢，罢，罢！有你这么宠孩子的吗？”女先生不依不饶说：“你这是封建残余！”一对恩爱夫妻在对待尔乙教育上，就此产生分歧，以后先生干脆不管孩子前程，闷头看书去了。

尔乙在娘“民主”光辉照耀下，有恃无恐。逃学，下到江边去玩。这曲江上白帆点点，波光粼粼煞是好看。尔乙有所不知，这曲江潮涌上来，可是要命的行当。前些天有位学生在江里游泳，被潮水裹走。幸得过路船家把他打捞上来送到校医室。校医室没三两个医生护士，赵医师见大事不妙，挺着大肚子给学生做人工呼吸。这学生捡回一条命，却不知动了胎气，赵师生下的孩子右胳膊右腿便不灵便，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那时没有“见义勇为”一说，孩子长大后赵医师求爷拜奶为孩子在学校谋了一个小职位。后话，又是后话，矣。

光阴如梭，尔乙又蹦着小腿，蹦进了育贤附属小学。没爹管，有娘宠，尔乙的学习成绩一塌糊涂。算术本上“红叉叉”触目惊心，语文作业错别字连篇。也不知怎的，尔乙写作文，耳边刮上一句老师讲的“倒述法”，灵光一现，记作20年后与一帮小伙伴回校看望老师，极尽“造谣”之能事，把老师感动

得当庭宣读！

到了小学五年级，社会上刮起“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人民忠于党”之风。学雷锋，做好事，就是“忠于人民忠于党”。尔乙不傻，也争做好事。无奈总是争不过“好事大王”张伊凡。这张伊凡来头不小，爹把他名字取自“伊万诺夫斯基”，不知是哪一位苏联专家，只把“伊万”改作“伊凡”，不掠人之美名。伊凡隔几天，“我在马路上捡到一分线，送到警察叔叔手里面”。尔乙恨得牙痒痒，专门低着头在马路上找钱！那年头三毛二分钱买一斤带鱼，岂是地上随便可找的“宝物”？尔乙不甘心，一路找来发现纽扣数枚，如获至宝。小手捧着纽扣屁颠颠跑去交给老师。便无下文，尔乙也纳闷，难道这不是“拾金不昧”？

转眼又到小升初考试了。尔乙再不能混日子骗爹娘学习如何了得，只好捧起书来“临阵抱佛脚”了。小脑瓜子也挺聪明的，继承了他爹过目不忘的本领。一番考试，过关斩将，居然考取育贤附属中学榜首！幼儿园、小学、中学均附属育贤大学，尔乙毫无夸张是“育贤子弟”。“弟”，“学子”也，切勿当作称兄道弟，乱了辈份。

第六章 劫难

尔乙高分考入附中，怎么着也得刮目相看，于是初一丙班最高行政长官——班长，囊括名下。到了1964年正是大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年代，“忆苦思甜”、“阶级斗争”大行其道。附中也不是世外桃源，办起“阶级斗争展览会”，展会上

解放战争军功章、荣誉证书、转业证，还有军服、军帽、军用皮带和解放鞋琳琅满目……尔乙独对一枚军功章感兴趣。他记得妈曾说过，爸出生贫家，读书时因为成绩出众，学校奖励他一枚金质奖状，而后爸把金质奖状卖了钱支付学费。军功章——金质奖状挥之不去，适逢学校布置展览会观后感。尔乙不假思索写了一篇作文《爸爸的金质奖状》。

收到尔乙这篇洋洋得意的“大作”，附中高层内部炸开了锅。有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揪住不放，有说孩子不懂事云云。鹰派自然力压鸽派，要一举开除尔乙学籍！幸得附中不少先生和女先生的弟子，女先生尤其关心贫苦学生，高层也有这样的学生。最终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保留学籍，撤消班长职务。

尔乙自小在妈呵护下长大，姐姐巽雅也关怀备至，爸虽不管他，也没让他受委屈。摊上这档大事，一千个想不通，一万个也想不明白。又没人向他解释，委屈只能放在肚子里。久而久之，那个曾经跳跳蹦蹦，口无遮拦的尔乙，性情大变。书自然读得不勤了，成绩一降再降，连以前赏识他的老师也只有摇头，同窗好友，避之不及。他常常用幽怨的眼光直视同学，只有几个“左派”的孩子稍有往来。

到了初二下半学期，连尔乙自己也感觉这书读不下去了。一场“疾风暴雨”袭来，课程嘎然而止，停课闹“革命”啦！这“革命”闹得！昔日威严的校长，被“革命”小将用麻绳拴着，拉到大街上游街。一尺多的高帽子下面，是一张扭曲的脸。尔乙当不成“革命”小将，远远尾随在后面，眼光依然冷峻，心里打着小九九，“格老子的，当初校长大人把我班长一撸到

底，报应了吧？”尔乙少不更事，皮带抽在校长脊梁上，倒也知道“残忍”二字。回到家，还没喘口气，家就被“造反派”团团围住。几个三大五粗的大学生振臂高呼，“打倒反动学术权威！XXX”、“打倒现行反革命XXX！”。接着，“崩，崩，崩！”“造反派”开始砸门，没等开门，“呼啦”一声闯进满屋子人。“造反派”嘴里嚷着“破四旧，破四旧！”把先生视为“命宝”的几千册书席卷一空！恐怖之夜，育贤大学不知有多少人家被洗劫，多少像尔乙一样的少年受惊吓。

自这以后，九龙山成了沸腾的大锅。“造反派”成天里押着斯文的先生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游街示众，打骂关押无所不用其极。私闯民宅翻箱倒柜，抄家！学子们不上课，“革命”！有位先生在小树林里上吊了，关乎尊严！原本已游手好闲的尔乙，看到林子里吊着的先生，听到家人抽泣的哭声，再不敢往林子里钻。去学校的路上，被人用小石子砸，还一句嘴，被从山坡上推下去。学校不上课，尔乙这“狗崽子”也参加不了“红卫兵”，就蹲在家。尔乙爸被关进“牛棚”，妈和姐除了掉泪，还要看着尔乙，怕他出去闯祸。尔乙不时腾起一阵阵莫名的仇恨，时机未到，埋在心中。

第七章 心魔

某日，尔乙照例趴在窗台，百无聊赖地望着曲江上百舸竞舟。几位附中年级稍高的育贤子弟前来敲门，尔乙疑惑地望着他们。一位老兄对着尔乙吐沫星子飞溅地说：

“尔乙，呆在家干嘛呢？跟我们去学校！造反，造反去。”

尔乙甩出一句：“莫非再去挨一顿鞭子不成？”

“非也，非也，你只管大胆地去造反！”

“瞎说，‘狗崽子’造谁的反，吃了豹子胆？”

“你有所不知，最高指示下来了，‘要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还不行动起来？”

几位学长又详细的解释了“重在政治表现”的重大意义，唯有“表现”，“狗崽子”才能翻身！一番话醍醐灌顶，尔乙听得不自觉心魔躁动，大喝一声：“我也造反去！”甩开巽雅扯着的手，一骑绝尘！到附中，已是战旗猎猎，歌声激扬。两派对立组织，“红卫兵司令部”和“反到底兵团”，简称“红司”和“反到底”。一个占据教学大楼、一个栖身办公大楼，用高音喇叭隔空对骂。不用说尔乙加入的是“反到底”，那“红司”是毒打他的仇人聚集地。尔乙既不会写大字报，更不会用三寸不烂之舌与对方辩论，唯有对组织的忠心，打打杀杀毫不手软，被“战友”们器重为“小蛮子”。几次武斗血肉横飞，尔乙冲锋陷阵，直至被硫酸瓶击中，留下终身难以抚平的创伤……

第八章 月是故乡明

运动无穷无尽，学生们被滞留在学校。尤其在中学，聚集了从初一到高三六届学生，史称“老三届”。大学被否定，“老三届”升不了学。国民经济瘫痪，无从接纳学生。“老三届”不走，小学生就上不来。环环相扣，似乎一筹莫展。办法总比困难多，最高指示及时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课堂从学校挪到田间，教师变成“贫

下中农”，诸多矛盾，一朝破解。

尔乙姐弟在这一大潮中，泥沙俱下，冲到了广博的东北黑土地。初到乍来，一切都是新鲜的。袅袅的炊烟，悠闲的牛群，无边的麦田，犹如一幅色彩绚丽的油画，仿佛又回到中世纪田园风光中去。尔乙也豪情万丈，尔乙也想脱胎换骨。邨子里老乡们亲切的关心，房东大嫂和尔乙“唠嗑”一唠就是半天。说到知青抛舍父母，离乡背井，勾起大嫂上辈闯“关东”的记忆，尔乙陪着大嫂掉泪。

到了农村，生活起居一应事务，知青都要自己操办，对小养尊处优的尔乙是个重大考验。水缸里没水了，尔乙挑着水桶上井台打水。春寒料峭，井台边上结着厚厚的冰，尔乙用力把打水的柳条篮子用“轱辘”摇上来，脚下一打滑，“轱辘”失手，柳条篮子下坠到井底，“轱辘”把砸在尔乙脑门上。鲜血淋漓模糊了尔乙的双眼。尔乙犟脾气又上来了，摸一把鲜血，嘴里哼着“下定决心，不怕困难，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硬把一担水挑了回去。

生活习惯南北不同。“大楂子”、高粱米、小米饭咽不下去，不吃也得吃。本是长身子骨的时候，尔乙瘦得皮包骨。东北农村在寒冷天气里，把猪狗赶进屋子御寒，跳蚤、虱子繁衍。尔乙身上被咬得青一块紫一块，脓血浸透内衣。夏季，蚊子、小咬在烈日下满天飞舞，衬衣上叮满蚊子，一巴掌下去能打死四五十只。尔乙默默忍受着，心已麻木，直到有一天……

知青没了贮存的燃料，队里派车去大草甸割草。前去的路上，大家哼着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回来时，车上装满打来的干草，知青

们爬在干草顶上，手里紧紧拽着捆干草的绳子。一个“趔趄”，美丽颀长的知青姑娘晓萌从车顶滚下来，车轮碾过前胸！等把晓萌送到简陋的公社卫生所，晓萌已是气绝身亡。育贤附中下乡的同学从四面赶过来，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着依然美丽的晓萌，抽泣声弥漫开来，尔乙的心扉极度震荡，想到晓萌运动中自杀身亡的母亲，她爹的日子可怎么过？

春去秋来，尔乙越来越消沉，原先身上的一股杀气，在“再教育”中被消耗殆尽。他低着头干活，成天没有言语，乡亲们看在眼里，叹息地说他：“见得越多，越不想说话了！”皓月当空，星光稀疏。尔乙怀抱吉它坐在旷野下，拨动着琴弦。一首俄罗斯歌曲随风飘荡。

“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的唱，
让我们回忆少年的时光，
春天驾着鹤群的翅膀飞到了遥远的地方。
……”

尔乙的眼睛有点湿润，记忆的列车带他穿越时光隧道，由近及远，回到下乡的前夜，运动中的冲冲杀杀，放学回家在山道上疯跑……爹娘啊，此刻你们在干什么？他甚至听到奶娘拍打着他，嘴里哼着的乡间小曲。尔乙猛的站起身来，两眼射出狼性的目光，吉它狠狠砸在地上，他仰天长啸：“我要回家！”寂静的村庄里，传来一阵犬吠，穿越长空，消失在地平线上……

第九章 归去

历尽磨难，尔乙拖着疲惫的心身，回到九龙山，巽雅姐姐

却永久留在了黑土地。双亲已是白发爬上双鬓，看到尔乙踏进家门那一刻，妈妈苍老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爸爸默默将一盆洗脸水端来放在尔乙面前。尔乙张口，却叫不出“爸、妈！”眼泪已夺眶而出，尔乙赶紧将脸浸入脸盆，分不出是水是泪！虽是回来了，找一个可以糊口的工作也不易。妈妈怕尔乙又回复到过去那个乌珠突出、打打杀杀的“尔乙”，苦口婆心劝尔乙：“阿宝啊，可得快去工作啊，哪怕扫马路，也是革命工作。”尔乙也知道，爸妈为他操碎了心，他默默点头。过不久，他就骑一辆破自行车，去郊外轴瓦厂上班，那是个大集体工厂。

厂子里生产的轴瓦是用在各种用途发动机上的。轴瓦由青铜、减摩合金等耐磨材料制成，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用木材、塑料或橡皮制成。尔乙的厂子小，技术水平低，只能生产青铜轴瓦。尔乙被分配在最苦最累的翻砂车间。那时工厂里有一句顺口溜称：“车钳铣没法比，电弧焊凑合干，要翻砂就回家！”尔乙在农村吃过苦，翻砂工的累他抗得住，制模、浇铸、开模各种活儿干得溜溜的。尔乙似乎越来越脱去了“书香门第”的外衣，满脸漆黑，手上青筋突暴，一开口脏话一串串的。但“工人阶级”的光荣外衣下，却笼罩着一颗不息的火种。他要把“十年浩劫”的损失夺回来，他要出人投地，他的志向是有朝一日，挑起轴瓦厂技术大梁，只为证明自己！

尔乙是那种认准目标，九头牛也拉不回头的人。恢复高考，出身文科世家的他，认准了要考理工科！他心里还有个谱，父母亲在运动中吃够了苦，传承家学会吓着妈，伤了妈妈的心。尔乙初中没上两年，数理化犹如一张白纸，读书时最讨厌数学，但他买了厚厚一叠《数理化自学丛书》。他黑灯瞎火地背数学

公式，几十条三角函数公式硬啃下来。把化学元素表贴在工具箱上，趁工作间隙瞄上几眼。物理学结合干活，重力、加速度、能量、作用力、反作用力……一点没难倒他。

77年第一次恢复高考，尔乙“政审”没通过。原因是爸“现行反革命”帽子作怪，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处理和不处理没啥两样。尔乙没有放弃，他感觉政策还会放宽，不是还有电大、夜大、函授吗？只要上得了大学，不管什么大学就对得起列祖列宗！第二年尔乙又报名高考，书记阴阳怪气地说：“做工人阶级不是挺好吗？知道你是教授儿子，你未必也会做教授！做人啊，要想得通，你已经摔过一个跟斗了，要想得通、撇得开，哈哈！”尔乙操起凳子要砸他，这小子瘫到地下直唤：“好，好，好！让你报名，让你报名！”尔乙狠劲上来了“你要是使坏，小心你全家性命，老子说到做到！”书记觑着脸说：“小子唉，凭你刚才威胁我，老子和你做个交易，你只能考电大、夜大，你要不从告到局里，别说考学，坐牢去吧！”尔乙一摆手说：“依了你，不怕你使坏！老子大江大河过得多了。”

第十章 天生我才

四年后，尔乙从夜大学自动化专业毕业。缺心眼的尔乙才发觉电大不分配工作，“还是被那小子害了！”尔乙恨恨地回到被人称作“摊儿厂”的轴瓦厂。“虎落平阳被犬欺”，尔乙又被书记搵到翻砂车间干翻炒的活儿。两年后，书记乱搞男女关系被人告了，换了新书记。过两个月，新书记跑到翻砂车间问：

“谁是个教授儿子？”尔乙搓着黑黝黝的手，站起身说：“啥事？”书记说：“下了班来我办公室。”

下班后书记大手一挥说：“走！”带到食堂包间里，两格臭高粱落肚，尔乙脸已是一只“酱猪头”。尔乙又问：

“啥事？”

“兄弟啊！知道你受不少苦，不容易呀！”

“我命不好！”

“咋这么说？你是名教授的儿子，有几个人像你？”

“我就吃了爹妈的苦……”

“兄弟啊！我就没你命好，爹拉了半辈子大板车，我大字没识几个！”

尔乙嘴硬心软，眼圈泛红，一把握住书记的手：“大书记，别往心里去，我也下过乡，吃过苦，我懂！”

书记双手举杯，一饮而尽：“既是兄弟了，干！”

尔乙一仰脖子：“干！”

尔乙问：“书记啊，你请喝酒，葫芦里的卖什么药？”

“你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厂子用人之际，你又有文化，又有实践经验，那狗日的把你摁在翻砂间里，不是害厂子吗？”

“那能怎的？”

书记一巴掌砸在尔乙肩膀上：“兄弟，明天上技术科报到！”是夜，尔乙喝得烂醉如泥，心里郁闷一扫而空。

技术科只有一位70年代的中专生，尔乙甫一上任，凭着对生产上熟门熟路，结合学到的专业知识，大刀阔斧对翻砂工艺进行改革，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革、提高产品合格率15%以上，一等品率提高6个百分点，工人降低了劳动强度，环境得到改

善，兴建浴室，建立医务室，等等。工人们对自己厂里培养的工程师分外亲切，尔乙白天下到车间与工人解决技术问题，晚上在灯光下画图纸。工人拥戴，领导满意。荣获了海州市科技发明二等奖一枚，四等奖二枚，产品被嘉奖为“信得过产品”。人到中年，尔乙收获了婚姻。

第十一章 潮起潮落

新千年曙光冉冉升起。尔乙稳坐轴瓦厂技术副厂长“宝座”，爸爸真正成为学界权威，妈妈退休颐养天年，妻子贤慧、儿子可人。尔乙的人生显得春风得意。但好事总不能都让尔乙摊上，一轮兼并大潮在轴瓦厂所在机械局兴起。

轴瓦厂虽然搞得风生水起，但必竟是“摊儿厂”放在局里就不如尔乙眼里金贵。局里要整合资源，把数十个同样“摊儿厂”的小厂子逐个划并给局龙头企业，轴瓦厂划入机床集团。凭尔乙的专业水平、才干，集团人事部找尔乙谈话安排工作。冲着尔乙这个“技术副厂长”官小了不给尔乙面子，官大了没人把“摊儿厂”副厂长放在眼里，还真不好办。人事干部带尔乙走了设计、工艺、设备、动力几个部门，明显感到不受欢迎。几天下来，尔乙冷静分析，恁咱这电大出身的工程师，要和集团正儿八经的名牌高校毕业生拼，无疑以卵击石，先自怯了。随便去哪个行政后勤部门占着茅坑不拉屎，依他的个性耐不住寂寞。

人事部主任没了辙，拉尔乙坐下沙发上，泡一杯家乡深山云雾茶递到尔乙手上，忐忑地试探尔乙：“兄弟，你看咋整？”

尔乙平静似水，混浊的眼睛里发射出清澈的目光，一字一顿地说：

“主任，你别再费心了，咱买断工龄，走人。”

“哪能呢，你可是局配干部。”

“老弟，邓小平还让贤呢，恁啥我就不能？”

“你没考虑到损失？”

“千千万万个下岗职工，他们的损失咋办？”

人事主任语塞，更令他没想到是如此结局，他搓着手，坐立不安，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半晌他抬头说，“兄弟，容我打个电话向局里请示，你且喝水！”人事主任在里屋打电话，声音时而高昂，时而隐隐约约。尔乙捧着水杯放眼望去窗外。高大的厂房是50年代建的，墙体已是斑驳。不到10点半，机器的轰鸣声早已停息，工人们懒懒散散敲着饭碗，蹭到食堂去打饭。

“兄弟，这么着把，你可是自愿买断，局里领导也知道了。我合计，按你现在职务，买断的钱我按最高标准给你，养老保险我全给办好，这是在我职权范围的权力。”

尔乙起身，轻舒猿臂握住主任的手，“主任，费心，咱回了。”

第十二章 血脉亲情

“下岗职工”、“四零五零人员”成为一代人的记印。这类人一般系指在运动中剥夺了学习的权利，下乡时耽误了青春，改革开放时因年龄偏大、文化知识贫乏被企业淘汰的人员。尔

乙也不幸忝列其中。但不同的是，尔乙有文化有文凭，担任过企业领导。所以不免有人指着他的背脊点点触触。可是今时不同往日，尔乙已能坦然面对生活中的潮起潮落，他记得马克思还是鲁迅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凭他在工厂里摸打滚爬，很容易地在社区谋到一个维修水电的工作。尔乙技术好，服务态度也好，不久即赢得业主交口称赞。

不经意间，日子又过了几年。爸爸在高资体检中查出得了肝癌，全家恐慌、不知所措。爸爸住院，尔乙陪护。学校领导颇为重视，校长书记四处联络名医会诊。有赖于名医的医术高明，得出结论为一良性肿瘤。爸爸顺利手术、恢复良好。一家人又过上平静的日子。

过了些年，风云又起，爸爸体检查出肺部有结节阴影。医生疑为上一次肿瘤术后转移。尔乙不解，医生说若有转移系为肿瘤发生病变。尔乙叹曰：“医学博大精深，非我所能也！”尔乙唯有一一次次送爸爸住院，眼见得针头一次次扎进爸爸枯槁的手臂，强忍心酸躲到一边。此刻爸爸却对尔乙说：“没啥，没啥！”还自编打油诗一首，中有“命长终要见阎王，命短些而也无妨”。几进几出，尔乙看得出爸爸回到家是要继续他的著作，在医院里也手捧书本，笔耕不辍。爸爸躺在病床上看书，尔乙坐在小矮凳上看着爸爸，尔乙的心襟再次飘荡到过去。从记事起，爸爸总是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尔乙从少年时离开家到东北闯荡，回城后忙于工作，父子俩少有待在一起的时候。现在坐在爸爸身边，一股血肉亲情悠然升起。人啊，当你领悟到，已是太迟！

第十三章 有涯之生

病魔夺走了爸爸。在最后日子里爸爸被折磨得只剩下 80 多斤，吞咽、呼吸都异常困难。尔乙实在不忍心，找院长要求放弃治疗。院长摊着手为难地说：“老先生是国宝，放弃治疗你们校长要追究我的。”尔乙说：“您就行行好，太痛苦了，给我爸留一份尊严吧！”院长还是直摇头，“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职责。”尔乙问：“您救得了吗？”院长摇摇头，一声叹息。爸爸走时，瞪着双眼，尔乙忍着泪水将双眼合上，心里默默地说：“爸爸，天堂没有痛苦……”

接下来的日子里，尔乙一有时间总是陪伴在妈妈的身边。自从爸爸走了，他就明白，陪伴双亲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时间的流逝，看似不经意，其实很残酷，谁也拉不住，也回不到过去。妈妈也越来越衰老，终于有一天，妈妈拉着尔乙的手，说：“宝，我要找你爸去了。”尔乙摇着妈妈的手，颤声说：“妈，我不要，我不要！”妈说：

“傻孩子，妈想你爸了！孩子，你爸一辈子，看似作出这么大成就，你可知道，他是怎么说过吗？”

“妈，我不知道……”

“你爸爸年轻时说：‘为无益之事，遣有涯之生，读书不过玩玩而已’。”

尔乙脑子一片空缺。“而已”，“尔乙”？

没有父母的日子里，尔乙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妈妈最后说的话，总在心头萦绕，他开始明白，他的名字“尔乙”是怎么个意思。但他还是不明白，爸爸一辈子与书为伍，怎么说“读

书只是玩玩而已”？尔乙常常对着夜空苦思冥想，父母亲的影子挥之不去。有一次他在梦中又遇到爸爸，爸爸笑盈盈地说：“我要写七十七部绿色著作！”尔乙大声说，“爸！我很痛苦，我迷茫！”爸爸说：“孩子，找到平衡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随即消失在梦境中……

尔乙翻身坐起，平衡？平衡！尔乙幡然醒悟。是啊！大到社会冲突，小到家庭琐事，个人的荣辱得失，矛盾无处不在。尔乙出生的那个时代，满脑子接受的教育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其实岂只是争斗？真正的高手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所谓的“正能量”，在物理学中只有“能量守恒”一说，“守恒”，即平衡。既不选择遗忘，其实也遗忘不了，也不沉湎过去。对生活既不怨恨，也不必非要甘之如饴。可也！

第十四章 尾声

尔乙的故事写完了，他静静地坐在书桌边，眯缝着双眼，若有所思。这是尔乙第一次尝试写小说，与他以往喜欢的记实文学有很大不同。每次写记实文学，他首先要坚持真实性，常常要不遗余力地核实许多已淡忘的细节。对于缺失的环节，只能望洋兴叹。但小说不同，可以虚构，否则怎能将童年写得栩栩如生？他想，小说家的幸福，大抵是如此吧？

尔乙没学过文科，对文艺理论一窍不通，依稀记得有句名言，成为他写小说的基本原则——“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尔乙写小说，只是把脑海中的记忆，从一个场景搬到另一个场景，使它言之成理。时空转换，梳理出情节的脉络。人物个性，

将时代的特征烙上去。复杂的过程，归并成流畅的节奏……这一切，不敢有半点生搬硬造。这“基本原则”是否达到了？他还不敢说“高于~”，只能说对得起自己的良知。

一只小手扯动尔乙的衣角，尔乙一回头，小孙子瞪着清澈的眸，稚嫩地问：

“爷爷，你在干什么呀？”

“爷爷在写文章呢！”

“爷爷，为什么要写文章呀？”

“留给宝宝长大看！”

“爷爷，好看吗？”

“不知道！”

“为什么呢？”

“每个人、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记忆！”

“爷爷，我听不懂！”

“宝宝乖，也许、或者、将来……”

第八章：后记

后记

我出生在一个传统文人家庭，虽然从未想过做一个“作家”，但在父母亲文学“光环”照耀下，不受熏陶也难，最心仪“问君能有几多愁”的意境。本书从己未年(2015)中秋开始筹划，到丙申年(2016)中秋完成心愿，个中一个“愁”字，表达了我秋天的心愿，洽乎其然！

本书到此即将编撰完成，本不想写后记，一个原因是想今后还会写一点，似乎还没手。但文字都在电脑网络上，不加紧处理恐出意外，更主要有两点要说明一下，所以还得写一个。

一、文章大都散见于网络，都是以单篇的面目出现的。为说明得详细一些，有时不同的文章中就有了相似的内容，甚至在其中互相拷贝。但是放到同一本书中，尤其在编撰过程中发现，有些内容在多处出现，觉得很不是滋味。如果要删除吧，精力付不起，且有些删除也影响单篇的完整性。所以就作罢了，请阅者谅解。

二、由于有些文章写作年代较早，一些观点不适时宜，一一加以修正也是不可能了，请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

鸣谢！半年前，为编辑《杭大附中回忆录》内人敏琍为我更新了大屏幕手机，所以有了这个新式“武器”我可以走到哪

里编写到哪里，方便极了。本书承挚友田维嘉女士全程校对，工程浩大，感激不尽（数篇后加的文章未经维嘉校对，如有错误，罪责在我）。微信群“平湖秋月·网上文史沙龙”及朋友圈众多好友对封面设计提出许多友好建议。

本书的书名由世友任平题写。有关任平可见拙作《任平简介》和有关文章。本书封面照片是倪建勇夫妇在夜幕中拍摄的之江山。由此突出了“梦萦”……

“校书如秋风扫落叶”，信也！本人才疏学浅，该书缺点错误甚多，期望阅者不吝指教。

己未中秋记于杭州道古桥（丙申中秋改定）

又：本次校对，修改了少量的内容，增加了《西溪烟雨——杭大新村记忆》后记和《枉凝眉》开卷。第一次印刷后，张梦新学长对稿子进行了校对，特此鸣谢。如果还有错误，是我的责任。

庚子初春记于浙大紫金港港湾家园

“杭大”在哪里？

——题杭大人出版社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施建基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路标里。宝石山下，黄龙一脉，文教胜地。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新村里。道古桥边，历史街区，年轮刻记。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民宿里。古刹钟声，径山深处，心有成蹊。
杭大在哪里？在西溪校园里。求是育英，千钧校训，百年桃李。
杭大在哪里？在万人履历里。饱经岁月，遍走四海，徽证如一。
杭大在哪里？在微信电波里。五洲同频，日夜泉涌，永不消逝。
杭大在哪里？在光影绘画里。青葱翠莲，冰天烈焰，长情醉忆。
——杭大在哪里？在心里，在梦里，在眼里，在远方和诗里……

ISBN 978-1-970152-14-2

